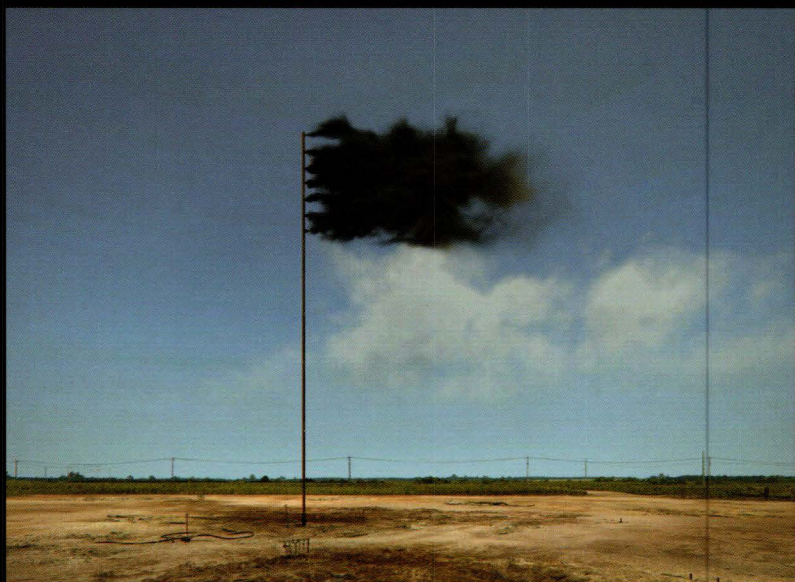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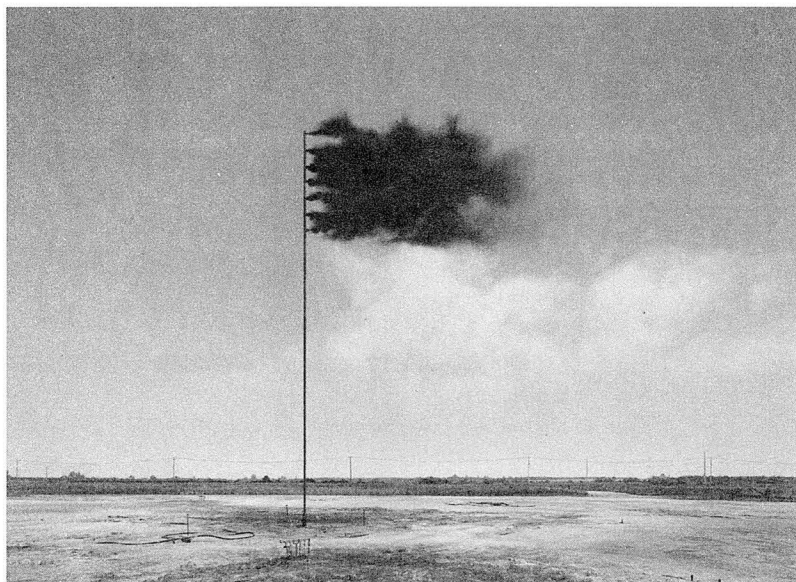




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英] 蒂莫西·米切尔(著)
Timothy Mitchell
钱静远、刘夕冉(译) 那黑(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英] 蒂莫西·米切尔(著)
Timothy Mitchell
钱静远、刘夕冉(译) 那黑(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2011

Copyright © Timothy Mitchell 2011, 2013, 202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4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图字10-2021-19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 / (英) 蒂莫西·米切尔著；钱静远，刘夕冉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6

书名原文: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ISBN 978-7-305-26007-0

I. ①碳… II. ①蒂… ②钱… ③刘… III. ①能源战略—地缘政治学—研究—世界 IV. ①F4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35897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书 名 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

TAN MINZHU SHIYOU SHIDAI DE ZHENGZHI QUANLI

著 者 [英] 蒂莫西·米切尔

译 者 钱静远 刘夕冉

策 划 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郭艳娟

特约编辑 叶 晗 朱雨丹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40mm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99千

版 次 2024年6月第1版 202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6007-0

定 价 84.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 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阿迪（Adie）和 JJ

目 录

英文 2023 版前言：出版十二年后的《碳民主》	i
鸣 谢	x
导 论	001
第一章 民主的机器	017
第二章 来自仙境的奖赏	062
第三章 被统治者的同意	098
第四章 善意的机制	127
第五章 燃料经济	163
第六章 怠工破坏	214
第七章 从未发生过的危机	257
第八章 “麦当劳-圣战”	297
结 论：不要再指望石油	346
英文 2013 版后记	381
参考文献	400
索 引	424

英文 2023 版前言： 出版十二年后的《碳民主》

《碳民主》首次出版距今已经有十二年了，石油和政治的问题看起来已经与当初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开始构思这本书时，美国 and 英国才刚入侵并占领伊拉克，而在 2011 年末本书出版时，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也正式结束。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为入侵部队带给伊拉克的苦难画上句号，也没有终结由占领引发和加剧的政治冲突。但战争的失败确实证明，支持入侵的人用来为之开脱的那些有关石油和民主的观念是有缺陷的。伊拉克的诅咒，在事后看来，并不是它的石油财富；掌握石油的控制权，对西方的民主秩序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而一支占领军，也不是把那种民主传授给其他人的工具。

十二年后，碳民主的问题以新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伊拉克现在已经不再是美国及其石油消费的威胁了。石油现在反而在威胁着那种号称依赖石油消费的生活方式。而民主，不是碳燃料驱动的繁荣与自由在持续的发展和增长之后所得到的最终结果，它只是一种无力招架化石燃料对这颗人类与非人类生命都宜居的行星所构成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胁，而似乎已经陷入瘫痪的政治秩序。

2010 年，当我还在写这本书时，人类剩余碳预算预计为 9100 亿吨二氧化碳。这个预算指的是，我们要将平均地表温度控制在比工业化时代之前的水平高 1.5℃ 以内，还能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量。

这个限额为人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阻止，或至少可以推迟气候系统所可能发生的突然且不可逆转的变化。2010 年后的十二年间，也就是到 2022 年，我们已经用掉了剩余碳预算的一半。¹

几乎所有国家现在都已经承诺，将在 2050 年或 206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但这仅仅是一个愿望而已。绝大部分国家都没能实施达成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政策。美国在 2022 年通过的气候法案* 试图通过补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减少碳排放，但即使是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距离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还是相差甚远——部分原因在于，这个计划不是通过采取措施来减少对能源的需求，而主要依靠的是向企业提供税收激励从而增加能源的供应，但美国的电网规模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扩张，因而就无法匹配这个让能源供应增加的计划。由于我们未能充分地履行对净零排放的承诺，而剩下的碳预算也已经消耗掉了一半，按照当前化石燃料燃烧的速度，在十年内，而不是之前预计的到本世纪中叶，把平均地表温度的升高控制在 1.5℃ 以内所能允许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限额就将被我们用尽。

这里所说的“我们”，主要指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从历史上看，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就产生了占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一半的排放。然而，虽然我们将排放量的增长与 1850 年以来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绝大部分过量的碳排放其实都是最近才产生的。从工业化时代之初到今天，人类燃烧掉的全部化石燃料中，超过 80% 是在 1960 年以后才烧掉的，其中又有超过一半是在过去的

1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pril 2022, ipcc.ch.

* 指美国 2022 年 8 月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译者注

三十年内烧掉的。² 尽管中国已经在最近的碳排放增长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北美的排放量数据却依然是偏离其他地区的异常值。中国、东亚其他国家、俄罗斯、欧洲和其他大型工业化地区人均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大致相同（大约每年 8 吨到 10 吨二氧化碳当量）。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绝大部分国家只有前述地区人均值的四分之一到一半，有些国家甚至更少。可另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每人每年却要消耗掉 20 吨左右的碳预算，是其他工业化大国的两倍。³

这些按国家划分的人均数据掩盖了另一种不平等。如今，排放量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国家和地区之间，还越来越多地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收入前 10% 人口，要对超过四分之三的碳排放负责。举例来说，在北美，收入最低的 50% 人口产生的人均碳排放，与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相比，甚至还不到六分之一；欧洲的这一比值也很接近。而在这两个地区，在从 1990 年到 2019 年的三十年间，收入最低的 50% 人口产生的人均碳排放量似乎还减少了 25% 到 30%。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收入和消费的减少，再加上国家气候政策的影响。因此，这两个地区的这一半人口，已经走上了实现 2030 年将升温控制在 1.5℃ 以内的人均排放量目标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最富有的 10% 人口必须将排放的碳减少 80% 以上才能达到相同的基准。⁴

2 计算结果来自 Pierre Friedlingstein et al., 'Global Carbon Budget 2021',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vol. 14, 26 April 2022.

3 Lucas Chancel, Philipp Bothe, and Tancrède Voituriez, 'Climate Inequality Report 2023',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world. 其他异常值包括个别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小国与澳大利亚。这里的人均数据代表国内消费产生的估算碳排放量，进出口环节的隐含碳排放量（embedded emissions），以及公共和私人投资所占的碳排放份额。

4 Lucas Chancel, '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over 1990–2019', *Nature Sustainability*, vol. 5, November 2022: 931–938.

vii

当今的民主政治似乎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它无法把未来世代的利益纳入考量范围，甚至连不久的将来都无法顾及。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突出。美国是大型工业化国家中人均化石燃料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也是从历史上看，对减少依赖化石燃料的转型最顽固抵制的国家。而这两个因素又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结合在了一起：有特权的少数人口贡献了过量碳排放中越来越大的份额——也贡献了与过量碳排放相伴的对转型的顽固抵制。

在《碳民主》中建立起来的这种理解能源政治的方式，如何帮助我们思考当前的挑战？让我先来回顾一下本书的若干主题。第一步是避免能源决定论，也就是将化石燃料消耗量的不断增长，解释成工业社会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事实上，与此后相比，19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产生多少过量的碳排放；不仅如此，西方对于从1960年代以来消耗的极其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并不是西方工业化生活的一项自然而然的特征。各种高碳的生活方式，是在重型交通工具的设计、城市城郊以车辆为中心的布局规划、建筑物能源使用的低能效标准、农业中对合成化学品和重型机械的依赖，以及其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建立和支撑这种对碳燃料的过度消耗而被人们选择的发展方向中，被打造出来的。西方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所面临的最新“威胁”，即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天然气供应的中断，就展现了这种依赖的人为打造性质。虽然能源供应的中断导致了相当大的短期困境，特别是在诸如英国这样政府拒绝管控短缺局面的国家，但是，欧洲很快就转向了替代性的能源供应。据当时的预测，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就将增长20%。⁵

5 Dave Jones, 'European Electricity Review 2023', ember-climate.org, 31 January 2023.

第二，石油政治不仅仅在于创造这种对碳能源的依赖。这种依赖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削弱人们对于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所提出的种种诉求。本书通过对煤炭和石油进行历史比较来探讨这一点。令人意外的是，虽然石油可以与削弱民主联系起来，但对煤炭的依赖似乎并不是达成民主政治的障碍，反而是使大众民主本身得以实现的那个因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像历史学家们已经论证的那样，只是因为煤的燃烧驱动了工业革命，从而创造出为改善集体生活而斗争的新的社会动力，而是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煤炭的广泛使用，尤其是以燃煤发电，使得许多国家都几乎完全依赖一种单一的、集中的能量来源。这种依赖会产生脆弱性，一种容易受政治中断（political disruption，或译“政治干扰”）影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赋予了那些生产和运输煤炭的工人一种关键的能力——中断能源供应的能力。工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能力来提出自己的各种政治诉求，而他们所仰仗的，就是这种足以关闭整个能源系统的力量。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这种力量和这些诉求催生了现代的大众民主。因此，本书从一种可以对碳能源的流动进行阻断或怠工破坏（sabotage）的能力入手，来重新定位民主的问题。

viii

石油的政治潜力则非常不同。石油是液体，生产它就不需要把大量劳动力派遣到地底工作。石油被装载在油轮上跨洋运输，当石油的供应受到政治中断的威胁时，可以很容易地改变路线。出于这些原因及其他原因，工人们光靠自身就更难中断能源的供应，也就更难利用这种中断来构建政治诉求了。此外，从煤炭政治转向石油政治，意味着发生了从人类使用的第一种化石燃料转向第二种的历史性变迁。这样的先后顺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空间关系。工业民主形成于很靠近煤

炭来源的地方，因而在能源生产和政治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石油的消费／耗，同样也集中在这些依靠煤炭发展起来的工业中心，但与煤炭不同的是，绝大部分石油的产地都在其他地方。石油的供应跨越了比煤炭长得多的距离，把生产地和主要消费地隔绝了开来，使得石油产地的工人很难与运输路线上或消费端的工人建立联盟。所以，石油不仅在生产和运输的技术上有所不同，更难对其进行阻断或怠工破坏，更难围绕它建立起民主的安排，而且，石油现在还广泛地分布在一个规模大得多的生产、流通与使用的帝国网络之中。

随着石油的开采和使用，怠工破坏的潜力已经从那些利用它来推进民主诉求的人手中，转移到了由私人股东或国家所有的大型企业手中。实际上，这些跨国公司，就是作为实施另一种形式的怠工破坏的手段而开始出现的。而由石油公司组织的对石油供应的限制和中断，就不是为了推进争取集体生活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政治诉求，而是为了提出实现巨额利润的金融诉求。

石油以另一种方式塑造着民主的可能性，而这种方式对气候的政治尤其重要。正如本书所探讨的那样，与 20 世纪后半叶石油生产的迅速崛起同步发生的，是北大西洋世界各工业化国家治理人口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标志，是一个全新治理对象的出现，而这个新的对象就是“经济”（the economy）。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统计学家和经济规划者们发展出了新的方法，来估算一个国家境内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值，描绘收入是如何通过工资支付和产品购买而在家庭和企业之间流通的。他们开始测量这种资金流通，也就是后来逐渐被我们认知为 GDP 或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东西，并把他们所测量的总体称为“经济”。他们在估算这个全新对象的规模时，

会将某些费用计入在内而将某些费用排除在外，还会将某些被视为负担的东西，包括越来越高的垄断性超额利润和利息费用，都算作利益。这些形式的排除和计算构建出了一种可以被视为规模在逐年“增长”的对象。这帮助创造了一种“增长的政治”（politics of growth），在这种政治中，经济增长的规模被误认为是衡量进步与福祉的标准。渐渐地，经济增长这个必须要履行的要求，就能被用作一种政治手段，为不平等和社会贫困，以及到了 1970 年代提高工资、延长休闲时间、提供充足的住房和医疗保障变得日益难以实现等问题作辩解。

当前，向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生活方式转型的势头终于开始加强，而本书对能源政治的分析，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变化呢？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终结，会让所谓的能源战争画上句号吗？改用分布更广泛，且可在本地控制的发电方式，有可能创造一个社会福利和保障得以平等获取的更民主的未来吗？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能源供应的方式可以开启一些政治机遇，但它本身并不决定政治的形式。

本书的分析突出了三个将会对能源转型所开启的政治可能性产生影响的因素，提请读者注意。第一，能源的生产与流通将会掌握在谁手中？是私营公司、国有能源企业，还是市政和地方层面的机构与合作社？小规模、分散式的能源生产并不必然就比更大规模的能源生产更加民主。毕竟，在化石燃料兴起之前，能量来自农田、森林、畜力、人力和河流的时代，能源生产要比今天规模小得多，也分散得多。尽管那个时代所能组织起的各种形式的压迫，还无法达到化石燃料的使用才最终使之达到的规模，但那并不是一个更民主的时代。应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有谁要为能源供应的控制承担责任，又有哪些脆弱的节点，能让这种责任得以落实？

第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是否会以一些特定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而这些方式能使我们从通过“经济”对我们的治理中被解放出来？正如本书所考察的那样，经济思想的发展，一直与化石燃料的历史紧密相连。20 世纪中期以后，石油消耗量发生了现象级的巨幅扩张，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经济”的发明，而它的发明也是由石油的巨量消耗所促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测量和管理，充当着衡量人民福祉的一项指标，也成为限制政治可能性的一种方式。这种经济理性取决于以特定的方式，对能源使用、非可再生资源耗竭，以及强加在未来世代身上的债务、股东利益索求和其他负担进行计算（counting）——以及不计算 / 扣减（discounting）。这种享受当下财富的强烈欲望，正在威胁着地球系统的稳定和许多物种的生存。人们常说，要向碳时代告别，向各种会造成生态破坏与物种灭绝的行为告别，就要求我们实现一种新形式的绿色增长，甚至是去增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打破由碳能源塑造的思维模式。要把我们自己从“经济”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必须更好地去理解与“经济”及其增长相关的理念，是如何一直以来让我们能够以牺牲未来为代价而生活的。

第三，未来的能源生产，将会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被资本化？与许多其他类型的资本项目相比，能源基础设施为那些控制石油生产与流通设施的人提供了尤其长久且可预测的收益流。这种长久且可预测的收益流，在例如说石油时代，曾使得各大跨国石油公司在许多个世代中一直都是这颗地球上最大的企业。而它们之所以有这样巨型的规模，并非因为石油行业相比其他主要产业，需要规模更加庞大的企业组织，而是因为它所能创造的以公司股份的形式——也就是股东对未

来利润的所有权——出售给当下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在规模上要远远大得多，收益持续时间也长得多。能源基础设施在政治与技术上的持久性（durability），以及这种持久性所带来的对未来收益的高昂索求，使巨型石油公司能够以一种强大的模式来运作，通过这种模式，少数人以牺牲未来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繁荣。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得到回报之后，这些掌控在股东手里的大型公司非但没有降低能源的价格，反而让所有未来的能源使用者承担重负，让他们以自己为能源付出的高额成本，来偿付购买了能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的未来预期收益份额的索求。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这种对未来施加负担的做法，将如何被安排？一种更民主、更公平的能源系统只会允许供应动力所必需的机制被资本化，而不允许成本早已收回后仍将长期流入的未来收入被资本化。换句话说，民主和社会正义不仅依赖于对当前资源做出控制，还依赖于对那些使当下的股东和其他掌权者得以控制未来收入的信贷装置加以限制。但这就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了。

蒂莫西·米切尔

2023 年 5 月

（聂瑶 译）

鸣 谢

xī

我曾在不少研讨会和讲座上介绍过本书的部分内容，各位与会者对我的批评和建议，以及安德鲁·巴里（Andrew Barry）、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乔夫·埃利（Geoff Eley）、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和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与我更加深入的讨论，都让我获益匪浅。不少我从前的学生与我分享了他们在相关主题上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还为我研究贡献了他们的援助。他们是：卡塔尤恩·沙菲（Katayoun Shafiee）、穆尼尔·法赫尔·艾尔丁（Munir Fakher Eldin）、贾纳伊·厄兹登（Canay Özden）、菲拉特·博兹察利（Firat Bozçalı）、莱恩·韦伯（Ryan Weber）和山姆·鲁宾（Sam Rubin）。

本书的部分内容辑选自我曾在他处出版的材料。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曾以“碳民主”（Carbon Democracy）为题发表于《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38: 3, 2009: 399–432）；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曾以“经济学的资源：制造 1973 年石油危机”（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s: Making the 1973 Oil Crisis）为题发表于《文化经济期刊》（*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3: 2, 2010: 189–204）；第八章的早期版本曾以“‘麦当劳-圣战’：美国全球秩序下的伊斯兰教”（*McJihad: Islam in the US Global Order*）为题发表于《社会文本》（*Social Text* 20: 4, 2002: 1–18）。

有三个人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阿德里安·米切尔和贾丝廷·米切尔（Adrian and Justine Mitchell）始终秉持批判的精神认真倾听我的想法，并给予我万般鼓励，让我最终得以成书。莱拉·阿布-卢古德（Lila Abu-Lughod）与我分享了她不可替代的智慧、洞察、耐心和关怀。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导 论

化石燃料既造就了现代民主的可能，也为之设下了限制。为了理解这些限制，本书首先来探讨，是哪些因素，使被我称为“碳民主”的这种特定形式的民主政治得以出现。但在溯及过去之前，我先来阐述我想到的某些当代的限制。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其中一个限制曾被广泛讨论。人们常说，中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缺乏民主。许多研究该地区的著述者认为，这种民主的缺乏与石油有关。那些出口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资源的国家往往不太民主。2011 年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抗争浪潮，似乎证实了大额石油收益与对更民主、更平等的生活提出诉求的困难程度之间存在的这种关联。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石油产量越小，产量下降得越快，争取民主的斗争就越容易展开。最初爆发抗争的突尼斯和埃及，以及抗争迅速蔓延开来的也门、巴林和叙利亚，都是中东地区石油产量最小的国家，而且它们的石油产量都在下降。而在中东八个主要石油生产国中，只有在产量最小的利比亚（而且该国近期也遭遇了产量下跌），类似的政治斗争势头才在增强，虽然发生在该国的冲突也是最快演变为暴力、最快遭到外国干涉的。¹

1 2010 年中东地区最初发生抗争的五个国家，石油产量最低每日 4.4 万桶（巴林），最高每日 66.8 万桶（埃及）。而中东八大产油国（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上卡塔尔）的石油产量，则在每日 179 万桶（利比亚）到每日 1051 万桶（沙特阿拉伯）的范围内；卡塔尔虽然仅生产每日 143 万桶，但人均石油产量最高，此外还是中东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阿曼（每日 86.9 万桶，2011 年春天只发生了轻度的政治抗议）恰在这两组之间。而在中东石油产量较少或几乎为零的五个国家中，（转下页）

2 这个问题有时被称为“石油诅咒”。大部分讨论它的人，很少谈及石油本身的特性，以及它是如何被生产、分配和使用的。他们讨论的对象不是石油本身，而是石油财富，也就是在石油转化为政府收入和私人财富之后的累积所得。对于石油的反民主属性，他们给出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它所带来的盈余收入上：它为政府提供了资源，来压制异见、收买政治支持，并通过发放公共救助和价格补贴，来缓解要求更平等地分享繁荣成果的主张对政府造成的压力。这些解释并不涉及石油开采、加工、运输和消费的方式，不涉及石油作为一种高度集中的能量来源所具有的各种权力，也不涉及那个将石油转化为各种形式的财富与权力的装置。在他们看来，石油诅咒仅仅在折磨着那些依赖石油收入的政府，而不会影响更广阔的世界获取驱动其物质生活与技术生活的能量所依靠的各种过程。²

对石油生产装置的忽视，体现了人们对民主持有的某种根本性的认识。在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九个月后，一位被派往该国南部的美国民主专家，在与某个省议会的议员们探讨“治理能力建设”时

（接上页）有四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动态更由巴以冲突而非石油政治牵动（以色列 / 巴勒斯坦、约旦和黎巴嫩），还有一个国家（摩洛哥）则主要依靠蓬勃发展的另一种矿产——磷酸盐的出口产业。数据包括原油和其他液态石油产品，来源：www.eia.gov。

2 多数研究在讨论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时普遍倾向于忽视石油的物质性，但以下著作是一个重要的例外：Fernando Coronil, *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这本书把上述倾向联系到了这样一个更广泛的现象上：在理解财富形成的过程中，自然因素的作用被普遍地抹杀了。亦参迈克尔·瓦茨（Michael Watts）参照石油时代之前的政治结构，对“石油复合体”（oil complex）及其构建的“可治理空间”（governable spaces）的讨论：‘Resource Curse? Governmentality, Oil and Power in the Niger Delta, Nigeria’, *Geopolitics* 9, 2004: 50–80，以及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对组织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的劳工体制和形象塑造等问题的考察：*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就分享了这种认识。“欢迎来到你们全新的民主体制，”他一边开始展示幻灯片上美国人为伊拉克人设计的行政结构，一边说道，“我见过你们这样等待接受民主制度的人。我在柬埔寨见过，在俄罗斯见过，还在尼日利亚见过。”据说，当这位民主专家说到此处时，两名议员直接走出了会场。³对一位民主专家来说，无论在哪里，民主政治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它由一套程序和政治形态组成，这些程序和政治形态应当要以这样或那样的翻版，被复制到每一个成功的民主化实例中去，就好像民主只能作为其自身用碳粉复写纸复制出来的副本出现一样。民主基于一种模型，一个原初的理念，可以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如果它失败了——就像它在许多石油国家看上去所经历的那样——那一定是因为模型的某些部分缺失或发生了故障。

理念（idea）是一种在不同地方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相同的东西，可以从一个语境或背景中复制到另一个语境或背景，不受当地历史、环境和物质安排的束缚，变得抽象化、概念化。民主专家必须将民主变成一种可以轻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抽象概念，这样，他就可以把它装进自己的手提箱里，或放在幻灯片上，从俄罗斯带到柬埔寨，从尼日利亚带到伊拉克，向人们展示它如何运作。

一旦某个人将民主变成了某种在世界各地到处流动的理念，为了随之流动，他就必须拘泥于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理念如何运
3 作，解释人民如何实现民主。如果民主是某种理念，那么使国家实现民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理念进入人民的头脑。民主的问题因而也就转化成了如何打造一群心向民主理念的新型公民的问题。

3 Rory Stewart, *Occupational Hazards: My Time Governing in Iraq*, London: Picador, 2006: 280.

在美国对当代中东的讨论中，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如何制造新型的公民。无论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经济改革、巴勒斯坦的未来，还是关于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民主化的障碍、反马克思主义的扩散、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抗争，在各种辩论中，人们都在反复关注怎样培养一种新型政治能动者（agent）这个问题。如何创造具备足够能力来对权威施加限制的权力主体？如何培育一个拒绝授权给威权主义的公民群体？要产生一个建立在依据理性的个人利益而不是腐败或裙带关系来行事的能动者的基础上的经济形式，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启蒙、训练或经验？是什么能产生基于和反对派的相互信任与尊重，而不是对他们的怀疑和压制的政治形式？简言之，这些辩论试图在探讨的是，人们如何才能学会认识到自己是新的权力形式的主体，并以这一身份做出反应？反过来说，什么样的权力形式能够塑造出自由主义或民主的政治主体？

对于提出及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已经有了大量批评，尤其是在有关民主化的辩论中。批评者们常常指出，这种提问和解答的方式忽视了在发挥作用的所谓“更大的力量”。美国讨论中东民主问题的著述通常很少触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少触及为了将人们改造为驯服听话的劳动者和自愿积极的消费者——这两个角色是解决西方的经济危机所必需的——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很少触及帝国的力量，对各大帝国来说，民主化策略只是为了勉力维持其日渐孱弱的霸权而采取的更广泛行动中一个次要的、外交性的部分；还很少触及各占领势力和军事政权所部署的暴力与镇压手段。然而，类似的批评忽视了这些辩论中这样一个有趣的概念：民主被视为一个工程项目，它关注的是新型政治主体的制造，以及如何使人们服从新的被治理的方式。

以一个近期对中东民主化问题的研究——“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项目——为例。该项目在五个阿拉伯国家进行民意调查，以测量可能有助于建立民主制度的个人态度与倾向在这些国家的存在程度。调查针对的倾向包括“政治宽容、尊重多样性、公民参与和人际信任”。⁴ 该项目最初由美国国务院的“中东伙伴关系倡议”（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资助，负责管理该项目的委员会包含了来自该项目所要测量和记录其政治文化的各个调查对象国的学者。“中东晴雨表”项目是调查范围更广泛的一个名为“全球晴雨表”（Global Barometer）的计划的一部分，除中东外，这一计划还在非洲、拉美和其他地区开展类似的研究。“阿拉伯晴雨表”和其他一些针对中东地区的类似研究所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已经让美国官方圈子中关于阿拉伯世界政治态度的许多被普遍接受的假设受到了质疑。

无论“阿拉伯晴雨表”在向我们展示官方话语的某些局限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该项目在乍看之下似乎就存在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同样也影响了许多关于民主化和公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它似乎在寻找一种“没有民主化的民主”（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ization）。⁵ 这个项目预设的前提，是“成功的民主化需要一个重视民主并具备民主政治文化要素的公民群体”。⁶ 然而就我所知，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表明，公民文化——信任、宽容、相互尊重的态度，以及其他自由主义美德——的存在，能够促进民主的出现。事实上，指向相反结论的历

4 Mark Tessler and Amaney Jamal, 'Political Attitude Research in the Arab Worl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9: 3, 2006: 433–437.

5 Ghassan Salamé, ed.,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London: I. B. Tauris, 1994.

6 Tessler and Jamal, 'Political Attitude Research'.

史证据并不鲜见。在西方的民主斗争史上，我们可以反复找到这样的例子：那些宽容、受过教育、开明的政治阶层，是如何扮演民主化的反对者，拼命阻止将实际的政治权利扩大到无财产者、宗教与种族少数群体、妇女和殖民地臣民的。在许多情况下，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所拥有的公民美德，反而恰恰成为他们反对民主化的理由。他们常常声称，正是由于自身的文明和理性，他们有资格为那些还不足以替自己发声的群体充当利益代言人。当人们获得了民主权利之后，行使这些权利也许能鼓励良好公民美德的发展，至少对于已经扩大了的那个政治阶层中的成员是如此——对于这些美德的传授和实践就变成了人们使自己服从于民主权威的一种方式。然而另一方面，民主化的过程往往是一场反对这些美德的战斗。一直以来，民主化的过程所需要的，是一套更加不妥协的参与和实践。⁷

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这些更加不妥协的参与，以及碳能源如何帮助创造了各种形式的能动性，使人们能够进行有效的不妥协行动。

★

我着手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想要更好地理解民主与石油之间的关系。起初，我和其他人一样，把石油看作一回事，把民主看作另一回事，我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前者似乎对后者有害。可是，当我开始追溯中东石油工业的建立过程，探究人们如何勘探石油，如何建造输油管道和管道终端的储运码头（terminal），如何将石油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热能和不同种类的运输形态，再将这些流程中的收入转化为

7 参 Bruno 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及 Lisa Disch, 'Representation as "Spokespersonship": Bruno Latour's Political Theory', *Parallax* 14: 3, 2008: 88-100。

利润，并寻找流通和管理这些资金流的方法时，我就越来越明白：碳能源和当代民主政治是错综复杂地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本书与其说研究的是民主和石油，不如说是民主作为石油——民主作为一种运作机制在多个层面上都关涉碳能源的生产与使用的政治。

如果针对石油和民主的研究将注意力局限在石油财富——石油及其腐化的权力所带来的收入——的问题上，而不是从石油生产和流通的过程入手，这种研究思路其实就不自觉地效仿了能源网络最初的建立模式。1914年，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Shell）开始在委内瑞拉生产石油，该国的独裁者戈麦斯将军（General Gómez）要求荷皇/壳牌将炼油厂建在靠近该国海岸的近海岛屿——荷属库拉索岛（Curaçao）上。他想要石油带来的财富，但不想要炼油厂会带来的大量集中的工人，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劳工诉求。⁸十年后，那家后来被称为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 BP）* 的公司开始在伊拉克建立石油工业，它规划了一条穿越邻近国家向地中海通去的输油管道，大部分石油会从地中海装船运送到欧洲的各个炼油厂，从而将这条细长的石油生产线延伸到更远的距离。当伊拉克日后的民族主义政府要求英国石油在伊拉克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炼油厂时，该公司极力反对。也就是说，如果从表面上看，石油似乎主要是在转化为资金流之后才影响生产国的话，那么这个表象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管道的铺设、炼油厂的设置、开采权益金的谈判，以及其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规避

8 Coronil, *Magical State*: 107.

* 这家公司为了摆脱旧日形象、拓展业务范围，现已改名为“BP”（在宣传上会用小写“bp”作为品牌名，而在中国有时会用“碧辟”这个音译名），并以“Beyond Petroleum”（意为“超越石油”，英文缩写亦是“BP”）这个口号宣传品牌。为避免读者误解，原书中“BP”的公司名在中文里依然译作“英国石油公司”（简称“英国石油”）。——编者注

劳工组织的诉求而做出安排，都关涉碳民主的问题。石油被转化为巨额却不受问责的政府收入，并不是民主与石油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以特定的方式从能量 / 源* 的流动中打造政治关系所造成的结果。

有关石油诅咒的论述未能追踪石油本身的生产和流通，而将这个问题诊断为只在石油流动并转化为能源、利润和政治权力的网络的其中一组节点——各石油生产国的决策机关——上发生的弊病。这个诊断的特点，是把只在石油生产国发现，而在非石油国家不存在的症状分离出来。然而，如果民主并不是碳粉复写纸的副本（carbon copy），而是以碳为基础（carbon-based）的呢？如果民主是以特定的方式与碳燃料的历史相联系的呢？我们能否追踪这个碳本身，也就是石油，从而将影响石油生产国的问题与碳民主的其他局限联系在一起？

主要工业化国家也都可以算石油国家。如果缺少了源自石油的能量，这些国家当前各种形态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都将不复存在。这些国家的民众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饮食、出行、住宿以及消费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方式，而这些方式都需要从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中获取大量的能量。这些生活方式并不是可持续的，如今，它们正面临着将会终结它们的双重危机。

第一重危机在于，新发现的石油跟不上现有供应枯竭的速度。尽管对化石燃料储量的估算是一个政治-技术性（politico-technical）的过程，涉及相互对立的计算方式，但目前的状况显示，我们似乎即将进入一个能源供应量下降的时代。⁹ 地球的化石燃料储藏不会彻底

* 英文的“energy”兼具“能量”与“能源”之义。中文译文根据它出现的语境选择其中的一种译法行文，但有时该处可能兼有两种意涵，提请读者注意。——编者注

9 详见结论章。

耗尽。随着煤炭和石油变得越来越稀缺，开采难度越来越高，开采剩余储藏所要花费的高昂成本和消耗的大量能源，就将终结这个化石燃料的时代，并带来我们现在还无法预知的后果。¹⁰ 让-保罗·萨特所形容的这种“由其他生物馈赠给人类的资本”在地球上的储备还能被人类消耗的时间，将会极为短暂。¹¹ 就石油这种最容易开采、如今供应量却变得最难以提升的化石燃料而言，人类从现代石油业起步的 1860 年代到 2010 年这一百五十年间总共消耗掉的石油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在 1980 年到 2010 年这三十年里被燃烧掉的。¹²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化石燃料的时代现在看来似乎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

第二重危机是，人类在消耗这些能源的过程中，就像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US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在半个世纪前的 1965 年所警告的那样，“无意间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地球物理学实验”。在仅仅几代人的时间里就燃烧了过去五亿年间在地下积累的化石燃料，人类由此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将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到 2000 年时预计升高 25%。1965 年的报告警告，“这可能足以产生可测的，甚至是显著的气候变化”，并且还补充称，这些变化“可能

7

10 Vaclav Smil, *Energy in Nature and Society: General Energetics of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204. 当燃料供应变得越来越难以开采，化石能源的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就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被称为能源投入回报率（energy return on energy invested, EROI）的下降。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参 Smil, *Energy in Nature and Society*: 275–280。

11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 1, *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London: Verso, 1977: 154.

12 直到最近，人们都以为煤炭的储藏量超过了石油，能支持几百年的充足供应。但近来的研究表明，对煤炭储藏量的估计甚至比石油更加不可靠，而且对于美国这个拥有最大煤炭储量的国家来说，其煤炭产量已经到达峰值并开始下降，全球煤炭产量则最早将在 2025 年达到峰值。参 Werner Zittel and Jörg Schindler, 'Coal: Resources and Future Production', EWG Paper no. 1/01, 10 July 2007, at www.energywatchgroup.org。

对人类来说是有害的”。¹³ 这场实验进行的速度比预期更快。自工业时代之初至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已经提高了 40%，而这一增长中有一半都发生在 1970 年代末以后。由此导致的地球气候变化不仅从人类立场来看是一个有害的威胁，而且是一场在整个地球尺度上的灾难。¹⁴ 对民主来说，石油所构成的一个更大的局限在于，为治理化石燃料时代而产生的那些政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化石燃料的产物，它们也许没有能力处置将终结化石燃料时代的事件。¹⁵

追踪碳元素并不意味着用一种物质主义（materialist）的叙事来取代民主专家们理念主义（idealist）的方案，或是将政治的结果直接归因到决定它们的能源形式——仿佛碳的权力是从油井或采煤作业面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就传递到了掌控国家的人手里一样。碳本身必然经历转化，而转化的过程从那些将碳从地下开采出来的人所做的劳动就开始了。实现碳的转化需要建立连接、构建联盟——不受物质与理念、经济与政治、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暴力与表征之间

13 R. Revelle, W. Broecker, H. Craig, C. D. Keeling and J. Smagorinsky,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in *Restoring the Quality of Our Environment: Repor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anel*, Washington: White Hous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November 1965: 126–127.

14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2007, available at www.ipcc.ch. 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及其同事针对古气候数据的研究显示，冰层融化的反馈循环可能导致冰层加速消失，从而引发更极端的气候变化，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发现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严峻警告都显得乐观得可笑。James Hansen, Makiko Sato, Pushker Kharecha, Gary Russell, David W. Lea and Mark Siddall, 'Climate Change and Trace Gas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vol. 365, 2007: 1, 925–954.

15 埃尔马·阿尔特法特（Elmar Altvater）清晰地阐述了这种双重威胁，并进一步指出它们代表了资本主义逻辑与化石能源的物理性质之间“相容”（congruence）的时期的终结。（'The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Fossil Capit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43, 2007: 37–59）。在下文中，我将对这些物理性质给出另一套阐述——例如说，石油与煤炭的可运输性就大不相同，这种差别难以符合那种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具有一系列不变“逻辑”的历史过程的概念。

的分际所限制的连接与同盟。由于这些连接的存在，将一种形式的权力转译（translate）为另一种形式得以成为可能。要理解化石燃料的使用与民主诉求的提出之间的相互联系，就需要追踪这些连接是如何建立的，它们创造了哪些脆弱性与机遇，以及在哪些狭窄的通过节点（passage point）上进行控制是格外有效的。¹⁶ 组织能源流动与集中的不同方式会开启或缩小各种政治的可能性，围绕能源的分配与控制而被装配（assembled）起来的人员、资金、专家知识*与暴力的安排方式，也会增强或限制这些可能性。

★

与化石燃料提供的能量一样，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晚近现象。这两种权力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相互交织。本书追溯了二者是如何被共同装配起来的，从第一章讨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煤炭与欧美大众政治的兴起开始。人们长期认为，利用蒸汽动力开采深埋地底的煤层，让煤炭的兴起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大规模制造业和现代城市的发展，而从煤矿、工厂和现代城市生活中，就涌现出了争取民主的力量。但這些力量通常被片面地认为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这种看法认为，在工作场所、工会和政治俱乐部中聚集的人们形成了一种

* 中文译文把“expertise”（专业知识）译作“专家知识”，以呼应作者对于专业知识被专家（expert）垄断的批判。可参作者所著的《专家之治》（*Rule of Expert*）一书。——编者注

¹⁶ 加文·布里奇（Gavin Bridge）将注意力从仅关注石油生产国和资源诅咒，转移到了观察由石油相关的企业所组成的多元网络上来，而这个网络上的每个环节，从生产、精炼到分销，到现在的碳捕集与封存、碳信用额度交易，都可能受到不同政治体制的治理。‘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Extractive Sector: Governing Resource-Bas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 2008: 389–419. 关于转译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和“必经通过节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或译“强制通行点”），参 Michel Callon,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ohn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86.

政治意识，促使他们为实现更平等、更民主的集体生活而斗争。这种论述之所以片面，是因为它忽略了装配这种政治能动性所需的设备，也忽视了寡头统治此时面临的技术上的脆弱性。第一章将会指出，利用由煤炭新提供的大量能量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技术性的世界（socio-technical worlds）具有特定的脆弱性，而正是能量密度高度集中的碳能源的流动，为组织有力的民主诉求提供了手段。

请先牢记这种对能量流动和民主兴起之间关系的新认识，我在第二章中转向了对中东石油工业起源的考察。标准的历史叙事讲述的，是一群英勇的开拓者在偏远艰险的地区勘探石油，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一战”前夜采取行动保卫这一战略宝藏的故事。然而，我从煤炭与民主的历史中了解到，能源政治不仅涉及保障能源的供应，还包括中断能源流动的能力，基于此，我提出了另一种叙述方式。我探讨了石油公司如何相互合作，以延迟中东石油工业的初步发展，而政客们又如何将对海外石油的控制，视为削弱本国民主力量的工具。中东石油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构成了民主政治形成与瓦解过程的一部分。

反对民主的斗争助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在这场战争中诞生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及新的控制中东产油区的机制——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Mandates）制度。通常的论述将这些事件描述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提出的、倡导自决（self-determination）这个民主原则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所体现的理想主义，与掌握中东产油区尤其是伊拉克控制权的欧洲列强的私利之间的较量。第三章展示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欧洲左翼为争取以更民主的方式控制帝国主义、控制原材料的获取，在“一战”期间进行了一番斗争，这种斗争却被转译成了一个非民主的

机制，用于制造“被统治者的同意”（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制造这种对帝国统治的“同意”，最重要场所就是伊拉克。我在第四章中考察了伊拉克和中东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如何做出回应，对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又如何取得。伊拉克及邻国随后建立起了石油工业，为组织民主政治的诉求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这种新的能量流动的分布与规模，也让推动这些政治诉求变得日益困难。

“民主”一词可以有两种含义。它既可以指一系列方法，民众用这些方法来提出有力的诉求，以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共同世界。或者，它也可以指一种治理民众的模式：利用民众的同意作为手段，通过分割共同世界，来限制他们对更大平等和正义的诉求。这种限制是通过将某些领域认定为要交由民众决策的关切公共之事，同时将其他领域划定为需要通过另外的控制方式来管理的事项而形成的。例如，治理的实践可以把共同世界划分成一块由财产规则所统摄 / 治理的私人领域，一块由自然法则所统摄的自然世界，一块由经济学原理所统摄的市场。于是，争取民主的斗争就变成了一场议题分配的较量，它试图将其他人主张为私人的问题（例如雇主支付的工资水平），属于自然的问题（例如自然资源的枯竭和大气中的气体组成），或者由市场法则所支配的问题（例如金融投机）确立为关切公共之事。在 20 世纪中期，这种“分配的逻辑”（logic of distribution）开始划定出一个十分庞大的新治理领域，而统摄这个领域的规则限制了其他的政治诉求：这个领域后来被人们称作“经济”（the economy）*。¹⁷

* “经济”（the economy）是本书所要批判的重要概念，有别于不加冠词的经济（economy），参第五章。中文译文以引号标识前者，但它在做形容词时或在复合词组中除外。——编者注

17 参 Jacques Rancière,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6，这本书把民主斗争看作一场反对“分配的逻辑”——将某些事项指定为公共之事，将另一些指定为私人之事——的战斗。

10 第五章追溯了“经济”在 20 世纪中期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对象的形成（大多数论述都错误地将“经济”的出现定位在比这更早一到两个世纪之前的时间）。本章还考察了以石油为形式的低成本碳能源产量的迅速增加，如何促进了这种新的政治计算和民主治理的模式。与煤炭时代的政府所特有的物质计算形式不同，石油的丰富使得新的计算方法成为可能，这些计算方法进而开创了以无限经济增长这一新原则为基础的集体生活管理方式。对经济增长的管理，为治理碳民主提供了新的理由以及新的规管模式。

尽管“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安排物质生活的方法，但它无法控制在许多人看来要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危机负责的那种力量——国际私有资本的流动，正是这些资本的投机性转移导致了欧洲金融与政治体系的崩溃。对于这个问题，石油似乎也提供了一个答案，在它的支持下，“二战”后一种新的控制国际资本的方法被创建出来。除了追溯国民经济的形成，第五章还考察了国际金融机制的建立，而建立它们的目的，就是去遏制私有跨国银行的投机活动对民主政治的威胁——这种威胁日后将在 20 世纪以新的规模再度出现。由于这种新的控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管理石油的流动来运作的，而中东正在成为世界石油的主要来源，要维持民主在西方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可能性，再次将中东安排在帝国式的控制之下就变得十分重要。“二战”后，将中东石油置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托管”（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这种帝国控制形式之下的尝试遭到了石油公司的阻挠，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简单的控制形式——“冷战”的框架。将某些区域划定为不适合推进民主诉求的场所，这样一种“分配的逻辑”将中东纳入了这类区域之列。

我对碳民主的论述，着手于追踪一种还算简单的关系，也就是对煤炭的依赖所创造出来的脆弱性，与提出有效平等诉求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然而，到了本书的这个阶段，我的论述已经发展出多个维度，展现了从煤炭向越来越多使用石油的转变、远远更加广泛延伸的能源生产与流通网络、充裕的化石能源所催生的新形式的集体生活，以及依赖于石油的生产而正在急速扩张的商品与金融的流通。

在第六章，我回到伊拉克和中东，考察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各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如何演变成与石油公司争夺石油控制权的斗争。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崛起的历史已经广为人知，同样广为人知的，还有民族主义势力如何推动石油生产国确立了控制权——首先确立的是对外国公司石油生产征税率的控制权，随后又掌控了这些公司本身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然而，从碳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强调这个故事的一些新的方面。第六章追溯了发生在炼油厂、输油管道和航运路线以及对这些装置的怠工破坏活动层面的石油争夺战；本章还探讨了石油国家购买高科技武器（始于伊朗），如何能提供一种特别定制的石油收入回流机制，而新的“安全”教义（doctrines of ‘security’）又如何与军火销售捆绑在了一起；本章还把中东石油问题与西方管理民主政治诉求的新策略联系了起来。上述发展导致了在第七章中探讨的 1973—1974 年的危机。把这场危机简单地称作“石油危机”会造成误导，这一时期的关键事件实际上涉及了对国际金融、国民经济和能源流动的治理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使得西方已经遭到削弱的碳民主，被放置在与中东石油国家的一种新型关系之中。美国与石油生产国关系的转变，也使那些反对把对“经济”的管理当作一种治理集体

生活的民主模式的右翼政治势力，得以重新引入并扩大了“市场”的法则，作为替代“经济”的统治技术，从而提供了一种更加有效的手段，来将共同世界中的某些部分，置于民主斗争的范围之外。

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间，从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到 2011 年春天阿拉伯世界的抗争，两大主题主导了有关中东石油与民主的讨论。其一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t）政治运动的兴起，而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对建立更民主的政治形态构成了阻碍；其二则是各石油国家所卷入的、程度不断上升的军事暴力——尤其是在海湾地区（the Gulf，即波斯湾）爆发的一系列战争，旷日持久的冲突终于在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到达了顶峰。一项讨论这段时期的知名研究，将这种动态关系描述为资本的全球化力量，与部族和宗教认同的狭隘势力之间的冲突，或简称“圣战对峙麦当劳世界”（Jihad vs. McWorld）。第八章则使用“麦当劳-圣战”（McJihad）这一概念，来提出一种思考石油、所谓的全球化，以及政治伊斯兰的力量这三者间关系的不同方式。

在结论章中，我再次回到了碳民主在当下面临的一些限制：由于以新发现的油田替代已枯竭的油田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再加上开发新发现的油田变得越来越昂贵，而开发本身所要消耗的能源也越来越巨大，充裕而低成本的碳能源时代已近尾声；由于现有的民主治理形式似乎无力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这颗行星的长远未来，气候崩溃的威胁正在加速。在本章中，我展示了围绕这些问题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technical uncertainty），如何让一种特定的思考方式——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占据了民主辩论的空间。我还指出，本书所寻求的一种对碳民主的社会-技术性的理解方式，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的途径，来克服这个阻挡我们塑造集体未来的障碍。

第一章 民主的机器

要理解石油与民主的问题，首先要从理解民主与煤炭的问题开始。发展出能源利用规模达到全新高度的生活方式，才让现代大众政治的出现成为可能。由煤炭的开采所供应的热力学力量在 19 世纪开始呈指数级增长。民主制度有时被描述为上述这种变革的产物，它源于快速崛起的工业生活对旧有形式的权威和权力的摧毁。然而，提出民主政治诉求的能力并非只是煤炭崛起的副产品。人们从新的能源体系内部获得了行动的力量，继而成功地形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利用这一体系的运作流程，将自己装配成一架政治的机器*。此后，随着由煤炭提供动力的集体生活，转变成为一种越来越以石油为基础的社会-技术性的世界，这种政治力量的装配就遭到了削弱。

12

埋藏的阳光

距今两百年以前，人类生存所需的能量几乎完全来自可再生资源，而这些资源的能量都来自太阳。太阳能被转化为谷物和其他作物为人类提供燃料；转化为草地供人们驯养动物以获取畜力和额外的燃料；转化成林地来提供柴火；转化为风能和水力来驱动交通工具和机械。可能直到 20 世纪中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依然主要以捕集可再生

* 作者在英文原书中用了“machine”和“machinery”两个不同的单词，但这两个词在很多情况下是互通的，都既指一种运作的“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比喻义的“机器”。中文译文没有区分译法，而是根据语境选择，必要时也保留“机器/制”这样的处理。——编者注

形式的太阳辐射来获取能量（因中国和印度成功维持了可行的农村生活方式，全世界城市人口直到 2008 年才开始超过农村人口）。然而，从 1800 年左右开始，这些有机资源被地下埋藏的能量密度高度集中的太阳能储藏稳步替代。这种储藏是 1.5 亿到 3.5 亿年前的泥炭沼泽森林与海洋生物在缺氧的水环境下腐烂形成的碳沉积物，这种环境阻断了碳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归大气的正常碳循环过程，而分解的生物质（biomass）被压缩为聚集成藏的煤炭与石油，虽然含量相对稀少，却蕴含着极其强大的能量。¹

13 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开采煤炭，但规模十分有限。造成这个限制的原因，在于生产这种燃料所需要消耗的能量——如今，由于石油公司试图开采世界上最难获取的石油储藏，人们正再度逼近这一限制。煤矿往往处在地下水的包围中，较深层的矿井要借助好几组牲畜的力量才能把水抽干。矿井挖到一定深度后，保持作业环境干燥所要消耗的能量，甚至比开采这些煤矿可以获得的能量更多。² 在英国，木材的短缺抬高了煤炭的价值，为了降低煤炭的运输成本，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被发展了起来，在此背景下，英国人纽科门（Newcomen）

1 E. A. Wrigley, 'Two Kinds of Capitalism, Two Kinds of Growth', in *Poverty, Progress and Popul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8–86. 煤炭早在 1880 年代就取代木材和其他生物质材料成为全世界商业能源的主要来源，但直到步入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绝大部分的煤炭消耗都集中在少数一些国家的情况才有了改变。Bruce Podobnik, *Global Energy Shifts: Fostering Sustainability in a Turbulent A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2 Rolf Peter Sieferle, *The Subterranean Forest: Energy System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K: White Horse Press, 2001: 78–89; and 'Why Did Industrialization Start in Europe (and not in China)?' in Rolf Peter Sieferle and Helga Breuninger, eds, *Agricultur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urope*, Stuttgart: Breuninger-Stiftung, 2003. 亦参 Smil, *Energy in Nature and Society*。

发明的常压蒸汽机成功克服了这一限制。这款问世于 1712 年的蒸汽机利用煤炭燃烧来产生蒸汽驱动真空泵，使矿工可以用比开采煤炭所获得的燃料更少的能源，将作业范围拓展到很深的地下。纽科门蒸汽机效率很低，只能将不足 1% 的燃烧能转化为有用的动能，因而需要消耗大量被开采出来的煤炭。但由于此时煤矿里废煤丰富，所以几乎没有提高真空泵效率的必要。直到 1775 年，博尔顿（Boulton）和瓦特（Watt）才推出了一个具备独立冷凝器的更高效蒸汽机设计并注册了专利。这款蒸汽机起初被用在煤炭资源稀缺的地方，尤其是用在铁的冶炼以及康沃尔郡（Cornwall）的铜矿与锡矿上。专利的保护也许延迟了这款机器的进一步改良，但在 1800 年专利到期后，康沃尔郡的矿业工程师们得以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开发出了更为高效的高压发动机，使蒸汽动力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更广泛地替代了畜力和水力。³

转向以煤炭和蒸汽动力的组合为基础的能源系统，还需要第三个组件——用来建造泵和其他采矿器械的铁。此前，铁的冶炼依赖于木炭燃烧过程释放的高热量，因此即便只是经营一家小型冶炼厂，选址也只能限制在大面积林地附近，使铁的产量大受限制。而到 18 世纪末期，铁匠们已经掌握了用焦炭炼铁的复杂工艺，借助蒸汽驱动的风箱，铁的生产跟上了煤炭供应量增长的脚步。随后，人们将康沃尔高压发动机与铁和煤炭结合起来建造了蒸汽铁路，而铁路最初的用途就

14

3 Alessandro Nuvolari and Bart Verspagen,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British Steam Engineering, 1800–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2, 2009: 685–710; Alessandro Nuvolari, Bart Verspagen and Nick von Tunzelmann, 'The Early Diffusion of the Steam Engine in Britain, 1700–1800: A Reappraisal', *Cliometrica*, 5 March 2011, 1–31; Alessandro Nuvolari, 'Collective Invention During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the Cornish Pumping Engin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2004: 347–363.

是运送煤炭。有了这些，人们此时就能够将丰富的能源供应从矿井大量运送到最近的水路和工业厂房，从而促进了制造业从水力驱动向蒸汽驱动的转型。

摆脱了牲畜体力与林地再生速度的限制后，能源供应开始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率增长了。过去，人类社会也经历过增长幅度一年更甚一年的指数增长阶段，推动力来自突然的技术进步，或新领土的迅速拓殖。但 19 世纪的这场增长有所不同。技术的突破，加上将在下文讨论的对地球表面更广阔区域的控制，这两个因素又结合了人类开启的第三个维度：地下的碳储藏。以往爆发式的加速增长或许维持了一两代人，但获取并快速消耗世界化石燃料储藏的全新能力，让这样的指数增长持续了超过两百年，直到 21 世纪初。⁴ 人类在这段时间内生产的能量规模令人叹为观止。英国的煤炭储藏（而今已几乎耗尽）产生了相当于沙特阿拉伯累计石油产量的总能量，让英国工业使用的动力每十年就增长约 50%，从 1800 年几乎全由水力驱动产生的约 17 万马力，增长到 1870 年的约 220 万马力，再到 1907 年的约 1050 万马力。这样的增长幅度与此后的增长，包括使用化石燃料发电的增长相比，又一次相形见绌。1907 年的 1050 万马力量中，包括了 156 万马力的发电容量。仅此一项，到 1950 年时，就已经增长到约 2200 万马力（15,000 兆瓦），1977 年达到约 1 亿马力（70,000 兆瓦）。⁵

4 Sieferle, 'Why Did Industrialization Start?': 17–18.

5 John W. Kanefsky, 'Motive Power in British Industry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1870 Factory Retur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2: 3, August 1979: 374. 1973 年以后增长率开始放缓，2009 年达到 85,000 兆瓦（统计数据来自 www.decc.gov.uk）。英国仅剩的几个煤矿现在的产出已经微乎其微，这样算下来，英国煤炭的最终累计总产量预计约为 290 亿吨（29 Gt，1 Gt 代表十亿吨）。David Rutledge, 'Estimating Long-Term World Coal Production with Logit and（转下页）

不断加速的能源供应改变了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系，使新形式的大众政治得以形成。前工业化时代，由于为生产生活提供主要动力的太阳辐射是一种能量密度较低的能源形式，需要相当大面积的地域才能将其转化至可供人类使用。对能源的需求促成了相对分散的人类聚居形态——沿河而居，毗邻牧场而居，靠近为提供燃料而专门划出保留的大片林地而居。这种能源生产的时间尺度取决于作物光合作用速率，动物的寿命，以及牧场、林场恢复所需的时间。⁶ 相比之下，化石燃料则是一种将大量空间和时间压成浓缩形态的能源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这种压缩方式：今天我们使用的一升石油，需要约 25 吨的远古海洋生物作为前体材料；或者说，我们在当下的一年内燃烧掉的化石燃料，相当于整个地球在四百年里的全部动植物所产生的有机物质。⁷ 煤炭和石油以紧凑而便于运输的固体和液体形式，储存了相当于数十年的有机物生长和数英亩生物质的能量。

15

这种转变使人们摆脱了对先前生产一次能源（primary energy，又译“初级能源”或“天然能源”）所需的大片土地的依赖。过去依靠木材作为燃料进行烹饪、取暖和工业生产的地区，也不再受林地面积和到林地邻近程度的限制。在英国，由煤炭对木材的取代所创造出的大量能量，如果还是依靠太阳辐射来产生的话，所需的森林面积会

（接上页）Probit Trans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Geology* 85: 1, 2011: 23–33. 按每吨煤 27 千兆焦耳、每桶石油（当量）6.1 千兆焦耳的标称能量值计算，英国最终累计煤产量相当于沙特阿拉伯从 1936 年到 2008 年约 1280 亿桶的累计石油产量。

6 Wrigley, 'Two Kinds of Capitalism': 75.

7 Jeffrey S. Dukes, 'Burning Buried Sunshine: Human Consumption of Ancient Solar Energy', *Climatic Change* 61: 1–2, November 2003: 33–41（数据始于 1997）；Helmut Haberl, 'The Global Socioeconomic Energetic Metabolism as a Sustainability Problem', *Energy* 31: 1, 2006: 87–99.

是现存林地面积的数倍。到 1820 年代，煤炭解放的林地面积可以说已经相当于英国国土的总面积。而到 1840 年代，煤炭提供的能量如果由木材来提供，就需要相当于英国国土面积两倍的林地，到 1860 年代是四倍，到 1890 年代则是八倍。得益于这个新发生的社会-能源层面的新陈代谢，大多数人口此时可以集中生活在城镇，不需要直接毗邻农业用地，城镇的规模也不再受能源供应的限制。⁸

民主与殖民地

16 从使用木材等可再生资源向使用煤炭的转变，奠定了欧洲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与此前同这两地生活水平相当的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等地的发展自 1800 年以来的所谓“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基础。世界其他地区也曾面临与欧洲这两个地区类似的压力，需要克服土地的短缺，也需要开发新的能量来源；而中国虽然拥有大量的煤炭储藏，但它的煤田面临着开发上的种种技术障碍，而且缺乏航道将其与主要人口中心相连。这些地区选择了其他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并没有触发它们转向能够以指数级扩张的能源体系。⁹

尽管世界其他地区最初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但向新的能源体系的转变绝不是一场仅限于欧洲的事件。世界某一地区转向以几

8 Sieferle, *Subterranean Forest*;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berl, 'Global Socioeconomic Energetic Metabolism'.

9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Wrigley, 'Two Kinds of Capitalism'; Terje Tvedt, 'Why England and Not China and India? Water System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 1, 2010: 29–50.

何级增速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需要许多其他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煤炭以空前的量级与集中度向人类提供着热能和机械能，但除非有办法使这些能量发挥作用，否则它们只会一无是处。要将这些能量利用在制造业上，就需要大幅增加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很多工业原材料，例如棉花，仍在依靠分散的、有机的能源（包括人力）来生产。因此，地下能量储藏的开发虽然降低了为生产过程供应能源所需的土地的面积，但与此同时，人们却需要越来越大面积的土地来生产原材料，让不断增长的能量可以尽其所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从事工业产品的生产而不再种植为自身供能所需的食物，工业化地区以外就必须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被组织起来，为这些劳动力提供能量来源，尤其是糖这样浓缩的食物能量来源。

我们通常认为，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城市现象，但它其实依赖于一种农业的——以及殖民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是以有机形式的能源为基础的。煤炭的使用在欧洲北部释放了先前被保留下来用于供应燃料的林地，使更多的土地可被用于放牧和耕种，这有助于增加额外的种植用地。但是，化石能源的开发也需要一种手段，让欧洲以外的地区能够提供远远更大面积的土地用在以太阳能为基础的生产活动上，同时也提供大量的人类劳动力。

欧洲所需的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商品不能简单地仅仅通过贸易关系获得，原因有两点。第一，农业人口通常更倾向于用他们的土地和劳力来主要生产满足自身需求的材料，只留有少量盈余可供出口。此时的欧洲需要某些措施，来迫使农业人口将这些以太阳能为基础的生产中占极大比例的部分出让给欧洲，以供应那里被化石燃料驱动起来的

需求。第二，当某一地区开发出一种新的工艺而使该地获得技术优势后，其他地区通常会尽快采用这种创新。¹⁰ 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体系既更难以被效仿，也更依赖于不被其他地区效仿。它很难效仿，是因为大量的煤炭和铁矿石储藏集中在少数地方，而煤炭所供应的以指数级增长的能量，很快就使欧洲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区；它依赖于不被效仿，是因为欧洲现在需要大量海外土地来提供以太阳能为基础的产品，如糖和棉花，而如果这些地方自己也引入了基于化石燃料的制造产业，它们就会转而将自己的有机能源体系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

由于无法依赖贸易关系，欧洲就需要采取其他方式从海外获得原材料，而它们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既使当地的土地耕种者无法掌控自己种植的作物，也阻碍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在新大陆获取用于生产糖和棉花的土地时，欧洲人依靠的方法，是对当地人口的全面剥夺和驱逐，以及输入奴隶和契约劳工。而在无法大规模移除农业人口的地区，主要的例子是印度和埃及，欧洲人则与当地的盟友开创了一种本地化的剥夺方法，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私有土地所有权。这种方法以一种新的制度取代了旧的农业收入份额分配方式。在这种新制度下，只有一位被指定为“地主”的所有权人能够决定要种植什么作物，并对收成享有独占性的控制权。这些殖民安排确保了当地维持粗放式的（*extensive*）、基于太阳能的作物生产来供应充足的农业产品，让欧洲城镇得以发展集约式的（*intensive*）、基于煤炭的大规模生产。

煤炭、工业化和殖民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化石燃料与民主的第一组联系。在 18 和 19 世纪，各种形式的代议制中央政府在欧洲部分地

10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

区及其殖民地发展起来。在当时的代议制政府倡导者眼里，这种政治形式并不是迈向民主的第一步，而是一种替代民主的寡头统治形式，因为政府的权力被保留给了那些拥有财产（财产不仅是土地，还包括妇女、仆人和奴隶）的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为他们赋予了权力，来掌控政府所依赖的财政收入的通道节点，以及关注公共事务的资格。在大多数实行代议制政府的国家，由于财产资格和登记程序的限制，只有不超过 30% 到 40% 的成年男性，或者说不到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口才是拥有选举权的选民群体。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代议制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财政-军事国家的权力行使提供了正当性，而在这种国家崛起的同时，其他形式更加分散的公众参与和自治往往会遭到削弱，而这些政治形式，如在英格兰治理大学、城镇、公司和社团的民选法人团体（elected corporate bodies），反而有时对其选民更加负责。¹¹ 到 1870 年代，欧洲和近东的一系列动荡——包括意大利的统一和德国的统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从西班牙、希腊到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等国发生的宪制争端的解决或自由主义革命，以及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自由化改革——创造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尽管这些宪制安排继续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为工会和大众政党的出现提供了法律的秩序。特别是在欧洲北部和西部正在工业化的地区，为了抗议公共生活对大多数人的排斥以

18

11 Jacques Rancière,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Bernard Manin, 'The Metamorphos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23: 2, 1994: 133-171; and Mark Knights,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关于英国选举限制规定的变化，以下文章进行了解释：Neal Blewett, 'The Franchi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85-1918', *Past and Present* 32, December 1965。

及工业化带来的福利极度不平等问题的，群众政治运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党派开始出现，并创造出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¹²

其后从 187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转型时期，既可被称为民主化时代，又可被称为帝国时代。¹³ 新的民主化政治力量的动员，依赖于人口向城市和制造业的集中，而这与因组织数量空前的不可再生碳能源的流动而形成的那些集体生活形式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要利用每十年供应量就增长 50% 的化石能源，则需要迅速扩大对殖民地领土的控制。这些殖民地也是与同样的一套以煤炭和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能源流动体系连接起来的，连接的方式却不相同，那里的人民无法轻易地利用它来制造有效的政治诉求。要理解为什么煤炭的崛起在某些地方产生了民主而在另一些地方却产生了殖民统治，我们必须更仔细地了解化石能源的流动是怎样被用于组织成功的集体诉求的。

控制碳渠道

19 当大部分能源来自广泛分散的可再生资源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口都参与了能源生产与输送的工作，但要处理的能源量很少。随着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尤其是在 1880 年代电力出现之后，工业化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其他人生产的能源的消费者，大多数工作都需要处理或监督由来自其他地方的能源所驱动的生产过程。此时，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在处理能源的生产和分配，而且要处理的是巨量的能源。

12 Geoff Eley,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此书强调，1760 年代泛欧洲的宪法转型是随后左派参与创建民主的基础。

13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Vintage, 1989: 88.

能源供应在特定地点的大量集中导致了能源供应装置的建立，而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民主政治将会建立在这些装置的基础之上。大规模的高质量煤炭是在相对少数的几个地区被发现并开发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及南威尔士，从法国北部经比利时到鲁尔河谷（Ruhr Valley）和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的带状地区，以及北美的阿巴拉契亚煤炭带。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工业区都聚集在上述这些煤炭供应地或附近。¹⁴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新的能源体系的建立，不只是肇因于煤炭的产量，而且还源于煤炭、蒸汽技术和钢铁之间相互促进的互动作用。铁轨的出现（它们是在使用由蒸汽驱动的风箱并以煤炭为燃料的高炉中铸造而成的），以及钢铁桥梁的建造，让铁路线得以快速发展。到 19 世纪末，工业化地区已经建立起了将集中的碳储藏从地下煤层输向地表，运往铁路、港口、城市以及制造业和电力生产地点的水路和铁路网络。

此时，大量能量正沿着狭窄的、专门建造的渠道流动。专业化的工人队伍集中在这些渠道的端点和主要枢纽处，操作切割设备、起重机械、调度器、机车和其他使能源储藏能够顺利流动其间的设施。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工人们所处的位置和聚集的程度，为他们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得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这种力量不仅来源于他们所组建的团体、开始分享的理念或者建立的政治联盟，而且还源自数量特别庞大的碳能源——通过运用他们

14 Sidney Pollard,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0–121. 欧洲资本还在更远的地方开发煤炭资源，包括英国的一些殖民地（南非的纳塔尔和德兰士瓦，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的部分地方，以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俄国的顿涅茨盆地。

所拥有的减缓、扰乱或切断碳能源供应的能力，他们就可以利用碳能源来装配政治的能动性。

20 在 1880 年代及以后的劳工运动和政治动员中，矿工们在对抗工作体制和雇主的私人权力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1881—1905 年间，美国煤矿工人的罢工率约为全部主要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是罢工率次高的烟草制造业的两倍。煤矿罢工的持续时间也远超其他行业。¹⁵ 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因此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地的煤矿区，“一战”后又再度袭来。¹⁶

矿工的斗争性（militancy）可以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将碳储藏从煤层移至地表的过程所创造的工作场所与方式，具有非比寻常的自主性。一个旧有的论点认为，与其他产业的工人相比，矿工社群享有一种特殊的隔绝，使得他们的斗争性近乎“一种殖民地人民对远方权威的反叛”。但是，这样的观点曲解了这种自主性。¹⁷ 卡特·古德

15 煤矿产业和全体产业每 1000 名工人参与罢工的几率分别是：134 和 72（1881—1886）；241 和 73.3（1887—1899）；215 和 66.4（1894—1900）；208 和 86.9（1901—1905）。P. K. Edwards,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97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106。

16 Podobnik, *Global Energy Shifts*.

17 Clark Kerr and Abraham Siegel,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Arthur Kornhauser, Robert Dubin and Arthur M. Ross, eds,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34: 192. 更近期的一些论述强调了煤矿工人社群的多样性，以及他们与其他群体、煤矿主和国家权威之间政治互动的复杂性。Roy A. Church, Quentin Outram and David N. Smith, 'The Militancy of British Miners, 1893—1986: Interdisciplinary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2: 1, 1991: 49—66; Royden Harrison, ed., *Independent Collier: The Coal Miner as Archetypal Proletarian Reconsider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Roger Fagge, *Power,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Coalfields: West Virginia and South Wales, 1900—192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H. M. Laslett, *Colliers Across the S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ass Formation in Scotland and the American Midwest, 1830—1924*,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里奇 (Carter Goodrich) 在他 1925 年发表的经典研究《矿工的自由》(*The Miner's Freedom*) 一书中曾论证, 这种自主性并不是由矿区与政治权威在地理上的隔离所产生的, 而是源自 “矿井内部工作场所环境的地理特性”。¹⁸ 在传统的房柱式采矿法 (room-and-pillar method) 中, 两名矿工负责开采煤层的某一个区域, 他们所处的矿房与相邻矿房之间由支撑矿房顶部的煤柱或煤墙隔开。矿工们往往自己来做决定在哪里开挖或留下多少矿石不动以防止塌方。在机械化采矿方式普及之前, “矿工免受监督的自由, 与流程井然有序、受到严格管制的现代化机械加料工人截然相反”。¹⁹ 形成于这种作业环境下的战斗性通常是为了捍卫他们的这种自主性, 抵抗机械化所带来的威胁, 或抵抗被迫接受更危险的工作内容、更长工时或更低薪水的压力。

21

人们常把大众民主的兴起归因于新形式的政治意识的出现。煤矿工人所享有的自主性似乎适用于这种解释。然而, 要理解煤炭工人所帮助装配的这种新形式的能动性, 并不需要舍近求远地探讨共同的文化或集体意识之类的问题。这种绕道会产生误导, 因为它在暗示, 在过去的时代或其他地方, 缺少那些要求更稳定生活的人。²⁰

18 Carter Goodrich, *The Miner's Freedom: A Study of the Working Life in a Changing Industry*, Boston: Marshall Jones Co., 1925: 19.

19 Goodrich, *Miner's Freedom*: 14; Podobnik, *Global Energy Shifts*: 82–85. 关于煤矿工人的相对自主性及其在机械化下的丧失, 亦参 Keith Dix, *What's a Coal Miner to Do? The Mechanization of Coal Mining*,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8, 及 Chris Tilly and Charles Tilly, *Work Under Capi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43–51。

20 仅在 E. P. 汤普森 (E. P. Thompson) 的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4) 中就可以看得到足够的证据。有关生活的不稳定性 (precariousness), 参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hinehart, 1944, 及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Verso, 2004。

缺少的并不是意识，也不是各种各样的要求，而是一种能够迫使当权者倾听这些诉求的有效方式。能源的流动和集中，使得矿工群体的诉求和其他人的诉求能够连接在一起，并为他们的主张赋予了某种技术性的力量，让这些诉求难以被忽视。罢工之所以变成了一种有效的手段，不是因为采矿环境的隔绝，恰恰相反，而是因为碳的流动，将地下开采煤矿的矿房与依赖蒸汽或电力的每一座工厂、每一间办公室和家庭住房、每一辆交通工具连接在了一起。

罢工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煤炭工人中也很常见。土耳其黑海沿岸宗古尔达克煤田（Zonguldak Coalfield）的煤炭工人曾经组织了多次罢工；而根据记载，1882年4月，世界最大装煤站塞得港（Port Said）的煤炭装卸工人发动的罢工，是新兴的埃及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集体行动。然而，由于缺乏将煤炭与国内工业生产重镇连接起来的途径，这些行动并不能使当地的能源系统陷入瘫痪，也就无法获得它们在欧洲北部和美国所能享有的政治力量。²¹

怠工破坏

由矿工们领导的罢工似乎拥有前所未见的力量。在德国，1889年矿工群体的罢工浪潮震惊了新上台的皇帝威廉二世，促使他放弃了首相俾斯麦推行的强硬社会政策，转而支持一系列推进劳工改革的方

22

21 Donald Quataert, *Miners and the State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Zonguldak Coalfield, 1822–192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 Joel Beinin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3, 27–31.

案。²² 威廉二世于 1890 年 3 月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呼吁制定管理煤矿劳工的国际标准，并对雇佣妇女和儿童进行限制。据《纽约时报》报道，就在会议于柏林开幕的当天，发生了“一个奇妙而意义非凡的巧合”，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矿工群体发动了“迄今为止劳工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参加罢工的男女老少总人数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26 万”。一位记者报道称，在英格兰北部的大型制造企业煤炭储备即将耗尽之际，“一场规模极大而且极具破坏性的劳资冲突，可能将会在我们面前上演”。²³

罢工并不是阻断能源流动及其支撑的那些关键功能的唯一方式。1889 年，英国格拉斯哥的码头工人发动罢工，可当他们的雇主雇佣了许多工贼（strike-breakers，或译“罢工破坏者”）来补上他们空出来的职缺之后，他们只得被迫返回工作岗位。于是，码头工人们决定，要像雇主找来替代他们的那些非熟练劳工一样，尽可能拖沓而笨拙地劳动。三天之后，工人们就成功地实现了增加工资的诉求。²⁴ 这种阻挠生产的成功策略被新成立的全国码头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Dock Labourers）宣传开来，并在法国得到效仿，还被那里的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等工人群体正式采用，作为争取工会组织权和改善工作

22 Kathleen Canning, *Languages of Labor and Gender: Female Factory Work in Germany, 1850–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0–133; G. V. Rimlinger, ‘Labour and the State on the Continent, 1800–1939’,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8,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ed. Peter Mathias and Sidney Pollar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576–578.

23 ‘Labor’s Cause in Europe: The Kaiser’s Conference and the English Strike’,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1890: 1.

24 Geoff Brown, *Sabotage: A Study in Industrial Conflict*,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for Spokesman Books, 1977.

条件的手段。1909 年，埃米尔·普热（Émile Pouget）出版著作《怠工破坏》（*Le Sabotage*），把这种策略的名字推广得尽人皆知。²⁵ 不到一年，“怠工破坏”（sabotage）* 这个新词就已经被引入了英语。它最初被用于描述法国铁路工人的一次劳工行动（industrial action, 又译“工业行动”），随后则被用于指代故意拖慢工作进度、严格遵照工作规章工作而绝不多做任何规定之外任务的变相怠工（work-to-rule），以及其他阻断某个关键流程正常运作的手段。²⁶

23 拖慢工作进度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抗议并非新鲜事。但“怠工破坏”一词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发现：在恰当的场合和时机引入相对微小的故障、贻误或中断，如今可以产生广泛的影响。1895 年，法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解释道：“只需仅值两分钱的某种材料，如果被用在恰到好处

23 的地方，就能使一台铁路机车停摆。”²⁷ 一台燃煤蒸汽机车能输出 3 兆瓦功率（约 4000 马力），相当于约一百年前第一批往复式蒸汽机动

25 Émile Pouget, *Le Sabotage*, Paris: M. Rivière, 1911 [1909], English translation, *Sabotage*, transl. Arturo M. Giovannitti, Chicago: C. H. Kerr & Co., 1913.

* “sabotage” 通常指“蓄意破坏”，但在本书有关劳工行动和石油公司限产策略的语境中，这种破坏不仅是造成物理性毁损的破坏，也包括通过怠工、限产等不作为的消极行动来阻断工业流程或哄抬油价，因此中文译文用“怠工破坏”这个译法来体现这一点。——编者注

26 《牛津英语词典》记录的“sabotage”这个术语在英文世界的首次使用，是在 1910 年登载于《教会时报》（*Church Times*）上的一篇文章中，对“法国铁路罢工者的怠工破坏”（the sabotage of the French railway strikers）的谴责。在“一战”期间，这个词在军事行动中被用来指代破坏或摧毁敌方资源的行为，因而被赋予蓄意使用暴力的意味。但在 1921 年，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将该词通常的含义，描述为“任何蓄意拖延、低效、笨拙和阻挠的策略”，或者如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所定义的那样，指“在要做正当之事的道德判断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地、有意识地降低效率”（conscientious withdrawal of efficiency）。Thorstein Veblen,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B. W. Huebsch, 1921: 1.

27 引自 Pouget, *Le Sabotage*, 在 raforum.apinc.org 上可查阅。

力的30倍。²⁸怠工破坏之所以具有这种新的效力，正是因为在一个区区一位操作员就能破坏的机制中，却高度集中了巨大的动能。

到20世纪初，由于这些机制的脆弱和它们所依赖的能量流动的集中，工人的政治力量大大增强了。大规模煤矿罢工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动员，如1906年法国东北部的库里耶尔（Courrières）矿难后发生的暴力罢工，就进一步激发了一场导致巴黎瘫痪的总罢工。²⁹而最常见的模式，则是罢工在煤矿业、铁路业、码头装卸和轮船运输业等相互联系的行业之间的蔓延。³⁰在英国，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在1911—1912年间组织了三次大规模全国性罢工，并在“一战”前夕通过他们所缔结的“三角同盟”（Triple Alliance）建立了正式盟友关系。³¹在某些时刻，罢工、拖延与其他形式的怠工破坏活动的协调，使得工人们构建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工具——总罢工（general strike）。“一股新力量已在各行各业的工会运动中崛起，”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面对这种新的威胁时警告道，“航运、煤炭、铁路、码头等行业，都在联合起来，预备一同爆发。总罢工这种‘方针’是一个必须应对和处理的问题”。³²

28 Smil, *Energy in Nature and Society*: 228–230.

29 1906年3月10日发生的这场矿难是世界最大的矿井灾难之一。煤尘爆炸所引发的矿难摧毁了库里耶尔煤矿，造成1100人死亡。Robert G. Neville, ‘The Courrières Colliery Disaster, 19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 January 1978: 33–52.

30 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8, 此文证实，罢工集中在所述的这些产业，而非制造业。

31 John H. M. Laslett, ‘State Policy Towards Labour and Labour Organizations, 1830–1939: Anglo-American Union Movement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8: 522.

32 Randolph S. Churchill, *Winston S. Churchill: Young Statesman 1901–1914*, London: Heinemann, 1967: 365.

24 在一个世代以前的 1873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拒绝将总罢工用作一种政治工具的想法，并将其比作徒劳无用的“神圣月”（holy month）计划——1840 年代英国宪章派（chartist）鼓吹的全国范围内的停工计划。恩格斯认为，这种想法反映了一种对地方性、自发性起义的无政府主义信念，而在现实中，工人们缺乏资源和组织来让他们发动的总罢工达成预期的效果。恩格斯说，倘若工人们能获得行动所需的资源和完善的组织，他们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一个国家了，因此，总罢工只会是一条不必要的弯路而已。³³

三十年后，总罢工依然被许多欧洲左派看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策略，不应取代有组织的政治行动。1902 年，比利时发生的一场由煤矿工人领导、以争取普选权为目标的总罢工，重新开启了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策略的辩论——尽管连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这样支持总罢工的人都认为，比利时这场罢工的有效性源于该国工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因而不能在更大的国家复制。³⁴ 三年后，她改变了

33 Friedrich Engels, 'The Bakunists at Work',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Revolution in Spai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39, First published in *Der Volksstaat*, 31 October, and 2 and 5 November 1873; 另参 Adrian Shubert, *The Road to Revolution in Spain: The Coal Miners of Asturias 1860-193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对总罢工的拒斥是马克思、恩格斯与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一部分，这场论战导致了第一国际的分裂。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发动广泛的地方性起义，总罢工就是这种起义的典型代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主张建立稳定的工人阶级组织以赢得政治改革，最终使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夺取国家政权。在马克思二人看来，工会的任务，不仅是在工作场所争取经济状况的提升，还包括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使他们可以逐渐根据他们的集体利益来开展行动。参 Paul Thomas,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249-340。

34 Ernest Mahaim and Harald Westergaard, 'The General Strike in Belgium, April 1902', *Economic Journal* 12: 47, 1902; Janet L. Polasky, 'A Revolution for Socialist Reforms: The Belgian General Strik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 1992, 449-466; Carl E.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8-58。

看法。在目睹 1905 年俄国革命中使俄国陷入瘫痪的罢工浪潮后，她在《群众罢工》（*The Mass Strike*）一文中主张，工人们现在可以在缺乏统一政治运动的情况下组织社会革命，因为孤立的经济斗争如今能够以某种方式连接成一股合而为一的政治力量。卢森堡写道，这股力量“时而如澎湃巨浪般涌过整个王国，时而分成股股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³⁵ 卢森堡试图用这样的言辞来刻画工人们如今以某种方式获得的分散而又相互连接的力量。她以水流为喻的笔法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将工人们凝聚为一支新型政治力量的，并不是溪流和波涛，而是铁路、河道与运河，以及它们所运载的高度集中的能量储藏。

“一战”期间，美英两国把煤田和铁路纳入政府指导之下，在某些情况下免于强制兵役的煤矿和铁路工人，也以工业生产的方式被纳入了国家的战争动员体系。罢工的次数减少了，这些能源网络的关键作用却更加凸显了。在德国，主要产业都设立了强制性的企业劳资委员会（works council），法国政府则禁止与战争相关的行业举行罢工，并直接参与制定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³⁶ 战事的漫长及其造成的巨大破坏——源自煤炭的能量对此有所贡献——削弱了各地的政治秩序，还

25

35 Rosa Luxemburg,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a translation of *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 1906), Detroit: Marxist Educational Society, 1925: 44. 与卢森堡同时代的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在《论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 transl. Thomas Ernest Hulme,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4 [1908]）一书中给出了另一个对总罢工的全新力量的反思。

36 David Corbin, *Life, Work, and Rebellion in the Coal Fields: The Southern West Virginia Miners, 1880–1922*,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1; Thomas E. Reifer, ‘Labor, Race and Empire: Transport Workers and Transnational Empires of Trade, Production, and Finance’, in Gilbert G. Gonzalez, Raul A. Fernandez, Vivian Price, David Smith, and Linda Trinh Võ, eds, *Labor Versus Empire: Race, Gender, and Mi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17–36; Rimlinger, ‘Labour and the State’: 582, 587.

把许多新的平民主义（populist）势力推上了台。在中欧和东欧，这些势力推翻了旧秩序；而在西欧、北欧和美国，这些势力则被容纳在旧秩序中。从1919年西弗吉尼亚煤矿罢工，到1920年德国总罢工，再到1926年英国总罢工，矿工、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相互协调的劳工行动，再度确认了他们新获得的这种关闭能源节点的力量。分散的太阳辐射能源体系，从未让工人群体装配出这般强大的政治权力。

总罢工的威力让大型产业的雇主们处在了被动的地位。1918年，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解释了这种脆弱性：

如果近来的历史已经揭示了工业冲突的恐怖后果，那么当前世界各地的事态发展难道不是预示着，也许还会出现无限糟糕的情况吗？工团主义的目标是通过武力摧毁现有组织，并将工业资本的所有权从当前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工团主义者或革命工会手中。这就是他们发动“总罢工”试图达到的目的。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如果在仅仅提前几天或几周的通知后，煤矿突然关闭，铁路停止运行，还有什么不会发生的呢！[……]这种威力一旦得以施展，将会比任何战时封锁都更加有效地使这个国家陷入瘫痪。³⁷

洛克菲勒家族是在1914年勒德洛大屠杀（Ludlow Massacre）之后委托撰写这份报告的。1913—1914年间，科罗拉多州勒德洛镇发生了大型煤矿暴乱，史称“大煤田战争”（Great Coalfield War）。配备机枪

37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Industry and Humanity: A Study in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8: 494–495.

的州国民警卫队被派来镇压煤矿工人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试图在一间洛克菲勒家族所属的煤矿成立工会的行动，导致参与罢工的一些矿工被杀害，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使大型工业资本的“当前所有者”面临威胁。³⁸ 洛克菲勒家族聘请了曾在加拿大劳工部长任上帮助化解了四十多起煤炭、石油和航运等行业罢工事件的威廉·莱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来设计一种暴力程度较轻的方法，以挫败煤矿工人的斗争。这个由麦肯齐·金贡献的“洛克菲勒方案”（Rockefeller Plan）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interwar period，又译“战间期”）被广泛地效仿，它建立了许多由公司操纵的工会（company union，或称“黄色工会”），允许工人就薪酬和工作条件进行谈判，同时阻止他们加入独立工会。³⁹

26

美国的大型企业将这种新的公司工会等形式的工人代表制标榜为“工业民主”，并将它们与同一时期美国在中东等地倡导的“自治”（self-government）相提并论。⁴⁰ 这些企业将新旧两种劳资关系的区别比作“民主国家与封建国家的差异——后者的政府无论多么开明，都不包含被统治者的同意”，还解释称，“如果人们在制定那些会影响到他们的规章制度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能理解和接受这些法规”。⁴¹

38 Thomas G. Andrews, *Killing for Coal: America's Deadliest Labor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571–590.

39 Jonathan Rees, *Representation and Rebellion: The Rockefeller Plan at the Colorado Fuel and Iron Company, 1914–1942*, Boulder, CO: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0.

40 我将在第三章进一步探讨这种比较，并分析英国如何采用“自决”政策作为统治阿拉伯世界产油区的模式。

41 引自 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1–172。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与这种福利工业主义式的家长制管理进行了斗争，并在日后推动立法禁止了由企业操纵的工会。但工业家们仍在继续推行利用公司的恩惠和福利来削弱工会势力的策略。他们支持推行更广泛的福利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有望削弱劳工组织。结束为洛克菲勒和其他企业担任劳资关系顾问的职位之后，麦肯齐·金重返加拿大政坛，担任总理长达二十二年之久。他反对推出类似罗斯福新政式的劳工保障措施，并规划设计了加拿大的福利国家政策。⁴² 随着工业化地区的工人为争取更平等的生活而开展斗争，他们所开始争取到的民主，却总是容易从为被统治者赋予提出有效平等诉求的手段，滑向为统治者提供通过分配福利来控管民众的手段。

27 从 1880 年代到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的几十年里，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利用他们控制能源流动的新能力，取得并扩大了投票权，以及更重要的，组织工会、创建政治团体、开展罢工等集体行动的权利。在许多例子中，这些变化使得基于群众的政党首次赢得了政权。工人们还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也开始有权参与包括工伤、疾病、失业保障和退休后的公共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险计划。⁴³ 新兴的妇女运动持续开展斗争，以反抗将女性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现状。这些斗争活动有时也得到了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逐渐迫使当政者为女性授予了投票权。大工业家通常会支持此类改革的限缩版本，因为提高工人福利能增加他们的干劲和纪律性，减少劳工抗议，而巩固家庭等级制度的福利措施，可以强化妇女在战时动员期间开始脱离

42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Online*, www.biographi.ca.
43 尽管财富的生产在 19 世纪大幅增加，但是，即使是工业化国家的人类福利指数也直到 20 世纪才开始提高。John Coatsworth, 'Welfa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1, 1996.

的母职角色。⁴⁴ 劳工组织有时反对这些社会保险计划提案，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不彻底的措施，会削弱他们为争取财富所有制实现更根本的改变而做的努力。而在更加激进的变革可能发生的地方，如战间期的德国和奥地利，面临威胁的大工业家们则支持摧毁议会制度。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和挫折，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劳动者还是获得了在 19 世纪末以前不可想象的力量。大工业的崛起使得人们面临严重程度异乎寻常的社会保障缺失、人身安全风险、过度劳动和贫困。但是，作为驱动这些工业过程所必需的能源，煤炭的集中与流动创造出了某种脆弱性。工人们逐渐联结在一起，而让这种团结得以实现的，主要不是阶级文化、集体意识形态或政治组织的弱纽带，而是他们开采、装载、运输、点燃并使之投入使用的，规模不断增长且高度集中的大量碳能源。中断、减慢或改变碳能源流动的协调行动创造出了一架举足轻重的政治机器，一种由煤矿、铁路、电厂以及它们的操作者所构建而成的新形式的集体能力。这种社会-技术性的能动性不单单是一场社会运动，它被用于推动一系列的民主诉求——正是这些诉求的逐渐落实，从根本上降低了工业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

煤炭之战

“二战”后，主要工业国开始重组劳动力与能源流动之间的关系。在美国，这一变化始于对一场石油工人罢工的回应。1945 年 9 月，密歇根州一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所属炼油厂的工人发起罢工，

44 Susan Pedersen, 'The Failure of Feminism in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Radical History Review* 43, 1989: 86–110.

随后蔓延至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演变成美国首次全国性的石油罢工，导致该国大多数炼油厂停摆。《时代》杂志将这些石油工人组成的工会称作“世界上最死硬顽固的工会”。然而，拒绝政府来仲裁的，反而是石油公司。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政府援引《战争权力法》（War Powers Act）让军方控制了炼油厂。罢工潮向煤矿、电力、钢铁、铁路和汽车制造等产业蔓延，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劳资冲突最集中的一段时期。为使石油工人结束罢工，政府迫使标准石油和其他大型炼油企业承认了全国性的工会对集体劳动力的代表权，同时又规定工会的角色仅限于谈判薪资待遇和工作条件。⁴⁵这个处理方案提供了一种新的劳资关系模式，取代了洛克菲勒家族在煤炭和石油行业开创的公司工会模式，并被汽车制造业及其他大型行业采用。工人们得到的让步实际上阻挡了“二战”后一些更加激进的工业民主提案，在这些提案的设想中，工人们将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企业利润。作为替代，政府和工业界推广起了工业管理这门新的科学，它致力于研究“生产力”的提升方法。今后，工资的提升和雇佣条件的改善，将取决于工人们对工作节奏提速、监督更为严密、工作岗位裁减以及体力消耗加剧的接受程度，而不是对国民财富进行任何更彻底的再分配。⁴⁶

美国的劳资关系模式，连同一次决定性的能量来源转换，被美国打包出口到了战后的欧洲。在法、德、英三国，1940年代后期的“煤

45 ‘The Last Traffic Jam’, *Time*, 15 December 1947; Myron L. Hoch, ‘The Oil Strike of 1945’,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5, 1948: 117–133.

46 Anthony Carew, *Labour Under the Marshall Plan: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Marketing of Management Scienc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Victoria de Graz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6–375.

炭之战”塑造着战后的政治格局，因为煤矿工人掀起的运动不仅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还要求对财富和福利的分配方式进行更广泛的改革。1944年法国将煤炭工业国有化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把煤炭开采业变成了展示生产力提高的样板，不仅换得了工人薪水的提升，还让工会在煤炭业的管理中扮演了直接的角色。然而，三年后，急遽的通货膨胀导致工人拿到的实际薪资骤降，煤矿工人参与了一系列罢工，要求政府提高工资水平、增加食物配给。⁴⁷面对这些诉求，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并未屈服，而是转向了美国求助。热切希望

在海外推广他们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并希望美国政府补贴其出口）的美国工业家们，利用美国政府对于共产党在西欧赢得民心的恐惧，在对欧洲开展战后援助的问题上成功赢得了华盛顿的支持。“这群共产党人帮了我们大忙，”日后担任法国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评论道，“因为我们面临‘共产主义的危险’，所以美国人才花大力气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维持这种不可或缺的共产主义恐慌。”⁴⁸美国援助欧洲的“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ERP）——俗称“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试图在欧洲打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劳工组织与大型工业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上，类似于美国在其国内正在开创的那样。

29

47 Darryl Holter, *The Battle For Coal: Miner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zation in France, 1940–1950*,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2; Adam Steinhouse,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Post-Liberation Franc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1. Gabrielle Hecht, *The Radiance of France: Nuclear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此书探讨了各工会后来在彼此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试图通过工人在核能这种新能源的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来为这些工人塑造他们在战后的政治角色。

48 Alexander Werth, *France, 1940–1955*, New York: Henry Holt, 1956: 351.

这个由美国资助的劳工力量的重组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马歇尔计划推广了美国式的工业管理模式。欧洲复兴计划的劳工部门变成了开发和测试美国劳动力和机械设备管理新方法的实验室。生产力的教义证明，加强对劳工的监管，付给他们少得赶不上飞涨物价的工资，都是合理正当的做法。“解决英国困境的唯一答案，”美国驻伦敦大使在向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汇报时说，“就是加倍努力工作，恐怕还得减低薪水。”然而研究显示，美国与欧洲生产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不能通过美国人工作更努力来解释，而是由于美国拥有丰富的煤炭与石油供应，这些资源使美国工业得以使用大量的电力，按每名工人的用电量算达到了欧洲的两到三倍。⁴⁹

第二，美国实施整个复兴计划的条件，是欧洲各国政府接受经济一体化的规划方案，而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始于西欧煤炭工业的一体化。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是欧洲迈向政治联盟的第一步，它减少了煤炭产业内部的竞争，并支持推动煤炭生产的机械化，同时还提供资金来减轻由上述因素导致的矿井关闭和失业所造成的影响。美国帮助提供资金的这个煤钢共同体项目急速减少了煤炭工人的数量，促进了跨越国界的煤炭供应，因而削弱了煤炭工人发动有效罢工的能力。

第三个要素影响最为广泛。美国资助了一系列将欧洲的能源系统从主要依靠煤炭转变为越来越依赖石油的计划。转向石油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在于永久性地削弱煤炭工人群体，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中断能源流动的能力曾为劳工组织赋予了使他们能够要求改善集体生活的力量，而发挥这种力量的过程曾推动了欧洲的民主化。

49 Carew, *Labour Under the Marshall Plan*: 136.

战后西欧那种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民主（corporatised democracy）就将建立在这种对能源流动的重组之上。ERP 资金帮助支付了建设炼油厂和安装燃油工业锅炉的费用，将从煤炭转向石油所需的基础设施安排就位。⁵⁰ 美国鼓励欧洲修建公路，向 ERP 参与国提供了 4.325 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车辆，并补贴意大利和法国的汽车制造商。西欧缺乏重要油田，因此新增的石油需求将由中东，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新油田来供应。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美国政府急切希望能提高那里的石油产量，以提供资金支持伊本·沙特（Ibn Saud）不稳定的寡头政权。

稀缺的钢材和建筑设备从美国运向了波斯湾，用来建造一条从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的输油管道，以便迅速增加对欧洲的石油供应量。同时，ERP 的管理者设计了一个全球性的石油定价方案。中东石油无论是生产成本还是运往欧洲的运输成本，都低于美国石油的相应成本，而美国的石油价格还受到政府生产配额的保护。根据新的定价方案，欧洲无法受益于进口中东更便宜的石油，因为中东石油要以远高于进口美国石油的价格卖给欧洲。这个方案虽然保护了美国石油生产商和国际石油公司的垄断利润，却使欧洲从煤炭转向石油的过程变得更加

50 Raymond G. Stokes, *Opting for Oi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West German Industry, 1945–196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96. 美国主管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合作署（European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CA）投入了 2400 万美元来增加炼油厂的建设；从其他开支项目（如石油购买）中腾出的资金也被转用于炼油厂的建设，而 ECA 的配套资金（counterpart funds）也被投入于此。David S. Painter, ‘The Marshall Plan and Oil’, *Cold War History* 9: 2, May 2009: 168. 建设炼油厂代表了一种减轻欧洲国家美元严重短缺的重要手段，而其原因，正如 ECA 署长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向国会报告时所言，在于炼油厂能让欧洲各国进口原油，而非昂贵的成品油。尽管欧洲复兴计划一个明面上的目标是解决美元短缺的问题，但美国各大石油公司通过斗争，成功地限制了将欧洲复兴计划的资金用于建设炼油厂。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Interstate and Foreign Commerce, *Petroleum Study, Progress Report*, 15 May 1950, 8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困难，特别是在供应中东石油的美国公司只接受美元支付的情况下。有鉴于此，ERP 的美元资金也被用于支付欧洲购买石油的费用——这一安排确保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全球金融体系正是基于各国以美元购买石油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在欧洲复兴计划的全部资金中，超过 10% 被用于购买石油，这是该计划资金最大的单项用途。在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1948 年 4 月至 1951 年 12 月），美国公司向参与国供应的石油中，超过一半是由该计划资助的，使得石油公司成为马歇尔计划所施援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⁵¹

31 在这些美国补贴的激励下，石油在西欧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从 1948 年的 10% 上升到了 1960 年的近三分之一。将钢材从其他用途转而用于建设输油管道，以及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转而用于推动欧洲从煤炭转向石油，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来自削弱欧洲煤矿工人政治力量的必要性。⁵²

煤炭时代的石油

如果煤炭在塑造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曾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将煤炭替换为石油，会带来什么不同呢？和煤炭类似，石油有时也使工人

51 David Painter, 'Oil and the Marshall Pla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8: 3, 1984: 362; Painter, 'Oil and the Marshall Plan': 164–165; Nathan Citino, 'Defending the "Postwar Petroleum Order": The US, Britain, and the 1954 Saudi-Onassis Tanker Deal', *Diplomacy & Statecraft* 11: 2, 2000: 137–160; Fred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52 James Forrestal, 'Diaries of James V. Forrestal, 1944–1949', vols 9–10, 6 January 1948, in 'James V. Forrestal Papers, 1941–1949', Princeton: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另参该套档案的 vols. 7–8, 2 May 1947; Painter, 'Oil and the Marshall Plan': 361–362。

们得以团结起来，将自己装配为新的社会力量。尽管 1945—1946 年的炼油厂罢工是美国第一场全国性的石油罢工，但在 20 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曾是美国主要石油产区的加利福尼亚州，那里的石油工人早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就领导过斗争了，而且不只是为了争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还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他们争取将石油工业公有化，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在真正的民主中，“政府的组建应当是为了造福最广大的群众，而不是为群众以外一小撮人的物质利益服务”。⁵³ 工人们将石油工业置于公共控制下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他们成功开创了一种以社群为基础的新型劳工运动，这种运动深度参与地方与州级政治活动，而且与其他产业的工会相比，更能经受住斗争过后随之而来的政治压制。⁵⁴

石油工人所能获得的政治力量取决于石油的使用方式，以及这种使用创造出的脆弱性。20 世纪以前，石油的主要用途是作为油灯中的煤油（kerosene，英式英语称之为 paraffin）来提供人工照明，以及用作机械的润滑剂。它被广泛分销到各地，通常以小份装在可重复使用的金属桶中直接供应给个人消费者。除俄国外，19 世纪没有其他国家把石油转化为驱动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机械动力的重要来源。因此，与煤炭不同，石油并未集中在其他工业过程所仰赖的关键渠道上，石油产区也没有成为工业中心。出产石油的地区常常远离大型市场，这些市场大多位于已经依靠煤炭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即便在那里，灯

53 *Kern County Union Labor Journal*, 10 November 1917 and 18 May 1918, cited in Nancy Quam-Wickham, 'Petroleocrats and Proletarians: Work,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California Oil Industry 1917-1925',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3-14.

54 Quam-Wickham, 'Petroleocrats and Proletarians'.

油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在农村而非城镇使用的产品，因为城镇照明依靠煤气，到 19 世纪末则开始改用电力。石油与外界联系的薄弱性，加上它在作为机械能的集中来源方面也地位有限，这些因素就限制了石油工人潜在的政治力量——除了在我们将会讲到的俄国。

这种薄弱性得见于“一战”前除美国和俄国以外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区——如今分属波兰和乌克兰的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省（Galicia）。加利西亚的油井分布在从克拉科夫（Cracow）开始向东一直延伸到罗马尼亚边境的一条 300 英里长的弧形地带上。到 1890 年代，蒸汽驱动的冲击钻井技术取代了手工钻井，人们能够开采更深的储油岩层，使石油产量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急剧攀升。供应的激增威胁到了控制欧洲煤油市场的大公司——标准石油，以及它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可是，加利西亚缺乏可通航的水路或铁路网络将当地产的石油输送到德国和其他重要市场，于是，这些大公司就得以利用这种隔绝状态来削弱加利西亚本地的油企与劳工。从 1904 年开始，当地石油工人组织了一系列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争取集体权利，包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当地小型油企无力承受罢工，愿意同工人谈判，可外国大型公司却拒绝与罢工者交涉。工人们以怠工破坏做出了回应：他们关停了把石油输进储油库的油泵，任由石油流进当地的溪流。对此，奥匈帝国政府派出了七个步兵营来保护泵站和输油管道。通过拒绝谈判并延长罢工，大公司既能挫败工人，又能令小生产商倒闭出局。其实，有传言称，1904 年的这场罢工正是标准石油资助的，为的就是实现这双重目标。⁵⁵

55 Alison Fleig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0–172.

20 世纪，随着电力照明在工业化国家开始普及，这些国家对煤油需求的增长就受到了限制，石油公司不得不开始为它们的产品寻找新的用途。它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将石油从一种照明工具，转变为一种机械动力的来源。起初，石油被投入锅炉，以燃料油的形式直接替代煤炭来驱动往复式蒸汽机。内燃机的发展，特别是它在 1900 年后的迅速推广，让石油获得了一种无法被既有产品取代的用途，无论是在轻型汽油发动机还是在动力更强的柴油机中，都缺乏现成可用的燃料产品来替代石油。⁵⁶

33

在俄国控制的高加索地区，石油工人已经能够从这种发展中获益了。位于现代阿塞拜疆境内的巴库（Baku）油田集中在巴库城四周，占地不超过 12 平方英里，却在 20 世纪初的一段短暂时期内产出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石油。巴库的石油工业通过一条铁路和一条输油管道与黑海港口巴统（Batumi）相连，再通过从巴统出发的水路和铁路与俄国其他地区相连，巴库爆发的抗议顺着这些路线延烧，最终演变成了俄国 1905 年的革命。南高加索地区的劳工骚乱始于 1901—1902 年由巴统输油管道、炼油厂和港口工人领导的罢工和示威，抗议活动最终在一间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属工厂的石油工人大罢工中达到了高潮，14 名抗议者在这场大罢工中丧生。工运的组织者们——包括年轻的约瑟夫·斯大林——与他们在巴库的盟友一直保持着联系。⁵⁷ 更浩大的

56 第一艘装载柴油发动机的远洋船舶是一艘为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建造的名为“火神星”（*Vulcanus*）的油轮，于 1910 年 12 月首航。Frederik Carel Gerretson, *History of the Royal Dutch*, 4 vols, Leiden: E. J. Brill, 1953–1957, vol. 4: 54–55.

57 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2nd ed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2–164; Robert Service,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8–50.

革命始于1903年7月巴库石油工人的罢工。这场罢工沿铁路线蔓延到了外高加索铁路中点城市梯弗里斯 [Tiflis, 今称第比利斯 (Tbilisi)] 的编组站和车间, 进而蔓延到巴统, 再之后就“像一把野火一样席卷了整个南俄罗斯”。⁵⁸ 这是俄国的第一次总罢工, 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 正是它让罗莎·卢森堡承认了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工人所具有的这种全新力量, 而按照她的说法, 把工人们联结起来的, 是个体在“经济”上的不满, 而不是“政治”上的组织。⁵⁹ 1904年12月, 巴库的石油工人们宣布发动第二场总罢工, 1905年革命就由此展开。

随着革命逐渐展开, 当地的观察者报道称, “在巴库感受到的劳工问题, 也许比俄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严重”。⁶⁰ 斯大林日后宣称, 巴库石油工人先进的组织技能, 以及他们与石油工业家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 给了他本人宝贵经验, 使他有资格成为“革命的熟练工人”。⁶¹ 然而, 罢工石油工人的领袖实际上与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发生了决裂, 34 并去和石油企业展开了谈判, 最后达成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劳工协议, 自此赢得了九小时工作制、病假工资、免费燃料油供应及选举工厂代表等权利。他们的政治诉求, 则包括“在普遍、平等、直接、无

58 Robert W. Tolf, *The Russian Rockefellers: The Saga of the Nobel Family and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6: 156.

59 Luxemburg, *Mass Strike*: 44.

60 来自巴库副领事厄克特 (Urquhart) 先生的报告, 附于领事史蒂文斯 (Stevens) 先生的以下报告之上: 'Report for the Year 1905 on the Trade and Commerce of Batoum and District', 26 March 1906: 13, in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vol. cxxvii, Command Paper 2682, no. 3566 Annual Seri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Russia, 1906.

61 斯大林的话出自他1926年对铁路工人的演讲, 转引自 Ronald Grigor Suny, 'A Journeyman for the Revolution: Stalin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in Baku, June 1907–May 1908', *Soviet Studies* 23: 3, 1972: 373。

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罢工以及组建和参与工会的自由”。⁶²

石油工人展现的力量表明，在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巴库石油工业的组织方式与连接方式，更接近同时期欧洲北部的煤炭工业，而不是其他地区或日后的石油生产。上百家企业群聚在几平方英里的空间内生产石油，就形成了一个由钻井架、露天储油池和蒸汽机组成的密集网络，与输送石油、水、蒸汽和天然气的管道以及供电的高压电缆纵横交错。在不远处的里海沿岸，汇集了一百多座炼油厂及工厂里的大批劳动力，石油从那里通过蒸汽轮船和铁路运往俄罗斯帝国的各个角落。油井、车间、泵机、电站和炼油厂之间如此近的距离，创造出了一个集中的劳动力群体，他们有能力中断广大地区的能源供应。⁶³

巴库的石油生产与同时期的煤炭工业还有第二个相似之处：那里所产的石油主要不是用于照明，而是用于产生蒸汽动力。巴库开采的重质原油中能够精炼成煤油的易挥发烃类含量较少，因此会产出较高比例的渣油，更适用于蒸汽锅炉。高加索地区缺乏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产油区多见的煤炭和木材供应，这些燃料的短缺就促使人们选用石油来提供燃烧热。巴库的工程师研制出了一种用在燃烧器上的雾化喷

62 Solomon M. Schwarz,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Bolshevism and Menshevism*, transl. Gertrude Vak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Appendix 6: 'The Baku Strike of December, 1904: Myth and Reality': 303; Beryl Williams, '1905: The View from the Provinces', in Jonathan Smele and Anthony Haywood, ed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London: Routledge, 2005: 47–48.

63 Tolf, *Russian Rockefellers*: 145–147. 我在此处和下文的几段分析参考了 Richard Ryan Weber, 'Power to the Petrol: How the Baku Oil Industry Made Labor Strikes and Mass Politics Possibl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MA thesis, Program in Liberal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May 2010。

嘴，使轮船和铁路上的蒸汽机能高效地利用石油。1870 年代，俄国里海舰队从煤炭改用石油作为燃料，而俄国铁路在 1880 年代也开始转向石油。到 1890 年，除了在顿涅茨盆地的煤炭产区和西伯利亚以外，俄国所有火车都由燃料油驱动，而且燃料油的使用还扩展到了冶金工业和北部的工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石油平均约占俄国商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41%。⁶⁴ 引爆 1905 年革命的石油工人罢工，此时就拥有了使帝国上下的交通网络与工业活动都陷入瘫痪的能力，正如煤炭工人的罢工在欧洲西部和北部所能达到的效果一样。

但是，与欧洲西部和北部不同，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俄国各民族之间的区分（ethnic division，后简称“民族区分”），在巴库石油工业的组织形式中得到了反映和利用——在挫败 1905 年革命的行动中，这种区分也得到了反映和利用。石油产业中的非技术劳动，部分由当地的阿塞拜疆人承担，部分由伊朗移民工人承担，这些伊朗移民既有波斯语族群的，也有阿塞拜疆语族群的。承担技术劳动的工人则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石油和其他生意的管理者和本地企业主大都是亚美尼亚人，其中许多人都因石油产业的繁荣而发家致富。一位当地的英国观察者形容，巴库“从商业和民族学的角度看，都像是俄国的约翰内斯堡”，把巴库比作因金矿开采而正在迅速兴盛的南非城镇德兰士瓦（Transvaal）。⁶⁵ 在南非，不久前爆发的南非

64 Tolf, *Russian Rockefeller*: 70–71; N. L. Madureira, 'Oil in the Age of Steam',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 1, 2010: 79.

65 James Dodds Henry, *Baku: An Eventful History*,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1905]: 12; Arthur Beeby-Thompson, *The Oil Fields of Russia*, London: Crosby Lockwood & Son, 1904: 125–126; Hassan Hakimian, 'Wage Labor and Migration: Persian Workers in Southern Russia, 1880–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7: 4, 1985: 443–462.

战争（英布战争）巩固了一个以种族化的劳工制度（racialised labour regime，即依照种族来组织和分配岗位的劳工制度，这种制度是在采矿业中发展出来的）为基础的帝国自治体系，而英国日后将会从中汲取在阿拉伯世界的产油区实行“自决”的灵感（参第二章）。

面对石油工人的革命罢工，俄罗斯帝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出动黑色百人团（The Black Hundreds），一伙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反革命力量，他们的首要武器，是“集体迫害”（pogrom）——利用聚众暴徒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发动的有组织暴力行动。1905年1月，他们在巴库发动的第一轮民族暴力并不成功，反而“给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到同年9月，黑色百人团攻占了巴库城，纵火焚烧油田，还煽动并武装阿塞拜疆人攻击信仰不同宗教的亚美尼亚人。数千人惨遭屠戮，石油工业遭受重创，工人的革命诉求也被挫败。⁶⁶

尽管存在一些现象表明，石油有可能被转化为一种建立政治自由的工具，但我们在20世纪初的巴库看到的劳工动员、交通运输和能源使用模式，被证明只是一个例外。利用民族区分来组织石油生产的做法才是更加普遍的，并且日后将被应用在中东地区的各个地方。⁶⁷将劳动力依照不同的种族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将管理者、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分开安置并给予他们区别对待，这样做能够削弱劳工的力量——这种能力反映出，石油的生产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与煤炭是不同的，并且是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后而非之前发展起来的。石油生产的

36

66 Report from Mr Vice-Consul Urquhart: 133; Tolf, *Russian Rockefeller*: 156–160; Henry, *Baku*, 149–218.

67 参 Robert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地点一般远离大型人口中心，并且生产规模往往扩张得十分迅速，从而满足生活在已经利用煤炭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与石油生产地远隔千里的那些用户的需求——这一现实促使石油生产商从各个不同地方引进劳工，然后继续维持各种形式的民族区分。然而，这个差异仅仅是让石油生产越来越不同于煤炭生产的其中一个因素。相较于煤炭，石油采用特有的方法来生产，且运输路线更长，通常也更加灵活，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它们所含的碳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有关。为了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石油的政治不同于煤炭的政治，我们就必须从这些因素入手考察。

石油的流动

石油是在地下压力的推动下到达地表的——这种压力来源于聚集在石油下方的水或石油上方的气体，有时还需要泵的辅助——石油的生产相对于所产出的能源规模而言，需要的劳动力比煤炭的生产少。⁶⁸石油工人在地面上作业，距离管理者们的监督更近。由于石油的碳以液体的形式存在，运输能量的任务用更少的人力就能完成。泵站和输油管道可以替代铁路作为运输手段，把能源从生产地运送到使用地或装船向海外交付的中转地。这些运输方法不需要成队的人员在途中全程跟随燃料，或在每个节点上将它装载、卸下，也不需要人员来持续地操作引擎、控制开关和发送信号。事实上，输油管道被发明出来，正是为了削弱人类干扰能源流动的能力。186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首

68 随着石油被开采出来，储油层的压力会下降。此时可以通过使用油泵来将更多的石油泵送到地表，或者通过将水或气体注入次级油井来增加储油层的压力。

次采用管道来输送石油，就是为了规避那些用马车把成桶石油运往铁路货运场站的马车夫对工资的要求。⁶⁹而在随后的十年中，巴库的石油工业从美国的石油钻探公司那里借鉴了这项创新发明，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输油管道难以经受住蓄意破坏行动。例如，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英国驻巴统领事曾汇报称，“相当数量的管道都被革命者钻了孔，因而无法使用”。但是，相比于运输煤炭的铁路，输油管道要被破坏到安全不堪使用的程度是更加困难的，而且可以迅速进行应急性的临时修补。那位领事也报告称，管道的损坏“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就能修补好，整条管线极有可能很快就恢复运作”。⁷⁰

不仅如此，柴油和汽油还比煤炭更轻，更容易汽化，并且燃烧后剩余的残留物也比煤炭更少。正因如此，就像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所指出的那样：

37

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存放于煤炭无法放置或难以企及的零碎空间：由于借助重力或压力便可输送液体燃料，发动机已经不再需要负责人工添加燃料的司炉工了。在蒸汽发电厂和蒸汽机船上引入液体燃料和机械加煤机所起到的效果，就是解放了一群奴隶般的司炉工。⁷¹

石油的流动性和质量相对较轻的性质，使得大批量地跨洋运输石油成为可能。而与石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很少有煤炭漂洋

69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33.

70 Mr Consul Stevens, 'Report for the Year 1905': 8.

71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235.

过海。⁷² 1912年，英国全国所产煤炭的三分之一被出口到国外，占全世界海运出口煤炭的三分之二，但这些煤炭的几乎90%，都出口到了邻近英国的欧洲和地中海地区。⁷³ 整个20世纪，煤炭出口海外的比例稳定在大约15%。相较之下，随着19世纪末油轮的发展，石油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在大洲之间运输。自1920年代以来，全球石油产量的60%—80%都被用于出口。石油运往海外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到1970年时，全球海运货物中有60%都是石油。⁷⁴

38 与铁路运煤相比，海上运输石油消除了煤炭装卸工和司炉工的劳动，从而也就消除了组织起来的劳工从能源系统的关键节点上撤走他

72 主要的一个例外是产自南威尔士的高质量动力煤，这种煤对于海军和快速班轮不可或缺，所以被英国运往了海外的煤炭供应站（H. Stanley Jevons, *The British Coal Trade*, London: E. P. Dutton, 1915: 684）。实际上，在1903—1913年间，在英国运往欧洲以外的煤炭中，有一半只运送到了两个目的地——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与苏伊士运河（Rainer Fremdling, ‘Anglo-German Rivalry in Coal Markets in France,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1850–1913’,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5: 3, 1996: Table 2）。从历史上看，由英国驶出的远距离运输船上搭载的煤炭货物可被用作船上的压舱物或配重物，并享受回程运输的低费率（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London: Macmillan, 1865: 227）。

73 H. S. Jevons, *British Coal Trade*: 676–684. 身为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于1942—1944年主管美国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又译“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军事供应部门。他回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煤炭并不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跨越大片水域运输的物资。它确实被英国运往海外的煤炭站，但人们并不会认为煤炭的跨洋国际贸易是一件常规的事。然而，当战争来临，当我们需要向欧洲运煤时，我们才开始把煤炭运送出去……他们在普吉特湾用铲斗把煤装上驳船，然后再运往欧洲，运往得克萨斯州的一个装卸点，运往缅因州的波特兰，运往各个地方”。Richard D. McKinzi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dependence, MO: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08–109, at 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kindbrgr.htm.

74 2005年，世界煤产量的86%都在生产国本国被消耗。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Coal in World in 2005’, at www.iea.org. 石油的数据，参 Podobnik, *Global Energy Shifts*: 79; 1970年的数据，参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07*, Geneva: UNCTAD, 2007. 在1970年时，煤炭仅占海运贸易的不到5%。

们劳动的能力。远洋航运的作业范围超出了受劳工法规和其他民主权利管辖的地域范围，而这些法规和权利正是工人们在煤炭和铁路大罢工的时代争取到的。其实，航运公司只要将船只注册在巴拿马或其他“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国家，就能完全逃避劳工法规的约束，甚至逃避缴纳税款，从而彻底消除了劳工组织可能还保留的任何已被大大削弱的力量。（当石油生产日后转移到了墨西哥湾等近海区域时，海上钻井平台被视同船舶而同样可以注册在方便旗下，如此一来，就连石油的生产场所都能够摆脱当地税目和劳工法规的约束了。）

铁路运输需要运行在一个专门为其建造的，运力、布局、轨距都固定的轨道网络上。与铁路不同，远洋航运并不受限于这样的网络。油轮离港时，常常并不知道最终目的地何在。它们会先驶向一个航路点，然后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水平来决定目的地。这种灵活性伴随着风险：1967年3月，这种灵活性就成为世界第一起大规模石油泄漏事故——在英国康沃尔郡附近海域发生的“托利卡尼翁”号油轮事故的原因之一。⁷⁵ 这场事故推动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而在日后，环保运动将是碳燃料产业面临的一大威胁。但是，这种灵活性进一步削弱了

75 “托利卡尼翁”号（Torrey Canyon）油轮的所有权属于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在百慕大设立的一间子公司，船籍注册在利比里亚，由英国石油公司租赁使用。它建造于1959年，1966年在一家日本船厂改造，使其载重吨位从66,000吨提升到119,000吨。1967年3月，它在英格兰康沃尔郡海岸搁浅。它的最后一趟航程，是在不知道最终目的地，也缺乏英格兰西南海岸详细海图的情况下启航的。由于缺乏处理巨量石油泄漏的方法，海岸和野生动物遭受的损害因而变得更加严重。英国政府试图让防空部队投掷凝固汽油弹（napalm）来点燃泄露出来的石油，但此举不仅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而且还无意间暴露了英国拥有这种颇具争议性的武器，以及英国轰炸机的命中率之低（超过四分之一的炸弹没有命中目标）。John Sheail, ‘Torrey Canyo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 3, 2007: 485–504; Cabinet Office, *The Torrey Canyon*, London: HMSO, 1967.

那些试图控制能源生产地点的地方性势力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比如说，如果某个石油产地被罢工活动或国有化运动波及，油轮可以迅速改变航向，从其他产地供应石油。

换句话说，煤炭的移动往往遵循某种树状的网络，这种网络的每个端点都有分岔的支路，但只有单一的一条主干道，因此会让几个重要的节点，变成可能会被扼住咽喉的瓶颈；而石油则是沿着具有网格状结构的网络流动的，就像电网一样，存在多种可能的通路，能量的流动可以通过切换路径来避开阻塞或克服中断。

39 这些化石能源开采、运输和利用方式的变化，让能源网络在面临由那些维持其运转的工人所提的政治诉求时，变得不再那么脆弱。与煤炭的移动方式不同，石油的流动难以被装配成一架使大量人员能够行使那些新型政治权力的机器。

制造稀缺性

石油不同于煤炭的属性还以另一套方式影响了它的民主潜力。石油的流动性和它相对易于流通开来的性质，给石油资源及其流通网络的控制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无论是在煤炭行业还是在石油行业，生产商总是试图规避竞争。与对手比拼价格和市场份额会损及利润，甚至导致公司破产。就煤炭而言，跨洋运煤的高昂成本确保了生产商只需要面对本地的竞争。而为了避免竞争，煤炭企业要么组建卡特尔（cartel），例如法国、德国和美国煤炭商，要么建立控管价格和产量的组织，例如战后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在英国，许多煤炭生产企业因竞争而破产，最终在 1946 年都被英国政府收归国有。

在规避竞争方面，石油公司面临的困难则要比煤炭商大得多。随着 1890 年代大型油轮开始出现，仅仅控制一个地区的石油生产和流通已经不够了。由于石油可以很容易地在大洲之间运输，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更便宜的石油，总是让本地的石油企业无力招架。虽然这种脆弱性在关于石油行业的论述中很少被注意到，它却对石油的民主化潜力创造出了另一套限制。

面对这个问题，石油公司发展出的解决办法，或许可以被称作一种怠工破坏的策略。在煤炭时代，工人们曾经发现了一种可以通过中断、限制或延缓能源供应的能力而构建起来的权力。而大型石油公司面临的挑战，就是做类似的事情：为石油的生产和流通引入一些小规模的延迟、中断和管制，从而通过限制能量的流动，来加强自己的掌控。埃米尔·普热在他 1909 年写出的那本讨论怠工破坏的小册子的结尾指出，也许资产阶级才是真正的怠工破坏者。十年后，随着这本小册子的英译本在芝加哥出版，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进一步发展了普热的想法。⁷⁶ 凡勃伦认为，大型商业公司的利润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怠工破坏。这些公司的目标并非让产量达到最大化，而是通过限制产量来确保供应的短缺，进而抬升价格。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的小伎俩”就展示了远远超出所投资本正常盈利能力的利润，是如何从大企业行使的“抑制的力量”（power of inhibition）中滚滚流出的。⁷⁷

40

76 Thorstein Veblen,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Peace and the Terms of Its Perpetu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rev. edn 1919: 167–174; *O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Sabotage*, New York: Oriole, 1919; and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New York: Oriole, 1919. 凡勃伦的观点近来又被希姆雄·比希勒（Shimshon Bichler）和乔纳森·尼灿（Jonathan Nitzan）进一步发展，参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77 Thorstein Veblen, 'On the Nature of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1, 1908: 104–136.

将这种“对低效能的资本化”（capitalisation of inefficiency）运用在石油这样的商品上尤其有利可图，因为石油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它对工业社会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它的供应受到限制，生产商可以赚取巨额的利润。石油公司的目标，就是把石油所必须流经的管道、加工地和瓶颈点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并从油井本身开始就限制竞争渠道的发展，最后再利用自己对这些必经通道节点的控制权，把石油的流动转化为利润。

20 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帮助限制了石油的供应与流动，但在两场战争的战间期，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石油公司（当时世界上绝大部分石油都在美国生产），还是那少数几家试图控制国际贸易的石油公司，都需要一套新的运作机制来限制能源的生产和流通。这些公司开发的手段包括：在美国国内实施的政府配额和价格管制制度，控制全球石油流通和销售的卡特尔安排，延缓中东新油田开发的财团协议，以及对石油公司这一怠工破坏体系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反对者所带来的威胁进行管理的政治机构。这些加强掌控权的手段塑造了跨国石油公司的发展，它们最终得以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石油供应限制的主导性远程机制。我们可以将这个发展理解为所谓“技术区”（technological zone）的形成，而这里的“技术区”概念，指的是一套由相互协调但又广泛分散的规章制度、计算安排、基础设施和技术程序所组成的体系，它使某些对象或某些流动过程变得可被管理和控制。⁷⁸

78 Andrew Barry, 'Technological Zon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9: 2, 2006: 239–253. 其他原材料也存在需要控管全球生产以避免竞争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便宜到石油这个程度，而且它们也远不及石油的使用量之巨大，因此它们没有产生与石油产业同等规模的对制造稀缺性的技术的需求。关于政治机器的构建，亦参 Andrew Barry,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thlone Press, 2001。

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这个发展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是 20 世纪初打压——一开始极力阻止，后来则设法限制——中东石油生产的种种努力，以及使之得以实现的技术与政治安排。而“二战”后，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当大量石油开始从中东流出时（距离中东最初发现石油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又有更多手段被添加进了这个制造稀缺性的机制。在限制中东石油生产的各种力量继续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两种新的方法，将充裕的碳能源，转变为一个供应受限的体系。第一种方法是和平时期的“国家安全”这一新的装置。⁷⁹“二战”为美国石油公司创造了一个在中东削减或停止它们绝大多数生产活动的机会。1943 年，当伊本·沙特寻求资金来弥补其石油收入的损失时，各石油公司说服了美国政府，将战时《租借法案》（Lend Lease）的贷款范围扩展到这位沙特阿拉伯的君主身上。这些为石油的不生产而支付的款项，被塑造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它们标志着一种新的战后政治的开始：美国与当地政府合作，当地政府负责限制石油的流动，美国则负责对抗试图增加石油供应的那些政府或公司——这种合作被组织得好像一个“保护”某种稀缺资源不被染指的体系一样。

41

79 对美国国际石油政策的批判性论述往往倾向于接受“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作为框架来论叙述石油的历史，而对其真实含义的揭示，要么从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资源稀缺问题的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出发，如 Michael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要么从保障资本主义扩张的帝国力量的必要性的角度出发，如 Simon Bromley, *American Hegemony and World Oil*,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trol of World Oil’,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0: 2, 2005: 225–255。从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这个角度来解释石油问题，会导致这些论述忽略了将围绕石油的多重斗争简化为一个关于资本逻辑的展开与稳定的单一叙事所必须完成的那些社会-技术性的工作。关于美国石油巨头用“国家安全”的框架来阐述它们的策略，以及这种视角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再生产，参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第二种防止能源充裕的方法，需要在美国迅速构建起一种围绕大量能源的消耗而组织起来的生活方式。1948年1月，不久前才刚刚根据新的《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被任命为美国首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在与纽约标准-真空石油公司（Socony-Vacuum）*的总裁布鲁斯特·詹宁斯（Brewster Jennings）讨论时这样说道：“除非我们能获得中东的石油，否则在五年之内，美国的汽车公司将不得不设计一台只有四缸发动机的汽车。”⁸⁰在随后的几年里，美国汽车制造商将标准的六缸发动机，替换成了具有八个气缸的V8发动机，并把这个新款发动机塑造成每个中产阶层家庭都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此举的推动下，美国乘用车发动机的平均马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翻了一番。⁸¹可就在福莱斯特发表此番论调的同时，英国莫里斯汽车公司（Morris Motor Company）正准备在市场推出自家生产的四缸轿车小莫里斯（Morris Minor），来迎战大获成功的四缸轿车大众甲壳虫（Volkswagen Beetle），而同样加入这场战局的，还有雪铁龙生产的双缸轿车2CV，以及德国发动机制造

* 纽约标准-真空石油公司，也就是从原标准石油公司分拆出来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与真空石油公司合并而成的公司，日后改名为美孚公司（Mobil），后来再与同样从标准石油公司分拆出来的新泽西石油公司发展而成的埃克森公司（Exxon）合并，遂成今日的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il）。“Socony”即纽约石油公司原名“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的缩写。——编者注

80 Forrestal, 'Diaries', vols 9-10. 他在1948年1月16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Forrestal, 'Diaries', 2026）。

81 Tom McCarthy, *Auto Mania: Cars, Consumers,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7-108. 保罗·萨宾（Paul Sabin）对加州石油工业的研究追溯了使石油的稀缺性被生产出来的“消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of consumption）的建立过程（Paul Sabin, *Crude Politics: The California Oil Market, 19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关于美国对能源的态度的历史，参David E. Nye, *Consuming Power: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Energ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商宝马在战后推出的首辆乘车型号，单缸的伊塞塔（Isetta）250。虽然这些欧洲车型比设计低劣的美国车型更畅销且更耐用，但是，后者帮助打造了更宏大的东西——一种耗碳量极高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战后中东新的政治安排相结合，将帮助石油公司把石油保持在足够稀缺的水平，从而让它们的利润丰厚增长。

有组织的劳工能够利用基于煤炭的能源体系的网络与节点，来装配一架政治机器，而这种能力塑造了在 20 世纪上半期涌现的，或有涌现的威胁但最终没有涌现的那些形式的大众政治。石油的崛起，必将改变民主运作机制的方式，重组了化石燃料的网络。于是，无论是在依赖石油生产的国家，还是在最依赖石油使用的国家，提出民主诉求的可能性都被改变了。

关于主要石油公司和汽车制造商在帮助制造和推广那些基于极高能耗水平的生活方式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有许多可以展开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对石油消费的分析，来平衡关于石油生产与流通的历史，而是需要理解：石油的生产不仅仅是在生产一种能源，还是在生产一种越来越依赖这种能源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来自仙境的奖赏

43

人们在讲述中东石油的故事时，往往会从一个错误的起点开始讲起：1908年马斯吉德苏莱曼（Masjid-i-Suleiman）的石油发现。一位特立独行的英国投资人雇佣了一小队钻探工人，用马车和骡子驮着沉重的设备，穿行于环境恶劣的不毛之地上，在经历了七年毫无成果的勘探之后，终于在波斯西南部的沙漠高原上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石油储藏。这里的发现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创建，同时也开启了这个世界上储油最丰富的地区现代石油工业的发展。可是，这个英雄一般的勘探者在荒凉之地发现惊天财富的传奇故事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其实早已知道，在中东地区一些更加方便到达的地点存在着石油，而在波斯的贫瘠山丘间寻找石油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开启中东地区的石油工业，而是为了推迟它的发展。

整个20世纪，中东石油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总是太多了。更精确地说，是有太多的石油集中在了太少的几个地点。一种能量来源的供应丰富并不必然是一个问题。在广泛分布着充足的水、木材、太阳能和草场的地区，集体生活可以欣欣向荣。利用和供应这些能源的人能够以此来维持生计，或许还能从中获得利润。正如我们在煤炭的例子里看到的那样，当人类开始把化石燃料当作获取能量的来源时，可供利用的能量规模能够以指数级增长。然而，由于地质学上的原因，化石能源储量丰富的地点往往相对较少。极度丰富的储量和十分有限的储藏地点相结合，便引发了问题。

组织化石燃料供应的企业能够经常相互合作，以限制可资利用的燃料数量。在煤炭的例子中，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几十年来，煤炭企业被迫将怠工破坏能量流动的能力，分享给采煤和运煤的工人，而这种能力让煤炭工人及其盟友得以装配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力量。而在石油的情况中，大规模延缓或阻断能源供应的能力要难以组织得多。石油工人发现，实施成功的怠工破坏十分困难——这种困难就阻碍了他们利用石油，来建立起一个推进民主政治诉求的持久机制。

管理石油生产与流通的公司，在限制能量流动的任务上，同样面临着比煤炭公司更大的挑战。然而，在中东和其他一些地区，最初被发现的产油地点相对稀少，位置也相对隔绝，这一特点让石油公司得以从中获利，它们利用将产油地与石油主要消费国（这些国家已经依靠煤炭完成了工业化）分隔开来的遥远距离，发展在这种分隔的两端都能行动的能力，维持连接两端的输送渠道的畅通或将之阻断——所有这些操作都是在高度针对性的政治和军事支持的帮助下完成的。

44

石油公司与它们力图掌控其劳动的工人团体相比，规模更小，力量也可能更弱。但是，随着石油的生产与流通，一个由钻井场地、输油管道、储运码头、炼油厂、配送节点、董事会议室、投资机构和政府的办公室所组成的网络发展起来，而石油公司的行动能力就沿着这个网络不断扩张。例如，在1908年马斯吉德苏莱曼发现石油后的几个月里，这家新设立的英国公司——未来的英国石油——已经在忙着卸下从别处运来的钢管，准备建造一条从油田到海岸的输油管道，同时也在规划一条沿管道铺设的电话线，与当地部落签订协议来保卫管线，指定代理公司来处理石油在当地的储存与航运，在英国起草招股书来吸引对此项目的投资，还在试图说服英国海军部（Admiralty）允

许它在招股书中宣称，政府支持在波斯建立石油工业作为皇家海军未来的燃料来源——然而没有说服成功。¹ 这些流通分配、建立关联、主张利益、实施掌控的网络虽然通路狭窄，但处在石油公司的严密监控之下，而它们延伸的范围大大超过了早前的能源形式甚至包括煤炭的网络，体现了石油更具流动性、更易于运输的属性，以及限制石油的供应所能带来的远远更高的利润。与煤炭工人相比，石油工人不只是更加隔绝孤立、更加缺乏联系，他们还被隔绝在了这个远远更加广泛延伸的庞大网络的各个末端。

讲述中东石油的传统故事，在假定寻找石油的目标是开采石油而非延缓其开发——因此，这些故事开始于错误的起点，理由我在后文会陈述——之后，还犯了第二个错误：它们认定了错误的故事主人公。这类叙事大都把大型石油公司及其背后的政府当作主角，这些机构往往又被少数几位英雄人物所代表，他们在“充沛干劲与热忱”的驱使下去争夺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在其石油史巨著中所引述的、温斯顿·丘吉尔所喻称的那种“奖赏”——对世界石油的掌控。² 但这种叙述方式忽视了石油生产者们的角色，而每当这些生产者对获取那种奖赏构成威胁时，他们的力量就必须被削弱或转移。这种叙述方式也极度低估了另一样事物：石油，它所蕴含的能量，就是石油公司试图掌控的力量；而石油的位置、储量、密度与其他属性，也塑造着控制它的手段与装置。这个由机器／制、人员、知识、资金和碳氢化合

1 Ronald W. Ferrier,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vol. 1: *The Developing Years: 1901–193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92–133.

2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12.

物*所共同组成的装置，便是我们所简称的“石油公司”(oil firm)。从技术的意义上看，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石油公司，也许可以把它想象成某种寄生虫：一个依靠某种比自身更大的东西——能源的流动——来从中吸取养分为生的存在物。如果它蓬勃发展，变得非常巨大，就像某几家石油公司在20世纪的进程中所做到的那样，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其领导人的热情和意志力，而更多地在于它如何让自己适应它所寄生的那些过程，并操纵这些过程来实现自身的扩张。³如果能源的流动出现了阻断或异常，这与其说反映的是一场未解决的掌控权争夺战，倒不如说它更多地体现了寄生的常规手段。

第三个误解在大部分有关中东石油的论述中都能找到。石油公司从来就没有强大到能仅凭自身之力来垄断石油的流动和中断。它们需要军事和资金上的外部协助。为了利用国家武力和政府财政的资源，西方石油公司开始把它们对海外石油的控制，形容为国家的“帝国”利益，或用后来的话语，称之为国家的“战略”利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控制是有益于公众福祉的。那些心怀帝国理想的政治领导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往往支持这样的观点，虽然也有些人拒绝认同。研究石油史的学者则通常都会应和这种帝国叙事。

可是，这样的论述从西方工业社会（尤其是美国）正在发展能源消耗量与日俱增的生活方式这一事实，就直接跳跃到了大型石油公司对石油的控制最能服务于这种生活方式的结论——哪怕石油公司的首要目标是阻碍能源的流动、抬高能源的费用，哪怕其他一些供应石油

* 即“hydrocarbons”，在化学上指仅含碳氢两种元素的化合物，即烃类，而在大众语境中这个词被用来指代石油与天然气。——编者注

3 Michel Serres, *The Parasi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和组织集体生活的替代方案在当时是可能实现的。在 20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当石油生产国政府开始要求石油公司把石油的控制权分享给它们时，这些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宣称这样做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与其先入为主地认定对中东石油的控制符合英国、德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帝国利益或战略利益，或认定它能服务于石油生产国的国家利益，我们不如先追问：是谁在推动这些主张 / 诉求？推动这些主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些主张，与其他有时更具民主性的石油控制权主张，包括那些生产石油的劳动者所提出的主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冲突？这些更具民主性的主张出现的时间较晚，因为石油公司的阻挠和其他拖延措施推迟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大型石油工业的建立。但对帝国强权来说，获取中东石油的能力，从一开始就与民主所构成的威胁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油湖

46 20 世纪初，全球各地有数百家企业参与到了石油勘探、生产、运输和流通供应的活动中。其中的少数几家正在想方设法控制远距离的石油供应。这些企业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对应着控制石油的不同方式和环节。有些企业是石油的生产商，它们的组织形式类似于煤矿开采公司，设有工人的营地，并配备了工程师团队，许多企业还装备了能钻入地下数千英尺的新式旋挖钻机，取代了老式冲击钻机的敲打捶击。以这种形式运营的企业中，有三家各自支配着一块位置偏远的石油产区——荷兰皇家石油在苏门答腊，缅甸石油（Burmah Oil，又

译“伯马石油”)在仰光,诺贝尔兄弟(Nobel Brothers)在巴库。有些企业则是银行,它们控制着建造能够垄断石油运输的铁路与管道所必需的资金流,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 Bank),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Rothschild's),以及创建了海湾石油(Gulf Oil)的匹兹堡梅隆(Mellon)家族。此外还有一家企业,也就是壳牌运输公司(Shell Transportation Company),则是通过采用并发展了另一种大批量运输石油的装备——远洋油轮,而在1890年代实现了扩张。全球最大的石油企业,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最初是一家石油精炼企业,它首先通过垄断炼油产业(它的垄断借助了使用大量蒸汽动力的更高效的炼油工艺,这些蒸汽由炼油厂生产的燃油来产生)而逐渐建立了美国市场的主导地位,进而控制了管道和运输路线,最终掌控了石油的流通分配体系,建立起了一个由储油罐、运货马车和可重复使用的锡桶所组成的网络,并用标准石油自己的这个遍及全球的网络,取代了个体石油进口商和批发商。

在1880年代以前,全世界只有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地区,那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的石油地(Oil Lands)。通过先后控制炼油厂和输送宾夕法尼亚石油的管道,标准石油得以主导全美乃至全球的煤油等石油产品的销售。然而,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石油公司在北美以外的五个地区开拓了大规模的商业化石油生产——巴库、缅甸和苏门答腊,以及中欧的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和罗马尼亚。石油运输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了石油的液态属性,并消除了能源运输过程中大部分的人工劳动,而这些新技术——钢制输油管、高压蒸汽泵、大型油轮和大型储油库——使得世界任何地区的本地石油垄断,都容易遭受上述五个产地石油供应的冲击。标准石油发起了各种努力,试图兼

并或摧毁这些竞争产区的主要生产商，却纷纷以失败告终，随后，它与这些对手达成了协议。在 1910 年代，这家美国公司和几家欧洲大型石油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安排，来限制石油的生产，并控制全球的石油销售——同时也来应对中东石油构成的威胁。

47 两个商业联盟由此成立，一个负责管理亚洲的石油贸易，另一个负责欧洲。1902 年，荷兰皇家石油与壳牌以及在巴库和罗马尼亚都有石油利益的罗斯柴尔德，结成了一个日后演变为荷兰皇家 / 壳牌的商业联盟。1905 年，壳牌集团迫使供应广大印度市场的缅甸石油同意分割亚洲石油销售市场，而标准石油也加入了这项协议。欧洲市场的组织方式与此类似。1906 年，罗斯柴尔德与另一家里海的大型石油生产商诺贝尔，及其在罗马尼亚的合作伙伴德意志银行，联手成立了欧洲石油联盟（European Petroleum Union），一个管理西欧煤油与燃料油市场的卡特尔。这个欧洲的卡特尔再与美国的标准石油达成了瓜分欧洲石油销售的协议，标准石油接受了不超过 80% 的市场份额限制，欧洲一方则占有余下的部分。¹

与此同时，大公司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中东。仅仅瓜分世界上现有的这五个左右的石油产区是不够的。这些公司仍然面临着一个风险：某个竞争对手可能会开发出一个新的大型油田，新增的石油供应就会威胁到世界市场现状。最大的风险就在中东，因为石油公司已经知道那里存在着几处潜在的产油地。另一个相关的威胁则来自里海沿岸城市巴库的俄国生产商。20 世纪初，巴库是世界上石油产量最丰富的

1 Gregory 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and the World Oil Cartel, 1900–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56–61; Robert W. Tolf, *The Russian Rockefellers: The Saga of the Nobel Family and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183–190; Yergin, *The Prize*: 121–133.

地区，但也是与大型石油市场最隔绝的地区。各大石油公司担心，巴库的俄国石油生产商们能找到更便捷的方式，将石油运往海外，特别是通过建造一条通往波斯湾的管道，来缩短巴库到亚洲的路线（参 174—175 页示意图）。为了消除这些威胁，三家最大的欧洲石油公司买下了在中东勘探石油的权利：德意志银行在 1904 年获得了伊拉克北部（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摩苏尔和巴格达两省，即欧洲人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的石油勘探权，缅甸石油次年获得了波斯（1935 年后改称伊朗）的，而壳牌石油则在 1908—1910 年获得了埃及的。

石油政治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演进着。由于大型石油公司的目标更多时候是推迟新产油区的开发，因此必须获得关键节点的控制权。控制油田本身并不总是必要的。这些公司从标准石油的经验中学到，控制运输途径更容易。铁路与管道的修建权要与政府谈判才能获得，而政府通常还会授予阻止竞争线路建设的进一步权利。在获得这些权利后，石油公司的目标通常是在不失去这些权利的前提下延迟建设。伊拉克是对石油生产进行总工破坏的关键地区。在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该国都维持着这样的角色，并在 21 世纪又以不同方式重新扮演了这一角色。伊拉克的故事展示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开始的。

在中东三大产油区中，伊拉克的产油潜力最大，石油资源也最容易获得。摩苏尔周边的生产商已经从手工挖的坑里开采了几个世纪的石油，并送到当地的蒸馏厂精炼，以供应巴格达的灯油市场。1870 年前后，巴格达总督在该城北部的巴古拜（Baquba）建造了一座规模更大的炼油厂。1888 年，奥斯曼苏丹接管了采油的权利，使之成为帝国宫廷的垄断。三年后，奥斯曼苏丹命令年轻的亚美尼亚裔石油工程师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起草一份关于摩苏尔油田

的报告，这位古本江的父亲过去曾经营从巴库进口煤油的生意。² 由于此前对该地区潜在石油开采地进行的调查留下了可用的资料，古本江不需要亲自到访便能提交报告。（日后，他只通过谈判就获得的伊拉克石油权益，让他从未踏足这个国家一步就积累了世界上最为可观的个人财富。³）1899年，一份英国地质调查报告确认了该地区的产油潜力，称在底格里斯河穿过低矮石灰岩丘陵的地方，山崖上“渗出一条条长丝状”的原油“污染了河流近三英里”。在评论此处石油的可及性时，报告指出，“这些石油可以立即被装载到轻型蒸汽船和驳船上”，再沿底格里斯河运输到下游，而这条河“提供了一个通向波斯湾的天然出口”。⁴ 同年，奥斯曼政府计划通过出售特许权的方式，来铺设一条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的铁路，为这里的石油建造第二个出口。德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启动了争取这项特许权的谈判。1901年，一个来自德国的技术委员会把摩苏尔描述为“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储量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油湖’”，闻讯的德意志银行立刻开始推进计划，确保从这个“湖”流出的石油不会到达欧洲市场，因为它会威胁到该行在罗马尼亚石油上的大量投资。1903年，德意志银行买下了上述铁路的特许权，来年又获得了摩苏尔和相邻的巴格达省石油的独家开采权。在这之后，德意志银行建造铁路的进度停滞不前，也几乎没有投入精力去开发当地的石油。⁵

2 Stephen Hemsley Longrigg, *Oil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3–14.

3 Ralph Hewins, *Mr Five Per Cent: The Story of Calouste Gulbenkian*, New York: Rinehart, 1958: 30.

4 F. R. Maunsell, 'The Mesopotamian Petroleum Field', *Geographical Journal* 9: 5, May 1897: 530, 532.

5 Edward Mead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A Study in Imperi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15; Dietrich Eichholtz, *Die Bagdadbahn: Mesopotamien und die deutsche Ölpolitik bis 1918*,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07: 32.

埃及的油田分布在红海沿岸苏伊士运河出海口附近，占据了更为便利的位置。当壳牌收购了埃及油田的股权后，该公司的地质学家报告说：“我们的油井距深水区仅几百码，世界大部分船只都会在距离我们油井两英里的范围内通过。”人们知道此处石油储藏的存在已有三十年，但由于法国反对英国占领埃及，这里的油田一直没有得到开发，直到1904年英法两国政府解决了关于埃及国家财政收入的争端为止。埃及同年新设立了矿业部门，负责拍卖油田的勘探权，投机者很快就将它们都买了下来。出资最大的投机者是英国金融商人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他曾靠管理埃及阿斯旺大坝建设的资金供应并投机大坝灌溉区内的农田而积累了一笔财富，如今他希望通过买卖石油投资权再赚一笔。埃及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Egypt），也就是卡塞尔设在埃及的投资公司，组建了东方与非洲特许权辛迪加（Eastern and African Concessions Syndicate）来持有其石油租约。他的目标不仅是垄断埃及，还包括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石油开采权。⁶

49

与德意志银行在奥斯曼帝国的做法类似，壳牌对开发埃及的油田并无强烈兴趣。它投资卡塞尔在埃及的辛迪加，是为了加入他控制整个地区石油权利的计划——一个据壳牌的说法，聚焦于“争夺美索不达米亚油田的重大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计划。⁷开罗的英国行政当局指责壳牌试图限制埃及油田的开发：“贵公司出于建立实质垄断的本能愿望，”英国在开罗的高级财政官员爱德华·塞西尔（Edward Cecil）

6 Frederik Carel Gerretson, *The History of Royal Dutch*, vol. 3, Leiden: E. J. Brill, 1953–1957: 240–241; Colonel John Ardagh, ‘The Red Sea Petroleum Deposi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8: 8, 1886, 502–507.

7 Gerretson, *History*: 242.

写道，“急于控制大量未开发的地区，并可能暂时限制石油的生产。”⁸埃及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强制执行租约中的“持续作业条款”并鼓励竞争企业来开发油田——遭到了壳牌的反对，对此，英国行政当局祭出了一个手段，这种手段日后却成为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竭力抵制的政策：1913 年，它对壳牌在埃及的子公司实施了国有化。⁹

保护在印度的投资

尽管底格里斯河沿岸和红海之滨的位置都很便利，中东第一个大型油田却并不是在这两个地方出现的。1905 年，缅甸石油从另一位英国投机商手上接管了在波斯寻找石油的垄断权利。然而，与埃及和奥斯曼治下的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一样，缅甸石油接手来挽救这个濒临失败的投资项目，并不是为了开启中东石油的生产。

波斯的位置，在当时全世界产量最高的油田——里海沿岸的巴库，和缅甸石油享有壁垒保护的印度市场之间。里海地区的两大石油生产商，罗斯柴尔德和诺贝尔，曾计划修建一条从巴库向南通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但最终搁置了这一方案，转而选择了更短的路线，从巴库向西直至黑海沿岸的巴统港（参第一章）。1901 年，里海石油的价格暴跌。由于巴库与主要石油市场的隔绝是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罗斯柴尔德与诺贝尔的支持下，俄国政府重启了原先的计划，来建设一条横贯波斯的输油管道。同年，英国投机商人威廉·诺克斯·达

50

8 Letter from E. H. Cecil to Waley Cohen, December 1912, in Geoffrey Jones, *The St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Oil Industry*, London: Macmillan, 1981: 118.

9 Jones, *Emergence*: 120–121.

西（William Knox D'Arcy）从波斯沙阿（国王）那里买到了在波斯勘探石油的权利，而这个勘探权中包含了这样一条协定：只要他的勘探工作还在持续推进，波斯政府就不会允许其他任何公司建造通往该国南部波斯湾沿岸的输油管道。阻止俄国人建造通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的权力，帮助达西维持住了这个投机项目。¹⁰

达西似乎也认为，波斯的采油潜力不如美索不达米亚。在取得了波斯的石油特许权之后，他与德意志银行展开了竞争，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权利。1901年，他向那里派出了一个钻探队，钻井工人将距离席林堡（Kasr-i Shirin）不远的一个名叫恰赫苏尔赫（Chiah Surkh）的地点选为他们的首个勘探点。这个勘探点并不在南波斯的沙漠高原上，甚至几乎都不在波斯境内，而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边境地带，在巴格达东北方向50英里处左右，相比于到波斯湾的距离它反而更接近里海，而这个勘探点所在的区域在1914年的一次边界调整中将会划归未来的伊拉克国。这个选址不仅为达西在美索不达米亚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同时还让他得到了一个更加直接的优势。巴库的石油公司原本可能会利用一条从德黑兰—巴格达主干交通线上的城市哈奈根（Khanaqin）进入伊拉克境内，再经伊拉克南部到达波斯湾的管道路线，绕开达西对经由波斯通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的垄断。而席林堡就在这条管道路线上（参74页示意图），从哈奈根出发沿德—巴交通线向北走只有几英里的距离。达西在席林堡附近而非波斯南部钻井，就此阻断了这条始于巴库的潜在绕行路线，从而确保了他能够阻止里海石油向印度扩大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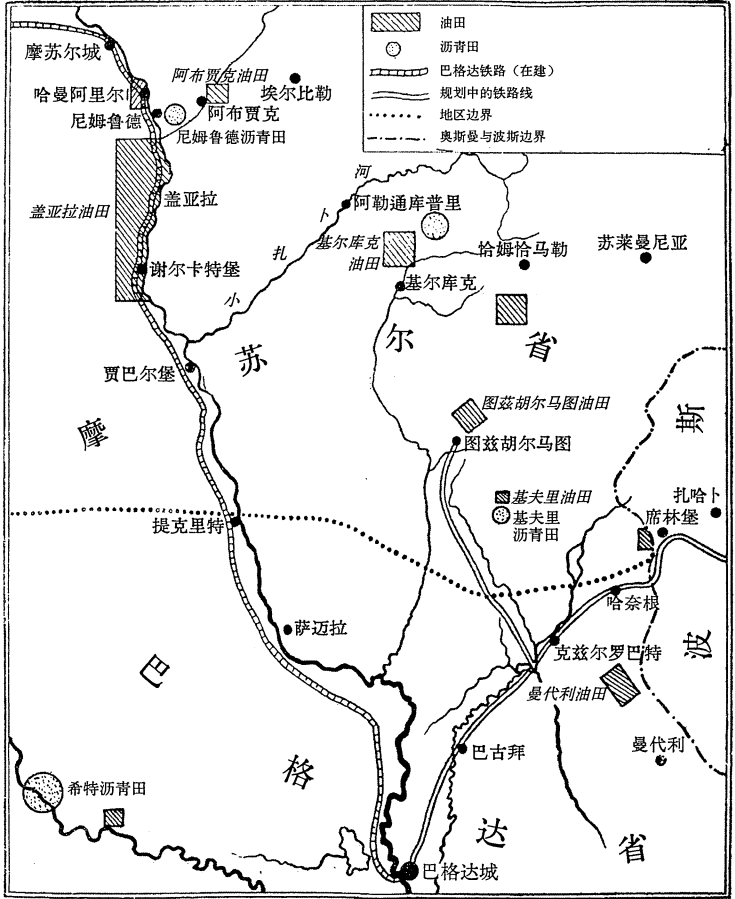
10 A. A. Fursenko, *The Battle For Oil*,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0: 130–133; Ferrier, *History*, vol. 1: 43–44; 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石油储藏

第二个巴库正在浮现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见证美索不达米亚的广大油田被开发利用。这里的油田早在古巴比伦经卷及《圣经》中就有描述，它以沥青的形式为巴比伦和亚述宏伟楼宇的建造做出了贡献。

在现代科技和新建的巴格达铁路的帮助下，



这里丰富的石油宝藏终将被开发并得到广泛应用，还会向国际贸易开放。它将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举足轻重、意义深远的作用。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对德国与英国来说都是重大的利益。若参与建设巴格达铁路的德国银行获得了特许权，那么德国的影响力……

摘自 1914 年 5 月 23 日《石油评论》(Petroleum Review) 的美索不达米亚油田与铁路示意图。

经过了两年多的钻探，达西的勘探队终于挖到了石油，但油井每天涓滴流出二十五桶的产量并不能引起大型石油公司的兴趣，而达西原本希望将这个投机项目卖给它们。他只能转而同意与缅甸石油分享自己在波斯的石油权利，后者随即暂停了在巴格达附近一个地点的钻探作业，并将工人和设备向东南方向转移了数百英里，沿卡伦河（Karun River）的河谷向上游进入了胡齐斯坦（Khuzestan）的群山之中。¹¹

达西能够找到缅甸石油这个投资伙伴，要部分归功于一批立足印度 52 的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这群人试图通过加强对波斯湾一带当地统治势力的控制，以及鼓励英国对当地贸易、航运和其他产业的垄断，来扩大英属印度帝国的影响力范围。在新任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领导下，他们宣扬着这样一个理念：英国正与俄国开展一场帝国间的斗争，而波斯和波斯湾构成了斗争的关键前线。寇松在他的著作《波斯与波斯问题》（*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当中反复警告，允许俄国建造通往波斯湾的铁路是很危险的，他还在就任总督之后与科威特统治者签署了一项保护协议，以阻止俄国在那里建造管道或铁路终点站。为了将俄国描述为军事威胁而非商业对手，寇松并未提及上述俄国管道或铁路的主要作用是出口巴库的石油。这

11 位于卡伦河谷的马斯吉德苏莱曼并不像石油业的英雄史话描写的那样偏远。卡伦河是南伊朗最大的一条河，也是伊朗唯一可通航的水道。一家名为林奇兄弟的英国公司在河上运营一艘蒸汽船，垄断了从波斯湾到伊斯法罕（Isfahan）的交通线。然而，对于即将在马斯吉德苏莱曼建立的石油工业来说，问题在于，货物在船上要通过蜿蜒曲折的河道航行 500 英里才能到达距马斯吉德苏莱曼只有 150 英里的波斯湾，且蒸汽船无法航行于阿瓦士（Ahwaz）以南的急流，因此必须在阿瓦士将货物（包括在英波石油公司输油管道竣工前的石油）卸下，通过一条小铁路（建于 1891 年）绕开这段急流再重新装船。参 M. Th. Houtsma, A. J. Wensinck and T. W. Arnold,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st edn, vol. 2, Leiden: E.J. Brill, 1913–1936: 779–780。

个遗漏并不是出于无知。在接受赴印度的任命之前，身为英国议会议员的寇松就已经去过了高加索和波斯，并在见证了巴库 1890 年代的石油繁荣之后，担任了波斯银行矿业权利公司（Persian Bank Mining Rights Corporation）的股东和董事，而这家公司早在达西投身石油业的十年前，就已经花了三年时间试图发展波斯的石油生产了。¹² 在达西的勘探项目发现了石油后，寇松的同僚、印度陆军总司令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与另外一位英属印度帝国扩张的拥护者，向被派去守卫达西勘探地点的印军分遣队的队长发去了一封电报，询问发现石油的消息是否属实，以便决定是否购买该项目的股份。¹³

日后的历史学家们喜欢重复寇松与基钦纳这类人的论调，把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描述为一场“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国与俄国在两大帝国的边界地带进行的长期斗争——的逐渐展开。虽然“大博弈”这个词是吉卜林（Kipling）在他 1901 年小说《基姆》（*Kim*）中率先使用的，而这本书讲述的是发生在印度西北边境的间谍冒险故事，但他在书中用这个词来指代的，是人生的博弈，而非英俄之间的对峙。这个词起初并未在外交文件或公众讨论中出现，只是在很久以后的冷战时期，才在历史学家的圈子里逐渐流行起来。¹⁴ 在冷战期间营造出来的这种对苏联扩张的恐慌，与美国挑战英国对伊朗石油控制权（这种控制就是达西率先建立起来的，参第五章）的企图有关，而要营造这种恐慌感，依靠的就是把俄国人与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向波

12 David Gilmour, *Curzon: Imperial Statesm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3: 76.

13 William Strunk, 'The Reign of Shaykh Khaz'al Ibn Jabir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rincipality of Arabistan',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1977: 152.

14 M. E. Yapp, '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2001, vol 111.

斯湾扩张的野心联系在一起,“大博弈”这个时空错置的词语,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方便使用的简化表达。

20 世纪初,许多英国的政治人物都不同意英属印度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对俄国的看法,反而认为英俄双方都可以从高加索和印度之间贸易状况的改善当中获益。¹⁵ 这尤其是因为最大的几家俄国石油出口商都是外资的,它们中包含了英国的大量利益。1901 年,投资巴库石油的资本中有 30% 来自国外,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是英国资本。¹⁶ 在达西的石油特许权阻断了从巴库到波斯湾的输油管道计划之后,那里的石油业者尝试推进一个替代方案——一条从里海到卡拉奇的铁路线。计划受到英法两国金融商的支持,统治印度的帝国主义者却让它再次受阻。¹⁷ (如果俄国对印度货物供应增加,可能有其他人会因此受益,因为这条铁路不仅能运送煤油,还能运送糖、谷物。食品的供应可能会缓解印度正在遭受的饥荒,包括 1899—1902 年夺走了 500 万至 1000 万人生命的大饥荒。这些饥荒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的商业政策所造成的,而寇松削减成本的帝国管治政策使情况进一步恶化。¹⁸) 对英国的印度帝国主义者来说,要将印度贸易和政治的帝国版图扩张到波斯湾,就需要阻断俄国的贸易扩张。而对波斯石油进行投机性的投资,哪怕做出了一项失败的投资,也是达成这些目标的有用手段。于是,他们

15 Briton Cooper Busch, *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 1894–191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16 Jones, *Emergence*, 56.

17 D. W. Spring, 'The Trans-Persian Railway Project',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54: 1, 1976: 60–82.

18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2001: 158–178.

帮助安排缅甸石油去投资了达西的项目，而且还让达西保持了他对波斯石油和建造跨波斯输油管道的垄断权益。

对缅甸石油来说，达西的项目看上去特别有用。壳牌从巴库出口的石油正在日益侵蚀缅甸石油在印度市场享有壁垒保护的 sales，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缅甸石油原本即将默默接受 1905 年与壳牌的亚洲集团——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达成的协议，限制自己在印度市场的份额。缅甸石油决定接手达西这桩不见起色的投资冒险，是希望把波斯石油的特许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从而避免其他人在中东开采石油或把高加索的石油输送到中东，因为这样只会加剧该公司在印度面临的问题。在达西的石油勘探工作进一步受挫之后，缅甸石油将其在波斯的投入降到了最低限度，“保留一种维持性的保底利益，仅此而已”。¹⁹ 正如该公司日后所承认的那样，“缅甸石油进军波斯，主要是为了保护其在印度的投资”。²⁰

54 缅甸石油在波斯的合作伙伴，也就是达西的企业，仍然在努力地寻找石油，希望能收回投资。1908 年 5 月，尽管缅甸石油下令开始逐步减少钻探作业，勘探队还是在马斯吉德苏莱曼发现了一处大型油田。也许是担忧这个新发现规模过大，缅甸石油仍然试图放慢开发的步伐，并将勘探队负责人召回伦敦，要求他在开始真正的生产之前，再多钻一些试探性的探井。“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达西埋怨道，“哪怕后来的勘探都失败了，也改变不了 [发现的大型新油田]

19 Ferrier, *History*: 43–44.

20 引自 Ferrier, *History*: 69. 费里尔（Ferrier）把“保护其在印度的投资”解释为应对在缅甸勘探石油的失败而做的保险措施。而诺威尔（Nowell）在他的《重商国家》（*Mercantile States*）中指出，虽然费里尔在前文中详细地讨论了巴库的输油管道，但他没有强调巴库的因素对这个问题的影响。

已经存在的事实。我想他们要把马斯吉德钻成胡椒粉罐的盖子一样才会高兴吧。”²¹ 缅甸石油花了一年时间正式成立了英国-波斯石油公司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下文简称“英波石油”)——也就是我们日后所熟知的英国石油公司——并用缅甸石油的股权从达西手中换得了波斯的石油特许权。缅甸石油对开发新的石油供应源并无多少兴趣,又用了额外的三年时间,才铺设了一条长 140 英里、直径 8 英寸,通向波斯靠近伊拉克边境的波斯湾港口城市阿巴丹 (Abadan) 的输油管道,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套简陋的蒸馏设施来精炼原油。

我们现在已经装配起了关于中东现代石油工业起源的另一种叙事。这个故事的开端并不是英勇的勘探者在波斯贫瘠山丘上的苦苦求索,而是相互竞争的石油公司及其合作伙伴试图在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的“重大经济和政治斗争”中取胜。这些大公司的目标不是开发重要的新增石油来源,反而是延迟它们的开发;对一些公司来说,目标还包括阻碍巴库的俄国大型油田出口石油。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些石油公司正在学习如何将它们自身的需求,描绘成是在增进国家的帝国利益,因而会为民族的福祉做出贡献。

一个阻止石油产品进入市场的计谋

正当这个在波斯已经延宕太久的投资项目发现石油之际,它又遇到了两个进一步的问题。首先,英波石油面临着对手企业发起的“侧翼进攻”:这些企业试图通过在附近开辟一个与之相竞争的石油产区,

21 Ferrier, *History*: 92.

来摧毁英波石油（至少英波石油是如此宣称的）。²² 德意志银行已经决定与壳牌合作，开发它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特许权。

接下来的事件常常被讲述成巴格达铁路的故事——欧洲列强间帝国争霸的最后一幕，据说“一战”就是由此引发。虽然金融商、工程承包商、船运商、棉粮商起初都对铺设一条将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连接到欧洲的铁路计划感兴趣，但大部分论述从未提及，德意志银行最终建造这条铁路，主要是将它用作“一条车轮上的输油管道”。

奥斯曼政府则对这条铁路另有打算。一方面，它把这条铁路视为更方便调动部队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希望依靠在铁路沿线安置帝国其他地区战事失败后产生的难民来增加粮食的生产——这是帝国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但从 1870 年代以来受到美国廉价谷物进口的冲击。这条铁路的第一段建成于 1890 年代，连接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中部，一般被称作安纳托利亚铁路。但这段铁路不仅未能创造利润，奥斯曼政府还花费了超过铁路覆盖地区农业税收总额的费用来补贴它，以确保德意志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投资回报。²³ 然而，对德意志银行及其生意盟友来说，除非能把这条铁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生

22 Marian Kent, 'The Purchas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Shares in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1912-1914', in *Moguls and Mandarins: Oil,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0-1940*,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6.

23 Donald Quataert, 'Limited Revolution: The Impact of the Anatolian Railway on Turkish Transportation and the Provisioning of Istanbul, 1890-1908',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1:2, 1977: 139-160, and *Workers, Peasant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1730-1914*, Istanbul: Isis Press, 1993. 关于车轮上的输油管道，及日后摩苏尔石油的开采，参 Firat Bozçalı, 'The Oil Pipeline on Wheels', MA thesis, *Center for Near Eastern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2009. 我对巴格达铁路的论述参考了 Sam Rubin, 'Iron and Steel, Oil and Grain: The Baghdad Railway and the Worlds it Built',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1。

产联系起来，否则就不可能为通向巴格达的剩余路段的建设融资。它们最初对开发新的石油来源没有什么兴趣，于是就利用独占性的铁路与石油特许权来阻止他人开发。只有等到英波石油在奥斯曼与波斯边界的另一侧发现了石油之后，它们才开始推进巴格达铁路剩余路段的建设工程，同时还制定方案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在欧洲销售这些还不被需要的石油。在那个时候，英波石油试图阻挠德意志银行的计划。由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没有认识到，将铁路线延伸至巴格达的工程主要是一项石油工程，以及这些大石油公司更感兴趣的往往不是生产石油，反而是对石油生产进行怠工破坏，所以他们会感觉难以理解围绕巴格达铁路的这段故事——也难以理解被莫名其妙地认为要为“一战”的爆发负责的那些阻挠、延搁与合纵连横活动背后的原因。

就像英国人在波斯的所作所为一样，德国人获取美索不达米亚石油以及将之运往欧洲的输送途径的独占性权利，最初的目的也是阻止石油的生产。在1904年7月取得了石油特许权之后，德国人修建铁路和勘探石油的工作都停步不前。德意志银行在二十年后承认，“对于整个事务的拖延处理，是出于战术考虑”。²⁴ 1907年3月，奥斯曼帝国以德意志银行“未能履行协议的特定条款，尤其是关于试验性钻探

56

24 Eichholtz, *Die Bagdadbahn*: 32. 玛丽安·肯特 (Marian Kent) 认为，石油开发的延宕是由于德意志银行对于油田权益的主张较弱。但德意志银行的主张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发生后才被削弱的，因此这并不能解释1904—1908年的延搁。参 *Oil and Empire: British Policy and Mesopotamian Oil, 1900–1920*, London: Macmillan, 1976: 24.

25 ‘Consul General at Berlin (Coffin) to Secretary of State’, 4 August 19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2: 660. 该档案在后续注释中简记为 FRUS 1920.

土耳其党人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将一个起初更亲英国的政府推上了台，而与此同时，英国企业又在波斯发现了石油。

于是，德国人迅速恢复了铁路的建设。为了使自己能够对英波石油新开辟的生产构成威胁，他们开始寻找办法来销售这些预期将要供应却还没有足够需求的石油，而石油的销售收入正好可以为铁路建设提供资金。德国人的解决方案就是制定一个计划，来打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对欧洲煤油供应的掌控。1906年，欧洲石油联盟为欧洲的石油企业确保了欧洲市场五分之一的份额。为了抢夺标准石油剩余的市场份额，德意志银行与它在法国的石油利益盟友合作，推动德法两国的国内立法，在灯用煤油市场建立起受政府管制的垄断。²⁶

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自己也遭受了一场“侧翼进攻”，而它怀疑这背后有标准石油公司的影子。一家自称为奥斯曼-美国开发公司（Ottoman-American Development Company）的美国财团经过谈判取得了一项初步特许权，来建设一条将成为德意志银行铁路项目有力竞争对手的铁路线。这条更具雄心的铁路线全长2000公里，从叙利亚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出发，经阿勒颇（Aleppo）和锡瓦斯（Sivas）到达摩苏尔，继而延伸至靠近波斯边界的城市哈奈根——英波石油曾经的勘探地点。此外，铁路特许权还附带在铁轨周围40公里范围内发现的任何矿产资源的权益。一家柏林的报纸报道称，该财团的负责人，一位名叫科尔比·M. 切斯特（Colby M. Chester）的退役美国海军上将，正是“标准石油的傀儡”，而德意志银行则警告道，这项特许权开发案并非“为了真正的铁路开发，而是一个控制某些未开发的油田以阻

26 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61-76 揭示了煤油市场垄断的细节，以及它与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特许权之间的关系。

止其石油产品进入市场的计谋”——德意志银行当然很容易就能识破这一战术。²⁷

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标准石油是否参与了这场“侧翼进攻”至今仍然只是一个传言，尽管可以确认的是，标准石油的首席地质学家兼石油资源勘查工程师约翰·沃辛顿（John Worthington）曾在1910年到访过中东，并向公司报告称，他看好美索不达米亚石油资源的采油潜力。考虑到标准石油当时为了在世界各地阻止竞争对手的油田开发付出了超出想象的力气，它要是在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的交战中缺席将会是令人意外的事。而科尔比的那个财团，在没有做任何初步调查的情况下，就为这个充满野心的项目贸然支了付大笔定金，美国官员对这种做法感到十分困惑。美国国务院派了一位外交官从华盛顿前往伊斯坦布尔去会见科尔比的儿子（他担任财团驻伊斯坦布尔代表），与他探讨是否应该支持这个特许权项目，作为美国在奥斯曼帝国拓展贸易的支撑。这位外交官并不知道，这份特许权协议也许不是为了扩大贸易，而是为了减少贸易，而在他抵达伊斯坦布尔并准备与科尔比的儿子会面的那一天，他才惊讶地发现，科尔比的儿子已经离开奥斯曼帝国去往维也纳了。德国人利用他们对奥斯曼官员的影响力，使美国的特许权在最后的审批环节中被否决。²⁸

57

就在这时，一个与伊斯坦布尔新政府关系密切的英国金融家商团组建了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联合股份公司，土耳其石油公司（Turkish

27 John A. DeNovo, 'A Railroad for Turkey: The Chester Project, 1908-1913',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3: 3, 1959: 313.

28 DeNovo, 'Railroad for Turkey': 318. 关于约翰·沃辛顿其人，参 Edgar Wesley Owen, *Trek of the Oil Finders: A History of Exploration for Petroleum*, Tulsa, OK: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Geologists, 1975: 1282。

Petroleum Company)。这个商团由欧内斯特·卡塞尔领导，我们已经在前文中介绍过他试图从埃及开始，继而逐步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建立石油垄断的计划。1912年，卡塞尔的商团安排仍然持有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特许权的德意志银行，及其在欧洲的生意盟友壳牌——壳牌包含了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石油利益——各自以25%的名义股份，入股土耳其石油公司。剩余的50%股份则由这群英国金融商人持有，他们把持股的投资公司命名为土耳其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Turkey），并在董事会里给奥斯曼新政府的几位要员安排了席位。²⁹

这个围绕石油与铁路的计划，此时已经足以对英波石油构成威胁了。英波石油之所以控制波斯的油田，原本是为了阻止竞争对手威胁到其母公司缅甸石油的庞大印度市场，如今，竞争对手却能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的开发而破解英波石油的布局。英波石油无法击退这场“侧翼进攻”，于是选择了替代方案：加入进去。为此，它需要英国政府的帮助，让英国政府利用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1875年奥斯曼国家财政破产后创建的外国债权人财团联合体）否决奥斯曼政府提高关税的决定，而奥斯曼政府原本计划用多得的关税收入来偿还修建巴格达铁路所需的贷款。英波石油警告英国政府，若壳牌——英波石油在争取英国皇家海军燃油供应合

29 Gerretson, *History*: 243–248; Marian Kent, ‘Agent of Empire? The National Bank of Turkey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18: 2, 1975: 367–389, and *Oil and Empire*. 奥斯曼政府也许更愿意取消之前的石油特许权协定，但如果要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新的协定，就会让标准石油和俄国各石油利益方有机会施加压力，对石油和铁路协议提出更多要求。同时，这还会触犯奥斯曼帝国的矿产法律关于在协商细则之前要进行试验性钻探以确定新特许权价值的规定——这样做会导致石油开采被推后，而奥斯曼政府十分希望能够避免延迟，尽快开采。参 ‘Consul General at Berlin (Coffin) to Secretary of State’, 4 August 1920, FRUS 1920, 2: 661。

同上的对手——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就会压低价格，将英波石油逼出市场，或迫使英波石油与壳牌合并，然后再抬高石油价格，并“仅仅以缓慢的速度来开发这个有巨大潜力的供应源”。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反对“英波石油的这种态度”，认为这家公司“迄今为止一直表现出极度支持英国帝国利益（ultra-imperialist）的姿态”，此时却威胁说，如果政府不出手相助的话，就要将自己出售给壳牌。³⁰ 然而，英波石油的警告还是说服了它在外交部中的支持者们，他们迫使卡塞尔的英国投资商团将它以土耳其国民银行的名义所持有的土耳其石油公司 50% 的股权，转让给了英波石油。

为了更全面地保护英波石油，英国还与德国和奥斯曼政府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约定德意志银行的铁路工程只修到巴士拉（Basra）为止，而不再将终点站延伸至波斯湾沿岸，并为印度航运业巨头英奇凯普勋爵詹姆斯·麦凯（James Mackay, Lord Inchcape）的航运事业取得了经营从巴士拉到波斯湾的河运业务的垄断权。按照英国政府的宣传，这一垄断权，以及在获得这个垄断权的过程中所造成的长期延误，对于将帝国交通网络掌握在英国手中来说是必要的举措。可是，当时其实已经有另一家英国公司，即林奇兄弟（Lynch Brothers），控制了从巴格达到波斯湾的汽船航线。伦敦的《泰晤士报》已经驳斥了企业家和帝国主义者号称巴格达铁路可能会成为一条“直通印度的大道”的说辞，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与贸易将继续依靠海路而非陆路。迫使林奇兄弟将巴士拉到波斯湾的内河航运垄断权让渡给英奇凯普勋爵的好处在于，勋爵同时也是英波石油的

30 Marian Jack, 'The Purchase of British Government's Shares in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1912-1914', *Past and Present* 39: 1, 1968: 142, 147.

董事。³¹ 这样的安排所要保护的，并不是英国的帝国贸易向波斯湾和印度地区的流动，而是一个阻断流动的战略位置。通过英奇凯普勋爵，英波石油就保留了这样一种阻断能力，可以封堵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使之无法进入英波石油享有壁垒保护的亚洲市场。

1914 年夏，就在德法两国要建立的煤油垄断即将最终确定之际，土耳其石油公司的相关协议在伦敦完成了签署，奥斯曼政府同意把巴格达、摩苏尔两省所有“已发现和尚待发现的石油资源”租让给这家新组建的企业。³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世界仅次于标准石油的四大石油企业——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英国与荷兰的荷兰皇家壳牌，以及英国的英波石油——已经达成一致，共享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的权益。

“一战”的爆发推迟了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特许权的一切开发工作。但这几乎不成问题。限制石油的生产，本来就是各企业同意共享这些石油权益的一个核心目的。1914 年土耳其石油公司协议的最后一段，便是一条著名的“自抑条款”（Self-Denying Clause）。根据这一条款，欧洲的主要石油公司承诺，不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任何地区（埃及和科威特除外，因为这两地连同波斯南部已经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单独开展石油生产，除非是通过土耳其石油公司来联合进行。³³

31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255–263; Stuart A. Cohen, *British Policy in Mesopotamia, 1903–1914*, Reading: Ithaca Press, 2008: 198.

32 ‘Turkish Grand Vizier (Said Halim) to German Ambassador in Turkey (Wangheim), Constantinople’, June 28, 1914, FRUS 1920, 2: 662.

33 土耳其石油公司协议的正文辑录于以下论文的附录中：Edward Mead Earle, ‘The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 A Study in Oleaginous Diplom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9: 2, 1924: 277–279。

仙境

一边应对着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遭到的侧翼进攻，另一边，英波石油又遇到了第二个难题：没人愿意买它生产的石油。人们发现，波斯出产的原油的硫元素含量很高，而硫有刺激性的气味，燃烧时还会在灯罩上留下一层黑膜，因此，这种石油不适宜用于照明。英波石油的产品找不到市场，而如果没有分红希望的话，投资者便不会愿意出资来完成生产设施的建设。波斯出产的石油要想找到销路，唯一的希望是把它用作蒸汽机或柴油发动机的燃料油，而不是用于照明。可是，在波斯南部及附近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在使用以石油为燃料的发动机。英波公司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对达西和缅甸石油来说，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弱点和需求转译为一种帝国的利益。这种策略，是英波石油一有机会就会采用的。英属印度政府曾派出一支特遣队去保护英波石油的钻探作业，并一直承担着这些士兵们的军费开支。在发现石油之后，英国驻德黑兰公使亚瑟·哈丁（Arthur Hardinge）建议，英波石油应该承担起警卫队伍的费用，或者换用更便宜的当地武装力量。达西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回答称，他与他的合作伙伴

正在努力地开发石油产业，并且已经相当成功地为此将会完全由英国人发起和主导，在英国人手中掌握和管理，并利用英国资本来进行开发的新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这个产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国政府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甚至还可以给予它一些特殊的关照，因为，

它将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我们的海军获取宝贵石油资源的来源。

英波石油试图采用同样的策略，来应对创造产品市场这个更大的问题。它再次向英国政府呼吁，希望政府能与它签订两份长期的燃料油采购合同，一份用于印度铁路，另一份用于皇家海军，由此为它生产的石油创造需求。然而，印度事务部和海军部都拒绝了这项提议。印度的铁路以煤炭作为动力来源，而印度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将其大部分舰队改造为部分或全部以石油为燃料，而且正在考虑建造完全依靠石油驱动的舰船，可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可资使用的石油供应源，包括坐落于苏伊士湾沿岸的埃及油井，这些油井直接位于一条世界主要航道上，而且已经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1914年的石油产量达到了10万吨，后来的产量更是增加到了数百万吨；还有一个选项是墨西哥，1910年一家英国公司在该国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油田。³⁴ 尽管遭到了海军部的拒绝，英波石油在起草用于股票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时依然宣称，自己已经获得了海军部的支持。海军部得知后，阻止了这份招股书的发布。然而，由于英波石油急于吸引投资者购买股份，便依然在招股书中暗示，该公司的石油对于皇家海军的燃料供应具有所谓的军事重要性。几年之后，海军部改变了它拒绝支持英波石油的决定。

从温斯顿·丘吉尔在他1923年的《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一书中的陈述开始，历史学者们一直都在呼应英波石油在招股书中的

34 Jones, *Emergence*: 68, 85.

主张，突出强调英波石油对英国帝国利益的重要性，以此解释海军部态度转变的原因。在论及英波石油向政府求助的结果时，丘吉尔这样写道：“命运从仙境给我们带来了一份超乎我们最美好希望的奖赏。”在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后被任命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此时正在努力争取让皇家海军的军费开支和战斗力实现空前的提升——这种扩张帮助推动欧洲在三年后陷入了一场出乎人们意料的惨烈大战。军备升级行动的主要开支，花在了建立一支高速战列舰队上，这些战舰装备了蒸汽涡轮机（一种高速发动机，最初是为了驱动新型发电机而开发的，后被改装用于船舶）并以燃油而非煤炭为燃料驱动。这反过来又需要在英国建立大型油库以储备支撑一场六个月的战争所必需的足够燃油，需要组建一支油轮舰队来进口燃油储备，还需要去购买那些石油的供应，而那些供应，就像丘吉尔解释的那样，都“掌握在受外国控制的巨型石油托拉斯手中”。³⁵他所指的石油托拉斯，是总部设立在英国最可靠盟友国家的标准石油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共有的壳牌石油公司，所以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这些公司的外资属性，不如说是它们对石油的垄断权力。在将海军的动力来源转变为石油的过程中，海军部使自己在石油垄断企业日益增强的力量面前变得脆弱。

海军部还在另一种新的力量面前变得脆弱。1903年，为了应对声势日趋高涨的劳工运动，英国政府推行了国家养老金制度，并在随后的1908—1912年间又推出了全国失业与残障保险、医疗保健计划，以及其他改善公共福利的措施。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措施的费用，英国议会起初削减了海军——英国武装部队中规模最大的军种——的年度预

35 Winston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8*, abridged and revised, ed. Martin Gilbert, London: Penguin, 2007: 75–76.

算，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账务审查和会计规则。接下来，议会又提高了富人应缴的税额，导致他们利用上议院发动了一场抵制增税的未果尝试，引发了一场宪政危机。海军部要将皇家海军的动力装置转换为完全依靠石油驱动的蒸汽涡轮机，这一计划本就耗资巨大，石油的垄断定价更是加重了其成本，由于面临着新实施的严格预算限制，计划很可能在议会遭遇无法克服的反对。丘吉尔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绕过这个新的民主障碍。

英波石油陷入的困局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家内外压力交困的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开出了一份石油长期供应合同，价格低到丘吉尔可以宣布它是一份“来自仙境的奖赏”。随后，丘吉尔不遗余力地安排了这份奖赏的颁授方式，使合同条款可以避免议会的审查。海军部在支付英波石油为维持经营而正急需的这笔预付款时，将款项巧妙地构造成对该公司 51% 股份的采购（然而，海军部并没有获得任何通常股东应有的监督公司经营的权利，因而也就无法对这一垄断体系发起任何攻击）。在政府法务部门官员的帮助下，丘吉尔没有将这项采购案作为一项需要经过专门委员会审查的财政预算案呈送议会批准，而是将其以政策文件或白皮书的形式提交给议会，同时又宣称这笔交易所围绕的核心，也就是那份石油供应合同，是不能公开细节的商业安排。1914 年 6 月 17 日，这项采购案被提交给了英国议会，它的不透明引发了广泛的谴责，但战争的爆发使反对声受到了压制。³⁶

对英波石油的救助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一种手段，使海军从煤炭转向石油的成本得以规避公众的审查，但它并不能解决产生这笔巨额花

36 Jack, 'Purchase of British Government's Shares'; Ferrier, *History*: 105–106.

费的其中一项原因——石油价格受到的垄断控制。通过向英波石油预付贷款，并安排该公司入局阻碍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开发的计划，英国政府反而让英波石油得以跻身那个正在成形的国际石油卡特尔，成为它的主要成员之一。如果说英国对煤炭的依赖为劳工运动建立更民主的政治形式提供了途径，那么从煤炭向石油的转换则为丘吉尔这样的帝国主义者提供了规避这些民主诉求的手段。

人民生活所依赖的脆弱结构

不止如此，石油还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提供了一种限制民众诉求的方式，这一点体现在海军部转变了对英波石油的态度并全面改用内燃机的另外一个原因上。1910—1911年，南威尔士的煤炭工人发动了罢工，要求保证他们的最低工资。这场罢工开启了1910—1914年间的“大动荡”（The Great Unrest）——截至当时英国所经历过的劳工行动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

62

在转任海军大臣之前，丘吉尔曾主政内政部，在那里曾负责“大动荡”第一波浪潮爆发时的安全警备工作，而他也是在内政部任上向政府警告了各工会通过协调煤炭工人、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的劳工行动而获得的那种“新的力量”。³⁷ 他与军旅生涯始于在英国殖民占领下的埃及担任宪兵的陆军部将军内维尔·麦克雷迪（Nevil Macready）合作，开始在英国推行新的方法来突破罢工纠察线（picket lines）的人墙并击溃罢工：他们派出骑兵和武装步兵，不是作为地方警察的辅

37 Randolph S. Churchill, *Winston S. Churchill: Young Statesman 1901–1914*, London: Heinemann, 1967: 365.

助力量，而是用作维持秩序的主要工具。³⁸ 1911年8月，当罢工从煤矿转移到铁路时，丘吉尔部署了军队来维持对铁路线的控制（并守卫发电站），这违反了仅在地方民政当局（civil authority）的请求下才可动用军队的规定——在1893年费瑟斯通（Featherstone）的矿工组织罢工期间发生了军队射杀罢工者的屠杀惨案后，英国议会确认了这条规定。面对丘吉尔的行动，议会工党领袖指出，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命令铁路公司接受罢工者的主要诉求——承认全国工会有权代表铁路工人——来立即结束铁路罢工。他还抨击丘吉尔以“军事统治”强代文官治理的做法激化了动荡，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恶魔般的角色”。

丘吉尔在证明他使用军队的合理性时，以铁路的特性作为辩护的理由。他在接受议会质询时辩称，军事部门需要“完全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沿铁路线调动部队”，如果每到一处都需要当地文官民政部门的批准，那是不可能做到的。铁路在大城市中造就了“大量劳动人口……集中在一起”的情况，而这些集中的人口所需要的燃料与食物都完全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罢工会造成“人民生活所依赖的所有结构，包括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都走向败坏”。铁路线的延伸分布，使丘吉尔能够借以描绘并唤起议员们认识到，某种脆弱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这种结构是非地方性的，要保护它就必须让统一协调的军事力量凌驾于地方性的民政当局之上。

在一位反对党议员怒斥丘吉尔在搞“军事戒严”、另一位议员宣称陆军部和内政部的人“全都疯了”的情况下，丘吉尔用他惯常的夸大其词的口气做出了回应，反问在场的人，“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是

38 Anthony Mór-O'Brien, 'Churchill and the Tonypandy Riots', *Welsh History Review* 17: 1, 1994: 67-99.

否曾有类似的灾难，也威胁到了一个同样伟大的社会”，然后自己举了发生在15世纪伊拉克的一个例子作为答案。他把铁路工人罢工可能会造成的危害，比作幼发拉底河上的尼姆罗德大坝（Nimrod Dam）决堤后引发的灭顶之灾。^{39*}

63

然而，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另一个地区的事件，为英国政府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克服铁路资方的顽固态度并向罢工者的诉求让步。在英国发生“大动荡”的同一时期，摩洛哥出现了一场规模更大的骚乱。摩洛哥苏丹欠下了欧洲金融商人巨额债务，于是征收重税，导致民众发动了一场反对苏丹的起义。法国向摩洛哥派出了军队，协助镇压叛乱。⁴⁰当时的摩洛哥几乎算是非洲最后一块未被殖民的土地，法国对摩洛哥的初步占领引发了德国的对抗行动，而英国此时站在法国一边，对德国以战争相威胁，并开始为欧洲的大规模冲突做准备，包括制定利用铁路调动兵力的详尽计划。⁴¹备战的决定促使英国政府下令铁路公司与工会谈判——同时也让丘吉尔有机会申请从内政部转往海军部任职。一边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占领，一边以战争的威胁来回应德国的抗议，这些政策使丘吉尔在英国国内被铁路工会的坚韧斗争所制约的军国主义，得以转战更大的舞台。

39 'Employment of Military', Hansard, HC Deb, vol. 29, 22 August 1911, cc. 2282-2378.

* 丘吉尔提到的尼姆罗德大坝（亦有拼写为“Nimrud”）可考的资料不多，大部分资料指其位于底格里斯河或其支流上，建于公元前1700—1900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溃于公元前600—700年左右。因此丘吉尔演讲中的说法或许是他引述来源有误，或许是他以“夸大其词”的口气信口编出来的。——编者注

40 Edmund Burke, *Prelude to Protectorate in Morocco: Precolonial Protest and Resistance, 1860-19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当时对英法侵略性的看法，见 E. D. Morel, *Morocco in Diplomacy*, London: Smith, Elder, 1912.

41 Churchill, *World Crisis*: 41.

揭开“大动荡”序幕的南威尔士煤矿罢工对海军构成了尤为严重的威胁。威尔士的煤田出产动力煤^{*}，一种兼具无烟煤的高热值和迅速产热能力的混合等级燃料，使得这里的煤田成为燃烧煤炭的战列舰唯一的燃料来源。来海军部后，丘吉尔立刻设立了皇家燃料与发动机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Fuel and Engines），研究将皇家海军所屬舰船的发动机从燃煤和燃油驱动的蒸汽机，更换为完全依靠石油的内燃机。威尔士煤田的政治动荡影响了海军部的想法，为其放弃煤炭而改用石油的决定提供了另一把助推力，进而促成了其对英波石油政策的转变。⁴²在让皇家海军投向另一种能量来源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使自己在面对石油公司的垄断权力时变得脆弱。但与此同时，英国也使自已摆脱了煤炭工人的政治诉求所带来的束缚。

64 如前文所述，波斯并非海军部能够获得石油的唯一地点。墨西哥的重大石油发现让该国在 1914 年时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产油国。一家英国企业，墨西哥鹰石油公司（Mexican Eagle），控制着该国 60% 的石油产量，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之一。海军部在 1913 年 7 月与墨西哥鹰签订了石油供应协议，但拒绝了该公司以英国政府购买公司股份为条件，来换取一份长期石油供应协议的

^{*} 即 steam coal，又译“蒸汽煤”，指用于燃烧产生热量的煤炭，区别于冶金用煤或化工用原料煤。——编者注

⁴² Jack, ‘Purchase of British Government’s Shares’: 154. 另外一群煤矿工人在十年前发起的类似骚乱也曾对海军部的计划产生了影响。1903 年，海军部的石油燃料委员会（Admiralty Oil Fuel Committee）建议将煤炭部分替换为石油，因为 1902 年的一起堪称美国劳工斗争转折点的事件——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大罢工，导致美国国内的能源转向石油，造成美国石油出口减少，这让海军部开始担忧能源供应的安全。参 Geoffrey Miller, *Straits: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Press, 1997: Chapter 27.

提议——这与英波石油正在与英国政府谈判的交易类似。⁴³ 墨西哥鹰当时正与标准石油争夺对墨西哥石油生产的控制权。试图暗中动摇墨西哥鹰根基的标准石油去资助了颠覆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政府的活动，结果引发了 1910—1920 年的墨西哥革命。⁴⁴ 当英国海军部要决定石油合同归属时，革命力量已经控制了墨西哥的油田，艾米里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其他起义领袖正在要求推行土地改革、争取工人权利，并实现其他革命性的变革。

波斯同样正在经历革命，也就是 1905—1911 年的立宪革命。一整年的罢工、抗议和静坐示威，迫使波斯沙阿在 1906 年接受了一部宪法，并决定建立议会（波斯语称之为 *majlis*）。巴库的波斯籍石油工人在 1905 年俄国革命后返回祖国，贡献了他们在俄国获得的革命经验。总部设在巴库并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伊朗社会民主党人组织（Organization of Iranian Social Democrats）在波斯各地涌现的群众集会中十分活跃，并且还组建了一个名为“穆贾希丁”（Mujahidin，又译“圣战者”）的政党，到 1907 年时已经招募了约 86,000 名成员。该组织的政治主张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权，以及用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来取代在新议会中仅代表大地主、商人和神职人员的有限代表制。⁴⁵ 这个进步运动的领袖之一赛义德·哈桑·塔吉扎德（Sayyid Hasan Taqizadeh）在被驱逐出境之后造访了伦敦，在那

43 Merrill Rippy, *Oil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1972: 153; Jones, *Emergence*: 76.

44 Kenneth Grieb, 'Standard Oil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alifornia Historical Quarterly* 50: 1, 1971.

45 Janet Afary,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1906–11', in John Foran, ed.,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in Ir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里他应一群左翼议员的邀请在下议院的院会上发表演说，寻求英国对立宪革命的支持，以对抗俄国干预波斯局势并复辟沙阿专制的威胁。⁴⁶可是，英国默许了俄国破坏立宪革命的行动，后来又扶持了一位军官礼萨·汗（Reza Khan）崛起——这位礼萨·汗在1921年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专制王朝，这个王朝一直统治伊朗*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为止。与此同时，伦敦还利用波斯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的机会，在该国建立了一支名为南波斯步枪队（South Persia Rifles）的民兵队伍来维护南部地区的治安，并以这支队伍取代了先前负责保卫英波石油生产活动的印军分遣队。与墨西哥油田和南威尔士煤矿区发生的大动荡相比，南波斯和与之邻近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油田提供了另外一条获取能源的途径，而这种途径需要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做出的让步看起来要少得多。

丘吉尔的奖赏并非一份来自仙境的礼物，而是一种将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按照它们即将为世人所称呼的名字，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工人生产的能源。战争的威胁与战事的最终爆发，为英国提供了平息国内“大动荡”的机会。等到战争结束时，对美索不达米亚油田的控制，将会提供削弱劳工运动这种新力量的进一步手段。尽管那些经由能源供应而被构建起来的政治诉求在国内遭到了削弱，然而，它们的范围反而扩展开来，将会开始涵盖那些在海外工作的石油工人的政治诉求。而在同一过程中，让一个帝国政府索取特殊权力来守卫的这个十分狭窄却至关重要的经济“结构”——能量流动的网

46 Mansour Bonakdarian, 'The Persia Committee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Ira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8: 2, 1991: 190.

* 礼萨·汗1925年登基，建立巴列维王朝，1935年将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编者注

络——此时也将从英国的铁路线和煤田开始向外扩张，把中东各处的油田都囊括进来。

要理解中东油田在民主政治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有必要打破关于该地区石油工业开端的传统叙事。抛开了在遥远而贫瘠的高原上寻找石油的英勇开拓者们的传说，我们在本章中追溯了这样一段历史：相互竞争的石油公司如何角逐独占性的权力，来建造或阻断铁路与输油管道，而它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去阻碍而不是去发展石油的供应。它们之间的交战在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爆发的革命斗争中渐次展开，并与英国和其他以煤炭为基础的帝国强权的国内政治动荡息息相关。石油公司与它们在金融界与政府中的盟友们，在开始代表大众政党的议会中面临着更加严格的问责，于是，它们开始将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的帝国需要。同时，帝国的政治家们正在成为这种能源供应的脆弱结构的代言人，他们以这种结构为手段，来对抗那些为争取更平等的集体生活而奋战的人。

第三章 被统治者的同意

66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由碳燃料提供动力的大规模冲突。燃烧煤炭的工厂生产了弹药、武器和机动车辆，使人类的杀伤能力成倍增加。驱使化石燃料而实现的机械化并没有减少人力劳动的使用。通过将人类战斗与远远更大的能源储备相连接，机器创造出了新的行动能力，极大地扩展了人力和畜力的物理极限。军队变成了战争的机器，在广大的作战范围和持久的战役中持续扩大对机械和人员的部署。死亡机器的大规模生产和运用让欧洲诸国得以维持一场消耗战，在欧洲战场屠杀了数百万人，并把战火延伸到非洲和中东，又在那里让数十万人死于战火、饥荒和大规模流离失所。不断膨胀的战争装置不仅需要煤炭和石油，钢铁和硝酸盐制成的炸药，还需要食品、饲料和衣物。因此，冲突越扩大，它就越依赖那些在煤矿、军工厂、麦田和棉花种植园中劳作的人们。扩张的战局摧毁了战火所及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战前的政治权力关系。与此同时，战争也为民主政治的诉求提供了额外的力量，而这些诉求的有效性源自各帝国强权对碳能源的流动所新产生的依赖。

在中东，奥斯曼帝国起先并没有加入战局，但它很快就站在德国一边，来对抗那些一直在慢慢肢解它的帝国势力。一支主要由印度士兵组成的英属印度军队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同时，英国的其他部队与一支阿拉伯军队联合，从占领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汉志（Hejaz，又译“希贾兹”）开始，一路北征，夺取了巴勒斯坦和大叙利亚（即现代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余下地区，从而控制了大部分奥斯曼帝

国的其他阿拉伯行省。此时，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有能力打一场规模极大、持续时间极长，而且暴力程度极高的战争，中东大部分地区因而都能被置于其控制之下。可是，这场冲突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使得战后帝国秩序的装配变得更加困难。

工业化的战争确认了石油作为交通运输燃料而非照明灯油的重要性。但是，在大战之后，这给大型石油公司带来了一个问题。一方面，它们现在能够利用未来战争的风险来辩称——就像英波石油已经开始号称的那样——它们谋求控制全球石油供应的行动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帝国的安全。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在被“一战”重塑的世界中，要组织对石油的垄断控制，将必须得到帝国政府的更多支持。但另一方面，如果石油供应真如各大石油公司当今宣称的那样关键而又脆弱的话，帝国政府可能会得出结论：这些相互竞争的公司所希望重建的那个石油卡特尔体系，可能不是确保石油供应最便宜或最可靠的方式。也许，一个大国的政府应当自己来负责生产石油，或鼓励小规模独立石油公司的发展，甚至回到原来各个国家发展各自石油工业的模式。在接下来的时代中，这些替代方案在不同时刻都有可能发展起来，对大型石油公司构成威胁。但除了战败国德国的石油公司外，这些大公司都能重新建立它们在战前享有的垄断地位，使得与之抗衡的另一套石油秩序又延迟了五十年才出现。

67

要管治全球的石油供应，就像管治大多数我们在名称前冠以“全球”的事物一样，靠的是对数量相对较小的一些场所的控制——几十个主要的油田、输油管道和储运码头，以及在它们之间往来航行的几支运载大宗散装石油的油轮船队。在“一战”接近尾声之时，两个重要的场所脱离了大型石油公司的直接控制。1917年，在拥有当时世界

最充裕石油资源之一的墨西哥，革命政府重新确立了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非地表土地所有者的制度，将外国石油公司对石油所有权的主张转变成了由政府授予的特许权。同一年，俄国也发生了革命，苏维埃红军在 1920 年从英国支持的高加索地方政府手中夺回了油田，使该地区的石油生产也被收归国有。面对这两种情况，国际石油公司做出的回应，都是试图去剥夺这些国有油田所能获得的投资和市场。¹ 墨西哥和俄国石油产量的削减缓解了大型石油公司所面临的限制全球石油供应的问题。“一战”后的几年里，管控全球石油网络的竞争就像在战争前夕一样，又一次集中在那个未决之地：伊拉克的油田。

转译民主

68 为了限制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的开发，仅仅依靠向伊斯坦布尔政府寻求特许权，已经不再可行。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读到的那样，英波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想要恢复它们在 1914 年以总部设于伦敦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名义从奥斯曼帝国政府手中获得的原有的特许权，作为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石油控制权（并试图将标准石油公司排斥在这一地区之外）的手段之一。但这家联合股份公司现在只不过是一具空壳罢了，仅仅存在于“一战”前在伦敦签署的一堆文件上，要实现获

1 Robert W. Tolf, *The Russian Rockefellers: The Saga of the Nobel Family and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196–212; Merrill Rippy, *Oil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Leiden: E. J. Brill, 1972: 160–162; N. Stephen Kane, ‘Corporate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Efforts of American Oil Companies to Influenc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Mexico, 1921–1928’, *Diplomatic History* 1: 2, 1977: 170–198;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232–233, 238–243.

得控制权的目标，还需要借助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在战争带来的重大动荡之后，英国需要一种方法来应对中东的政治势力，因为这些势力已经不是在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权威之下组织起来的了。机械化的军事力量虽然可用，但是太过昂贵且效果不彰，所以不能当成主要的控制方法。于是，一种被称为“自决”的手段应运而生。

整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纳入了帝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支撑现代帝国主义运作的那些资源，同时也为工业化地区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体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借助关闭能源供应的全新能力，成功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新响起的自决呼声，初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行得通的方法，可以将这种提出有效民主诉求的能力普及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然而，在实践中，它的表现事与愿违。自决的教义和手段把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在推进民主的驱动力，转化成为一系列普世性的诉求，在世界各地迅速但十分浅薄地传播着。这些诉求确实具有某些重要的应用，但适用范围仅限于个别地点。与此同时，自决的机制反而可以被用来打击那些在欧洲正在成功推进的民主诉求。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自决原则是一个美国式的理念。许多人也承认它与俄国革命存在关联。丹尼尔·耶金写道：“1918年初，为了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强大吸引力，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他理想主义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并发出了一个引起广泛回响的呼吁，要在战后实现各民族与人民的自决。”² 以这种方式来描述自决，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决确实变成了一种美国式的理念——也就是说，它既变成

2 Yergin, *The Prize*: 188.

了美国式的，又变成了一种理念。首先，以“公共外交”之名大行于世的宣传机器，将威尔逊总统的一些演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这些演讲中，威尔逊批评了所谓的“秘密外交”（欧洲列强之间关于吞并领土的秘密协定），但起初并没有提及自决。在威尔逊采用“自决”这一术语之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政治运动对此的回应，是在提出结束战时占领或脱离帝国控制的诉求时，都会抬出这位美国总统的名字和美国的权威——哪怕这些诉求威尔逊本人很少支持过。³ 其次，使演讲“引起广泛回响”的宣传机器，将自决变成了一种理念。它之所以能传播得又快又远，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物质的，更像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是对未来的期望而不是某种物质性的实践。

我们所说的理想，其实是言说以及指涉他人话语的方式，它们获得了这种普遍的、脱离物质实体的传播。自决和民主这样的术语虽然看起来是非物质的，具有我们认为理想或原则所具有的无实体形式，但是，它们是通过特定的实践才获得了其易于转移和传播的特性的。为了理解这些术语的效力，我们需要追溯这些术语如何从产生它们的各种语境中被剥离出来，多样化的诉求如何被转译和误译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惯用词，而使其广泛流通的传声机制又如何建立起来。

要去做这样的追溯，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自决的诉求在“一战”期间的出现和转变来进行。这一谱系将首先带我们前往非洲南部，在那里见证帝国统治方式的变化，以及在民主政治和机械化战争中都扮演着新角色的劳工运动；然后再带我们回到中东，围绕“自决”的斗争在那里上演得最为激烈。

3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伍德罗·威尔逊的自决言辞，不仅是对布尔什维克强大号召力的回应，更是在回应列宁于1917年10月夺取政权之后第二天发表的宣告：“不管哪个民族希望不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都应当被允许“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本民族的国家生存形式问题”。列宁并不是在陈述一种普遍的权利（独立的要求必须服从于终结资本家统治的需要，正如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巴库等地区所开始实施的那些政策一样），而是在控诉强国侵占和吞并弱小民族领土的帝国主义罪行。在发表了这份宣告之后，列宁的政府公布了沙皇俄国与英法两国秘密达成的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战时协定。⁴此外，列宁的宣告还呼应了更广泛的反抗帝国暴力与不公的运动，这些运动在世界各大洲纷纷涌现。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观点受到了数位英国和德国政治经济学家著作的影响，其中包括曾于1902年出版经典作品《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J. A. 霍布森（J. A. Hobson）。霍布森关切的问题让列宁与威尔逊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⁵

霍布森把帝国主义理解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运动，而这种认识，形成于他对“一战”前的一场由英国殖民统治引发的暴力冲突的反思。这场冲突就是1899—1902年间的南非战争（英布战争）。1886年，在

70

4 V. I. Lenin, 'Second All-Russia Congress of Soviets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Report on Peace',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6: *October 1917–January 191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0, available at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www.marxists.org/archive. 亦参 A. J. Mayer, *Wilson vs. Lenin: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New Diplomacy, 1917–1918*,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 Legal Reappraisa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18.

5 V. I. Lenin, 'Plan of the Book Imperialism', *Collected Works*, vol. 39: *Notebooks on Imperi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230–239. 该卷（编者注：对应中文版《列宁全集》第54卷）包括列宁的“霍布森笔记”（'Notebook on Hobson'）和“布雷斯福德笔记”（'Notebook on Brailsford'）。

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淘金者发现了世界上储量最大的金矿，使基于黄金储备的国际贸易机制得以迅速扩张，并使伦敦能够保持它在这些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尽管英国在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正逐渐落后于德国和美国。⁶ 金矿业的繁荣导致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建立的共和国* 与大型英国金矿企业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些金矿企业向更强大的英国殖民政权的政治机构寻求支持，以帮助它们解决开发和管控工业劳动力的问题，因为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秩序非常依赖这些劳动力。⁷ 黄金在地层中以极微小的颗粒形式存在，它的采掘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而由于黄金的价值依赖于让它维持一个恒定的价格，因此，要以工业化的规模生产黄金，就需要找到办法来大大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南非的大型英国金矿企业由美国的矿业工程师经营，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州和委内瑞拉的美国矿山引进了一套采矿营地管理体制，组织这套体制的核心原则，是对劳动力进行严格的种族区分（这套体制后来在石油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⁸

6 Marcello de Cecco,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oney and Empire*, 2nd ed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22–38.

* 阿非利卡人，旧称布尔人（Boer，英布战争即英国殖民者与布尔人之间的战争），指从17世纪开始移居南非的白人移民后裔，以荷兰裔为主，也有法国和德国等其他欧陆国家的移民后裔。他们建立的两个共和国是德兰士瓦共和国（Transvaal Republic）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1910年南非战争之后，这两个共和国与英国人建立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及纳塔尔殖民地（Colony of Natal）合并为南非联邦。——编者注

7 参 Shula Marks and Stanley Trapido, 'Lord Milner and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History Workshop* 8, 1979: 50–80, 这篇文章大体上支持霍布森在这份文献中的分析: J. A.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s and Effects*, London: J. Nisbet, 1900。

8 Y. G.-M. Lulat,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South Africa: A Critical Overview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31–47. 这套体制在石油业的角色，参 Robert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与英国自由主义激进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霍布森支持被英国击败的阿非利卡人共和国，并谴责英国的军国主义“野蛮行径”，包括使上万名黑人和阿非利卡人平民命丧其中的英国所谓集中营的建立。⁹ 英国吞并布尔共和国导致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在1910年成立，成为大英帝国版图内的一个自治领。在南非，自治逐渐变成了一种赋予白人权力并进一步剥夺非白人权力的方法，它的发展还将塑造“一战”后在更大范围内处理臣属人口所提诉求的普遍策略。

霍布森在南非战争前夕到访该国时，从德兰士瓦的荷兰定居者与力图吞并该地的大型英国金矿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中，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物质动力（physical dynamic）。帝国统治的不断扩张，以及支撑这种扩张所需的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并非英国主流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源自心理或种族方面的驱动力。真正在驱动扩张的，是有别于制造业者与商人、现在被称为“资本家”的那些人的需求：这些金融商和大型银行无法在国内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因为根据霍布森的分析，当时英国国内大多数人口收入太低，无法创造对更多产品的需求。因此，金融资本转而流向海外，将资金投入矿产开采和其他资本密集型的原材料生产方式，以及建造将这些材料运送到装船载往欧洲的港口所需的铁路工程中去。当这些投资者的事业引发了地方冲突或造成了财务困难时，他们便将自己的投机活动描绘成“帝国主义”，然后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影响力，要求将公共资金用于对这些所谓的公共利益提供军事保护。¹⁰

71

9 W. T. Stead, *Methods of Barbarism: The Case for Intervention*, London: Mowbray House, 1901.

10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James Nisbet & Co., 1902; P. J.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对南非战争的鼓动者来说，对布尔共和国的吞并和南非联邦的组建为某种基于自治原则的新形式帝国提供了一个蓝本。南非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和他招募的年轻行政官员们希望将英国的各个殖民地转变为一个由自治的领地所组成的联邦（commonwealth）。配合改善人口健康状况和提升工业劳动纪律的计划，自治可以增强帝国的整体实力，并把维持这个帝国的成本更多地重新分摊给各个殖民地。只有移居到这些自治属地的白人定居者才能参与当地行政机构的选举和管理。米尔纳曾参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在那里，他协助将短期的军事占领变成了一场让欧洲无限期控制埃及的“实验”，并阐述了为什么他所谓的“埃及独立的游戏”依赖欧洲人的“控制之手”，而在出任南非的殖民官员之后，他把在埃及获得的经验带到了这里。¹¹ 就像在米尔纳的集团从南非返回伦敦后制定的英国帝国统治方案中解释的那样，“治理的能力是被保留给欧洲族裔的少数人口的，对此，不可辩驳的理由在于，只有这部分公民才有能力担当这项任务，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自我统治的原则与帝国的理念并不相悖，虽然看似矛盾，但自治的需求反而能够为定居和控制海外土地提供一项新的论据，因为唯有被殖民的领土上存在欧洲人，才能让某种形式的自治成为可能：诸如埃及人或印度人这样“更加落后的种族”，应该被纳入帝国联邦之内，“理由正是在于，他们目前还没有能力来治理自己”。¹² 这些秉信进步主义的帝国主义者辩称，如果没有欧洲族裔的少数人口存在，任何非欧洲民族都无法为未来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职务而接受训练。

11 Alfred Milner, *England in Egypt*, 11th ed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4: 358.

12 Lionel Curtis,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Macmillan, 1915: 60, 198.

南非模式将对战后帝国权力的重组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曾与英国人作战，但之后与英国协商将布尔共和国并入南非联邦的阿非利卡人军事和政治领袖扬·史末资（Jan Smuts），与米尔纳集团结成了同盟，并帮助他们制定了上文所述的那个新的帝国统治方案。在霍布森访问南非期间，史末资和他结识并成为朋友，之后也继续与他通信往来并阅读他的著作。¹³ 尽管史末资曾利用他在左翼激进派那边的盟友来对抗黄金矿业巨头，但他本人绝不是左翼激进分子。1913年，他动用英国军队镇压了由白人金矿工人领导的总罢工，最后导致二十名矿工丧生；次年，他实施了戒严法，挫败了另一场总罢工，还把罢工的带头人驱逐回了英国——当时的大部分白人矿工都是最近才迁居至此的新移民，主要来自康沃尔郡已经几近耗竭的铜矿和锡矿产区。¹⁴ 与此同时，他开始系统地实施由大型南非金矿企业从美国招募而来的工程师们所引进的劳工种族隔离政策——这一种族结构将会定义这个新国家的政治。

史末资将军接连指挥了1915年南非军队对德属西南非洲的占领，以及次年英国对德属东非殖民地的征服，随后在1917年，他来到英国本土，加入了“一战”的战争内阁，并参与规划战后格局的总体安排。在此期间，他与他的“老朋友”霍布森也见了面。在伦敦与米尔

13 Jan Christiaan Smuts, *Selections from the Smuts Papers*, ed. W. K. Hancock and Jean Van Der Poel, vol. 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1973: 50–55, 304, 440–444, 530–532.

14 Jonathan Hyslop, 'Martial Law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Jan Smuts and the "Solid Guarantee of Force" 1899–1924',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2: 2, 2009: 234–268. 史末资在五年前提议让阿非利卡人取代来自康沃尔郡的矿工。开普殖民地的领导人约翰·X·梅里曼（John X. Merriman）在给史末资的信里写道：“我同意你关于那些康沃尔人的看法；这群老家远在6000英里海路之外、拿着过高工资的无礼家伙早一天离开南非，我们早一天好受。” Smuts, *Selections*, vol. 2: 344.

纳及其门徒共事的史末资，后来指导了自决这个“理想”的制定，而这个“理想”再之后被归在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名下。¹⁵

摩洛哥的矿山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路

73 建立一个在白人统治下的自治帝国的设想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在南非，1906年纳塔尔爆发了始于反抗自治殖民地横征暴敛的巴姆巴塔起义（Bambatha rebellion），凸显了殖民地自治这种新形式的殖民统治所遭到的抵抗。¹⁶同一年，在人口仅次于印度的英国第二大殖民地埃及，丁舍瓦伊事件（Dinshaway Incident）的发生在该国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对外国统治及欧洲定居者社群特权的运动。¹⁷当史末资在德兰士瓦推行新的劳工与移民法时，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组织印度侨民社群展开了斗争，而与此同时，他开始阐释另一种对“司瓦拉吉”（*swaraj*），也就是自治的主张：在甘地的定义中，自治指的不是国家的政治独立，而是用消极抵抗的方法赢得的、社群共同体通过成员之间的合作而达成的自给自足状态。1912年，一群

15 Smuts, *Selections*, vol. 3: 464. 史末资前往伦敦参加帝国战争内阁（Imperial War Cabinet），一个英国各属地领导人的会议。但会后他留了下来，出任威斯敏斯特政府设立的负责指挥战争的战争内阁（War Cabinet）的成员。关于史末资，亦参 Mark Mazower, *No Enchanted Palace: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8–65。

16 Shula Marks, 'Class, Ideology, and the Bambatha Rebellion', in Donald Crummey, ed., *Banditry, Rebell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Africa*, Oxford: James Currey, 1986: 351–372.

17 事件缘起于五位英国军官来到丁舍瓦伊村，射击村民饲养的家鸽取乐，从而挑起了他们与村民的冲突，其中一名士兵在逃跑途中中暑身亡。为此，英国殖民当局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了五十二名村民。四位男性村民被判处死刑，并在他们的乡亲面前被绞死。

杰出的南非黑人建立了最初名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的组织，也就是后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而在英国本土，“一战”的爆发加剧了民众对米尔纳和史末资等人所代表的新帝国主义的反对情绪，也催生了一些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战后世界的构想。

这些对于战后民主的构想，是在当时围绕帝国主义和对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论战中成形的。霍布森的作品，以及对他有所呼应与拓展的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和埃德蒙·迪恩·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等帝国主义主要批判者的著作，使我们得以将战争的根源追溯到以下方面：海外金融资本不受约束的流动，由此引发的对欧洲以外经济资源的独占性控制权的竞逐，以及对战争有既得利益的军火制造商与军事集团的壮大。

布雷斯福德在他出版于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的《钢和金的战争》（*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一书中梳理了这些联系。他在书里写道，四十年前，埃及政府无力偿还英法两国银行家的投机贷款，致使英国得以占领尼罗河谷。这次占领掀起了欧洲列强争夺非洲其他土地的狂潮。¹⁸ 1885年的《柏林会议总议定书》（*The General Act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首次创立了一套规管欧洲国家获取海外殖民地的法律架构，并阐述了一种以文明国家对劣等民族的“道德与物质福祉”所负有的责任为基础的殖民主义哲学。《柏林议定书》还承认了“土著人民处置自身事务的权利”，这意味着，殖民应当建立在被殖民人口同意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同意是通过与原住民族的本土统治者订立条约

18 Henry Noel Brailsford, *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 A Study of the Armed Peace*, 10th edn, London: G. Bell & Sons, 1918.

74 来获取的。¹⁹ 然而，E. D. 莫雷尔在著作中揭露了夺走数百万非洲人性命的强迫劳动、剁手砍脚、大规模杀戮等暴行，以及饥馑和疾病，而这些惨剧都发生在了刚果独立国（Congo Free State，又译“刚果自由国／邦”），一个在柏林会议的框架下建立的殖民地，其劳工制度甚至作为模板输出到了邻近的殖民地。²⁰ 刚果独立国的情况展示了“以一种尤为残暴的形式运作的高度鼎盛的帝国主义金融”，它证明了柏林框架在获取被殖民者同意方面的失败，同时也表明，还需要一种更加强而有力的机制，来规管欧洲经济力量在海外的行使。²¹

根据布雷斯福德的论述，“一战”爆发前的十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这个问题。当时，埃及当地反对殖民占领的声浪日益高涨，为了加强对埃及的控制，英国在 1904 年与法国达成协议：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以此换取英国秘密承诺支持法国夺取摩洛哥。面对法国对摩洛哥形成的控制之势，柏林以多家德国公司已经获得了在当地开采铁矿石及其他矿产的权利为由，在摩洛哥资源的使用权问题上挑起了一场法德之间的危机。1906 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The Algeciras Conference）只部分解决了两国的争端，在 1911 年的摩洛哥

19 Siba N. Grovogui, *Sovereigns, Quasi Sovereigns, and Africans: Ra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andates System', in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Scramble for Empire, Suez and Decolonization: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I. B. Tauris, 2006: 225–226; Antony Anghie, 'Finding the Peripheries: Sovereignty and Colon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0: 1, 1999: 51–57.

20 E. D. Morel,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1904; and *Red Rubber*,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6. 莫雷尔在 1904 年与罗杰·凯斯门特（Congo Reform Association）共同发起成立了刚果改革协会（Congo Reform Association）；参 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8.

21 Brailsford, *War of Steel and Gold*: 71.

叛乱后，法国派兵占领了该国。法德关系迅速恶化，德国随即出手，阻止了法国金融资本参与控制巴格达铁路及其将要连通的石油储藏。“一战”的爆发并非取决于欧洲权力平衡态势的打破，布雷斯福德这样写道，而是取决于“摩洛哥的矿山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路”。²²

布雷斯福德并不主张恢复互相争霸的帝国强权之间的势力平衡，也不主张重新确立柏林会议的安排，而是提议建立某种“经济结构”来取代《柏林议定书》，并以更直接的方式来管理海外资源的开采。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曾建立了各国共享获取摩洛哥矿产资源和其他投资机会的机制，虽然这一机制因英国支持法国占领摩洛哥的秘密协议而被摧毁，但它提供了一个模式，来替代这种“秘密外交”和帝国控制。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在“一战”后为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的获取设定框架的委任统治制度，其理念来源正是这一机制。²³

75

22 同前注：第37页。评论者发现，布雷斯福德这本恰在“一战”前夕的1914年5月出版的书，表现出了“悲观愤世”，而那时还很少有人预料到一场战争即将爆发（Brailsford, *War of Steel and Gold*: 8）。关于人们对“一战”的预期及战争原因的最新研究，参 Annika Mombauer, ‘The First World War: Inevitable, Avoidable, Improbable or Desirable?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n War Guilt and the War’s Origins’, *German History* 25: 1, 2007: 78–95。关于德国在摩洛哥的矿产资源利益，参 Joanne Stafford Mortimer,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German Diplomacy in the Agadir Crisis’, *Historical Journal* 10: 4, 1967: 440–456。关于阻止法国在巴格达铁路中的金融参与（以及阻止奥斯曼承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主权），参 Marian Kent, ‘Agent of Empire? The National Bank of Turkey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18: 2, 1975。

23 Brailsford, *War of Steel and Gold*: 249。欧洲各债权人借以合作管理在奥斯曼帝国投资的奥斯曼公债管理局提供了另一个范例。有关摩洛哥的协议，即1904年《英法协约》的一系列秘密条款，在1911年11月被法国媒体公布，并于次年春天被莫雷尔收入：E. D. Morel, *Morocco in Diplomacy*,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912。此书在战争爆发后被国家劳工出版社（National Labour Press）以《十年秘密外交：一个被忽视的警告》（*Ten Years of Secret Diplomacy: An Unheeded Warning*）之名重版，到1918年时已经出版了五个主要版本。参 F. Seymour Cocks, E. D. Morel: *The Man and His Work*, London: Allen & Unwin, 1920: 199。

截至 1918 年,《钢和金的战争》已经出版了十个版本。在 1915 年 5 月的第三版中,布雷斯福德详细阐述了他对这个经济结构的设想,将之发展成为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提议。布雷斯福德倡立的联盟将不仅仅是一个各大国同意使用集体武力来对抗侵略国的“强制执行和平联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这是美国共和党前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数月后倡议的“用拳头保卫的、有威慑力的和平”(peace with a punch)方案,而这也是已经接替塔夫脱出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于 1916 年 5 月在塔夫脱创建的强制执行和平联盟发表演讲时采用的主张。²⁴布雷斯福德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们所提议设立的联盟,是一种经济结构,它将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权威机构……用于将资本的输出资本国际化”。这个机构将管理特许权的竞争,控制关键的贸易路线、运河和自由港,并按照商定的比例来分配所有矿产和铁路特许权的投资份额。联盟或其成员国政府将监督这些投资,防止出现奴役、血汗劳动或对工人的系统性虐待;防止对国家发放高利贷,比如帝国强权之前对埃及、奥斯曼和摩洛哥的贷款,这些贷款的违约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世界当前面临的危机;还要阻止帝国利益资助革命,就像传闻中它们在 1908 年土耳其革命和 1911 年墨西哥革命中所做的那样——前者对应的是欧内斯特·卡塞尔所代表的石油利益集团,后者则对应了标准石油的角色。²⁵换句话说,这个联盟将会

24 ‘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Advocate of Peace* 77: 7, July 1915: 168–170; ‘Peace with a Punch’, *New York Times*, 1 July 1915: 3;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7 (这本书中重述了威尔逊在这些战时演讲中谈到的关于自决的主张)。

25 关于卡塞尔,参本书第二章。关于墨西哥,参 Kenneth J. Grieb, ‘Standard Oil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alifornia Historical Quarterly* 50: 1, March 1971: 59–71。

是一种经济机制，它不是要取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要取代战争的根源——针对物质资源的冲突。²⁶

控制外交政策的机制

76

这些对战后政治的提议，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拆解帝国主义，以及建立新的方法来控制矿产资源开发与国际金融流动。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些提议被不断传播并得到了发展。在一系列书籍、期刊和会议上，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草拟了各种替代欧洲殖民制度的方案。由 E. D. 莫雷尔（他将在 1922 年的议会选举中击败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主持、创始成员包括霍布森与布雷斯福德的民主控制联盟（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发起了将外交政策交由议会控制的运动，以消除那种使帝国利益得以支配国际关系的秘密外交。²⁷ 1915 年，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召开的一次会议支持建立一个“以民主的方式来控制外交政策的机制”和一个将殖民地置于国际管理之下的体系，而欧洲将在这个体系中，如《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在 1916 年所提议的那样，“受文明之托付来代管这些领土”。²⁸

1917 年夏，英国劳工运动受到了两大因素的鼓舞：俄国工人在推动进步政府上台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战争有望迅速结束的前景。受此

26 Brailsford, *War of Steel and Gold*.

27 H. Hanak,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Historical Research* 36: 94, November 1963: 168–180.

28 Carl F. Brand, *British Labour's Rise to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63, 72.

影响，他们开始制定战后安排的具体建议，并起草了一份名为《战争目标备忘录》（Memorandum on War Aims）的文件。这一运动吸收了霍布森、布雷斯福德等人的思想，其目标是将它在本土已经开始实现的民主化进程，扩展到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的海外地区。激励这一运动的驱动力，并不主要是利他主义（而且它对于非欧洲民族是否已经准备好自我治理持有矛盾的态度），而更多的是这样一种认识：海外的帝国主义会限制和破坏在本土取得的任何民主成果。

英国劳工运动（工党）的这份《备忘录》呼吁实现“所有国家的民主化”，而这需要“将外交政策像国内政策一样，交给民选产生的立法机构来掌管”。在欧洲的范围内，战后的边界划分应该按照“允许所有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一般原则”来决定。

而在欧洲以外，为了实现帝国权力的民主化，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两项创举。第一，建设有一个代议制国际立法机构的国际联盟，并由它来取代各个欧洲国家来担任各国附属领土的管理者。生活在近东地区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人民，将像欧洲人一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如果这被证明是不可行的，那么这些领土也不应由欧洲国家来管理，而是应当交由一个在国际联盟监督授权下的国际委员会来管理。在热带非洲，国际联盟将不仅要像其他团体所提议的那样接管从前由德国统治的属地，而且还要接管所有的欧洲殖民地，并管理国际投资与贸易。一代人以前的《柏林议定书》曾要求欧洲列强担负保护被殖民者的“道德与物质福祉”的责任，这份《备忘录》则引入了一套有关社会改良或发展的表述，以及推进这一目标的经济机制：国际联盟在管理矿产、铁路和其他产业的投资时，应确保所有财政收入都用于人民自身的“福祉与发展”。

第二,《备忘录》呼吁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强制落实保障工人免受剥削的法律,包括规范工厂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长,以及防止血汗劳动。1917年12月28日,工党在特别会议上通过了这份《战争目标备忘录》。两个月后,一场由来自欧洲全部协约国的社会主义组织与工人运动的领袖所共同参加的会议也采纳了同样的提议。²⁹

这些作为帝国主义替代方案的民主计划,在大多数关于国际联盟及其授权下在战后中东实施的委任统治制度的论述中都没有被提及。我们在第五章中将会读到,这些计划将在“二战”后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出现:那时,英美两国不仅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国际联盟的继承机构,而且还创建了两个旨在控制国际金融与投资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时甚至试图建立第三个机构来管理国际石油工业——尽管这些机构并不包含任何劳工运动在“一战”期间所设想的民主元素。社会主义者们的民主计划在制定之时所产生的影响,在“一战”后的安排中依然能找到几分踪迹,只不过,这些踪迹并不是在国际联盟的主要架构中找到的,而是体现在为了边缘化将帝国权力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的努力而采取的种种行动中。

当协约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创建国际联盟时,与会各国还确立了两项额外的国际安排,与左翼力量提出的两大要求相对应,分别

29 'British Labor's War Aims: Text of a Statement Adopted at the Special 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 at Central Hall, Westminster, on December 28, 1917',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4: 123, February 1918: 45-56 (*The Times*, 28 December 1917: 7 刊载了全文摘要,但是删去了针对工作条件制定国际规定的要求)。'Labour War Aims: Views of Inter-Allied Conference', *The Times*, 25 February 1918: 3. 1917年12月的英国劳工会议,与1918年2月的协约国间劳工与社会主义者会议(Inter-Allied Labour and Socialist Conference)通过的两份文件,唯一显著的区别在于管理非洲领土的模式。Henry R. Winkler, 'British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of Colonial Trusteeship, 1914-1919', *Historian* 13: 2, 1951: 161-162.

78

作为第 22 条和第 23 条，被附加在《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之中。第 22 条建立了中东和非洲的委任统治制度，第 23 条则创设了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关于这两项安排具体形式的谈判，被刻意地从创建国际联盟的主要工作中剥离了出来，从而使帝国强权得以控制谈判结果，并限制这些安排的效力。被左翼力量当作实现民主化国际秩序的主要工具而提议赋予国际联盟的这两大职能，最终只沦为了次要的附属品。尽管如此，国际劳工局还是开始按照劳工运动《备忘录》中提出的方针来推行国际性的劳工规章。³⁰而委任统治制度，虽然看似脱胎于英国劳工运动 1917—1918 年间的提议，但是，通过将人民对民主化的要求，转变为一套截然不同的原则——自决，或者说“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些提议已经被实质性地改造了。

很不幸，他们是一群工人

在那个时刻，英国的战争内阁无法轻易忽视劳工运动的要求，即政府要同意接受他们拟定的一份推进民主诉求的战争目标具体清单。1917 年的英国在战场上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革命后的俄国又退出

30 《凡尔赛和约》（《合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前 26 条，构成了《国际联盟盟约》）在第十三部分，“劳工”篇，详细规定了相关内容（第 387—399 条）。该部分的序言呼吁，对劳工状况进行紧急的改善，例如“规定工作的时长……预防失业，提供足够生活的工资，保护劳工免遭疾患、病症和伤害……承认结社自由的原则……和其他措施。”‘The Versailles Treaty June 28, 1918: Part XIII’, Avalon Law Project: Documents in Law, History, and Diplomacy, at avalon.law.yale.edu/imt/partxiii.asp.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参 Markku Ruotsila, ‘“The Great Charter for the Liberty of the Workingman”: Labour, Liberal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LO’, *Labour History Review* 67: 1, April 2002: 29–47。

了战争，再加上缺少足够的舰船将美国的武装力量运送到欧洲，面对这样的情势，英国政府需要加强“清理”（combing out）那些受到保障的工业劳动力，以便将更多人员部署到战场和造船厂。

战时的劳工抗议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工业化战争需要对煤炭供应和制造业进行组织，就像在战场上需要对武器和军队进行组织一样。各工会曾经同意在战争期间暂停行使罢工权。1916年，英国政府实行了征兵制（这在该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同时保障军需品和造船等关键行业免受强制兵役的影响，但是，当政府认为某个工业流程用数量更少或技能更低的劳动力就能运作时，它便开始“清理”该流程中的男性产业工人。工人未经雇主同意是无法更换工作的，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物价上涨，以及食物和住房供给不足之苦。政府对劳工的控制逐渐崩溃，1917年春，军需产业工人发动的罢工引发了更广泛的冲突，最终导致20万名工人参与到罢工中来。³¹

79

在1917年12月的那场工党大会结束一周后，英国政府召集了各工会领导人参与的会议，商讨政府进一步削减受保障行业劳动力数量的提议，希望避免该年春天的大罢工再度发生。1918年1月5日，时任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会议的致辞中发表了一份战争声明，这是所有协约国领导人中首次有人发表一份列举了战争目标的声明，同时，他还在声明中陈述了继续战斗下去的理由。鉴于民众担忧战争正在转向对协约国不利的局势，劳合·乔治的讲话也是在向德国暗示，英国将以何种条件与德国举行和谈。这份战争目标声明的发表事先没有与其他协约国政府商议，也遭到了坚决拒绝向德国妥协的

31 George H. Cassar, *Lloyd George at War, 1916–1918*, London: Anthem Press, 2009: 42–43.

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声明的起草者，是南非的领导人扬·史末资，而与他一同起草的，还有米尔纳的南非派系小圈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时任首相秘书的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³² 这份对劳工运动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化的国际关系结构的主张做出了呼应的声明，却是由一群在南非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者撰写的。

政府的声明虽然呼应了劳工运动的战争目标清单，却把那些目标转译成了一套新的词汇，而这套词汇将国家之间关系的民主化，转变成了“自决”的原则。劳合·乔治在讲话中首先说道，有组织的劳工被要求去维持前线军队的力量，因此有权知道他们是在为了何种目的而牺牲。他说，战后的领土安排必须以“自决权或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可是，劳工运动的《备忘录》既没有提到自决，也没有提到这种权利，而是呼吁实现一个所有国家都得到民主化的过程，并提出了推进这个过程的机制，也就是将海外投资置于国际管控之下。民主在英国国内的赢得，靠的不是制造被统治者的同意，而是发展某些让被统治者可以拒绝同意的手段——特别是以总罢工相威胁。

劳合·乔治提议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军备的控制与争端的和平解决，而不是对帝国经济关系进行更广泛的管理。这位首相没有提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国际控制的方案，而是主张“民族自决的一般原则”不仅应当适用于欧洲的领土安排，而且也应当适用于非洲，虽然仅限于非洲的德国前殖民地。他解释说，在那些地方，人们曾生

80

32 ‘Man-Power: Ministers’ Conference with Labour, More Men from Munitions’, *The Times*, 4 January 1918: 6. David R. Woodward, ‘The Origins and Intent of David Lloyd George’s War Aims Speech’, *Historian* 34: 1, November 1971: 38. 米尔纳也是八人战争内阁的成员。克尔在南非时曾在米尔纳手下任职，后于1910—1916年负责编辑米尔纳集团的《圆桌》（*The Round Table*）期刊。

活在“有能力代言”他们利益的酋长或部落议会的统治之下。换句话说，自决将会是一个承认（以及在实践中帮助构成）各种形式的地方专制统治的过程，而帝国控制将通过这些形式的地方专制统治来继续运作。自决的过程将产生一种同意的机制。这是对《柏林议定书》中确立的“土著人民处置自身事务的权利”原则的更新。它重新表述了自我处置这个旧有的殖民原则，也就是试图将帝国权威建立在与殖民势力签署协议的土著酋长的权力之上。³³在谈及中东时，劳合·乔治首相却换了一种更模糊的表述方式：阿拉伯、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有权获得对它们各自民族状况的承认”。由于英国对这些地方另有打算，首相不加掩饰地转向了笼统表述：“这种承认的具体形式，无须在此讨论”。³⁴

在劳合·乔治发表声明的三天后，对英国单方面声明战争目标感到惊讶的威尔逊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列举了应当指导战后和平协定的原则。他并没有在其中提及自决权。“十四点和平原则”的首要目标，是门户开放的商业原则，这反映了美国所秉持的论点：要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国际金融商和贸易公司应当分享利用海外领土的机会，而不是安排独占性的帝国特许权（而美国日后还将使用这个论点，来要求英法两国重新谈判在战后就共享美索不达米亚石油所达成的协议，以允许标准石油公司分一杯羹）。威尔逊在第五点原则中补充指出，被帝国统治的臣属民族的利益，应当与合理

33 Grovogui, *Sovereigns*: 80.

34 'British War Aims: Mr Lloyd George's Statement, Justice For Small Nations, Alsace Lorraine, Reparations Vital', *The Times*, 7 January 1918: 7. 关于新的殖民统治方法的“去中心化的专制”（decentralised despotism），参 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的帝国利益具有“同等权重”，但他没有提到自决。他开始在讨论战后的安排时用起“自决”这个术语，是为了重申《柏林议定书》确立的原则，并主张，在帝国国家为被帝国统治的那些臣属民族准备自治或自我统治的过程中，臣属民族应当拥有发言权，来选择由哪个西方
81 强权统治他们。³⁵ 可是，当主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运动领袖在战后宣布国家独立时——埃及在 1920 年 3 月，叙利亚也在同月——威尔逊却拒绝给予承认。³⁶ 美国并不支持伊拉克的民族独立运动，而且当美国驻巴格达领事支持反英活动时（领事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利益），华盛顿很是恼火，差点决定将他撤职。³⁷

国际联盟和委任统治制度的方案，是由史末资在他撰写的《国际联盟：一个切实建议》（*The League of Nations: A Practical Suggestion*）这份小册子中，被赋予了具体形式的。这确认了一点：对民主的要求已经被转译成了一种制造被统治者同意的机制。在讨论原属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与人民未来该如何治理时，史末资写道，国联应当采用“自决的法则，或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来决定对其治理的形式”。这份小册子也确认了这样一种认识：对于世界上被殖民的

35 威尔逊是在 1918 年 2 月 11 日的一次演讲中，在分析德国和奥地利对其“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反应时，首次使用了“自决”这个词的。然而，他仅仅是顺便提到了这个词，并没有将其包含在他所总结的、将在日后主导战后和平协定的美国外交四大原则中。关于自决和威尔逊提出的自我治理原则之间的区别，参 Trygve Throntveit, 'The Fable of the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35: 3, 2011: 445–481。

36 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对于自决将如何影响到英国表示了忧虑：“[自决的原则]会对爱尔兰人、印度人、埃及人，以及布尔人中的民族主义者产生什么影响？它难道不会散播不满、骚乱与反叛吗？”参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Dangers', memo by Lansing, 30 December 1918, 引自 William Stiv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raqi Oil, 1918–1928: A Study in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5: 4, 1981: 536。

37 Stiv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raqi Oil': 536。

地区，甚至包括那些曾由德国统治的殖民地，这个自决的原则对它们来说都是不适用的。史末资解释说，非洲的德国殖民地“居住着野蛮人，他们不仅完全没有能力治理自己，而且将任何欧洲意义上的政治自决理念应用到他们身上，都是不切实际的……对于这些殖民地的处置，应当根据威尔逊总统在他著名的‘十四点’中的第五点所确立的原则来决定”。³⁸换句话说，被殖民的人口提出的任何政治主张，都必须与殖民强权的利益相权衡。依照威尔逊第五点中规定的平衡机制，殖民强权的利益“必须具有同等权重”。史末资之所以能够认为德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人民是野蛮人，大概是因为他们从18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地抵抗他们的土地被殖民化，这些抵抗曾导致德国于1904—1907年间在西南非洲对赫雷罗族（Herero）和纳马族（Nama）人民发动了蓄意的种族灭绝行动。³⁹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读到的，南非是一块发展殖民地自治国家的试验田，因此，在将民主化的压力转化为某种新的帝国主义框架的过程中，南非成为提供专家知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来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为了限定将要行使这种新的治理权力的“自我”，史末资和其他构建了统一南非联邦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相比于民主的

82

38 Jan Smut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 Practical Suggestion', in John Dugard, ed., *The South West Africa/Namibia Dispute: Documents and Scholarly Writings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0.

39 David Olusoga and Casper W. Erichsen, *The Kaiser's Holocaust: Germany's Forgotten Genocide and the Colonial Roots of Nazism*,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图增强欧洲定居者阶级的力量，以对抗两方面的挑战：更倾向于使用亚洲契约劳工的那些矿业巨头的势力，以及本土非洲人口带来的威胁。殖民政权当时认为，白种人口需要得到壮大，才能抵御经济的威胁，因为欧洲人在非洲矿工所能拿到的工资标准下无法维生；以及抵御种族生命力（vitality）的威胁，因为贫困会使白人种族质量下降。南非土著事务委员会（Native Affairs Commission）制定了系统性的种族隔离方案，把德兰士瓦金矿产业的种族化结构扩展到了整个国家。黑人会被分配到单独的工资等级、居住区域和学校，受控制工人流向城市区域的“通行证法”（pass laws）约束，并由单独的土著政务委员会（Native Councils）管辖。“一战”后，史末资政府完善了种族隔离的主要原则，包括把黑人排除在技术性工业岗位之外，将他们从全国大部分地区迁移到专门划出的保留地，以及在单独为黑人设置的土著统治者之下对他们进行“再部落化”（retribalising）。

J. A. 霍布森在战前曾经致信史末资，批评他的方案剥夺了非洲人在南非这个新国家中的任何政治权利。开普殖民地的领导人约翰·X. 梅里曼认同史末资对于伦敦的自由党人“会在这个棘手问题上制造一些麻烦”的担忧，并认为“任何普遍的土著选举权”在当下都是“做梦都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也警告史末资，南非的黑人“很不幸，是一群工人，而在每个国家，未来都属于工人”。他警告了现在出现的“邪恶迹象”，也就是“预示着未来祸患的种族混杂”，而种族混合之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最优秀的土著人“优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远远优于我们欧洲人中最底层的群体”。⁴⁰ 梅里曼此前曾写信给史末资

40 John X. Merriman, letter to Smuts, 19 July 1908, in Smuts, *Selections*, vol. 2: 446–447.

说：“我根本就不喜欢土著人，我真希望南非没有黑人。但是，他们就在那里，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命安排我们与他们共命运，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规划我们的路线，以维持我们种族的优越地位，同时尽到我们的责任。”⁴¹

非欧洲人的诉求问题，通过“单独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又译“分别发展”）的教义得到了解决。由于未来似乎属于工人——这是对矿工和其他有组织的产业工人队伍前所未有，并且还在日益增强的力量的认可——他们就不能轻易地被忽视。既然如此，那就把他们界定为需要“发展”因而权利被暂时中止的人口，以此将他们的诉求推迟到未来。为“一战”后的殖民提供正当理由的委任统治制度，也将基于同样的原则，而事实上，“委任统治”这套话语很快就会被发展的教义所取代。在委任统治之下以及 20 世纪后期，发展的实践不断演进和壮大，但它始终带有这种种族上的结构。即使在“单独”这个形容词被移除后，“发展”这个术语还是始终意味着“单独发展”。某些人口被界定为相对欧洲人种而言的“未发展”（undeveloped）民族，需要从欧美人那里学习发展的知识，并且要被剥夺“发达／已发展”（developed）民族所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在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时对此给出的理由，恰恰是他们还需要发展。

83

民主诉求的推进需要一套制度装置，但国际联盟在创建之时没有设立推进民主的机制。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是一种在“一战”前夕被首次设计出来的手段，用来管控围绕摩洛哥的帝国之争。借鉴列强协调瓜分中国贸易的经验，美国在 1906 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41 Smuts, *Selections*, vol. 2: 239.

上提出了一种机制，以保证相互竞争的帝国势力能够平等地分享参与摩洛哥贸易的机会。《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总议定书》决定，在摩洛哥的所有港口设立由外国势力出资、指挥和管理的本土警察部队，以此建立起对摩洛哥港口的国际控制。为了取得在摩洛哥拥有最大利益的帝国势力法国的同意，其他与会国家同法国达成了一项妥协，同意让法国和控制着摩洛哥北部海岸的西班牙，能够在其他帝国国家的“委任”之下，掌握对当地警察部队的实际控制权。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国家将被共同认可为“所有大国的受委任者，从而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又能维护各国所享有的平等机会”。⁴²

1914年，布雷斯福德提议，将帝国强权就摩洛哥问题达成的协议，作为围绕欧洲以外地区准入权的国际合作可以参照的模式。⁴³次年，霍布森在初步构想委任统治的理念时，援引了摩洛哥的先例，将其视为取代殖民主义的一种多国共享的国际控制机制。史末资借用并弱化了霍布森的委任统治理念，而这个削弱后的版本又被伍德罗·威尔逊采纳并推广了开来。⁴⁴乔治·比尔（George Beer），米尔纳集团在美国的盟友之一，同时也是由威尔逊的助手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召集的一个负责收集战后安排意见的委员会的一员，在1918年1月撰写了一份讨论“美索不达米亚的未来”的报告，提议将《阿尔赫西拉斯议定书》中的委任方案作为殖民统治伊拉克的模式。他建议，从前属

84

42 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Elihu Root to Baron Speck von Sternberg, German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17 March 1906, 引自 Pitman B. Potter, 'Origin of the System of Mandates Und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 4, November 1922: 580.

43 Brailsford, *War of Steel and Gold*: 249.

44 J. A. Hobs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15: 141; Potter, 'Origin of the System of Mandates': 577-581.

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应当被托付给“担任国际联盟受委任国的不同国家”进行管理，而这种安排类似于联合控制中国财政的六国银行团和1906年《阿尔赫西拉斯议定书》确立的多国共管机制。⁴⁵

《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案公布后，英国劳工运动对草案中那些遭到转译的提议表示了谴责。国际联盟并不像工党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者所提议的那样是一个以代议制议会为基础的民主机构，而是一个各国政府的联盟，其权威都集中在由赢得“一战”的五大强权控制的理事会手中。⁴⁶被削弱的委任统治制度既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没有执行手段，甚至就连对不同利益方在贸易和投资上相互竞争的主张进行“平等对待”（equal treatment）的门户开放原则，也被重新表述为仅仅是要给这些主张以“公正待遇”（equitable treatment）。布雷斯福德原本希望委任统治制度能受到“国联官员严格且持续的检查”，并且构成“高于一切的一个经济结构”，来负责分配煤炭、钢铁、石油、棉花、羊毛、磷酸盐和谷物等原材料的份额。比如说“摩苏尔的石油”，在这个经济结构下，就将按照国际联盟某个常设理事会确定的比例，“被分配给所有需要〔它〕的国家”。⁴⁷霍布森则认为，在巴黎和会上批准的这个委任统治制度，将会“提供必要的政治机制，使西欧完成以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形式吞并地球广大区域的过程”。⁴⁸

45 George Louis Beer, 'The Future of Mesopotamia', in Louis Herbert Gray, ed., *African Quest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ith Papers on Egypt, Mesopotamia, and the Colonial Settl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424–425.

46 Carl F. Brand, 'The Attitude of British Labor Toward President Wilson during the Peace Confer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2: 2, 1937: 246.

47 Henry Noel Brailsford, *After the Peace*, London: L. Parsons, 1920: 110, 119.

48 Hobson, 引自 David Long, *Towards a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J. A. Hobs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8.

将民主转译为自决，使欧洲国家得以继续维持它们的控制，这其中也包括对石油的控制。与此同时，采纳自决原则的各个帝国强权似乎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想主义姿态。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将会继续和这个理想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打着建立一个阿拉伯民主政体的旗号入侵伊拉克的计划，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重申。而在那些曾为推动国际关系的实质民主化而奋斗的人眼里，威尔逊则具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如果历史要对他的治国之道做出评价的话，”1919年，一份工党办的报纸在提到威尔逊时这样写道，“那它将会谴责，凶恶的命运竟然将干涉人类事务的权力托付给了这样一个最无能、最不称职的人。”⁴⁹

85

由煤炭中蕴含的能量造就的工业化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殖民的世界。尽管煤炭使得生产和人口在靠近煤矿的地方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集中，工业化过程也在这些地方率先发生，但对工业化地区所缺乏的诸如棉花、糖、橡胶和黄金等材料的需求，推动了矿产开采、种植园经营和殖民定居等活动在欧洲以外广大世界的扩张，同时也带来了铁路、银行企业、投资资本和帝国军队。煤炭的开采和运输曾经为建立更加民主的政治创造了可能性。可是，事实证明，沿着上述其他材料的生产和运输路线来扩大民主控制的尝试是更加困难的。民主正在成为一种理想，一个轻飘飘的主张，被转译成了自决的教义。

49 *Labour Leader*, 22 May 1919, 引自 Brand, 'Attitude of British Labor': 252。

第四章 善意的机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英国似乎已经不大可能继续控制美索不达米亚（或者说伊拉克，按照我们如今对它的称呼）或它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体系已经被摧毁，在崩解的帝国领土上，每一个角落都有地方寡头和民众团体在组织替代的力量。但英国军队此后仍在伊拉克驻扎了四十余载，协助英国的石油公司与法美两国的石油公司合作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并在其后控制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外国石油公司对这一地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的掌控还将持续半个多世纪，直至 1970 年代初。

诸多过程帮助维持了这种对 20 世纪主要能源资源的超强控制，而其中的两个过程从一开始就至关重要。首先，如前文所述，石油公司绝不仅仅只关心石油的供应，限制石油的生产、延搁石油工业的发展也是它们的重大关切。于是，利用石油基础设施建立有效方法来推进平等主义政治诉求的能力，就会因此而受到阻碍。其次，这个新的委任统治制度，最初被英国和法国用来构建其统治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正当性，而它最终被设立起来的形式，被英国驻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委员会的代表称为“双重委任”（dual mandate）。欧洲列强宣称，为了文明的利益，它们一方面被委任去教化那些土著人民，另一方面还被委任去统治他们。¹ 它们所谓的文明的利益，其实指的就是西方的经济利益，而西方的经济利益常常就意味着西方石油公司的利益。就

1 Frederick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5th edn,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65.

伊拉克而言，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对该国正式实施委任统治的时间虽然短暂，这种“双重委任”却以不同的名义延续了下来。第一重委任的延续，打着“自决”的旗号，而所谓“自决”，用战后担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米尔纳勋爵的话来说，其实就是“通过臣属民族的首领来统治他们”的做法；第二重委任的延续，则打着“发展”的旗号，也就是那个号称被统治的臣属民族没有权利“拒绝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他们的丰富物产”的原则。²

战后的革命

87

战争结束时，英国在中东部署了超过一百万名军人，占领了埃及和苏丹，以及从西部的巴勒斯坦经叙利亚北部一直延伸到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这三个行省的一大片奥斯曼帝国领土。面对国内民众要求遣散驻中东部队的压力，英国很快便发现，即使拥有如此庞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无法维持英国对被占领地区的控制。

在叙利亚，一个得到英国支持的阿拉伯军政府在名义上执掌着该国的政权，可是，当英国依据英法两国在战后签署的一份协定撤回了对该政权的支持，从而允许法国占领叙利亚时，各人民委员会*纷纷发动起来，夺取了对大马士革和其他重镇的控制。1920年3月7日，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叙利亚国民大会（Syrian General Congress）

² 同前注：第61、194页。

* 人民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s）是叙利亚的一类由地方性部落力量所组建的民间武装团体，有些还构成了当地的自治机构。亦有文献将叙利亚国家议会——叙利亚人民议会（People's Assembly of Syria）译作叙利亚人民委员会，请读者注意二者的区别。——编者注

的名义在大马士革召开会议，宣布叙利亚独立。入侵叙利亚的法国军队以武力夺回了对该国的控制权，但在 1925—1927 年间的叙利亚大起义（Great Syrian Revolt）中，反抗的力量再度活跃了起来。³

就在叙利亚宣布独立的一个月后，巴勒斯坦爆发了大规模反对英国占领的示威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巴勒斯坦从英国独立，并阻止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这个地区移民——英国此前已经决定支持这些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移民，因为这样做，便能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一个欧洲定居者的人口群体，而英国也许能通过这一群体来保持对地中海东岸领土的控制。英国原本只计划保留巴勒斯坦的港口城市海法（Haifa），以这块飞地作为从伊朗向地中海运输石油的铁路或输油管道的终点站。⁴然而，英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要应对巴勒斯坦人反抗领土被侵占的示威活动，将会需要更大规模的军事存在，于是便选择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殖民地的计划。这样，英国就可以证明它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占领是一个必要的措施：一方面可以支持那些欧洲定居者的自决，另一方面在这些定居者试图获取巴勒斯坦土地而引发冲突时，英国的军事力量也可以充当调解的角色。

在埃及，一年之前爆发的 1919 年革命，已然在该国拉开了民众起义的序幕。在开罗的城市地区，一场场罢工导致交通和政府行政都陷入了瘫痪；而在乡村，农民们破坏了那台让他们在战时遭受贫困的

3 James L. Gelvin,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87–137. 俄国退出战争后，英法两国放弃了战时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并商定了一项新的谅解：法国放弃控制摩苏尔，换取英国同意法国侵略和占领叙利亚，并分享给法国一部分摩苏尔的石油利益。

4 ‘Notes of a Meeting Held at Mr Lloyd George’s Residence’,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5: 807.

88 机器——用于征收粮食和劳动力的铁路系统。⁵ 1920年3月，就在大马士革的集会宣布叙利亚独立的两天之后，已经被英国中止的埃及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的成员们在一位民族主义领袖的家中集会并通过决议，宣布英国对埃及的保护权无效，并公告“埃及土地”（*al-bilad al-misriya*）的独立，领土范围包括现今的埃及和苏丹两国。⁶ 1920年8月，英国提出愿意接受埃及某种形式的独立，条件是要让英国保留对苏伊士运河的军事控制——“保护”苏伊士运河的需要为英国继续维持军事存在提供了借口。英国放弃了一项允许埃及境内各外国殖民地在议会上下院中都拥有直接代表权的宪法提案，转而提议给自己保留一项干涉权，可以否决埃及实施任何在它看来针对其国内的欧洲定居者社群“运作不公平”（operating inequitably）的法律。⁷

在“一战”战火延烧最久的伊拉克，抵抗力量是更加逐步地涌现的。在大马士革和开罗那两份独立宣言问世的同月，一个初生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运动的29名代表在大马士革*集会，宣布国家独立。邻国

5 参 Abd al-Rahman al-Rafi'i, *Thawrat sanat 1919: Tarikh misr al-qawmi min sanat 1914 ila sanat 1921*, 2 vols, Cairo: Maktabat al-Nahda al-Misriya, 1946; Reinhard Schulze, *Die Rebellion der ägyptischen Fallahin 1919*, Bonn: Ballbek Verlag, 1981。关于农村贫困与铁路的关系，参 Ellis Goldberg, 'Peasants in Revolt: Egypt 19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4: 2, May 1992: 261–280; 及 Nathan Brown, *Peasant Politics in Modern Egyp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关于城市罢工潮，参 Joel Beinin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84–120。

6 Al-Rafi'i, *Thawrat sanat 1919*, vol. 2: 106–108。

7 Alfred Milner, 'Report of the Special Mission to Egypt', December 9, 1920,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Public Record Office (以下简记为 PRO), Cabinet Office Records, CAB/24/117: 13, 23–26。

* 原文作巴格达，经与作者确认，会议地点应是大马士革。会议是由一群流亡叙利亚的伊拉克民族独立人士所组成的伊拉克盟约协会（The Iraqi Covenant Society, *al-'Ahd al-'Iraqi*）召集的。参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编者注

伊朗对于英国强加保护国地位的企图所发动的抵抗，以及苏维埃俄国那年春天在巴库对英国势力的成功驱逐，都让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备受鼓舞。⁸ 1920年7月，占领伊拉克的英国军队企图增加捐税以弥补军费开支，此举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点燃了民众反抗的星火，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反英大起义，即伊拉克所称的“1920年革命”（Thawrat al-Ishrin）。英国用了六个多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表明，帝国统治的难度和成本都在日益增加。

威尔逊式的态度

正是在面对这些挑战时，自决，或者说本土统治（native rule）的教义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伦敦的帝国官员们在讨论伊拉克的危机并准备派遣在印度行政当局任职的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去担任驻巴格达高级专员时表达了忧虑，认为考克斯“可能会采取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更加威尔逊式的态度”。⁹ 他们口中的这个词——“威尔逊式的”（Wilsonian），形容的并不是最近才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联系在一起的自决的理念，而是考克斯此行将要接替的那位官员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的观点。这位阿诺德·威尔逊曾是印度陆军的一名军官，1907年第一次来到中东时，担任一支由二十名印度骑兵组成的分遣队的队长，而这支分遣队就是负责保卫在马斯吉

89

8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vol. 5, *Hawla thawrat al-'ishrin*, 2nd edn, London: Kufan, 1991: 45–54.

9 'Minutes of Inter-Departmental Conference on Middle Eastern Affairs', 16 June 1920, PRO,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 371/5227-0002: 5.

德苏莱曼勘探油田的英波石油公司钻探队的那一支（他在战后伊拉克的职位被考克斯接替后，转往英波石油任职，成为负责海湾地区业务的经理）。¹⁰ 战争期间，威尔逊在伊拉克担任考克斯手下的政务官，而在战争结束时，他代替上司出任了英国驻巴格达的代理专员，负责领导这个为管理英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而组建的行政机构。战后，这个主要人员来自印度（包括英国官员和印度下属）的机构开始“像管治印度的一个省一样管治美索不达米亚”。¹¹ 当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之火在1920年夏天愈烧愈烈时，威尔逊向伦敦的上级官员通报称，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以武力控制美索不达米亚，要么彻底抽身而退”。威尔逊的这种观点，在寇松勋爵看来，“给他留下了威尔逊上校无力收拾这种局面的不良印象”。而伦敦方面则希望采取“一条中间路线：通过争取人民的善意来保持我们在该国的地位”。¹² 因此，战后的帝国主义亟需某种机制来获取善意——来制造被统治者的同意。

对于那些试图找到办法在战后的伊拉克维持英国势力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与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自决关系不大，而是与阿诺德·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所持的“威尔逊式的”观点更加相关。这些帝国主义者，无论是在印度接受历练的海外殖民官员，还是英国国内的强硬派内阁成员，都希望英国在伊拉克建立直接统治——这个目标也许可以通过鼓励从印度向当地移民定居的方式来实现，就像英国正尝试在东非实施的政策那样——并维持或扩大对印度和埃及等国

10 Arnold Wilson, *SW. Persia: A Political Officer's Diary, 1907-191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11 Edwin Montagu,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Mesopotamian Administration', 23 July 1920, PRO, CAB 24/109.

12 'Minutes of Inter-Departmental Conference on Middle Eastern Affairs': 5, 3.

的控制。在亚洲和非洲，英国通常并不是通过直接吞并当地的邦国来建立帝国统治的。虽然帝国的权力依赖频繁施展的武装暴力，而且贸易港口和其他战略据点通常也是靠武力夺取的，但是，帝国势力的扩张往往通过渗透和逐步篡夺统领权的方法来进行。采用这种方法就需要保留当地的权威形式和法律秩序，尽管它们正从内部遭到破坏。在1858年印度起义、1882年英国的帝国统治扩张至非洲后，英国发展出了更加细致的本土统治的教义与实践。¹³

90

要做到控制领土，而又不招致直接吞并所带来的强烈反抗和高昂成本，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为这些领土提供人们所称的“保护”。当英属印度政府要把帝国版图扩张至波斯湾地区的奥斯曼领土时，它与当地的埃米尔（Emir）们签订了保护协议，类似于它此前与印度由土著王公统治的各土邦（princely state）所签订的协议。这种协议承认当地统治者的权威，而当地统治者则要将其权威的一部分，包括对该国的对外贸易或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让渡给帝国强权。¹⁴到了20世纪初，国际法教科书试图通过区分在“真正的国家”（real state）建立的保护国（protectorate）*，比如法国1912年在摩洛哥建立的那种，与“所谓的保护国”（so-called protectorate），比如欧洲各国通过与非洲的那些所谓“部落”的酋长签订条约而获得的那种，来将这种保护

13 Nicholas Dirks, *The Hollow Crown: 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 2nd ed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Karuna Mantena,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 Anthony Anghie, 'Finding the Peripheries: Sovereignty and Colon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0: 1, 1999: 48-51.

* 这里的保护国（protectorate，又译“保护地”或“保护邦”）实际上是被强国所保护和支配的国家或地区，所以也被译为“被保护国/地/邦”。——编者注

的教义正式化。非洲的政治制度并非不如其他地区“真正”，但将某些被保护的领土区分为“真正的国家”，就合理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此时几乎每一个新近被占领的领土都被称为“保护国”，某些国家仍然强大到足以要求获得自治的权力，但是，就连这些国家也不被允许独立——或用当时的词汇来形容，不被允许获得“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的成员资格。保护国制度就赋予了这些国家某种临时或权宜性的成员资格。1920—1921年出版的拉萨·奥本海（Lassa Oppenheim）《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的第三版指出，尽管受到保护的国家都是真正的国家，但“它们全都是非基督教国家，其文明程度还不能使其被接纳为国际大家庭的完全成员，除非处于目前所是保护国地位”。¹⁵ 这种保护的教义与后来将取代它的自决原则类似，允许帝国强权承认独立的诉求，但同时坚持认为，对于欠发展民族（或用有时仍在使用的称呼——“非基督教徒们”）来说，推进独立诉求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自己处在欧洲的控制之下。

91 过去，帝国列强提供保护的对象不是领土或民众，而是当地的统治者，不仅保护他们不被敌对强权侵犯，也保护他们不被自己的臣民挑战。然而，“一战”期间，英国在它占领的中东国家中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地方统治者。在用武力摧毁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英国也摧毁了能借以建立保护关系的地方权威。为应对这个问题，英国尝试建立一种新形式的保护关系。1914年，在“一战”爆发时，英国未征得享

15 Lassa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1, *Peace*, 3rd edn, ed., Ronald F. Roxburgh,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20: 168. 关于准主权（quasi-sovereignty）和保护国的关系，参 Siba N. Grovogui, *Sovereigns, Quasi-Sovereigns, and Africans: Ra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有埃及主权的奥斯曼帝国同意，就将埃及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¹⁶ 英国宣布，终止奥斯曼对埃及的宗主权，并建立保护关系——这个保护关系针对的不是奥斯曼驻埃及总督，这位总督已经被英国废黜并由他的一位叔父取而代之；英国要把埃及整个国家和人民纳入保护关系中。英国号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埃及，保护其居民和利益”。¹⁷

驻开罗的英国官员设想，英国对埃及实施的保护关系，可以作为将其他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并入大英帝国版图的一个样板。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国计划在阿拉伯人的起义削弱或摧毁了奥斯曼战前统治权威的地方建立更多的保护国。1914年，英属印度政府将一支远征军派往伊拉克南部，此举表面上是为了保护英波石油的油田，更大的目标，则是应对当地可能发生的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确保在起义爆发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与当地阿拉伯势力的联系不会中断。¹⁸ 1917年3月，伦敦命令驻伊拉克的英国代表把巴士拉纳入英国的统治之下，并在巴格达建立“一个虽不具有英国保护国之名，但实际处在英国的保护关系之下，拥有本土统治者或政府机构的阿拉伯国”。¹⁹ 类似在巴勒斯坦的情形，英国起初的计划是只控制石油运输的几个关键节点。巴士拉是阿拉伯河（Shatt al-Arab，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汇合而成的水道）沿岸的城市，它可以为英国提供一个基地，用于保卫英波石油

16 当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时，为了镇压一场反抗英法控制该国财政的民众起义，英国让埃及在名义上仍然处在奥斯曼苏丹及其派驻当地总督的统治之下。在当时的英国政府通信中，大臣们称这种双重控制（dual control）为“英法共同保护”（Anglo-French protection）。参 Sir E. Malet to Earl Granville, Cairo, telegram, 7 May 1882, PRO, FO 407/20。

17 Milner, 'Report': 7.

18 Stuart A. Cohen, *British Policy in Mesopotamia, 1903–1914*, Reading: Ithaca Press, 2008: 221–229.

19 引自 Peter Sluglett, *Britain in Iraq: Contriving King and Country, 1914–193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

在河对岸下游方向几英里外的城市阿巴丹营建的储运码头，并建设通向巴勒斯坦的输油管道。直到 1917 年底，英国人依然在为到底应该直接控制巴格达，还是在奥斯曼帝国松散的权威之下维持英国的影响力而辩论不休。²⁰ 至于摩苏尔，这个将来在巴格达和巴士拉之后第三个并入伊拉克从而使该国现代版图成形的行省，奥斯曼政府一直坚守到战争结束。1918 年 11 月“一战”停战协定签署后仅一周，英国军队就进入了摩苏尔，但这片富油区域的地位直到后来才得以确定。

经济性是评判政策的标准

92

在构建一种获取同意的机制时，英国所希望建立的治理模式，不仅要能应对当地民众对外国军事占领的反抗，同时也要能够对付英国国内的工党议员等帝国主义的批判者所构成的挑战，这些人反对耗费巨资维系庞大的帝国，也反对在战后继续延长强制兵役政策。伦敦印度事务部的高级官员亚瑟·赫策尔（Arthur Hirtzel）指出，英国在伊拉克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创建“某种带有阿拉伯特色的行政体系，让我们能在安全撤离的同时保持对局势的操控；这个体系不应花费太多，要让工党能在不违背其原则的情况下勉强咽下去，但通过它，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保全”。²¹

在法国占领之前，叙利亚就已经诞生了一个独立国家，这样的事实说明，地方性的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领导力量能从奥斯曼秩序的瓦

20 Reidar Visser, *Basra, the Failed Gulf State: Separatism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rn Iraq*,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59.

21 引自 Sluglett, *Britain in Iraq*: 31.

解中迅速形成。而在伊拉克，大部分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都存续了下来。英国人勉强承认，这个行政体系“给城镇居民带来了某种文明的表象”。“这里有可以上诉至君士坦丁堡的法院，也有一套选举制度，不仅能选出维持市政运转的市议员，还能选出派往奥斯曼帝国议会的代表。事实上，伊拉克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就像帝国的其他部分一样。”²² 然而，法律体系、市政机关和代议制政府是不够的。英国人需要一位弱势的“本土统治者”，他的弱势能让英国为他提供保护，并进而维持对这个国家的间接控制。

英国的解决方案是“拥立一位埃米尔”。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承认，这种做法并不适合当下。他写道：“要立即选定一位埃米尔，也就是要立即建立一个王朝……在眼前的时代真是最棘手的问题。”他提议，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有民选总统的共和国——前提是，国际联盟要允许英国指定首任总统的人选。英国曾考虑扶持最有权势的当地人物、在战前统治巴士拉的赛义德·塔利卜（Sayyid Talib）担任此职，但最终认定他太过独立，不易操控。²³ [塔利卜在伊拉克的主要英国靠山哈里·圣约翰·菲尔比（Harry St. John Philby）随后转而支持伊拉克以南地区的另一位本土统治者——内志（Najd，又译“纳季德”）王国的埃米尔，伊本·沙特。这位埃米尔不断开疆拓土，最终将内志扩张成了今日的沙特阿拉伯王国。] 伦敦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把挑选埃米尔一事延后几年，先让英国的高级专员代为统治，但考克斯认为，这样做将会让伊拉克的主权和必须建立在主权基

22 Montagu, 'Mesopotamian Administration'.

23 Sir Percy Cox, 'Note on the Mesopotamia-Persia Situation', 30 July 1920, PRO, CAB 24/110; Visser, *Basra*.

93 础上的自决等理念变得“难以解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决定挑选一位来自伊拉克以外地区的“本土统治者”，并把寻找候选人的目光投向了阿拉伯半岛的两支新兴势力。在考虑过内志王国的埃米尔伊本·沙特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统治汉志王国的哈希姆家族首领之子费萨尔（Faisal），来担任伊拉克的埃米尔。²⁴

用“本土”统治取代奥斯曼行政体制的困难，反映在殖民统治的财政负担上。尽管战后拮据的财政预算让英国有理由缩减在伊拉克的投入，但英国仍有一些节省开支的手段，比如使用成本更低的、从印度调来的帝国步兵营，征募伊拉克本地的武装部队，以及部署空中军事力量等。派飞机轰炸伊拉克的城镇和乡村帮助英国迅速镇压了1920年起义和其后的反英暴动，但空军力量并不可靠。例如，印度事务大臣发现，以空军作为手段的提议与“热带气候下飞机很难维持正常使用”的报告“难以调和”。²⁵ 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极力主张，要把空军的力量与民众的同意结合起来，利用前者来索取后者。丘吉尔提出，控制这个国家“不是依靠单纯的武力，而是靠美索不达米亚全体人民对他们已经自愿接受了政府与统治者的默许，而这个政府与统治者将得到空军、英国征募的本地部队以及四支帝国步兵营的支持”。他认为，这将创造出“一个对大不列颠友好且有利于她的商业利益，同时几乎不会给帝国财政带来什么负担的独立土邦”。对于这种以轰炸民众的方式来赢得他们同意的做法，陆军大臣提出了疑虑：

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惩罚性的措施来对付那些危害和平

24 Cox, 'Note on the Mesopotamia-Persia Situation'.

25 'Minutes of Inter-Departmental Conference on Middle Eastern Affairs': 8.

的人；但是，目前空军唯一可用的手段，也是实际上正在被使用的手段，就是去轰炸乡村里的妇女和儿童。如果阿拉伯人民意识到，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和平控制最终取决于我们轰炸妇女和儿童的意图的话，我非常怀疑，我们能否如殖民地事务大臣所期望的那样，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的丈夫与父亲们整体的默许。²⁶

维持占领的战争此时都变得旷日持久、消耗巨大，而且还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虽然机械化作战已经可以在全球规模上开展，但它耗费的成本也极其高昂。英国派往伊拉克的占领军，尽管无论在相对规模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远远强于它占领印度、埃及和其他领土所用的部队，英国当局依然无法对伊拉克确立有效控制。到 1919—1920 年间，英国面临的反抗几乎出现在其帝国版图的每一个角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以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

94

但是，在财政上受到的约束也反映了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在国内面临的政治秩序的变化。英国议会已经强制要求海军部和陆军部采用新的报告军事开支的方法。1920 年 6 月，工党的议员们迫使丘吉尔披露了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成本：每年耗资多达 5000 万英镑。²⁷ 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为应对其力量而采取的种种社会措施，催生了公众对于

26 Memorandum by Churchill, 4 August 1921, PRO, CAB 24/126; Memorandum b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17 August 1921, PRO, CAB 24/127, 以上两份文件引自 William Stivers, *Supremacy and Oil: Iraq, Turkey, and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Order, 1918–193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78. 关于通过轰炸村庄来确保税赋的征收，以及英国对其空军力量的其他一些用途，参 Sluglett, *Britain in Iraq*: 264–270。

27 ‘Persia and Mesopotamia’, *The Times*, 10 June 1920: 17.

揭示这个庞大帝国实际维系成本的要求。而这又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消除浪费、追求“经济性”（economy）* 的呼声，新闻界甚至宣称，这是“国家的最高需求”。在《泰晤士报》上，这场关于伊拉克的辩论被总结成这样一句话：“经济性……是评判政策的标准”。²⁸

对于面临这些压力和挑战的帝国主义来说，自决就不是问题，而反倒变成了一种解决方案。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在英国占领的土地上实行自决可能会对英国有利。如果根据自决的原则被定义的那样，它意味着，帝国强权应该要在占领他国时征求被占领国的同意，并且要设计出本土统治的机制来产生那种同意的话，那么，这种新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理念便可成为一种工具——不是用来削弱帝国利益的，而是用来保全它们的。

对产油区的控制

英国很快就放弃了战后直接控制伊拉克的最初计划。1920年4月，英法两国在意大利圣雷莫（San Remo）举行会议，达成了瓜分阿拉伯领土控制权的协定。英国想要继续军事占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则在会议后立即以武力夺取了黎巴嫩和叙利亚，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两国根据一年前在巴黎和会上制定的方案，宣称上述地区是在国际联盟授权下的“委任统治地”。此外，两国还在圣雷莫签署了另

* 这里的经济性（economy）是节约的意思，与本书所批判的、作为现代学科体制和政治对象的“经济”（the economy）不同，作者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编者注

28 ‘Public Anger At Waste: Mesopotamia Debate To-Day, Urgent Coalition “Whip”’, *The Times*, 23 June 1920: 16; ‘Mesopotamia and Economy: Lord Curzon on Arab Rule, A Cabinet Committee’, *The Times*, 26 June 1920: 16.

一项协定，以共享摩苏尔的石油资源。摩苏尔此时已经被英国宣布为伊拉克的一部分，为了给出一个合法的理由来控制当地的石油，英法两国搬出了那个总部设于伦敦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在 1914 年获得的一份未被奥斯曼帝国正式批准的石油特许权协议（参第二章）。根据这份 1914 年的协议，英波石油（也就是未来的英国石油）将持有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一半股权；壳牌石油通过自己原本拥有的 25% 的股份，再加上由自己控制的法国财团所接手的原属德意志银行的份额，总共控制了该公司的另一半股权。为了说服伊拉克人接受他们的石油控制权被外国所掌握，英波和壳牌同意，允许伊拉克的“本土政府和其他本土利益方”购买该公司至多 20% 的股份。²⁹

95

无论是英国在伊拉克实施的委任统治，还是英法的石油协定，都没能长期维持。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针对英波石油和壳牌发动了缜密谋划的精准攻势，由此摧毁了这份石油协定。³⁰ 标准石油

29 常常被历史叙事忽略的《圣雷莫石油协定》（San Remo Oil Agreement）的原文，参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 1935: 655–658。关于壳牌对法国财团所持份额的控制，参 Gregory 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and the World Oil Cartel, 1900–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80–160。

30 1911 年美国最高法院解散了标准石油托拉斯，并将其分为数家公司。两家最大的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后来的埃克森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后来的美孚公司，1999 年与埃克森合并为埃克森美孚公司）依然被洛克菲勒家族控制，所以在此仍合称“标准石油”。洛克菲勒公司攻击英波石油的方法，是威胁在伊朗北部签署一项竞争性的石油特许权协议，而攻击壳牌的方法，则是去破坏它试图获得的一项由法国政府支持的石油垄断计划，也就是恢复本书第二章曾提到的法德两国在战前合作的煤油垄断计划。为了持有法国在伊拉克的石油份额，一个新的法国财团——法国石油公司（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Pétroles）被组建起来，其股份的最大头由标准石油及其在法国的生意盟友持有，而少部分份额则由法国一些独立的石油公司，甚至英波石油和壳牌持有。迫于国会左派的压力，法国政府在日后持有了该财团 35% 的股份。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135–144, 160–222。

的代理人还试图削弱英国在巴格达的影响力，大肆散布英国报刊上对本国政策的抨击，而这些对英国的批评，随后被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在呼唤民族独立的演说中反复援引。在 1920 年的反英起义期间，标准石油可能也资助了起义者，虽然这一点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我真希望这些美国人闹出点事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抱怨道，而他口中的美国人指的就是标准石油的代理人，“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把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驱逐出去了”。³¹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美国政府差点撤换了美国驻巴格达领事。这位领事曾在战争期间担任纽约标准石油的销售代表，并为巴格达城内的奥斯曼军队提供了物资补给，而他之所以差点被撤职，是因为华盛顿发现他在支持反英势力。³²

在伊拉克人的反英起义被镇压后，标准石油转而支持另一股反英势力，也就是刚刚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至少英国人在 1921 年 12 月从“可靠消息源”那里获知的情况是这样——以此作为将英国人赶出伊拉克的替代手段。英国怀疑，标准石油在“煽动土耳其人攻打伊拉克，希望借此从土耳其人那里分得一杯石油羹，因为只要我们的国王陛下政府仍然维持着对这个产油区的控制，这些石油份额就是美国人无法获得的”。³³ 同时，一家先前被认为与标准石油有关联的

96 美国公司，与安卡拉的土耳其新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要完成建造战前规划的从摩苏尔通往巴格达的铁路项目，并获得摩苏尔石油的开发

31 ‘Foreign Influences Behind Arab Uprising’, 12 August 1920, PRO, FO 371/5228-0002. 伊拉克起义受外国资助的说法也出现在：Winston S. Churchill, ‘Foreign Incitement of the Turks to Attack Iraq’, 13 December 1921, PRO, CAB 24/131.

32 Stiv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raqi Oil, 1918–1928: A Study in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5: 4, 1981: 536; 及 *Supremacy and Oil*: 109.

33 Churchill, ‘Foreign Incitement of the Turks’, CAB 24/131.

权。³⁴ 标准石油施加的压力迫使英国修改了《圣雷莫协定》，把美国人也纳入了该计划的股东之列。

伊拉克人自己在反抗英国统治方面并不需要标准石油的协助。英国在巴格达扶植的政府，由此时已被指定为伊拉克国王的费萨尔埃米尔领导，但这个政府拒绝承认英国以国际联盟的“委任”为基础对伊拉克提出的统治权主张。1921年6月，在宣布对伊拉克实施委任统治仅仅一年后，考克斯就向伦敦汇报称，这种做法已经“过时”。1922年10月，英国同意与伊拉克签订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来取代委任统治，并承认这个新国家的主权——尽管尚未承认其独立。在英国国内，殖民势力持续遭到反对，舆论反对英国长期卷入伊拉克事务，以至于在那项同盟条约签署一个月后，该届政府便宣告倒台。伊拉克问题成为随后选举中的一项关键议题，作为伊拉克政策设计者之一的丘吉尔，把议院席次输给了社会主义者 E. D. 莫雷尔——莫雷尔在“一战”期间曾领导了争取在外交政策上实现民主控制的运动。伦敦新当选的政府修改了与伊拉克的条约，将英国在该国扮演正式角色的期限从二十年缩短为四年。³⁵ 面临伊拉克民众的抵抗和国内议会的反对，英国从1923年开始试图以最低成本来保住自己在伊拉克的地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石油的控制权，而这既是英国在伊拉克继续维持军事存在的主要原因，可能也是为此提供资金的手段。

34 John A. DeNovo,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1900–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3: 210–228. 这家美国公司就是本书第二章提到的切斯特的财团。它旗下的奥斯曼-美国开发公司曾被指是标准石油的幌子。“一战”后，这家公司试图获得标准石油的支持，但它似乎更像是土耳其用来挑战英国的工具，而不是标准石油的工具。

35 Toby Dodge, *Inventing Iraq: The Failure of Nation-Building and a History Deni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26.

97 前述几家石油公司在同意纳入美国人之后，用了近两年时间来决定如何分享土耳其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土耳其石油公司日后将改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Iraq Petroleum Company，简称“伊石油”），该公司与伊拉克政府的谈判又持续了两年，而这几家石油公司接下来又花了十年时间，才终于开始大规模地生产石油。与往常一样，这些延搁体现了石油公司一贯倾向于阻碍大型新增石油供应源开发的意图。为了防止伊石油坐拥特许权却尽可能少地生产石油，巴格达的英国官员协助伊拉克政府谈判了一系列条款，包括增加钻探义务、规定最低产量要求、订立输油管道建设时间表，以及拍卖未开发的钻井区块等。在实际操作中，伊石油却能成功规避所有这些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它拒绝了唯一可能让伊拉克政府监督伊石油履约情况的那项要求：让伊拉克政府持有伊石油的股权。几家石油公司将伊石油 25% 的股份授予了标准石油和其他美国石油利益方，以此排除了英国政府提出的让伊拉克方面持股 20% 的提议。伊石油和伊拉克政府就公司所有权展开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伊石油始终拒绝让步，巴格达最终妥协，并于 1925 年 3 月签署了一份没有给予伊拉克政府任何伊石油股份的特许权协议。由于这个新国家迫切需要石油资金开始流入，又顶着英国的压力，同时它也许还被警告称，如果石油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一个负责裁决摩苏尔省归属土耳其或伊拉克的国际联盟委员会将倾向于支持伊拉克——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巴格达最终同意了这样一份协议，让它剥夺了自己对开发本国最主要经济资源的任何控制权。

与此同时，几家大石油公司在 1928 年的《红线协定》（Red Line Agreement）中敲定了它们在伊拉克石油资源中瓜分到的份额，并做出约定，未经所有成员同意，各石油公司不得在中东除伊拉克外的地

区开发石油生产，由此把它们在伊拉克阻碍石油开发的安排，扩展到了中东的其他地区。³⁶ 同时，为了应对苏联的所谓“石油攻势”（oil offensive，即苏联尝试向国外出售更多石油，并摆脱壳牌和标准石油控制的行动），这些跨国石油巨头们达成了一项平行协议，在彼此之间瓜分了全世界的石油市场，并限制石油的产量以维持油价。³⁷ 随后，各公司又商定，尝试将油价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也就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石油生产和销售的价位。签署于 1928 年的这些协定实际上还形成了一个经营范围更广泛的能源卡特尔，不仅包括石油，还覆盖了煤炭与化工行业。主要石油公司与英国和德国的化学工业集团达成了协议，联手控制与合成燃料生产相关的专利。³⁸

国联负责裁决摩苏尔归属的委员会决定，将这片土地及其丰富的石油储藏划归伊拉克，条件是将委任统治的期限延长二十五年，因为国联认为，占摩苏尔人口多数的库尔德语族群需要得到一个帝国力量的保护。这个国联委员会被赋予的任务，是依据自决的原则来决定摩苏尔的未来归属，但在它的理解中，这一原则意味着去调查该地区的人民认同自己是阿拉伯人还是土耳其人。委员会发现，它咨询的当地人更关心集体福祉和经济生计，而不是把自己复杂多重的族属关系归

98

36 Ronald W. Ferrier,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vol. 1: *The Developing Years: 1901-193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583-585. 据《红线协定》，英波、壳牌及法国石油利益方合组而成的法国石油公司（标准、英波和壳牌在法国石油公司中亦持有部分股份），与标准石油牵头的美国石油利益方合组而成的近东开发公司（Near Eas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各占 23.75% 的伊石油股份，剩下的 5% 归土耳其石油公司最初的组织者、奥斯曼亚美尼亚裔石油商卡洛斯特·古本江所有。这条“红线”划定的范围，包括了除英波石油控制地区之外的整个中东地区（北非除外）。

37 Alzada Comstock, 'Russia's Oil Offensive', *Barron's*, 30 January 1928: 17.

38 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223-279.

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类别。这使委员会能够以经济的理由，将摩苏尔划归伊拉克，因为巴格达和巴士拉都依赖从北方输入的粮食。³⁹

摩苏尔的并入要求英国在短时间内再次修改与伊拉克的条约，但延长至二十五年的新条约包含了一项条款，规定若国联同意伊拉克的政治发展已使其具备国联会员国资格，则委任统治可以提前终止。条约签署还不到一年，英国在伊拉克的行政官员就开始主张迅速结束委任统治，同时急于确保该国新的统治精英能够继续掌权，因为这些精英保证了英国能获得石油，并有权在该国维持空军基地。为此，英国伪造了递交给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报告，制造出伊拉克已经满足国联会员国标准的印象。像之前一样，英国国内的一场选举再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29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落败，部分原因正如其党内的警告声音所说的那样，是“军国主义的冒险外交政策”所造成的损害。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很快就同意中止实施1927年的条约，并在1932年提名伊拉克成为国联成员国。⁴⁰ 工党1916年战时《备忘录》中的计划早已被抛弃。“所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实现，委任统治制度反而扶植了一个与英国结盟的精英小圈子上台掌权。

多数人的天然代言人

在自决的原则下，欧洲国家设计了一些机制，以制造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对欧洲控制的“同意”。以埃及为例，英国为了平息1919年

39 Sarah Shields, 'Mosul Questions: Economy, Identity and Annexation', in Reeva Simon and Eleanor Tejirian, eds,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Quincy Wright, 'The Mosul Disput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 3, July 1926: 453–464.

40 Dodge, *Inventing Iraq*: 32–37.

革命，最终同意与埃及的民族主义精英在伦敦谈判。谈判中，由米尔纳勋爵领导的英国一方，坚持要求埃及民族运动领袖带着英国拟定的条约草案回到埃及，“向国内民众解释条约方案的性质……以及埃及将从中得到的巨大好处”。如果草案得到了积极回应，米尔纳解释道，“这将构成某种来自人民的‘委任’”。米尔纳报告说，回到埃及的代表们所要采取的程序，则是“邀请一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埃及人，同他们见面并讨论这个拟议的方案。随后这些人再去埃及各省向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报告，从而在那里收到对此表示支持的决议……这样的话，在他们抵达埃及后的两周内就能明显看到，该国具有代表性的群体中有相当大多数的成员支持”这个拟议的条约。⁴¹ 在伊拉克，类似的获取同意的程序也被组织了起来。委任统治制度被转变成了某种制造同意的机制，帝国强权在这种机制下与准独立国家中的少数“代表性群体”签署条约（在巴勒斯坦除外，英国对它的控制已经瓦解），而通过这些条约，这些“代表性群体”同意英国的帝国权力在他们国家的存在。由此，委任统治地就倒退成了某种形式的保护国。

99

这种制造同意的机制，使帝国列强得以应对两种形式的反对：首先，在签署条约的过程中被帝国强权承认的部分主权，让当地的精英能够借以将自己塑造成民族主义者，从而削弱了更加平民主义的反抗力量。在各种形式的君主制的框架下组织起来的地方寡头权力，伴随着大地主的统治，就可以被说成是一种“自决”的表现。正如卢吉（Frederick Lugard，又译“弗雷德里克·卢加德”）所解释的那样，“自治理想的实现，只能通过产生了欧美民主的那种进化的方法”，也就

41 Milner, 'Report': 23, 35.

是“通过建立代议制的机构，而在这些机构中，相对少数受过教育的阶层应当被承认为多数人的天然代言人”。⁴² 其次，委任统治制度的框架为英国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缓解其国内争取在外交政策上实现民主化的压力（“某种工党能勉强咽下去的东西”）：因为英国并不是在以帝国强权的身份行事，而是在根据国际联盟的委任来采取行动。

“自决”的另一好处，在于人们此时可以通过由种族或民族所决定的政治认同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民族或种族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可以指涉语言、宗教、共同的历史，或者在最常见的情况中，只是指涉简单的地理划分。由于没有任何人口在民族上是完全同质的，这就创造出了让某些群体被识别或被塑造为“少数族群”的机会。于是，帝国强权继而就可以主张，自己有义务来保护人口中这些濒危的少数。在埃及，英国放弃了在当地建立保护国，但是在 1920—1922 年关于埃及独立的谈判中，英国主张，自己有权继续在当地扮演欧洲侨民的保护者角色——我们曾在前文中读到过，英国最初希望这些欧洲侨民在埃及上议院中有单独的代表。在巴勒斯坦，英国经由推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此定居并镇压当地人阻止这种定居的努力，创造出了一个由欧洲人口组成的少数族群，然后再尝试建立起某种本地人与犹太少数族群都有“平等”代表权的机构，成功扮演了同样的保护者角色。但事实上，如果巴勒斯坦人的领袖不接受委任统治的条款，英国就拒绝在巴勒斯坦建立立法议会，而这些条款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主张，却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⁴³ 法国在入侵叙

42 Lugard, *Dual Mandate*: 193.

43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31–48.

利亚后 [英国保留了叙利亚的南部省份, 以此建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Transjordan)], 将它进一步分割成了六个邦国 (state)。每一个地理区域上的复杂政治归属被仅仅简化成了民族-宗教的认同: 一个阿拉维派 (Alawite) 的邦国; 一个德鲁兹派 (Druze) 的邦国; 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邦国 (黎巴嫩); 一个土耳其人、阿拉维派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混居的邦国, 亚历山大勒塔 (Alexandretta); 两个阿拉伯人的邦国, 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在 1924 年重新合并为这个名叫“叙利亚”的国家, 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的两个邦国也分别于 1936 和 1937 年并入。亚历山大勒塔于 1939 年被移交给土耳其, 只剩下黎巴嫩成为原先六个邦国中唯一的独立实体。⁴⁴对于那些不能作为控制手段的族群, 没有任何保护提供给他们。亚美尼亚人在面对土耳其人的暴行时没有得到保护, 也没有在战后被授予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但是, 逃脱亚美尼亚惨案的难民却被法国欢迎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 因为他们会在那里成为另一个需要帝国保护的基督教少数族群。⁴⁵

物质层面的义务

训练被统治的臣属种族实行自治, 仅仅代表了帝国列强当前所被委任的职责中的一半, 也就是他们对“被统治的种族所负有的道德层面的义务”, 包括训练本土统治者, 开办有限的学校教育从而“协助

44 George Antonius,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13: 4, July-August 1934: 523-539.

45 Tsolin Nalbantian, 'Fashioning Armenians in Lebanon, 1946-1958',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0: 33.

他们进步，但又不引发他们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其他分阶段谨慎推进的“文明”进程。除此之外，受委任的强权还主张，自己负有一系列“物质层面的义务”。这些义务不是要将各种本土的统治形式文明化，而是要确保对本土人民的统治符合文明的利益。

101 原英属尼日利亚总督卢吉爵士，曾于1922年至1936年间担任英国驻国际联盟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代表。在出任这一职位之前，他写了《双重委任》（*The Dual Mandate*）一书，在其中解释了殖民主义的道德层面与物质层面之间的区别。他之所以撰写这部讨论本土统治的经典著作，既是给殖民官员作为指导，同时也意在反击英国劳工运动试图将帝国主义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的努力。这种双重委任在物质的层面上，是一种确保“自然资源得到开发，从而使当地人民和全体人类共同受益”的责任。卢吉认为，帝国强权“一方面是负责推动臣属种族进步的受托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对其物质资源进行开发的受托人”。⁴⁶

“开发／发展”世界资源的义务提供了一个答案，来回应帝国的左翼批评者，也就是卢吉在六百页巨著的结尾所针对的目标。“一战”以来，这些批评者一直主张，“英国纳税人被要求支持沙文主义者的野心，而土著种族则遭受弊政之害，其土地与应得的权益，都被贪婪的剥削者夺走”。卢吉抱怨称，似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企图，试图在工党中宣扬这套说辞，并说服他们相信，帝国的存在不仅违背了被帝国统治的臣属种族的利益，也违背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工党的研究部“想要说服英国这个民主社会：最好逃避帝国责任，并

46 Lugard, *Dual Mandate*: 58–59, 606.

把它移交给各种国际委员会；以及，物质层面的发展仅让资本家得利，而英国对臣属种族的统治仅仅意味着掠夺和自利”。⁴⁷ 于是，双重委任的教义就给了这些批评帝国的人一个答案。卢吉辩称，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反民主的进程。相反，唯有通过殖民主义，劳工运动各种新的民主诉求才能实现。“当今民主社会主张人们拥有工作的权利，”他指出，但如果没有殖民地生产的原材料，“这个要求就不可能得到满足。”帝国的商人、矿工和制造业者在海外运用他们的技能、资本和能量，不是在充当“贪婪的资本家”，而是在“履行文明委任的使命”。⁴⁸

这套发展的教义，为帝国强权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而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在这套教义的阐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1920 年代这个时间点，这套教义指的还仅仅是对物质资源的发展。在下一章中，我将追溯一个新的发展对象——“经济”——的出现。

集中最主要的力量

到了 1927 年 4 月，伊石油终于开始钻井采油了，而此时距奥斯曼帝国将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份石油特许权授予德意志银行，已有

102

47 同前注：第 608 页。关于委任统治与开发/发展，参 Antony Anghie, 'Colonialism and the Birth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overeignty, Economy, and the Mandate System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34: 3, 2002: 513-633。亦参 Priya Satia, 'Developing Iraq: Britain, India and the Redemption of Empi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ast and Present* 197: 1, 2007: 211-255。[T. E. 劳伦斯 (T. E. Lawrence) 曾以“发展”的说法来批评占领：“我们说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是为了发展它以造福世界。所有专家都说劳动力供应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今夏对一万村民与市民的屠杀，将在多大程度上阻碍大麦、棉花和石油的生产呢？”‘A Report on Mesopotamia’, *Sunday Times*, 22 August 1920]。

48 Lugard, *Dual Mandate*: 61.

近四分之一世纪。几周内，该公司就在基尔库克（Kirkuk）以北一片绵延 60 英里的高孔隙度石灰岩构造中发现了一处大型油田。伊石油以此发现作为进一步延搁开发的借口。它放弃了在伊拉克其他地区的钻探活动，并在基尔库克油田又花费了七年时间来钻试验井，十分缓慢地确定储油层的范围和特性，每天只生产象征性的 2000 桶石油。该公司修筑了道路、车间和住房，为 2000 名伊拉克工人、125 名欧洲人和 30 名美国人提供了住宿设施。但是，伊石油不愿意发展生产，尤其是在 1929 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大萧条的关头。伊拉克政府要求伊石油建设一条将石油输送到地中海的输油管道，但该公司拒绝这样做，直到伊拉克政府同意重新谈判 1925 年的石油特许权协议。

1931 年，伊拉克亲英的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同意修改石油特许权协议，以换取一笔金额适度的现金预付款。新协议取消了伊拉克政府向该公司的利润征税（这种税与生产每桶石油所要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或开采权益金不同）的权利，并取消了最低钻探义务和公司需要定期放弃未开发特许权区块的要求。协议还将特许权区域的面积从根据定期放弃条款所只能选择的 192 平方英里，扩大到了 32,000 平方英里（从 5 万公顷扩大到 800 万公顷）。伊拉克政府在接受了这份日后被美国国务院的石油专家评价为“有史以来签订的最糟糕的石油协议之一”后，终于开始从石油中获得适度的收入了。⁴⁹

1932—1934 年间，一条从基尔库克通往地中海沿岸的 12 英寸口径输油管道铺设完成。这条管道分出了两条支线：一条向南延伸，最终

49 Francisco Parra, *Oil Politics: 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 London: I. B. Tauris, 2004: 12–13. 1931 年协议将伊拉克东北部石油的控制权给了伊石油公司。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当伊拉克出售西北部和南部的石油特许权时，伊石油又买了下来，这让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伊拉克石油。

到达海法的一座由英国控制的储运码头；另一条则向北延伸至的黎波里（Tripoli）的一座处于法国控制之下的储运码头（参 174—175 页示意图）。这条配有十二座泵站的新建管道，是中东的第一条大型输油管道——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焊接管道——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由于这条管道而增至过去的四十倍，从每日 2000 桶增加到了每日 8 万桶。但这仅仅是伊拉克油井潜在产能的一个零头而已，可是，将这条管道的输送能力提高四倍的计划，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迫延迟，后来又因为 1948 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切断了通往海法的南支线，而使这条管道的输油能力减少到了原来的一半——虽然当时已建造了一条向北通往叙利亚沿海城市巴尼亚斯（Banias）、输送能力更强的管道，可以替代南支线。到了 1950 年，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翻了一番，达到每日 16 万桶，到 1952 年又翻了一番（而到 1980 年时，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将达到每日 250 万桶）。⁵⁰与此同时，在 1940 年 7 月，连接巴格达与摩苏尔的铁路竣工，巴格达铁路的全部线路至此终于完成——在原本的设想中，这条铁路会是中东地区的第一条石油输送线路，但它花了四十年才终于完工了。

103

石油公司在建设石油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是在铺设政治抗议的基础设施。那些脆弱的节点，也就是政治运动所能组织起来并施加压力的地点，如今包括了遍布整个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油井、管道、炼油厂、铁路、码头和航运路线。一系列争取实现政治自由和更加平等的生活方式等诉求的斗争，将会在这些相互连接的地点上开展。

50 Stephen Longrigg, *Oil in the Middle East: Its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3rd ed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70–83, 174–182; DeGolyer & McNaughton, *Twentieth Century Petroleum Statistics*, Dallas: DeGolyer & MacNaughton, 2009.

英国在 1941 年又重新占领了伊拉克，距英国承认该国正式独立还不到十年。“二战”结束后，反对英国占领的抗议活动，在 1948 年的民众起义、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中达到了高潮。已经发展成为该地区最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之一的伊拉克共产党，要求“撤出外国军队，解除民主自由的枷锁，为人民提供充足的面包”。⁵¹ 伊共已经“将其最主要的力量，集中在……对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大型工程上”——也就是集中在铁路、巴士拉的港口，以及油田上。将攻势重心集中在一个以石油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中技术结构最脆弱的节点上，这样的做法“构成了其基本战略的关键”。⁵²

在铁路系统上，伊共将绝大部分资源集中组织在“整个系统中最关键的节点，沙尔基亚（Schalchiyyah）的铁路车间”上，主要的仓储设施以及全部的修理和维护工作都集中在那里。“如果此地停工十到十五天，整个伊拉克的火车运行就会完全停摆。”⁵³ 而在英国控制的油田中，伊共则将活动重点集中于一个更为关键的地点——“从基尔库克出发的输油管道分出海法支线和黎波里支线的分岔处，即哈迪塞（Hadithah）附近的 K3 泵站”。⁵⁴ 1946 年 6 月，石油工人发动罢工，要求获得组成工会、病残保险和养老金的权利，最终遭到了武力的镇压，造成 10 名工人被害，27 人受伤。⁵⁵ 然而，在 1948 年的起义中，石油工人成功关闭了 K3 泵站。因为这座泵站负责为其他泵站供应汽油，

51 Prison letter from Comrade Fahd, early February 1948, 引自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London: Saqi Books, 2004: 564.

52 同前注：第 616 页。

53 同前注：第 617 页。

54 同前注：第 622 页。

55 同前注：第 624 页。

所以工会派员守卫此处，确保“哪怕是一品脱的汽油”，都不会从这里流出。停工持续了两周，直到伊石油用机枪和装甲车包围了现场，并切断了向泵站的食物供应。罢工工人无法冒险与武装力量对抗，于是便决定一路示威，向 150 多英里外的巴格达进发。罢工者在沿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最终在行进三天后，“到达费卢杰（Fallujah），在那里落入了警察的罗网”。⁵⁶ 石油工人被遣送回了 K3 泵站，而罢工的领导者们则被投入了监狱。

麻烦制造者

基尔库克—海法输油管道另一端的巴勒斯坦成为另一个斗争地点。在 20 世纪英国遭遇的最持久的反殖民起义——1936—1939 年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中，反抗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才完工不久的这条从伊拉克通来的输油管道。1936 年 8 月，抗议者最初试图通过在海法的炼油厂，以及港口、铁路和公共工程部门（Public Works Department）发动罢工来削弱英国的势力，但英国调派了皇家海军的工程师来运营火车，并让犹太工人去运营港口和炼油厂，抗议者的行动就因此受挫了。⁵⁷ 但是，输油管道则更为脆弱。1936 年 7 月 15 日，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伊尔比德（Irbid）附近第一次损毁了这条管道。随后，他们又炸毁了考凯卜哈瓦（Kaukab al-Hawa）、马哈尼以色列（Mahane Yisrael）和伊克萨尔（Iksal）的村庄附近，阿富拉（‘Afula）

56 同前注：第 625 页。

57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43.

和贝桑（Beisan）之间，以及位于特拉达斯（Tel ‘Adas）、比雷赫（al-Bira）、阿尔德玛尔吉（‘Ard al-Marj）、塔姆拉（Tamra）、米斯尔村（Kafr Misr）、吉斯尔马贾米（Jisr al-Majami）、金贾尔（Jinjar）、贝桑和因杜尔（Indur）的输油管道。⁵⁸ 由于英国人无法全程保护输油管道，他们便组建了一支配备武装的犹太定居者部队来协助他们防卫管道，并负责保卫海法—吕大〔Lydda，现称卢德（Lod）〕铁路线。⁵⁹ 这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的队伍，后来构成了 1948 年夺取巴勒斯坦控制权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的核心力量。

而一条沙特阿拉伯油田至地中海的输油管道的建设，又产生了另系列的政治计算与机会。1933 年，沙特阿拉伯将在该国生产石油的独占性权利授予了阿美石油公司（Aramco）。持有阿美的四家美国石油公司又合资设立了跨阿拉伯输油管道公司（Trans-Arabian Pipeline Company，后简称“Tapline”），原本计划将这条输油管道的终点设在位于海法的英国炼油厂附近。⁶⁰ 为了避开巴勒斯坦，该公司在 1946 年改变了管道走向，绕道经过叙利亚的西南角，并在黎巴嫩的沿海城市

105

58 Ghassan Kanafani, ‘The 1936–39 Revolt in Palestine’, New York: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Palestine, 1972: 109, 可参见 www.newjerseysolidarity.org。卡纳法尼（Kanafani）两次提及一个叫“Bashan”的地点，这可能是翻译错误，已被改正为“Beisan”；“Ain Dur”被改正为“Indur”。“‘Ard al-Marj’”指的则是“Marj ibn Amir”。

59 Kanafani, ‘The 1936–39 Revolt’. 关于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守卫输油管道，参 David Ben-Gurion, ‘Our Friend: What Wingate Did for Us’, *Jewish Observer and Middle East Review*, 27 September 1963: 15–16。

60 参 174–175 页示意图。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今天的雪佛龙（Chevron）〕于 1933 年取得了沙特石油的特许权，三年后与德士古（Texaco，又译“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组成了合资企业，并于 1947 年扩大企业规模，引入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和纽约标准—真空石油（美孚）的投资。关于中东输油管道的历史，参 Rafael Kandiyoti, *Pipelines: Flowing Oil and Crude Politics*, London: I. B. Tauris, 2008: 49–83。

赛达（Sidon）附近设置管道终端的储运码头。跨阿管道公司给出的改道理由，是巴勒斯坦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并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该国稳定构成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另一个对石油公司的控制权造成了威胁的场所，位于现有的伊拉克至海法输油管道终点的那家英国炼油厂。那里的工人组织了1935年2月和上文所述的1936年的两场罢工，以及1947年3月石油工人为了争取更高工资而发动一场为期13天的罢工。⁶¹ 1947年夏，巴勒斯坦共产党书记什穆埃尔·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就石油公司在当地行使政治权力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意见：

设在海法的炼油厂〔联合炼油有限公司（The Consolidated Refineries Limited）〕是一家被免除了所有关税的外国企业。伊拉克石油公司和跨阿拉伯石油公司也被授予了垄断性的特许权。这些特许权所包括的权利，让这些外国公司无须支付任何特许权的使用费或权益金、税、进口关税，或其他任何款项、费用和补偿，即可：经我国任何地区铺设管道；征用土地；夺走木材、石材、水，以及任何其他这些公司所需的当地材料；引进廉价劳工而不受现行移民法律的限制；自由穿越巴勒斯坦边境；建造和使用它们自己的港口、铁路、机场和无线电台；向停靠和装卸货物的船舶征收港口税；保有自己的警察武装。这些政府单方面授予的特许权并未给巴勒

61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327, 331.

斯坦人民带来更便宜的石油与汽油，而这些特许权的授予也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⁶²

让输油管道绕经叙利亚，就避免了这类政治责难。当叙利亚议会拒绝批准与跨阿管道公司达成的协议条款，提出要增加管道过境费用，并要求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要采取太一边倒的立场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石油公司的要求下策划了一场政变，把一位更为通融的上校推上了台。新掌权的军政府中止了议会和宪法，并完成了管道协议的签署。⁶³ 类似这样的事件打造了“二战”后石油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106

在黎巴嫩，美国向黎政府施压，要求签署一项双边投资条约，使石油公司可以免于遵守当地的劳动法规。⁶⁴ 从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的那个冬季开始，黎巴嫩爆发了一系列争取工会权益、提高薪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劳工抗议活动，最终促成了一部保障劳工的法律在 1946 年通过。⁶⁵ 由黎巴嫩国民经济部长卡迈勒·琼卜拉特（Kamal Jumblatt）

62 Testimony of Samuel Mikunis to the UN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13 July 1947, UN General Assembly, A/364/Add.2 PV, 来自 domino.un.org。巴勒斯坦共产党以前既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包括犹太定居者，在 1943 年它分裂成了阿拉伯和犹太两派，但犹太派——包括由米库尼斯领导的派系——直到 1947 年底以前，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犹太国的计划，主张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合作。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303–351.

63 Douglas Little, ‘Cold War and Covert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yria, 1945–1958’, *Middle East Journal* 44: 1, Winter 1990: 55–56; Irene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1945–1958*, 2nd ed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97–98.

64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111–114, 131–132.

65 Irene C. Soltau,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Leban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3, July 1949: 307–317; Elizabeth Thompson, *Colonial Citizens: Republican Rights, Paternal Privilege, and Gender in French Syria and Leban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7–281; Malek Abisaab, ‘“Unruly” Factory Women in Lebanon: Contesting French Colonial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 1940–1946’,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6: 3, 2004: 55–82.

所代表的一支改革派力量，反对向外国跨国公司提供优厚的特许权，并且支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他的副手警告称，之前建成的基尔库克—黎波里输油管道（也就是从伊拉克 K3 泵站分出去的另一条输油支线）和炼油厂，对当地就业和发展没有起到多少促进作用。“每年有两百万吨石油流经的黎波里，但这个庞大的设施对这座城市的经济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很少有人知道，的黎波里的一座棉纺厂所雇佣的人手，是整个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储运码头和炼油厂加起来总雇佣人数的四倍。”⁶⁶ 在管道特许权的最后谈判中，美国人成功地把琼卜拉特赶下了台。⁶⁷ 而当输油管道开始运营后，美国公司则通过雇佣临时工和其他措施，来防止工人们组织工会。⁶⁸

在沙特阿拉伯，阿美公司引入了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在薪酬、工作环境和住宿条件上为不同种族提供差别待遇的措施，而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读到的，这种种族化的结构是美国石油和其他资源开采行业的常见特征，其目的就是要降低成本，并抑制劳工组织和政治行动的形成。⁶⁹ “二战”结束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沙特阿拉伯的劳工发起了一系列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和薪资，消除种族歧视。在 1949 年的一波抗议活动之后，沙特将被认定为“麻烦制造者”的一群伊拉克工人驱逐出境，同样被驱逐的，还有来自此时已经独立的巴基斯坦

66 Na'im Amiouni (Amyuni), 'A Short History of our Pre-War and Post-War Economic Problems', 3 July 1946, cited in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48.

67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47–48, 145.

68 同前注：第 112 页、第 117 页。

69 Robert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维塔利斯 (Vitalis) 揭示了种族对组织石油生产的重要性，沙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工人争取更平等的劳工体制的反复努力，以及美国公司拼命维持种族歧视制度的顽固态度。

坦的工人。阿美向美国国务院解释称，被驱逐的工人追随“共产主义路线，尤其关注资本主义的罪恶和种族歧视”。1953年，在阿美拒绝承认工会领导人有权代表劳工之后，一场为期十天的罢工爆发了。这场罢工一方面带来了阿美的改革承诺，另一方面又让沙特政府在油田实施了军事戒严，这使阿美的发言人能够把责任推到沙特政府身上，说它最初拒绝和劳工领袖谈判只是在执行政府的反工会政策。而等到阿美公司的承诺根本没得到遵守时，一系列抗议、罢工和抵制活动接踵而至，最终演变成了1956年6月爆发的总罢工。工人的要求包括：制定政治宪法；获得组建工会、政党和全国性社团的权利；停止阿美对国家事务的干涉；关闭美国军事基地；释放被囚禁的工人等。阿美公司的安保部门向沙特安全部队指认了罢工领导者的身份，这些组织劳工行动的人随后被一一囚禁或驱逐。⁷⁰

伊朗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二战”期间，英国通过与苏联共同入侵伊朗，保证了它对伊朗石油和石油供应路线的控制。为了争取伊朗人对军事占领的支持，英国顺应民意压力，废黜了沙阿礼萨·汗，却又扶持其子继位，以此确保沙阿的专制统治方式能在未来延续下去。⁷¹在1945—1946年间，石油产业的劳工为了争取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结束在人员管理和住宿方面的种族歧视制度，发起了一系列罢工，包括一场在三天的时间内遍及阿巴丹的炼油厂和全国

70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92–95, 119, 171–184（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亦参 William Eddy, Letter to Children, 23 November 1953, William A. Eddy Papers, Box 8, Folder 7,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71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4–165。

各个油田的总罢工。来自英国的一个议会代表团报告称，此时已更名为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英波石油为工人提供的住房“看起来像沙漠中的劳改营”，住宿条件“比猪圈好不到哪里去”。伊朗政府通过了一部劳工法以回应工人的部分诉求，但同时也建立了对工会实施的国家监管制度，而后又在产油区宣布戒严，并试图镇压独立的石油工会。⁷²在 1949—1951 年间，石油工会及其在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又译“图德党”，即伊朗的共产党）的盟友再度活跃起来。类似 1937 年在墨西哥的情况，一个改革派当权的政府试图将伊朗的石油工业国有化，希望以此化解石油工人的力量——虽然政府提出的国有化条件与工会和共产党所要求的相比，要更加有利于外国石油公司。随后，石油工人和穆罕默德·摩萨台（Muhammad Mossadegh）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政府逮捕了石油工会的领导人。英伊石油并没有理由反对国有化（英国五年前就已经把本国的煤炭工业收归国有），而它试图让国际法院裁定伊朗违反特许权协议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1953 年，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组织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摩萨台，并赋予了沙阿打击民族主义运动、镇压劳工运动与左翼人士的权力。英美联合策动的这场政变重新确立了外国对伊朗石油的控制权——尽管华盛顿迫使此时已经更名为英国石油的英伊石油，将其石油垄断的份额降至 40%，而把其余部分留给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分享。⁷³

108

72 Katayoun Shafiee, 'Cracking Petroleum with Politics: Anglo-Persian Oil and the Socio-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of Iran, 1901-54',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2010; Fred Halliday, 'Trade Unions and the Working Class Opposition', *MERIP Reports* 71, October 1978: 7-13; Habib Ladjevardi, *Labor Unions and Autocracy in Ira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1-69, 123-147;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73 Ervand Abrahamian, 'The 1953 Coup in Iran', *Science and Society* 65: 2, Summer 2001: 185-215.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将自决的教义转变成了这样一套手段，用于在伊拉克制造某种虽然控制力弱化，却能以更低成本来维持影响力的间接统治机制，确保了几家国际石油巨头对该地区石油的掌握。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石油公司延搁了对油田的开发，由此保障了它们对全球石油的垄断性控制。“二战”后，以石油取代煤炭的新的能源网络被构建起来，让帝国势力能够以此为基础，在欧洲削弱左翼的力量，建立起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战后民主。与被取而代之的那种以煤炭为中心的能源安排相比，这种新的能源网络的政治属性有所不同。煤炭工人曾利用煤炭所赋予的力量使能源体系陷入瘫痪，并建立更加民主的秩序，然而，尽管中东地区的油田、泵站、输油管道和炼油厂变成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开展的场所，它们并没有为在这些场所劳动的工人提供同样的力量。

第五章 燃料经济

109

我们正在逐渐学习如何不从某种理念的历史或某场社会运动的兴起的角度来思考民主，而是将民主理解为一系列机器 / 制的装配过程（assembling of machines）。一些人曾将煤炭的供应组装成一种使工业化世界民主化的装置，他们也曾试图将这种装置的机制推广到用于治理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的关系。“一战”的危机到来后，他们曾构想出一些手段来管理国际金融流动，并将其利润引向有益的目的。而帝国强权在与各个地方性势力结成的不稳定联盟中，成功打造出了替代上述手段的一种新手段——这种手段用“自决”的过程取代了民主的主张，用“发展”这个新兴的装置取代了对国际资本的民主控制。

管理货币流动的困难一直阻碍着更平等、更民主的政治的发展，而这种阻碍越来越紧密地与石油的流动联系在一起。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后，欧洲民主政府相继失败，又一场世界大战爆发，经历了这些动荡的人们再度尝试设计一种管理国际金融流动的方法，这就是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安排。在它发展的同时，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一些以管理某种最近才被逐渐称作“经济”的事物为基础的新形式的民主政治。国际金融安排和这个被称作“经济”的装置，都是用于治理民主的手段；而这两大体系被构建起来的方式，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读到的，都利用了不可再生碳能源使用量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在人类转入石油时代之后仍然保持着指数级的速率。为了理解 20 世纪下半叶碳能源与民主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我们必须考察石油在这两种治理机制中的位置。

将放债人逐出圣殿的石油

欧洲民主在 1920 至 1930 年代的崩溃，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全球局势的恶化并朝着又一场世界大战爆发的方向下滑，这些现象都被认为是货币保值手段的崩溃所造成的。中欧和东欧的各个国家不得不放弃将本国货币的价值建立在黄金储备基础上的尝试。这些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接连崩溃，中产阶级陷入贫困，穷人普遍失业，两次大战战间期的民主遭到了摧毁。1944 年，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10 写道：“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的崩溃”，是“将欧洲推向末路的机制”。¹

“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制定了打造一个新的国际货币流通管理机制的计划。1944 年 7 月，四十四个“二战”同盟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饭店举行会议。这座饭店由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煤炭大亨在 1902 年出资建造，此时已经不复往日的光彩。在会议上，各国达成协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如今演变成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协定放弃了建立在煤炭所累积的财富和技术基础上的旧货币金融体系，并以基于石油流动的新体系取而代之。

为了防止重蹈战间期金融灾难的覆辙和民主的再度崩溃，各国政府必须控制那些曾经造成灾难的人——货币投机者。1880 年代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的发现（参第三章），以及英国金矿企业的垄断和

1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20.

这些企业施行的种族化劳工制度在那里的巩固，使得由黄金储备调控的国际贸易开始扩张。同时，这些因素也刺激了通过投机各国货币的价值来获利的大型私人银行的兴起和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目标就是消除这些银行家的投机力量。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致辞中表示，这个新的货币体系的宗旨，是“限制某些私人银行家过去曾对国际金融行使的控制权”，并且把“那些高利贷的放债人逐出国际金融的圣殿”。²为了遏制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流动，货币的价值将不再与黄金储备挂钩，而是与商品的交换相关联，因为商品的价值反映了人力财富与物质财富。摩根索宣称，没有任何人民或政府“将会再度容忍长时间或大范围的失业”，并且表示，在有了新的国际金融机制以后，“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都可以在公平和稳定的基础上，自由地交换他们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

在接下来的大约二十年里，这个新的货币体系成功地限制了私人货币投机者的破坏性力量。但是，它实现这个目标，靠的并不是将货币价值与人类劳动生产的商品的总体流动相关联，而主要是靠将货币与石油的流动挂钩起来。在1960年代末，借助石油的流动所创造出的各种压力，投机者们得以削弱这一机制；而在1980年代，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货币投机方式时，这一机制便被他们彻底摧毁。³

111

2 'Address by the Honorable Henry Morgenthau, Jr., at the Closing Plenary Session' (22 July 1944), in Department of State, ed., *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 Bretton Woods, Final Act and Related Documents, New Hampshire, July 1 to July 22, 194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4: 7-10, at www.ena.lu.

3 Donald A. MacKenzie,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货币体系从来都既是一种计算性的装置，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装置，由一系列技术性的过程构成。金本位制，也就是之前的机制，其最初得以建立需要依靠煤炭和蒸汽动力，具体方式我们将在下文探讨。黄金储备不再能够作为确保国际金融交易的工具，是因为“二战”期间，欧洲各盟国被迫将它们所有的金条都送到美国，用于支付从美国进口煤炭、石油和其他战时物资的费用。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积累了全世界 80% 的黄金储备。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同意以这些黄金为基础，将美元价值固定在每盎司黄金 35 美元。其他与会各国同意将美元作为唯一能够以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的储备货币，并将自己国家的货币价值与美元挂钩，从而间接地与美国的黄金垄断挂钩。然而，美元流通规模的增长速度很快就超过了美国积累黄金的速度，部分原因在于，南非金矿工人开采黄金的速度，跟不上由流动起来更为容易的石油所驱动的世界贸易开始增长的速度。⁴ 实际上，真正支撑美元价值的因素，是各国都不得不使用美元来购买那些占国际贸易大宗的基本物资，尤其是这些物资中最重要的石油。

无论从价值还是数量上看，石油都已成为世界贸易中份额最大的商品。1945 年，美国生产的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二，而在余下的三分之一中，有一半以上产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⁵ 根据管理国际石油贸易的安排，石油交易使用的既不是生产国的货币，也不是消费国的货币，而是控制石油生产的跨国公司所属国家的货币。所谓

4 Barry Eichengreen,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Lessons of Bretton Woo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40–41.

5 Degolyer & MacNaughton, *Twentieth Century Petroleum Statistics*, Dallas: DeGolyer & MacNaughton, 2009.

的“英镑石油”(sterling oil, 主要产自伊朗)是以英镑交易的,而除此之外,全球销售的石油大部分都是“美元石油”(dollar oil)。世界其他地区必须使用美元来购买它们所需的能源。作为国际金融基础的美元,其价值取决于石油的流动。

大多数关于战后金融体系的标准论述都忽视了石油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但是,“二战”后的一些规划文件表明,制定规划的人对于石油的重要性有着清楚的认识。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位设计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曾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外再设立第三个机构,来管理石油和其他基本原材料的贸易。⁷ 他们对战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提议就包括了建立石油、橡胶、糖等商品的储备计划,以防止这些商品出现短缺、过剩和价格波动。通过将货币流通与石油等关键商品的贸易相挂钩来减少金融投机,这样做的必

112

6 具体例证参 Cornelius J. Dwyer, 'Trade and Currency Barri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Oil Trade', Walter J. Levy Papers, Box 22, Folder 4, Laramie, Wyoming: American Heritage Center, University of Wyoming, 1949. 德怀尔(Dwyer)曾是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国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的政府机构)石油司的助理主管。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标准历史叙事中忽略石油的例子,参 Barry Eichengreen, 'The British Economy Between the Wars', in Rodrick Floud and Paul John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nd ed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 in 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7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曾主张建立一家“国际基本原材料开发公司”,设想的职能是“增加世界必需原材料的供应,并保证成员国以合理价格获得充足的供应”。Harry Dexter White, 'Uni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Fund and a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 preliminary draft, March 1942, Chapter III: 30. Harry Dexter White Papers, 1920–1955, Box 6, Folder 6, Public Policy Papers, Princeton: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要性，就连凯恩斯的反对者——尤其是刚刚兴起的、反对政府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自由主义运动——都认同。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借鉴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建立“一个现代常平仓”（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的提议，主张建立一种“国际商品本位制”来取代金本位制，在这种本位制下，通货的发行应当与“由若干种可储存的原材料商品的仓单（warehouse warrants）组成的固定比例组合”挂钩。⁸在关于防止货币遭到投机性破坏的辩论中，正反双方都认为，战后的金融稳定，以及它所关系到的民主的未来，都依赖于对关键商品的储存和交易进行管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石油这一种商品的流动，在日益成为稳定——或威胁——民主秩序的机制。

我们可以在一系列建立战后新安排的会议中看到对石油的重视。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战后金融体制，同年秋天同盟国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举行的会议则制定了接替国际联盟的新机构的安排。而在这两次会议之间，其实还有第三场会议：英美两国的代表于8月初在华盛顿会面，共同商定战后的石油秩序。会议最终确定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名为国际石油理事会（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uncil）的常设机构。正如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限制国际银行的投机交易所导致的混乱一样，在石油行业中设立类似的组织，是为了限制国际石油公司所造成的麻烦——并且也为了先发制人地防止各石油生产国，尤其是中东国

8 F. A. Hayek, 'A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 *Economic Journal* 53: 210/211, 1943: 176-184; Benjamin Graham, *Storage and Stability: 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37.

家，自己来控制石油。与国际联盟设立委任统治制度以便阻挠阿拉伯世界争取政治独立的要求相呼应的是，国际石油理事会被设想成某种形式“托管”(trusteeship)，以便英美控制中东的石油。

大国的托管

主要石油公司很配合建立国际石油机构的计划，因为它可以替代凯恩斯所提出的对更广泛的商品建立国际控制的计划——凯恩斯的计划将在1945年4月联合国的筹备会议上讨论。壳牌美国子公司的负责人警告称，如果大型石油公司不支持建立国际石油理事会的话，就会面临被一份“将在旧金山会议上达成的、覆盖所有类型商品和所有国家的主协定”所约束的风险。而专门的石油协议，他说，“其中有些东西是我们介入制定的”。⁹ 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在推动建立一个新的管理中东石油的体制：美国的跨国石油公司在它们的主要海外势力范围——拉丁美洲——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当时，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就美国石油储备的枯竭和军事领域对石油新产生的需求发表了一些引人恐慌的耸动言论，这帮助他们获得了华盛顿对开发中东石油生产的补贴。但是，这些公司面临的真正问题位于美国以南地区。

就在“二战”爆发前夕，美国在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利益遭到了美国国务院石油顾问所形容的“粗暴的剥夺”，而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要么石油生产转向国家垄断，要么当地政府制定了更严苛的

9 Minutes of National Oil Policy Committee, 18–19 April 1945, cited in Stephen J. Randall, *United States Foreign Oil Policy, 1919–1948: For Profits and Security*,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6.

114 特许权条款，美国公司在拉丁美洲要获得巨额利润就因而变得更加困难。¹⁰ 战争结束后，利润的获得将必须越来越依赖中东，虽然那里大量尚未开发的石油资源仍然对这些公司构成威胁，但当地要求石油资源收归国家控制的压力，似乎要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应对。美国的石油公司在战间期已经取得了那里的石油特许权，但几乎没有怎么推动石油生产的发展。随着战争期间对中东石油需求量的下降，这些公司更是缩减了在当地本就不大的运营规模。1945年，中东只生产了世界7.5%的石油，其中三分之二产自英国控制的伊朗油田。¹¹

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地区建立石油产业时，不得不与主权国家打交道。这些国家已经独立了超过一个世纪，也越来越有能力在谈判中争取到更加公平的石油协议。但在中东，主权国家仍在从旧的地方和帝国统治模式中逐渐形成。于是，石油公司就可以把自己在中东的角色，描绘成在帮助那些偏远落后的民族“发展”，并以此向他们强加更不公平的安排。

美国国务院希望避免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东重蹈覆辙，给自己制造曾在拉丁美洲造成的那些问题。一个与英国达成一致的框架，将会给这些公司的石油业务经营活动，披上“托管”——“委任”这个旧理念的新术语——的外衣。如果有一份国际石油协议，英美就能把自己对中东油田的控制，说成一种使每个对石油有需求的国家都能获得石油的手段，并把这种“公平”的管理当作对石油进行国际管理的

10 Herbert Feis, 'The Anglo-American Oil Agreement', *Yale Law Journal* 55: 5, 1946: 1174–1175; Michael B. Stoff, 'The Anglo-American Oil Agreement and the Wartime Search for Foreign Oil Polic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5: 1, Spring 1981: 59–74.

11 DeGolyer & MacNoughton, *Twentieth Century Petroleum Statistics*.

原则——一种剥夺了石油生产国对本国石油控制权的原则。美国战略服务处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公平分配和开采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优先于石油生产国的主权权利，并且还预设了大国要对世界石油资源进行的某种形式的托管”。¹²

华盛顿最初打算让一个政府机构来充当受托人。1943年，美国战时石油管理署（US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for War）成立了由政府控制的石油公司——石油储备公司（Petroleum Reserves Corporation），希望由它接管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备。它计划取得拥有沙特石油特许权的美国合资企业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的多数股权。华盛顿还将沙特划入了战时《租借法案》的援助范围（减轻了美国石油公司需要在经济上支持伊本·沙特统治的负担），并计划建造一条由美国政府拥有的石油管道，以便将石油从沙特的油田输送到地中海。通过控制沙特石油，国务院希望能比石油公司更有效地防止石油被国有化——而防止石油被国有化的部分手段，就在于向中东地区的统治家族施以财政援助，让他们用于“发展”。¹³ “一战”后，英国政府曾将它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视为一种“发展”该国物质资源的方案，从而创建一种新形式的保护国，并鼓励石油公司向该地区投资来维持帝国权力的稳定。华盛顿的托管计划，就是一个新版本的帝国式发展。

拥有沙特石油特许权的两家美国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后更名为雪佛龙）和德士古（现已与雪佛龙合并）——阻止了美国

115

12 OSS,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Comments on a Foreign Petroleum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引自 Randall, *United States Foreign Oil Policy*: 147。

13 Robert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62-125.

政府试图接管沙特石油的行动。为了营造一种美国官方和这个阿拉伯国家正式合作的印象，两家公司把它们的合资企业名称从“加利福尼亚-阿拉伯”（California-Arabian）改成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缩写为“阿美”（Aramco）]。它们没有允许美国政府注资阿美，而是通过安排新泽西标准石油和纽约标准石油（现在的埃克森美孚）购入阿美 40% 的股份，筹集了公司在战后扩张所需的资金。它们也挡下了前述的管道计划，随后却又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它们自己来建造这条管道（见 174—175 页示意图）。

与之类似的美国“托管”计划此时也正在“二战”期间曾被英苏共同占领的伊朗展开。1943 年底，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面，就创建联合国的初步计划达成了一致。在这场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还采纳了国务院将美国在战后伊朗的角色设定为某种国际受托人的想法。他把已经在伊朗开展工作的五十位美国行政顾问的团队，形容为正在“展示这个设想中的新‘托管’制度的可行性与某种形式”的一场“临床讲解”（clinic）。¹⁴ 与“一战”后对伊拉克实施的委任统治类似，托管伊朗的想法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手段来挑战英国对石油的控制，同时推动美国石油公司来采取措施促进伊朗更广泛的“发展”。美国国务院敦促标准石油和另一家美国公司竞标伊朗的石油特许权，可是，当美国的石油地质学家没能在伊朗东南部发现有潜力的石油储藏，而开始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北部进行勘探时，莫斯科做出了反应，提出了它自己对北部石油特许权的主张。

14 Arthur Millspaugh, *Americans in Pers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46: 8, 引自 Simon Davis, “A Projected New Trusteeship”?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an, 1938–1947’, *Diplomacy & Statecraft* 17: 1, 2006: 31–72。

为何中东石油应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原因有时很难说得清楚。曾在 1943 年担任对外石油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Oil Policy）主席的美国国务院前经济顾问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试图向公众解释国际石油协议的必要性。“缺乏石油的国家不得不为了获得它而讨价还价，或用其他商品来交换；这样的国家会变得依赖他国的意愿和慷慨，”他这样写道，并且加上了一句几乎掩饰不住的讽刺：“美国显然对这种想法并不习惯。”¹⁵一位如此高级别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在离任政府职位之后也许会乐于指出：对于石油公司来说，市场交换的原则——为了获得某物而讨价还价，并且依赖这种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是它们并不习惯的想法。接下来的冷战，很快就为石油公司提供了一个方法，来转移对它们的这种讽刺。

在建立一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驾齐驱的石油机构的目标上，美国国务院的雄心，根据该院一份备忘录中的说法，是要创建一个“对世界石油资源实施实际行政控制的全球体系”。¹⁶1944 年，英美两国制定了旨在为战后的石油秩序提供框架的《英美石油协定》（Anglo-American Petroleum Agreement），《协定》呼吁“高效且有序地发展国际石油贸易”，并表示，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达成“国际共识”——显然是对拉美国家采取单边行动来控制本国石油的替代方案。《协定》的第一条就列出了用于挫败石油生产国控制本国石油的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新方案：石油应当“在竞争性和非歧视性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在适用的法律和特许权合同的框架内”，通过国际贸易供应给所有国家；因此，“生产国的利益应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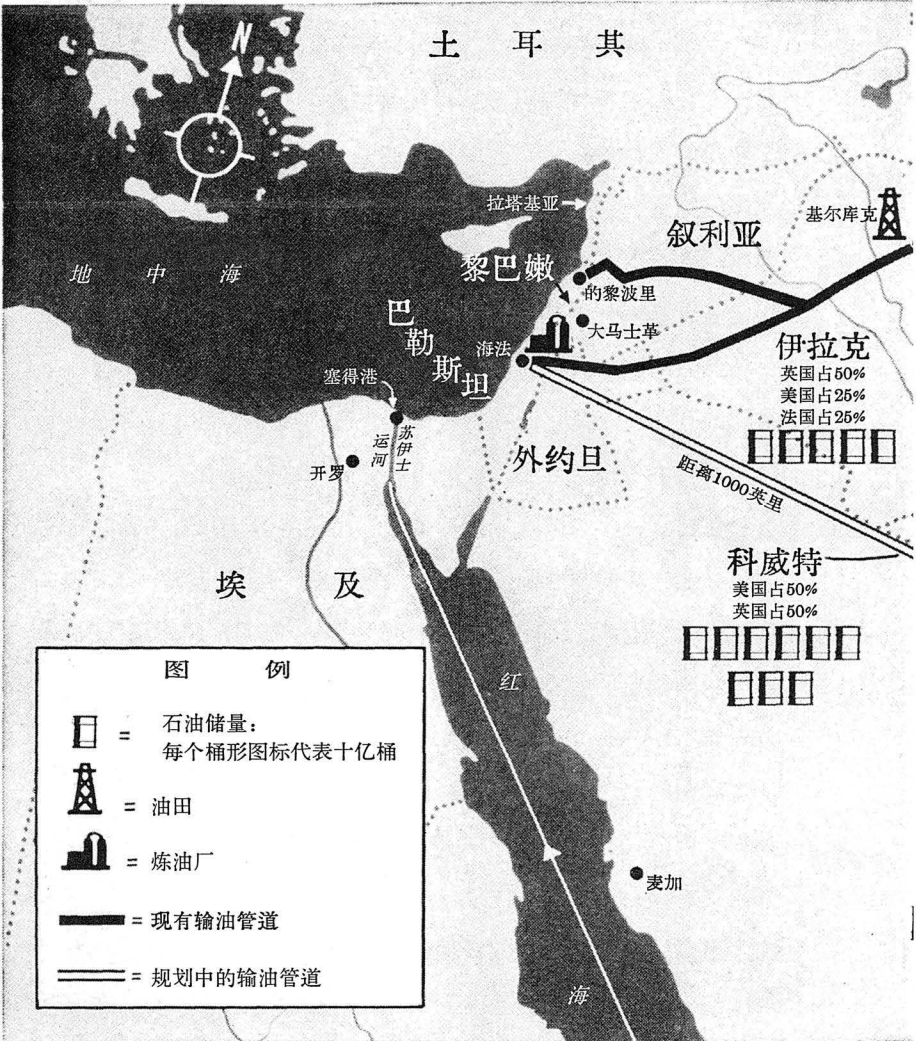
118

15 Feis, 'Anglo-American Oil Agreement': 1174.

16 Randall, *United States Foreign Oil Policy*: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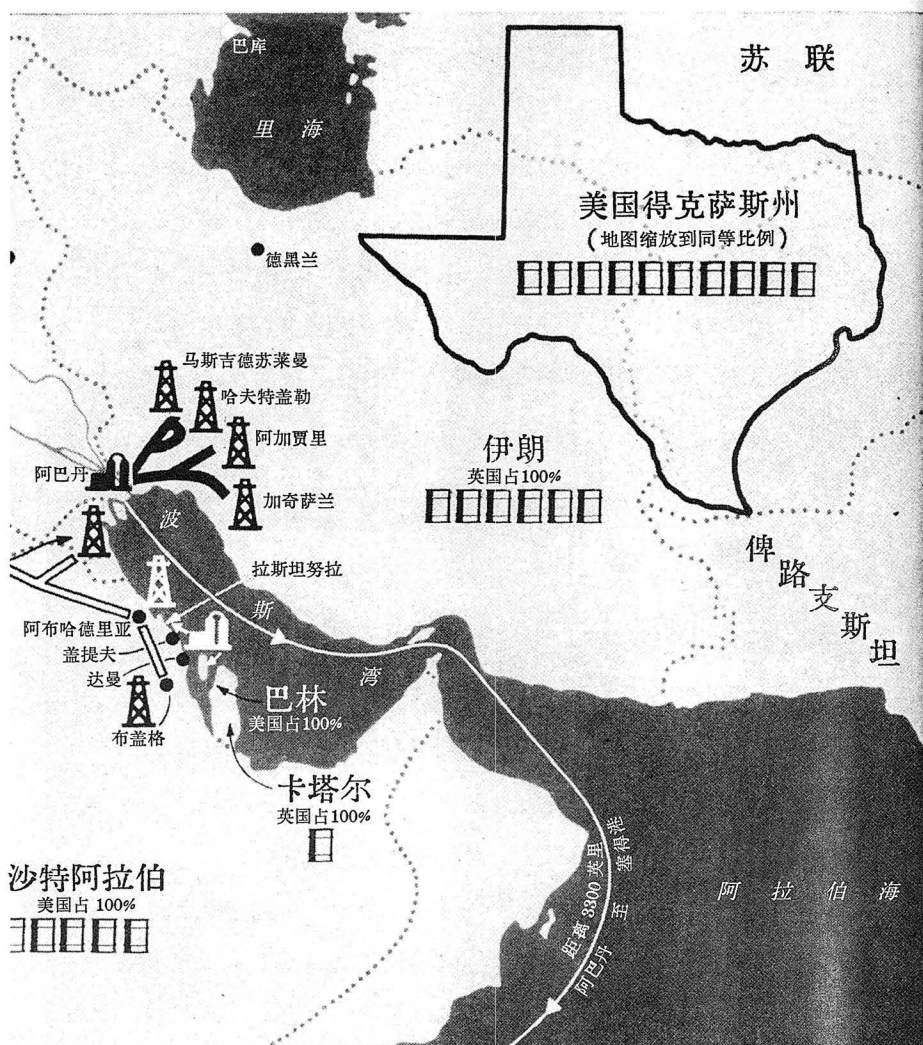
中东石油 续图

116



中东石油可被证实的储量，根据估算，已经超过了260亿桶，而相比之下，美国全国的石油储量是200亿桶。按照当前的消耗速率来计算，中东石油还足以再支撑15年的使用。英国垄断了伊朗所有正在生产的油田。俄国希望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而荷兰则拥有伊朗西北部一大片未勘探地区的石油特许权。英国控制着伊拉克的石油（详细信息见杂志下一页），但是，美

图片来源：“中东石油：麻烦随着大国竞逐石油所提供的权力而爆发”，《生活》(Life)，1945年6月11日。



国、法国和荷兰在该国亦有利益。美国运营着巴林的石油生产 (详细信息见杂志第 32—33 页), 并掌控了在沙特阿拉伯的主导地位 (详细信息见杂志第 34—37 页), 还与英国人共享新发现的科威特油田。本图仅标示已勘探及作业中的油田 (但鉴于卡塔尔与科威特油田的重要性, 两国未投入生产的油田亦于图中标出)。美国正在规划的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道, 比水路距离短得多。

118 在促进其经济进步的目标下得到保护”。换句话说，大型石油公司将在现有特许权协议体系的基础上，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来管理石油的开采，同时通过为石油生产国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方式，来补偿这些国家。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些目标，《协定》提议建立一个名为国际石油委员会（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mission）的机构，负责收集统计数据并发布报告。国务院前经济顾问菲斯认为，这份协定不过是在提议“建立一间总在开会的会议厅，由一组专家出席，再配备一台印刷机”而已。¹⁷他说得很对，但他没有注意到，召开多边会议和复印无休无止的统计报告，都有助于促成石油的“国际化”，从而反击石油生产国可能提出的任何将石油视为国有资源的主张。

长远计划的失败

这份国际石油协定从未得到实施。英美两国对石油控制的竞争也没有得到解决。在大型石油公司的施压下，这份《协定》遭到了修改和弱化，而美国国内的石油公司也阻止了参议院批准这份《协定》。与此同时，对伊朗和沙特石油的托管计划被搁置，因为美国找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进而确保美元的流通。

119 在和美国的石油谈判中，英国有一个主要目标：以某种能够重建英镑价值、使其成为与美元比肩的第二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方式，来组织石油的生产与流动。英国希望达成的协定，要能够允许自己所控制的市场（也就是所谓的英镑区，包括英帝国版图内的大部分国家，再

17 Feis, 'Anglo-American Oil Agreement', 1187.

加上伊拉克、科威特和其他波斯湾地区的领土）排除美国石油的进口。它还希望通过增加战后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来提振英镑的价值。同时，像往常的情况一样，可供开采的石油量要多于实际能够生产的量，因为增加石油产量就会降低油价，从而减少石油公司的大量收入，而英镑的价值越来越依赖油企的这些收入，于是，英国还试图限制“二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任何扩张生产的举措。

英国捍卫英镑成为一种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国际货币的努力，其实是一场争夺油田的斗争。美国几家石油公司为了将沙特石油输往欧洲而合资设立的非营利企业跨阿拉伯输油管道公司，其负责人在决定管道路线的走向时，最初计划把管道终点设在巴勒斯坦。英国在战前曾承诺将在1949年之前给予巴勒斯坦独立，然而，联合国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阿拉伯国，一个犹太国，并在耶路撒冷市建立特别国际政权），但并没有提供划分各部分领土的方案或把犹太国境内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的办法，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以通过武力夺取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领土，因此石油公司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它们也曾短暂考虑过一条以埃及西奈半岛北海岸为终点的南向管道路线。但是，埃及当时仍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这会让各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的那堆麻烦问题之外，还要面对一个新问题：埃及是英镑区国家。事实上，埃及和伊拉克是英镑区这个交易机制中，仅有的两个非英联邦成员。¹⁸ 而美国的石油公司建设这条输油管道的目的之一，

18 对于这个货币机制的解释，参 Elliot Zupnick, 'The Sterling Area's Central Pooling System Re-Examin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1, February 1955: 71-84. 埃及同意于1947年7月脱离英镑区，希望将其于“二战”期间在伦敦积累的英镑余额兑换成美元。然而不久之后，英国违反协议的条款，中止了埃及英镑余额的兑换可能。Frederick Leith-Ros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Egy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28: 1, 1952: 29-37.

就是要削弱英镑区的地位。为了协助实现这个金融上的规划，它们最终将输油管道向北改道，过境叙利亚和黎巴嫩。与此同时，英国也建立了一条与美国管道相对抗的输油管道，以增加从伊拉克到地中海的英镑石油流量。但美国建造的管道口径是 30 英寸，而英国建造的管道口径仅有其一半（输油量不到美国管道的 1/3），而“管道口径被限制在 16 英寸，是由于英镑区的制造商没有能力生产更宽的管道，以及没有办法获得美元”。¹⁹ 围绕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斗争，此时正在管道路线和管道口径的竞争上展开。

120 由于石油在英国国际贸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以至于一份 1955 年发布的关于英国贸易账目要如何处理石油的报告认为，“石油产业（包括其油轮业务）的国际影响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复杂，我们几乎可以说，石油本身就是一种货币”。²⁰ 欧洲和其他地区不得不积累和持有美元，然后再将它们支付给美国来购买石油。而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慢慢侵蚀了美元的价值，因此，当这些国家购买石油时，它们使用的美元的价值，要低于当初获得这些美元时的价值。这种能让华盛顿向世界所有其他国家课税的所谓“铸币税”（seigniorage）特权，让美国得以维持经济繁荣，并进而维持其民主制度的受欢迎程度。

1945 年 2 月，罗斯福总统在参加完举办于雅尔塔的美英苏三巨头第二次会议的归国途中经停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国家的君主举行了会晤。其中，罗斯福与伊本·沙特的会晤被

19 Stephen Longrigg, *Oil in the Middle East: Its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3rd ed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79–80.

20 Steven Gary Galpern, *Money, Oil, and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Sterling and Postwar Imperialism, 1944–197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

认为标志着美国和沙特确立起了一种关乎中东石油的特殊关系。但这并不是美国战略服务处（中情局前身）的特工、协助安排了此次会晤并在其后继续以阿美公司政治代理人的身份作为掩护为中情局工作的威廉·埃迪（William Eddy）的看法。在这次会晤过了六个月之后，另一位在该地区工作的美国特工同事向埃迪哀叹道，尽管“我们在华盛顿都像狗一样为此拼命工作”，但他们对于制定“一个针对沙特阿拉伯的长远计划”的希望还是破灭了——这指的是他们没能争取到美国对沙特的大规模支持。²¹ 美国取消了在“二战”期间根据《租借法案》对沙特和伊朗提供的援助，也对沙特要求美国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巴勒斯坦建成犹太国家的计划不予理睬，还搁置了在战争期间制订的托管伊朗和沙特并开展大规模发展项目的计划。²²

后来，杜鲁门总统还拒绝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扩展到中东，转而提出“第四点”（Point IV）计划作为替代。杜鲁门解释称，美国无法与世界上“还未得到发展的地区”分享资本或物质财富，因为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作为安慰，华盛顿将会向这些地区提供一些理念。美国政府将会鼓励美国企业来分享它们“不可估量的技术知识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在不断增长的”，而且与物质的财富相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技术知识可以使各个国家能够利用它们现有的物质资源，来生产更多的食物、衣服和机械动力。²³ “发展”的理

121

21 'Letter to Eddy from Paul H. Alling,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angier, Morocco, August 9, 1945', William A. Eddy Papers, Box 8, Folder 6,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2 见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79–86; Simon Davis, "Projected New Trusteeship".

23 Harry S. Truman, 'Inaugural Address', 20 January 1949, available at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ww.presidency.ucsb.edu. 琳达·威尔斯·卡玛克迈 (Linda Wills Qaimmaqami) (转下页)

念将会在美国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发挥次要但关键的作用，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将是去管理世界上少数人的极度富裕和绝大多数人的有限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而非提供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些差距。

与此同时，管理与非西方国家（包括中东石油国家）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正在形成。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开始计划将武装部队迅速从欧洲调往太平洋战区，并希望就军机在中东的起降权和加油设施做出安排。这一关切，而非缔结两国基于石油的新关系，其实才是罗斯福与伊本·沙特会晤的主要原因。在无法从华盛顿获得进一步大规模财政支持的情况下，阿美和伊本·沙特选择在宰赫兰（Dhahran）建设一个机场，作为美国的空军基地。等到这一空军基地的建设资金被批准时，美国已经结束了在太平洋的战争，因此，美国战争部认为，这个机场“能否在军事上派上用场是存疑的”。然而，阿美意识到，利用人们对于军事脆弱性的恐惧，可以作为确保从华盛顿持续获得补贴的方法。²⁴ 在大规模发展计划被放弃之后，石油公司此时可以开始重新诠释它们的利益——不再把它说成是对世界石油的“托管”，而换用了一种相似的表述，把它称作保障“战略”关切的必要之举。

要建立一个将美国的石油利益安置于其中的战略框架，并以此组织战后的国际金融，一个更大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二战”结束时，由于美国在苏联边境附近勘探石油，美苏两国在伊朗石油特许权的问题上再次出现了争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围绕伊朗石油的争端被

（接上页）认为，杜鲁门提出的以商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加速了伊朗石油的国有化进程：
‘The Catalyst of Nationalization: Max Thornburg and the Failure of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alism in Iran, 1947–51’, *Diplomatic History* 19: 1, 1995: 1–31.

24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82.

美国扩大成了一场国际危机。美国官员由此得到了一个机会，将伊朗变成一种临床试验场（clinic）——利用这个地方，美国可以培育出一种新的语境，以此支持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政策，并推动美国的权力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扩张。1946年2月，在伊朗石油特许权危机达到白热化的时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从莫斯科发出了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通过自己的“心理分析”，凯南在这封电报中指出，苏联的行为不是基于它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而是出于它偏执地追求绝对权力，进而想要填满“世界权力盆地中每个可以抵达的角落和缝隙”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为了对抗这种威胁，凯南提出，民主国家必须在实际上变得不那么民主，必须更像那些被认为对民主构成威胁的国家一样行事。这种无处不在的威胁，无法通过“代表民主社会中公众舆论一时想法的偶发行动”来有效对抗，而只能依靠比偏执的苏联“目标更坚定，执行方式更多变、更有谋略”的政策。这种威胁要求我们，要“在一系列不断变动的地缘和政治的关键节点上，灵活而戒慎地施加反制力”。民主政治的虚弱无常将让位于一种全方位的帝国警戒。而在美国国内，民主的软弱也将依靠采取果决的措施“解决我们自己社会内部的问题，提振我们自己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团结精神”来加以对抗。²⁵

122

对于这项把美苏竞争转化为一场全球性的政治、文化和心理战争的计划持反对立场的人士，将这个计划称作“冷战”——这个名词是

25 George Kennan, '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2 February 194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6: 696-709, 及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4, 1947: 566-582, at 575, 576 (凯南以化名“X”修订并刊出了本文)。

新自由主义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篇文章中借用的。奥威尔在那篇文章中警告人们，在持久战争的状况下，国家将走向寡头和技术官僚统治。²⁶ 反对人士最终失败了，冷战被构建起来了，而在战后去殖民化和主张民族独立变得愈发困难的背景下，企业追求控制海外资源的普遍野心，就可以通过援引及阐述冷战这个全球“语境”来解释。在中东，无论是像委任和托管这样的手段，还是宏伟的发展计划，都不再必要了。美国官员和石油公司高管搬出中东地区在持久战争状况下的“战略重要性”，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石油公司需要控制该地区的石油生产，而不用再举企业利润或限制中东石油供应的需要作为理由。随后，学界的分析便可以重复这种战略必要性的话语，帮助将冷战构建为一种长期的手段，用于管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用于通过控制石油来组织金融的流动，并用于对抗民主在国内对社会纪律和团结精神构成的威胁。这种谈论石油的方式甚至到今天都还在被人们使用着。

在第一章的最后，我讨论了马歇尔计划和冷战在欧洲的构建。煤炭的生产网络曾使各种形式的民主能动性得以装配，进而使各种争取政治正义的新诉求得以推进；而接下来的马歇尔计划，却通过让欧洲变得越来越依赖石油和美元，推动在西欧建立起了一个在这些民主诉求面前不再那么脆弱的政治和金融体制。这种体制建立在对中东石油的开发和控制，以及用美元来交易中东石油的基础之上。于是，民主抗争和脆弱性交锋的场所就被转移到了中东。在英美两国原本的设想

26 George Orwell, 'You and the Atomic Bomb' (1945), in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eds,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1947.

中,《英美石油协定》是建立一个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并驾齐驱的国际石油委员会的基础,它试图通过为英美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提供一个各国集体参与的国际框架,来推广它们对民主政治的这种规划。就在美国试图挑战英国在中东石油中的主导地位,并巩固美元-石油机制时,1945—1946年间的伊朗危机出现了,这场危机帮助推广了替代《协定》的另一种治理框架,用于统摄对石油的控制和对民主的管理:冷战。

战后的西方民主似乎依赖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机制,一个借助油井、管道、油轮作业以及对石油工人日益困难的控制,而被装配起来的秩序。全球能源供应和全球货币流通这两大相互关联交叉的网络以石油的流动为基础,这一事实导致了一种断裂的产生,而这种断裂会在1960年代末变得愈发明显,最终引发了1967—1974年的能源危机、美元危机和中东危机。下一章将讨论这些相互交织的危机。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探讨战后碳民主的第二个维度,一个同样与石油相关,并且会在1967—1974年危机中发生转变的维度——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经济”的政治。

碳经济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主导创设了将货币价值与石油流动挂钩的战后装置,而他也协助规划及阐述了20世纪中期的另一项创新:一种计算与治理的现代装置——它逐渐被称作“经济”。石油与20世纪中期的民主政治之间的另外一组联系,关乎经济(学)专家知识的作用。与20世纪的民主一样,20世纪的经济(学)专家知识,是在与这个碳氢化合物时代的一种特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凯恩斯对于制造这一对象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设计了新的方法，来描述与管理国内的货币流通。在他 1936 年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有一段令人难忘的论述，他通过想象在废弃煤矿中埋藏钞票的场景，解释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市场机制，与现代社会中由政府来组织货币流通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

如果财政部用钞票把一堆旧瓶子塞满，再把这些塞满钞票的瓶子填埋到已经废弃煤矿中适当的深度，并用城市垃圾把煤矿填到和地面齐平，然后再根据经过充分检验的自由放任原则，让私营企业去把这些钞票挖掘出来……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失业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在这样做所造成的持续影响的助推之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及其资本财富很可能将比现在多很多。²⁷

124

英国的煤炭产量在 1913 年达到了峰值。二十年后，等到凯恩斯开始撰写《通论》一书时，英国的各大煤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消耗殆尽。在 1870 年代开创了凯恩斯之前的英国经济思想革命——对个人效用进行数学计算——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曾出版过一本著作，在那本书中，杰文斯向人们警告了煤炭储藏即将彻底耗竭的问题。在出版《通论》时，凯恩斯正在阅读杰文斯的那本著作，而且他还在 1936 年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做了一场

27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129.

关于杰文斯的讲座。²⁸ 凯恩斯不再像杰文斯那样把煤炭储藏的耗竭视为一场危机，这体现了经济思想所发生的一种转变，而凯恩斯在这个转变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此时，人们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用对货币储备的管理，来取代对煤炭储备的管理。在这个由凯恩斯的思想参与定义的时代，碳能源的供应已经不再是经济可能性的实际限制了。真正重要的，是钞票（货币）的得当流通。

1930年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新的经济（学）专家知识的应用而塑造成形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知识得到了发展和运用；这种知识扩张到了不同的政策和公共辩论的领域，包括对殖民地的治理；这种知识的技术性（technical）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议题被主张应当交由经济领域的规划和知识，而非民主的公共辩论来决定。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对经济知识的阐述和发展，是对平民（民粹）主义政治的威胁，尤其是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平民主义政治，以及在那一时期涌现的、十年后又卷土重来的劳工战斗行动做出的回应。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来为民主的实践设定种种限制，并维持这些限制。

专家知识的运用，要求并且鼓励我们创造能够被这些知识所掌控的社会-技术性的世界。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必须被创造的世界，是

28 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London: Macmillan, 1865. 杰文斯的儿子 H. 斯坦利·杰文斯（H. Stanley Jevons）在《英国的煤炭贸易》（*The British Coal Trade*, London: E. P. Dutton, 1915）一书中再次讨论了英国的煤炭耗竭问题。他修改了其父对英国煤炭耗竭的可能日期的估算，从一百年修改为“不到两百年”。John Maynard Keynes,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A Centenary Allocation on his Life and Work as Economist and Statisticia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99: 3, 1936: 516–555. 凯恩斯的演讲发表于1936年4月21日，他对杰文斯书的引用在第517页。

一个“经济”的世界。而对于这个被称作“经济”的对象，在1930年代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或政策规划者曾提及或知晓其存在。当然，经济这个词在1930年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它在当时指的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事物。它意味着对人和资源的治理或得当管理，如同它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个短语中所体现的意思。²⁹ 经济将会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对象——这个过程与“发展”在西方以外的出现是相随相伴的。对“经济”这个对象的管理变成了政府的核心任务，而且需要运用专门的知识。

文明是动力的经济

即使到今天，大多数对于经济学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思考，仍然反映了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卡尔·波兰尼的影响。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学者认为，“经济”作为一个与社会其他部分相互分离的独立制度领域于19世纪开始出现。而在这个分离发生的时刻之前，“经济”是被吸收或被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当中的。因此，波兰尼认为，古典的李嘉图经济学的形式化规则，仅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市场交换不再是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一个次要的层面，而变成了一个看似自我调节的体系，并且其他社会领域都从属于它的时期。此外，他还认为，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实现市场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分离，特别是通过制定一系列方式，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视为仅仅只是商

29 这一节和本章其他几节取材于 Timothy Mitchell,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eorge Steinmetz, ed.,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6–141。

品——这一系列虚构都是“经济”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制度领域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³⁰尤其是将货币作为一种投机者可以交易的商品来对待的做法，在波兰尼看来，导致了日后欧洲民主体制的崩溃。

这种认为“经济”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成为智性知识与治理实践的一个独立对象的普遍认识，忽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位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提到过某种被称作“经济”的对象。我们如今理所当然地把“经济”理解为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关系所形成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或总体，而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概念，是在一个多世纪后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才出现的。在学术写作和大众话语中，“经济”的这种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开始被普遍使用。

从17世纪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研究，到18世纪晚期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一个经济体内部的生产结构或交换结构。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斯密一次都没有提及这样的结构或总体。当他使用经济这个术语时，这个词传达的是它旧有的含义，也就是节俭或对资源的审慎使用：“资本已经通过私人的节俭和良好行为默默地逐渐累积起来……王公大臣假装要监督私人的经济……实在是最粗暴、最专横的作为。”³¹ 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商品的得当

126

30 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中，波兰尼把19世纪“社会”的出现，描述为一种试图限制市场关系展开来的规管和控制体系。而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把这个体系描述为“经济”的出现。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Glencoe: Free Press, 1957.

3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Methuen, 1950 [1776]: 327–328.

节用与流通，以及主权者在管理这种流通中所扮演的得当角色。一个历史更久的讨论大家户或庄园的经济或管理的书写传统，被扩展到了讨论国家的管理上，而国家在此被想象成主权者的家户。经济这个术语逐渐开始指代这种对社群事务的审慎管理或治理。³² 而政治经济学，则指的是一个政治体的经济或治理，而不是一个经济体的政治。

随着各国从 18 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向 19 世纪日益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活，“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指的仍然是一个政治体的管理或治理，尽管各位论者此时正在辩论是否需要新形式的治理。德裔美国记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6）有时被认为是一本对 20 世纪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做出研究的超前作品。李斯特普及了美国学者在政府政策对鼓励和保障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上所做的论述，并对比区分了“国家的财政经济”，即“政府物质资产的积累、使用和管理”，与“人民的经济”，即“支配着公民经济状况的那些制度、规章、法律 and 情势”。经济这个词在这里表示的就是各种形式的行政、规管、法律和社会情势，它们定义了那些被我们称作治理的过程。³³

凯恩斯曾阅读的那本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讨论煤炭问题的著作，是杰文斯在 1865 年出版的，该书展示了在 20 世纪的“经济”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前经济一词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与煤炭和蒸汽动力的增

127

32 Keith Tribe,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80–109;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3 Friedrich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and Tübingen: J. G. Cotta'scher Verlag, 1841. English translation,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 G. A. Matil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56: 281.

长之间的关系。杰文斯认为，经济，也就是对资源的审慎管理，尤其适用于使工业文明得以实现的那些资源。他对比了自然界中能量和物质的大量耗散，与人类对极少部分动力的经济使用，而这种对动力的经济使用就构成了文明的基础。“物质性的自然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与物质的持续浪费，”杰文斯写道，“我们在最强劲的发动机中使用的动力，也不过是从无边无际的自然力量中抽取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尽管太阳每年洒在我们身上的热能，大约是我们每年开采的所有煤炭所含热能的一千倍之多，但就是这千分之一的部分，如果处在完美掌控之下，足以支撑我们所有的经济与进步”。他引用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eibig）的观点，把对化石燃料所含动力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描述为文明事业的基础。“文明，就像李比希男爵曾说过的那样，是动力的经济（the economy of power），而我们的动力就是煤炭。正是对煤炭使用所采取的这种经济管理，造就了我们如今的工业；我们越高效经济地使用煤炭，我们的工业就越繁荣，我们的文明事业就会越壮大。”³⁴

煤炭时代的计算

19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展现了一个煤矿和蒸汽机的世界。但矿山和发动机不仅充当着展现的对象，它们还帮助形成了一个计算、流通和控制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的教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此，金本位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国的海外帝国不断扩张、为殖民战争

34 Jevons, *Coal Question*: 122, 125; 强调为原文所加。

提供资金的国家债务也随之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英国需要一种新的货币体系，让货币能在数量上大幅增加，并能跨越遥远的距离流通，同时还能保持价值的稳定。解决方案就是推出通证货币（token money，又译“代用货币”）：这种硬币的价值不在于铸造它的金属本身——金属材料的实际价值要略低于硬币所代表的价值——而在于发行这些硬币的政府所持有的黄金储备。通证货币的铸造成本必须高到可以防止伪造，又要使发行者能够负担大规模的铸造。以燃烧煤炭产生的蒸汽驱动的轧钢机和压印机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1816—1817年间的货币大重铸（Great Recoinage）使银币开始作为通证货币使用，伦敦皇家铸币厂的八台压印机在此期间的每日铸币量可多达25万枚。³⁵蒸汽驱动的货币铸造使英国得以逐步实施金本位制（其他欧洲国家要到1870年后才开始跟进），造就了英国金融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它也促进了人们发展出新的方式来认识货币和财富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铸造和流通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包括铸币的不精准和硬币在使用过程中的重量磨损等。这些问题曾多次受到调查，调查者包括一个1849年成立的皇家委员会，以及杰文斯——他组织了一项开创性的统计研究，对银行所持货币的币龄和重量进行了调查，并据此计算出了平均磨损率。³⁶也就是说，一个以煤炭为动力的工业铸币体系打造出了各种形式的流通、存储、核算和调查，而政治经济学这门经验科学就是在多个像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得以诞生的。

35 Great Britain, Committee on the Royal Mint,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Royal Mint, London: HMSO, 1849: 74; Angela Redish, 'The Evolution of the Gold Standard in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4: 789–805.

36 参 Sandra J. Peart, "Facts Carefully Marshalled"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William Stanley Jevon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3, 2001, annual supplement: 252–276。

其他形式的蒸汽动力机制 / 器也创造出了其他形式的流通、计算和控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 1820 年代旅居美国期间，曾短暂参与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开采业，并加入了一个建造输煤铁路的企业。返回德国后，李斯特开始大力倡导扩大铁路的使用范围：不仅将它用作连接两点的线路，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商业和交通的网络，而这个网络可以营造出一个交易和交流的共同空间。他在 1836 年写道：“工业和交通的需求将驱使欧陆大国的铁路系统组成网状结构，集中连接各国内部的主要节点，并从中心向边境地区辐射。”³⁷

煤炭生产本身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计算和辩论的空间。为了吸引公众关注统计方法的使用，杰文斯将他对煤炭供应耗竭速率的研究整理成著作，展示他所参与发展的用于分析统计信息表格的新工具，如何能被应用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³⁸ 他希望表明，统计学可以用来测量某种自然法则——社会增长的法则（Law of Social Growth）。他采用地质学家爱德华·赫尔（Edward Hull）发布的英国剩余煤炭供应量的估算数据和矿业档案局（Mining Record Office）的统计数据来估算英国煤炭消耗量的年均增长率。赫尔曾估计，以当前每年消耗 7200 万吨煤的速率计算，英国可供开采的煤炭足够维持超过一千年的供应。虽然赫尔承认，煤炭的消耗量在过去二十年中翻了一番，并且如果继续以这个速度增长下去，煤炭供应将在仅仅 172 年内耗尽，但他认为，来自美国的煤炭供应，以及在“获取与使用矿产”方面“更

37 List, 'Deutschlands Eisenbahnsystem in militärischen Beziehung' (1836), cited in Keith Tribe, *Strategies of Economic Order: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95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 英文译文更改了李斯特德语原文中“netzartig”（网状的）一词的译法。

38 Peart, “Facts Carefully Marshalled”; Margaret Schabas, ‘The “Worldly Philosophy” of William Stanley Jevons’, *Victorian Studies* 28: 1, 1984.

经济”的措施，将会延长英国享有煤炭供应的时间，而且，人们不应假设“造物主创造的宇宙有任何一部分会被如此缺乏远见的计划所调控，以至于会因为维持其经济的要素失效而陷入无序之中”。³⁹

杰文斯打算消除地质学家们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谬论”。他认为，要理解和测量增长的进度，关键不在于某种商品产量增加的绝对数量，因为这个数值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信息，而在于增长率——相比于上一阶段增长量的相对增长。如果某个国家某一年的煤炭产量增加了一百万吨，但这个增长量还是小于上一年的增长量，那么，即使总产量增加了，产量的增长率反而下降了。“在统计的问题上”，杰文斯解释道，人们必须养成将所有的数量或数值以“相对于彼此”的角度来审视的习惯。煤炭消耗的增长率表明，煤炭消耗量的增长不是每年固定的，而是一个几何级增长的过程，每一年的增长量都会大于上一年。杰文斯描述的这种由煤炭和蒸汽动力所创造的新异社会经验，在今天被我们称为“指数增长”——在这种增长中，数值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就可以增长到近乎无限大的程度——由此，杰文斯向公众展示了，即使是非常大规模的煤炭储量，也可能被迅速耗尽。杰文斯运用他的方法对矿业档案局发布的煤炭消耗量数据进行对数计算，得出了煤炭消耗 3.5% 的年增长率。按照这个速率，赫尔通过估算确定的煤炭储量维持不了一千年的供应，而仅能支撑一百年。⁴⁰

接着，杰文斯指出，问题出现的时间会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也许就在二三十年内。认为“有一天我们的煤层会被挖空到底，会像

39 Edward Hull, *The Coal-Fields of Great Britain*, 2nd edn,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61: 236, 238–239, 243.

40 Jevons, *Coal Question*: 4, 170, 236–240.

储存煤炭的煤仓一样被彻底清空”，或者认为这个国家的火源和高炉会“突然熄灭，只留下寒冷和黑暗来主宰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家”，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早在那之前，随着煤炭的采掘变得更加困难，煤炭的成本的上升将导致“我们到达增长的顶峰”和“不列颠王国当前持续增长状态的终结”。

从这些计算当中，杰文斯得出了一个直接而实际的结论。在增长还没有到达顶峰前这剩下的几十年里，趁英国的收入还在增加、财富还在积累的时候，必须采取措施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在指出“我们财富的整体结构”建立在“无知、贫困与恶习的基础上”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后，杰文斯主张，要在制造业中减少童工的雇佣，同时建立一个普遍的教育体系，以消除“我们低层工人阶级的无知、短视和酗酒成性”。国家不应将现有的物质财富花费在“增加奢华、炫耀和腐败”上，而应当用于“提高下一代的劳动效率”。杰文斯在其著作的结尾这样告诫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国家繁荣的全盛之晨，正要接近中午。可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向数百万国人同胞偿付我们欠他们的道德和社会债务，而这是必须要在黑夜降临之前结清的。”⁴¹

130

杰文斯讨论煤炭的著述中显现出了三个主题，我们将继续跟进这三个主题，以理解在日后石油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经济”的形成有哪些不同之处。第一，碳能源的供应，就像铸币的工业化流通和铁路线的发展一样，也形成了一种集中的物质流动，而作为一个过程，它也被历时地记录、测量和跟踪，并被编列成统计表格。随着问题和争议开始出现，对此过程进行检查与收集信息的方法也在增加。

41 同前注：第 v、xxiii-xxvi 页。

例如，1850 年的《矿山检查法》(Mines Inspection Act) 促使政府开始任命煤矿检查员，他们从 1854 年起开始编制矿业档案系统 (Mining Records)，而杰文斯的研究正是基于他们的统计数据。第二，这些统计数据让人们得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测量发展的进度、增长的速率、资源的消耗等。因此，物质材料供应的限度、自然资源的耗竭、未来可能发生的衰退等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切的事项。第三，随着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生活的后果逐渐显现，人们同时也开始关切如何度量和改善贫困人口的道德状况及其与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

在杰文斯之后，社会统计学的发展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对诸如贫困、穷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业事故等问题进行度量的研究。到 19 世纪末时，为了应对 1873—1895 年间的经济危机以及劳工组织日益增长的政治力量，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成立了劳动统计局。这些机构收集的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信息，塑造了新的社会福利措施，比如退休金和各种形式的工业与医疗保险等，并且促成了这些福利项目的施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见，在“一战”期间争取普及这些措施的运动，促成了国际劳工局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在“一战”结束之际的创立。

第二条路径是对种族发展和优生学的研究。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在其表兄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的进化论的启发下，对遗传进行了统计分析，而这些最早在 1865 年就问世的研究，直到 1890 年代才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到 19 世纪末，欧美的统治阶级开始忧心于种种被认为是种族质量下降的证据：在英国，政府难以为南非战争招募到体质健康的士兵；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则开始恐惧人口中贫困和体质较劣群体的繁殖速度超过了种族上更强壮

的群体，从而导致“种族自杀”的风险。⁴² 高尔顿及其追随者提议推行生育控制，以改善种族质量，并抵消投票权的扩大所带来的影响。高尔顿警告称，人不是“平等的社会单元”，不具有“平等的能力来进行投票或其他活动”。⁴³ 为了推进对种族质量的研究和改善，高尔顿发展了新的统计方法。其实，现代数理统计及其相关性、回归和误差分析的方法，都是为了优生学运动发展起来的。⁴⁴ 高尔顿的学生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继续推进了相关工作，而他推广数理统计的努力尤其成功地影响了 20 世纪初的经济学，在这个领域里，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等人“很快就改进了相关性的方法，用它来检验货币数量理论”。⁴⁵ 为了适应统计相关性的极端经验主义，这些货币主义者简化了他们的理论，从而寻找单一的指标来揭示货币供应在决定经济周期中所起的作用。到 1920 年代时，美国经济学家都在“狂热而不加区分地进行相关性分析，但他们的热情和谨慎却呈现负相关”，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写道，“而其结果，正如我们在一个充满无意义相关性的世界中所能预见的那样，自然是荒谬的”。⁴⁶

42 G. R. Searle, *A New England? Peace and War 1886–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375–276.

43 Theodore M.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0.

44 Donald Mackenzie, *Statistics in Britain, 1865–193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29–146, 270–314; Alain Desrosières, ‘Managing the Economy: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Statistics’, in Theodore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7: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5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314.

46 Jacob Viner,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28 (supplement), reprinted in J. Viner, *The Long View and the Short*, Glencoe: Free Press, 1958: 451, 引自 Thomas M. Humphrey ‘Empirical Tests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30’,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 2, 1973: 307.

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力

在 20 世纪初的数十年间，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交锋。这场交锋塑造了经济知识的未来，及其与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关系，并且将深切地影响自然资源的问题如何进入民主的公共讨论。一方希望经济学从自然资源和能量流动出发，另一方则认为应当围绕对价格和货币流动的研究来组织这门学科。后者最终赢了，他们从对货币和价格的度量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对象：“经济”。

132 在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专业领域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关注如何测量地球资源的枯竭程度。在美国，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诸如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T. 伊利（Richard T. Ely）与他的学生索尔斯坦·凡勃伦（第一章曾提到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作为某种“怠工破坏”体系的理论），开始关注自然资源及其枯竭、过度或“炫耀性”消费、“能源”的耗散与保护等问题。在他们眼中，经济学应当研究的不是市场的规律，而是物质流动和资源的规律。⁴⁷但在将对他们参与创建的这门学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交锋中，他们败给了以欧文·费雪这样的人为首的价格理论派。经济学由此变成了一门货币的科学；它的对象不是自然的物质力量和资源以及人类的劳动，而是自然在一边，人类的社会与文化在另一边，两边之间开辟出的一个新空间——一个不完全自然也不完全社会，被人们称作“经济”的空间。

47 凡勃伦主张，企业应由工程师而非商人来运营，因为工程师理解物质性的过程，并倾向于更高效地利用资源，而商人只会图利。作为对 1902 年无烟煤矿大罢工的回应，美国的一些工程师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掌控企业“经济性的”效率，而非仅仅“技术性的”效率，并呼吁工程师与有组织的劳工建立联盟。Donald R. Stabile, ‘Veble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ngineer: The Radical Thinker and Engineering Leaders Came to Technocratic Ideas at the Same Tim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5: 1, 1986: 41–52.

20 世纪上半叶，许多新手段和新安排的出现，使人们得以发展出一些新的计算形式和表征实践，从而借助它们来讨论和管理代表着“国民经济”的货币流通。与其详述构建“国民经济”所涉及的全部工作，我们不如通过被 1987 年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誉为“美国培养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例子，来说明“国民经济”的形成方式。这些方式看起来平凡无奇，但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⁴⁸

作为杰文斯研究的信徒，费雪被后人记住，是因为他建造了第一个可动手操作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是一个液压机械装置，主体是一个盛有水的水箱，水箱内部装设蓄水槽、管道、阀门、控制杆和塞子。他在耶鲁大学授课时用这个设备作为实验工具，来研究在一般均衡系统中，十种不同商品中任一商品的需求或供给受到的冲击，会如何影响由水箱总体水位所表示的价格水平。构建“经济”的工作还有一个更实用的例子，也就是费雪发明的另一个设备：一个名为“可视索引”（Visible Index）的装置，人们可以用它管理小卡片上的信息，如今被称为“轮转式索引卡片架”（Rolodex），1913 年费雪获得了这个设备的专利。他在自己位于纽黑文的家里成立了一家名为“索引指数研究所”（Index Number Institute）的公司。在他家的地下室里，他的助手们使用这个新设备和费雪设计的指数公式，计算出了最早的商品价格指数和美元购买力指数。《纽约时报》等报纸每周都会刊登费雪发布的价格指数以及他的评论，使七百万读者能够追踪和参与这些将逐渐被称作“经济”的价格变动。

133

48 James Tobin, 'Irving Fisher (1867-1947)',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London: Macmillan, 1987: 369-376.

在经济学中，还有许多其他机制可以用于将自然和物质资源排除出去，将这门学科转变为一门价格的科学——这些机制就不像“轮转式索引卡片架”那么简单，或那么无可争议了。比如说，费雪还是优生学的倡导者。他在耶鲁大学的导师，就是美国极有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906年，费雪协助成立了人种改良协会（Race Betterment Society），又在1922年创立了美国优生协会（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并担任首任主席。在费雪的经济理论中，种族改良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人类劳动被视为一种财富或资本存量。就像非人力资本一样，它是一种可以被改善或放任其退化的资源。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个体所做的决策：是在当下消费，还是为未来投资？这些决策受到个体的自控能力、预期寿命、节俭程度和远见能力等品质的影响，而这些品质是劣等种族和优等种族中质量下降的那部分人所缺乏的。⁴⁹

1908年，为了解决人们对自然资源耗竭的问题日益增长的担忧，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成立了国家保育委员会（National Conservation Commission）。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的费雪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保护自然的最重要手段，不是由政府来规管对它的开发，而是采取措施来防止“人种退化”，因为“人种退化的首要症状之一，就是远见的衰退”，而“一个人种越有活力、越是能够长久延续，就越能更好地利用其自然资源”。经济学将停止研究自然的能力和资源，转而研究人类的能力和资源。费雪主张设立一个联邦卫生部，作为改善种族的主要工具，但经济学也可以在提升人类的能力上发挥作用。经济学可

49 Mark Aldrich, 'Capital Theory and Racism: From Laissez-Faire to the Eugenics Movement in the Career of Irving Fish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 3, 1975: 33-42.

以通过开发像“轮转式索引卡片架”和报上刊载的商品价格指数这样裨补人类能力的工具，以及随后精心设计被称为“经济”的这一整套计算机器／制，来拓展个体的远见能力。⁵⁰

货币经济

在经济学这门学科中，对于“经济”是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这个观念，最容易追溯到它首次出现的地方，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尽管凯恩斯倾向于使用诸如“经济性的社会”（economic society）或“整体经济体系”（economic system as a whole）之类的术语，而不是今天人们直接说的“经济”，但《通论》通常被认为标志着后来所称的宏观经济学的起源。⁵¹

134

“经济”这个新对象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背景下被构建起来的。以数学方法测量“经济”的先驱——扬·廷贝亨（Jan Tinbergen，又译“扬·丁伯根”）是回应荷兰政府请求他制定对抗经济萧条的政策，而建立第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的。⁵² 凯恩斯的理论回应的也是大规模失业和大萧条的社会经验，以及法西斯主义、苏维埃体制、罗斯福新政等不仅关注个体性的人类行为，还关注就业、投资、货币供应等整

50 在国家保育委员会的任期结束后，费雪在耶鲁大学开了一门名为“国家效率”的课程，课程描述称这门课“研究的是自然资源、人种活力和社会制度”。William J. Barber, 'Irving Fisher of Yal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4: 1, 2005: 49.

51 Michael Bernstein, *A Perilous Progress: Economics and Public Purpos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hilip Mirowski,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2 Mary S. Morgan, *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2.

这些更广泛的事件并不只是“经济”这个新概念出现的背景。虽然在 20 世纪中期，“经济”形成的可能性源于这些事件，但正如我们在费雪的工作中看到的那样，经济学本身也参与了那些促成“经济”诞生的社会-技术性的世界的重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重构过程的两大主要方面：新形式的货币流通；欧洲的帝国以及其他形式的帝国控制的逐渐衰弱，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国民经济”的构建。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英美等国的货币流通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剧烈的变化是日常交易中，货币——尤其是纸币——使用的增加。凯恩斯曾提到，在“一战”前，英国人很少会使用通证货币或纸币来进行金融交易。他能想到的自己会固定使用货币的目的只有两个——购买火车票或给家佣支付工资。⁵³ 大部分日常交易都通过记账户或填写支票的方式来结算。美国根据 1863 年《国民货币法案》（National Currency Act）推出了联邦储备银行券（美元钞票），但供应量有限。这种钞票的使用一直都不流行，而且要与其他地区性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本地代价券（scrip）竞争。⁵⁴ 与英国一样，本地账户和个人支票在当时是结算交易的最常见方式。情况在战争期间开始转变，纸币的印刷迅速增加，同时绝大多数国家开始放松并最终抛弃了金本

54 Viviana 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Pin Money, Paychecks, Poor Relief and Other Curren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位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 1913 年的成立和其他国家类似的改革使银行券得到了标准化，纸币的使用被广泛而迅速地接受了。

货币使用和流通方式的这种转变，展示了经济学知识如何帮助构建了它新的对象。首先，经济学家发展出了新的货币理论，也参与到围绕货币改革、金本位制、政府对汇率和货币供应的控制等问题的政治斗争之中。凯恩斯的第一本著作《印度的货币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1913）便是对这些政治问题做出的实际贡献，在这之后他又出版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一书。在美国，欧文·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与 J. 劳伦斯·拉夫林（J. Laurence Laughlin）及其学生的“真实票据”（real bills）学说之间的论争，塑造了联邦储备体系的创建过程。⁵⁵ 由经济学家提供的概念与计算技术，融入了各个新成立的金融机构中。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发展出了用于衡量和管理货币价值的实用工具，而这些工具构成了货币流通这个很快将被称作“经济”的全新日常机制的一部分。

下一步则是开始把这个新的货币流通机制视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体系，而不只是另一个“市场”。在《货币论》出版后，凯恩斯与他的剑桥前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理念上彻底决裂，并且也与费雪和朗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又译“拉格纳·弗里希”）的工作分道扬镳。凯恩斯认为，早期的经济理论家仅仅把货币当作某种中性的价值标志物，因此这些学者没有看到使用货币的交换体系和以物易物的交换体系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凯恩斯约创作于 1932—1933 年之间

55 Perry Mehrling, 'Retrospectives: Economists and the Fed: Beginn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4, Autumn 2002: 207–218.

的《通论》存世最早的草稿以及同一时期他在剑桥授课笔记的片段中，他讨论了古典经济理论中“实物交换经济”或“中性”经济，与当下现实世界的“货币经济”之间的差异。⁵⁶ 这些笔记是凯恩斯首次使用当代意义上的“经济”这一概念。

136

凯恩斯的突破在于，对于“经济”这个新的整体，他并不将其视为不同商品市场的总集合，而是把它构想为货币的流通：“经济”就是货币易手发生的所有时刻的总和。

国民经济

构建这种“经济”更进一步的步骤，就是建立度量某一地理空间之内所有货币收支情况的机制，也就是新的国民收入核算（national income accounts）体系。在战间期以前，计算国民财富或“国民红利”（national dividend）的尝试曾经遭遇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个问题是，“同样”的商品或货币会被计算两次。例如，人们通常认为，批发销售的商品不能在零售时再计算一次。而通过岗位工资得到的收入，在作为薪水支付给佣人时，不应第二次计入国民财富。而且，还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指出的，在财富生产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如何核算所有浪费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浪费不仅包括工具和机器的损耗，还包括国家自然资源的耗竭。⁵⁷

56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ed. Donald Moggridge, London: Macmillan, 1971–1989, vol. 13: 396–412, 420–421; vol. 29: 54–55;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 *The Economist as Saviour, 1920–1937*, London: Macmillan, 1992.

57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n, London: Macmillan, 1920: 523.

在“一战”后为估算德国做出经济赔偿的“偿付能力”而设立的道斯委员会（Dawes Committee）发现，要做这些计算，缺乏的不仅是关于国民收入的可靠数据，还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明确所要计算的对象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在战间期的德国和美国，有许多人付出了大量的努力。⁵⁸ 最终，在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解决方案并不是去更精确地计算事物，而是重新构造想要被计算的对象。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去计算国家的财富或红利，而变成了计算该国总的“国民收入”——每一次的货币易手（每一笔货币交易）的总和。每发生一次货币易手，都代表了货币的接收者得到的收入，而不必管该活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也不必管它所产生的浪费。凯恩斯的工作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和他的学生与英国的财政部紧密合作，设计了估算国民收入的方法。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又译“顾志耐”）系统化了这些新的方法。1942年，美国商务部开始发布国民经济数据，罗斯福总统则在他1944年的预算演说中介绍了“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的概念。⁵⁹ 库兹涅茨警告称，“全国性的总体值，会使人们所称的国民经济这样一个模糊的存在，被赋予独立的重要性”。⁶⁰

137

58 J. Adam Tooze, 'Imagining National Econom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1900–1950', in Geoffrey Cubitt, ed., *Imagining N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2–228. 亦参 J. Adam Tooze,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9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331–332.

60 Simon Kuznets,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1939*, Vol. 1,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1: xxvi.

然而，他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作用。其后对每一个经济体 GNP 的阐述，都使人们能够展示或描述这一新的总体的规模、结构和增长。“经济”的构建提供了一套新的、日常使用的政治话语，让每个民族国家都能用这套话语来描述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空间上有明确边界的，并且可以用政治手段来管理的存在。

这个正在逐渐形成的“国民经济”依赖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国家化”——以 1930 年代后民族国家政府大幅扩张的行政机器 / 制为基础，大规模的、技术-科学性的治理实践开始出现。反过来，它也促进了这些国家化的治理机器 / 制的形成，而在这些机器 / 制中，经济学取代了法律，成为行政权力的技术语言。⁶¹

对凯恩斯理论之前的正统经济学而言，经济行为发生的领域是个别市场。经济学家们通过这一抽象概念，来分析成本、效用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当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整体的经济体系”取代了这个缺乏地理和政治定义的抽象概念时，他所谓“整体的经济体系”，是一个由一整套地缘政治边界所定义的系统。这个系统由一系列总量（生产、就业、投资和消费）和综合平均值（利率、物价水平、实际工资等）来表示，这些指标所指涉和参照的对象，则是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这种将“经济”置于“国家”框架下的做法并不是被经济学理论化的，而是作为某种常识性的建构被引入经济学的，让经济学家们可以在它所设定的边界内部来度量这些新的平均值和总量。⁶²在此之后，经济学又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独立领域，使得

61 Theodore J. Lowi, 'The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We Become What We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 1992: 1-7.

62 Hugo Radice, 'The National Economy: A Keynesian Myth?' *Capital and Class* 8: 1, 1984: 121.

这种被当作常识的、指向民族国家的指涉和参照，被刻写进了这个学科的结构之中，而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将国民经济简单地理解为“宏观层面”，替代了对国民经济的地缘政治建构方面的理论分析。经济学没有研究国家的制度形式，而是在这门学科的结构内部直接再现了这种制度结构。

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建构经济，与国际秩序的重塑有关。“二战”前后，日本和欧洲诸帝国的瓦解，摧毁了以在帝国秩序中的位置为基础的旧有政治权力框架。在此，“经济”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地缘政治空间的方式。从前，谈论例如说“英国经济”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它的经济领域被认为包含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更普遍地说，只要在人们心目中，世界在欧洲以外的部分，是由一系列广阔而互相间隔的欧洲帝国和其他帝国组成的，那么，人们就很难想象，这样的世界包含了大量独立的经济体，而且其中的每一个经济体都与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空间相吻合，并由这个空间内的经济关系的整体所组成。

138

帝国的崩溃和美国日益增长的霸权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秩序，这一秩序首先经由国际联盟，随后再经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得到了巩固。在这个秩序中，整个世界以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呈现，每个国家都代表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边界。新兴的宏观经济学则再一次未经理论化，就将这些被想象出来的民族国家经济体，当作其指涉和参照的对象：国际贸易是通过由不同国民经济体之间的交易所定义的总量（商品与资本的进出口）与平均值（贸易条件、汇率）来衡量的。⁶³ 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新成立的机

63 同前注。

构中得到制度化的经济（学）专家知识，经由统计数据的发布，以及大量以这些独立经济体为对象的政治计划的制定，帮助建构了这个新的全球政治秩序。

凯恩斯主义国民经济的框架构建，是一个旨在限制和减少市场竞争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通过强化对金融、贸易和移民的管理，以及最重要的，防止一个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来实现其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国民经济是殖民秩序的继承者——殖民秩序也是一个依靠垄断、管制贸易、控制劳动力和政治压迫等手段来限制市场力量的体系，但它出现的时间更早，历史也久远得多，最终在战间期开始走向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的构建应该与一种与它并行发生的发展联系起来，而这一发展同样试图构造排除市场竞争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个发展就是大型公司的发展，其中包括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种公司——跨国石油公司。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主张，经济学家比自然科学家更有理由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他们所研究的世界。⁶⁴这是因为经济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它实际上是由数值现象——价格、数量的测量、利率等——建构而成的。这一点在熊彼特看来，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分析的量化与形式化方法提供了论据。经济学方法与它所研究的世界的构成之间存在的这种亲和性无疑是它的优势，但这个优势有着更深远的后果。这种亲和性使经济知识能相对容易地介入经济分析的对象的日常构建。⁶⁵由此导致结果是，学院中的经济学所建立的各种模型和表征，与其声称所要表征的世界，将永远都不可能简单地分隔开来。

64 Joseph Schumpeter, 'The Common Sense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a* 1: 1, January 1933: 5.

65 Michel Callo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1998.

这些转变在 20 世纪创造了密集充斥着现代经济学的专家知识、计算技术和概念机器 / 制的一个政治性与物质性的世界。这个由政府、公司、消费者和消费品所构成的所谓物质性的世界，在经济（学）专家知识的协助下被安排、管理、形构和运作着。这个世界似乎能够很容易地被经济学操控并建模，而这种容易的程度并不是简单地反映了如熊彼特所说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天然“量化”的世界。它反映了经济科学的概念和计算，与其所研究的这个世界之间紧密重合的程度。

燃料货币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将“经济”的装配，与基于煤炭的能源体系向主要基于石油的能源体系的转变联系起来了。“经济”这个概念的形成和理解依赖于丰富且低成本的能源供应，而这使得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变成了某种“石油知识”（petroknowledge）。

将“经济”概念化为货币流通的过程，定义了这个新对象最主要的特性：它能在物理规模不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扩张。过去对财富的认识方式建基于各种隐含了增长极限的物理过程：城市和工厂的扩张、殖民地领土的扩张、黄金储备的积累、人口的增长与移民的吸纳、新矿产资源的开采、商品贸易量的增加。所有这些空间性和物质性的过程都有其物理极限。到了 1930 年代，人类社会似乎正在逼近许多这样的极限：西方人口增长已趋于平稳，欧美帝国强权的扩张已经停止并面临逆转的威胁，煤矿正在枯竭，农业与工业则面临着过度生产导致的供应过剩。然而，以国民收入核算为新的计算手段来度量的“经济”，却没有明显的限度。国民收入——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国民生产

总值，即 GNP——所度量的，并不是财富的积累，而是纸币易手的速度和频率。它可以在没有任何物理或地域限制的掣肘下增长。

140 对于这种将“经济”视为可以无限增长的对象的全新观念，石油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了它的形成。首先，石油的价格不断下降。在调整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一桶石油在 1970 年的价格仅为它在 1920 年售价的三分之一。⁶⁶ 因此，尽管能源的消耗量在增加，能源的成本似乎并没有构成经济增长的限制。（事实上，经济学家在解释他们这个新对象的增长时，并没有考虑不断增加的物理能源消耗量，而只是衡量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而这样做，为经济学家们留下了一个未能得到解释的“剩余”增长，在很长时间里，他们试图将之归因于他们的经济模型以外的、被他们称为“技术”的因素。⁶⁷）

其次，由于石油的供应相对丰富，且易于跨洋运输，因此它可以被视为某种永远不会耗竭的资源。石油的成本中并不包含对其储藏耗尽的计算。“经济”的增长——根据 GNP 来进行度量——并不需要去考虑能源资源的耗竭。对于“经济”的学术构建做出了主要贡献的工作——如凯恩斯的《通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保罗·A.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66 石油价格从 1920 年每桶 31 美元，到 1970 年降至每桶 9 美元（以 2006 年美元价格计算）。每十年的平均油价也在下降，从 1920 年代的每桶 18 美元，到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每桶 15 美元，到 1950 年代的每桶 14 美元，再到 1960 年代的每桶 12 美元。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7, available at www.bp.com.

67 Dale W. Jorgenson, ed., *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vit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9. 罗伯特·U. 艾尔斯（Robert U. Ayres）和本杰明·瓦尔（Benjamin Warr）的研究显示，将对能量或有用能（exergy，或译“烟”，即转化为有用功的能量）的度量作为指标纳入对增长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美国从 1900 年以来的所有增长。Ayres and Warr, 'Accounting for Growth: The Role of Physical Work',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6: 2, 2005: 181–209.

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阿罗—德布鲁模型 (Arrow-Debreu Model) 等——都没有关注能源的耗竭问题。⁶⁸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 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认为, 长期的增长是不受能源供应限制的过程。⁶⁹ 不仅如此, 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灾难、气候变化和其他负面后果的代价和成本, 都没有从 GNP 的计算中扣除。由于对“经济”的度量并不区分有益成本和有害成本, 因此, 处理化石燃料造成的损害所需要支出的越来越大的花费, 似乎反而是对“经济”增长的助力, 而不是阻碍。⁷⁰ 通过这些方式, 石油的可获得性和它的供应, 在将“经济”及其增长塑造为 20 世纪中期政治新的首要对象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碳氢化合物能源的丰富性, 还以某些更进一步的方式, 促进了新的计算形式的发展, 而其中的两种方式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其一是农业的工业化。早期的经济思想把土地视为财富的主要来源, 但是, 土地同时又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因为它无法以人口增长的那种速度来增加, 反而会地力退化, 使用殆尽。“一战”后以天然气为原料制成的合成肥料, 以及“二战”后化学除草剂和农药的施用, 似乎消除了这些自然因素对增长的限制。其二是由碳氢化合物制成的合成材料的兴起, 而这似乎是对资源枯竭问题给出的一个直接答案。1926 年, 马

141

68 Keynes, *General Theory*; John Hicks, *Value and Capi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aul A. Samuelson,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Kenneth J. Arrow and Gerard Debreu,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3, 1954: 265–290.

69 Geoffrey M. Heal and Partha S. Dasgupta, *Economic Theor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

70 Herman E. Daly, *Steady-State Economics: The Economics of Biophysical Equilibrium and Moral Growth*,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7.

萨诸塞州威廉斯敦政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 at Williamstown, Massachusetts）举办的一次会议将一群矿业工程师、地质学家、化学家与政治学家召集在一起，共同讨论资源枯竭的问题。矿业工程师们对关键矿产枯竭的威胁发出了警告；但化学家们并不同意，他们认为在“一战”期间开始发展的新型合成材料，能让我们以人工方式创造出任何短缺的资源。“矿业工程师们主张，在重要材料的现有储备耗尽之际，我们的文明也将遭受重大冲击，”会议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另一方面，化学专家之间则弥漫着显著的乐观情绪。”化学家们承认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短缺，但“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用同样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其他材料，来取代那些枯竭的资源”。两个群体的观点差异也延伸到了政治议题上。矿业工程师们警告，“自然资源的分布是极其不均的，因此许多不可或缺的资源都存在着某种近乎垄断的状况”，石油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另一方面，化学家们“觉得合成制品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打破国家的垄断，恢复真正的竞争局面”。⁷¹

★

如果说石油在“经济”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它也塑造了一项将对“经济”构成挑战的方案，而这一方案会在日后提供一种对抗“经济”的治理民主政治的方法：新自由主义的“市场”。1938年8月，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领衔，一群欧洲知识分子在巴黎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讨论沃尔特·李普曼对罗斯福新政的批评，由此发起了新自由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反对这个新的、作为规划/计划对象的“经济”，也反对规划本身作为集中与部署专家知识的方法。新

71 Henry M. Wriston, 'Institute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 4, 1926: 853–854.

自由主义提出了替代“经济”的另一种安排知识、专家技能和政治技术的方式——一种被它称作“市场”的政治装置。这并不是大卫·李嘉图或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笔下的那种市场，这个词在初生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含义。李普曼在《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和《良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中曾警告称，公众舆论是危险的，有必要把更多的议题保留给专家来决策。吸取了这些警告的新自由主义被哈耶克及其合作者设想为一种替代“经济”的方案，可以

142

用来战胜左翼与平民主义的民主所构成的威胁。

战争的爆发和战后的各种重建计划推迟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它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装置所构成的政治挑战，要在战争结束的十年后才以温和的形式逐步展开。挑战开始的标志，是1955年一家名叫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智库在伦敦的成立，而致使这家智库成立的缘由，是石油-货币体系在战后遭遇的第一次危机：英国企图保留英镑区作为一种货币调控机制——哪怕英国已经丧失了它曾控制的这一机制的核心，也就是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油田。尽管失去了曾经造就了英镑价值的油井，但为了维持英镑的价值，伦敦仍然竭尽全力地采取了各种孤注一掷的措施，而正是这些措施为新自由主义运动提供了有机可乘的脆弱节点，让它在这些节点上第一次开始构建“经济”的替代方案。

与英国的情况类似，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起源与战后围绕石油和国际金融投机监管等议题的斗争紧密相连。美国国务院在1945年制定的美国石油政策计划遭到了石油工业战时理事会（Petroleum Industry War Council）的阻挠。该理事会的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檀香山石油公司（Honolulu Petroleum Company）的总裁阿尔伯特·马

泰（Albert Mattei）警告那些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规管战后石油开发的官员，“我们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提议，要是你们不接受，我们就拆烂你们要建的玩具屋”。⁷²接着，他还出手协助扼杀了《英美石油协定》。身为一名有权有势的北加州共和党人，马泰是成立于1946年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创始董事之一，而这家智库正是启发哈耶克在伦敦成立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最初灵感来源。该智库的首批出版物之一，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美元能挽救世界吗？》（*Will Dollars Save the World?*），抨击了马歇尔计划和它得以施行的基础——欧洲各种形式的国家计划，以及它所强化的种种有关美元和其他货币的观念。黑兹利特呼吁美国实施真正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金本位制，并希望他国也能跟进。⁷³

143 中东的油井和输油管道，以及通过它们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安排，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以及这种“经济”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那些形式的民主，得以被装配起来。因为石油，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未来有着一种特殊的定位：未来是一片无限增长的前景。这种前景并不是对一个丰裕时代的自然反映，而是根据一个被称为“经济”的新世界，以特定的方式来组织专家知识及其对象所产生的结果。计算的方法、货币的使用、交易的度量和国家统计数据的编制等方面的创新，让人们能够把政治的这个中心对象，想象成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物质上的终极限制，而能够无限增长的对象。

72 Stephen J. Randall, *United States Foreign Oil Policy 1914–1948*, 2nd edn,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9–200.

73 Henry Hazlitt, *Will Dollars Save the Worl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47. 他对欧洲的分析是从对盟军控制德国经济的抨击出发的，而这基于持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观点的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的论证。

至此，我们已经拓展了“碳民主”一词的含义。在一开始，这个术语指向的是煤炭在大众民主的兴起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而接下来，它又指向了与煤炭具有不同地理来源、物质属性和控制模式的石油，在各种形式的民主能动性被削弱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些民主能动性都是对煤炭的依赖所曾催生的。现在，石油在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中占据了更大的重要性。“二战”后，民主政治发生了转变，促使这种转变发生的，不仅是从煤炭到石油的转换，还包括两种新的治理民主的方法的发展，而这两种方法，都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来自石油的能量而得以实现的。其中一种治理民主的方法，是一种对货币价值进行监管，并对被认为摧毁了战间期民主的金融投机力量做出限制的安排。这种安排，是一个凭借输油管道、石油协议和组织石油供应与定价的寡头集团而建立起来的体系，而它的形成，同时伴随着冷战体制的构建。冷战为帝国强权管治战后的中东提供了一个框架，取代了它们对于委任统治、托管、各种发展项目以及其他帝国权力架构的需求。另一种治理民主的新模式则是“经济”的构建，自此，“经济”的专家开始取代民主的辩论，“经济”的机制则为平等主义诉求的实现设下限制。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读到，在1967—1974年间，这些迥异要素之间的关系全都发生了转变，正如它们在今天正在再次发生的转变一样。为了理解那一时期的所谓“石油危机”，我们必须先了解中东的政治力量，如何终结了“二战”后的石油秩序。

第六章 怠工破坏

144

当石油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让人们得以想象“经济”无限增长的能源之时，石油工人正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场地中，将这种液体从地下开采出来，储存在油罐中，送至处理工厂加工，泵入输油管道，装载到油轮上进行远洋运输。石油工业的钻井设备、油泵、输油管道、炼油工厂和流通网络不再像煤炭时代的碳能源网络那样，脆弱得容易受到停工与怠工破坏的影响。然而，随着中东地区取代拉丁美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产区，石油生产遭到地方性干扰的可能性也增加了。¹

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利比亚，不受英法政治影响的政府终于上台掌权，美国的两个扈从国（client state）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则开始试图削弱外国对其石油的控制。这些变化使发生在当地的冲突与破坏能够被整合到某种更有效的方法当中。中断或减少石油的供应能被用作一种手段，来服务更宏大的政治目的——更易中东石油的控制权，或改变中东政治秩序的其他方面。人们通常会从某种新政治意识的兴起的角度来描述这种手段的建构：更为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滋长。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反抗的实际形式：石油供应路线的改道、新炼油厂的建设，以及怠工破坏活动——它们使得西方石油公司掌控石油流动的方式第一次遭遇到持续的挑战。

1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石油产量于 1953 年超过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产量，并在十年后又超过了美国的产量。DeGoyer & MacNoughton, *Twentieth Century Petroleum Statistics*, Dallas: DeGoyer & MacNoughton, 2009.

伊拉克的革命

在 1960 年代，中东地区各个石油生产国都希望能找到一个办法，让自己能在避免重蹈伊朗十年前覆辙的情况下，实现本国国内石油储藏由国家控制的目标。1951 年，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将英伊石油公司的资产全部国有化，伊朗的石油生产全部被国家接管，可是在这之后，该国生产的石油却没有办法对外出售。英国封锁了阿巴丹炼油厂加工的石油向国际市场的输出，还说服了各油轮船队和各大石油公司拒绝经手伊朗出产的石油。为了弥补因此损失的石油供应，英伊石油公司增加了邻近的科威特油田的生产，将产量翻了一倍，使得科威特一举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由于石油占了伊朗出口收入相当大的比重，英国的封锁措施将这个国家推入了经济危机，使伊朗政府成为 1953 年 8 月英美两国策划的一场军事政变容易下手的目标。这场政变推翻了摩萨台的议会制政府，复辟甚至强化了沙阿的寡头统治，让该国的左翼面临暴力镇压的威胁。

145

伊拉克是大型石油公司与石油生产国之间斗争的下一个焦点。与伊朗类似，伊拉克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但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因为农村的土地都集中在大地主们手中，而这些大地主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牢牢地控制了农业生活与农民生计，于是，贫困的流动人口就被迫迁移到了城市。在油田、铁路车场和纺织工厂，劳工们组织起了活跃的工会。这些工会的领袖以及其他一些群众政治力量的领导者大多都来自伊拉克共产党——当时伊拉克国内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的政党。左翼力量发起了一系列运动，争取就业、居住和其他集体福利的改善，要求结束这种在农村地区造成疾苦的大片土地归私人控

制的现状，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以消除他们遭到的政治压迫，并终止外国对石油工业的控制。²

随着石油的控制权成为群众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它的国有化反而导致了这些势力的失败。怠工破坏的力量——阻断或减缓石油流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先前主要被垄断在跨国石油公司手中——将不是由运作石油工业的工人们来组织，而是由国家。1958年，支持民族独立的陆军军官们在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的领导下推翻了英国扶持的君主政府。他们最初依靠共产党人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同时试图围绕夺回石油控制权的运动来团结整个伊拉克。接管了本国石油资源的国有控制权之后，卡塞姆及其继任者们就可以借此为社会改革筹措资金，而不必采用那些会让富裕阶层受制于平等主义诉求的财富创造模式了。石油带来的收入，消除了通过对土地进行激进的再分配和大规模发展制造业来创造国民财富的必要性。

146 在世界其他地方（如东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有效的土地改革是建立更平等、更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手段。将农地规模限制在一户家庭可以自耕自作的面积范围之内，就剥夺了富人通过土地赚取大量地租收入的可能性，迫使追求财富积累的人通过发展制造业来聚集资本。这种变革具有双重效果：既能在农村创造出更大程度的平等（以及面积更小但生产力更高的农地），还能让资本的所有者在工业劳动力面前逐渐变得脆弱。一直以来，民主化的过程通常依赖于

2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764-865; Joe Stork, 'Oil and the Penetration of Capitalism in Iraq', in Petter Nore and Terisa Turner, eds, *Oil and Class Struggle*, London: Zed Press, 1980: 172-198.

打造出这种形式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之所以产生，并非因为制造业让工人们能够聚在一起分享理念或形成所谓的“社会运动”，而是因为它可以使创造财富集中的技术过程，变得依赖于非常多人的福祉。

伊拉克的新政府试图重新分配大面积的农业土地，但在面临地主反对与持续严重旱灾的情况下，这一计划的实施困难重重。新政府规定，灌溉地的持有上限是 250 公顷，雨养地则是 500 公顷。³而在东亚，各国政府由于害怕本国农民及其盟友可能效仿周边国家发起革命，纷纷实施了土地改革计划，为灌溉地的持有设定了限制，最低甚至低至不超过 3 公顷。伊拉克的资本所有者们保留了大型地产，于是不需要选择通过制造业来赚取财富的艰难道路，而且在日后，随着石油让政府稳步富裕起来，他们还能享受到财富增长的政府对贸易、承包和其他服务的需求所带来的商机。制造业依赖复杂的人力-机械互动过程，这种过程容易受到怠工破坏行动的影响，规模庞大的工业劳动力因此就被赋予了提出有效政治诉求的能力，但是，对石油实行国家控制，就能让石油的收入被掌控在国家手中，逐渐增强政府的权力，并让政府不再像执政初期那样依赖群众的力量。⁴

3 Edith Penrose and E. F. Penrose, *Iraq: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Ernest Benn, 1978: 240–248.

4 探讨石油对民主影响的研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例如，Michael L.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3: 3, April 2001: 325–361 这篇文章，展示了石油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与政体数据库 (Polity) 所估算的民主程度之间所呈现的一种负相关性。政体数据库对民主程度的测算，来自它对于行政长官的候选人所经历的遴选、选举和问责这一套制度流程的评估。这种对民主的狭隘理解、其测量的不可靠性，以及这种测量所基于的假设，即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某种普遍性的民主原则的不同程度，因而它们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和排序，都是这套数据所展现的诸多问题之一。罗斯 (Ross) 无法确定能够解释石油出口与政体数据库的民主程度排名之间统计关系的原因，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某些地区，如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在石油的开发和更民主的统治形式的出现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

在当时的中东四大产油国——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伊拉克的情况是最特殊的。在这个国家，控制着世界主要石油产区的石油公司最不愿意增加石油的产量。伊拉克的石油工业掌管在此时已更名为英国石油公司的英伊石油公司手上。自 1920 年代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创建以来，英国石油一直力图放缓伊拉克石油的开发，使之慢于邻近国家的石油生产。英国石油是代表一个财团——伊拉克石油公司——来进行石油生产活动的，这种安排与各大石油公司在邻国（包括 1953 年后的伊朗）采取的安排类似。然而，英国石油在伊拉克的合作伙伴不仅包括了石油“七姐妹”（seven sisters）——英国石油、壳牌和其他五家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所组成的卡特尔——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一个名为法国石油公司（即如今的道达尔）的法国石油财团，以及法国财团的盟友、建立起伊石油（即从前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石油掮客，卡洛斯特·古本江。提高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就会提升法国和古本江在石油市场所占的份额，而在另外三国，增加的石油产量仅仅会在“七姐妹”的成员内部分享。⁵ 因此，伊拉克石油产量的增长速度要远远低于邻国。

英国石油迟迟未能完成石油出口管道建设，故意钻探很浅的油井以避免发现更多的石油储量，还封堵了那些油藏发现颇丰的野猫井*，以便向伊拉克政府隐瞒这些油井的存在。尽管伊拉克的石油储量与其他三国相当，但在 1950 至 1960 年代，其石油产量却被控制在

5 在伊朗的石油财团中，各家独立的石油公司只占有象征性的股份，但在伊拉克，法国石油公司 / 古本江的股份占比要大得多，达到了举足轻重的 27.5%。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经营石油的公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财团，而是各石油母公司所共同持有的子公司。

* 即“wildcat well”，石油行业的俚语，指在未经任何勘探的地区所钻的探井，或译作“预探井”。——编者注

仅为其他三国大致一半甚至更低的水平上。英国石油及其合作伙伴把伊拉克当作了保留大量未开发产能的“产量调节者”^{*}，仅在需要满足特殊的需求时才会增加产量。⁶

与石油国有化的努力已遭挫败的伊朗相比，伊拉克处在更加弱势的地位。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都通过输油管道经叙利亚出口到地中海地区，因此伊拉克政府并不控制石油装船运输的地点。伊拉克有一座小型炼油厂可以用来处理供国内消费的石油，但供应区域市场的主要炼油厂位于输油管道靠近地中海沿岸的那一端，致使伊拉克缺乏独立的手段来加工用于出口的石油。

让渡特许权

当卡塞姆和他的军官战友们在 1958 年推翻英国支持的君主制政府时，他们意识到，伊拉克石油产业所具有的这些弱点，将使大型石油公司能够击败任何将之国有化的尝试。卡塞姆最初的目标是去兴建可以克服这种脆弱性的设施。他提议伊拉克石油公司从北部的摩苏尔油田铺设一条管道通往南部的巴士拉，并在巴士拉建设一座用于加工出口石油的炼油厂。各大石油公司拒绝了这个提议。它们并不希望伊拉克获得加工并出口本国石油的能力。此外，卡塞姆并不知道，南部

148

* 即“swing producer”，又译“摇摆产油国”，指拥有大量闲置石油产能的国家，它们可以通过调节国内的石油产量来影响国际石油供应和价格。本书第八章提到了沙特阿拉伯作为“产量调节者”的角色。——编者注

6 *Twentieth Century Petroleum Statistics*; John Blair, *The Control of O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81–85; Gregory 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and the World Oil Cartel, 1900–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270–275.

其实拥有非常充裕的石油储量。伊石油估计，巴士拉附近的北鲁迈拉（North Rumaila）油田可能是世界最大或第二大的油田。但在与伊拉克政府的谈判中，英国石油一直将这个秘密保守了下来，并指出，在现阶段“讨论鲁迈拉更大规模开发的潜在可能性”并不审慎。⁷

英国石油向股东支付的年度股息从 1950 年代初的每股 16 便士上涨到了 1954 年的 43 便士，占每股原始价值的 43%。由于战后英国经济紧缩，再加上伊拉克与其他产油国对石油收入的分配份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此高额的股东利润让英国财政部的一位资深大臣十分难堪，并在私下要求降低股息。“继续容忍这群走狗是不可能的”，大臣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还威胁要公开批驳“这个缺乏爱国心的组织”的董事们。英国石油拒绝屈服，还搬出了一条最关键的标准：它的竞争对手壳牌支付了更高的回报。43% 的回报率很快就被超越了；英国石油在 1950 年代末将分红上涨到每股 75 便士，1960 年到 117 便士。⁸ 由于增加产量会降低油价，从而威胁到这个远超正常水平的超额利润率，英国石油强烈不希望看到北鲁迈拉这样的新油田被开发。

由于无法实现伊石油的国有化，伊拉克转而计划发展一套与之并立的国有石油工业。伊拉克政府提议伊石油将它几乎覆盖了伊拉克国

7 United Kingdom, Foreign Office, 'Searight's Account of His Interview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9 April 1959, FO 371/141062, and 'IPC Believes Rumaila Oilfield Has Huge Potential', 14 June 1961, FO 371/157725,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 to 1966, 此档案在今后注释中简记为 FO 371，后面加上具体文档号。有关伊石油和伊拉克政府谈判更细节的历史，参 Samir Saul, 'Masterly Inactivity as Brinkmanship: The Iraq Petroleum Company's Route to Nationalization, 1958-1972',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9: 4, 2007: 746-792。

8 James Bamberg,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vol. 3: *British Petroleum and Global Oil, 1950-1975: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1, 135.

土全境的石油特许权区域让渡一部分出来。根据 1925 年的初始协议，伊石油必须在开始勘探后的 32 个月内，放弃除约 0.5% 特许权区域以外的所有其他部分。但伊石油强迫伊拉克政府在 1931 年的修订协议中删去了这一条款。此时，英国石油及其合作伙伴同意让渡特许权区域的 50%——之后提高到了 54%——条件是，放弃的区域要以平方英里而非总面积的百分比来表示（以此增加其他国家索求同等交易的难度）。⁹ 持有伊石油的各大石油公司同时坚持，要由它们来决定要让渡哪些区域。伊拉克愿意让伊石油保留所有当前正在生产的油井和已探明有石油储藏的区域，但希望对余下区域的让渡有一定话语权，以使未来可能与该国合作的企业看到有吸引力的前景。英国外交部担心，如果伊石油不肯让步，伊拉克可能会以吞并从前属于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科威特来回应。英国石油在 1951 年对伊朗实施禁运时，曾以科威特的油田替代原本来自伊朗的石油供应，因此一旦伊拉克夺走科威特，就会让英国石油在伊拉克国有化石油之际更难对其实施禁运。¹⁰ 尽管外交部对此感到忧虑，并认为伊拉克要求让渡特许权的提议“实际上并非不合理”，但各大石油公司依然拒绝了这些提议。¹¹

149

偏向于挑起危机

各大石油公司更偏向于挑起一场危机。就像英国外交部所指出的那样，持有伊石油的各大石油公司“也许宁可被夺走 75% 的权益，也

9 ‘IPC Negotiations with Iraqi Government’, 30 July 1959, FO 371/141068.

10 ‘Nationalization of IPC’, 1 April 1959, FO 371/141061.

11 ‘IPC: Points Causing Breakdown in IPC Meeting’, 2 October 1959, FO 371/141069.

不愿意主动交出 54%，因为这可能会在其他地区引发类似的要求”。¹² 迫使伊拉克单方面采取行动，可能会给人留下伊石油对此没有话语权的印象，进而让其他国家更加难以对采取类似的安排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如果伊拉克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持有伊石油的各大石油公司就可以威胁起诉任何同意在被没收走的区域作业的石油公司，让它们不敢与伊拉克政府合作，就像英国石油 1951 年在伊朗成功做到的那样。由于无法就此达成协议，1960 年 12 月，伊拉克通过了第 80 号法律，取消了 1931 年的特许权协议，并没收了 99.5% 的特许权区域，只让伊石油保留了当下正在生产的油井，但不包括北鲁迈拉在内的、伊石油拒绝开发的油田。伊石油剩下的 0.5% 的份额，正好对应了 1925 年初始的特许权协议允许它保留的区域。一部官方授权的英国石油公司史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各大石油公司当时的策略：它们决心“等到卡塞姆的出局”，并“希望迎来政府的更迭”。¹³

美国和英国似乎已经做出了铲除卡塞姆的决定。中情局在 1960 年 2 月尝试刺杀他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就像前一年对他的暗杀一样，但他还是在 1963 年 2 月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并杀害了。¹⁴ 美国立刻向新

12 'IPC Relinquishment', June 1959, FO 371/141066.

13 Bamberg, *History of British Petroleum*, vol. 3: 167.

14 Penrose and Penrose, *Iraq*: 288; Thomas Powers, 'Inside the Department of Dirty Tricks: Part One, An Isolated Man',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79; Roger Morris, 'A Tyrant 40 Yea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Times*, 14 March 2003: A29; Malik Mufti, *Sovereign Creations: Pan-Arabism and Political Order in Syria and Iraq*,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3–144. 布兰登·沃尔夫-亨尼克特 (Brandon Wolfe-Hunnicut) 评估了出自这些来源的证据，并且解释了美国政府内部在愿意与卡塞姆合作的官员和主张除掉他的官员之间态势不断变动的斗争：'The End of the Concessionary Regime: Oil and American Power in Iraq, 1958–1972',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 26–90。

上台的政府提供了一百多位左翼分子的名单供其行刑队抓捕，其中许多人是著名的知识分子，英国也在一周内就向新政府报告称，“挖出”共产党人的行动取得了进展，而且“军队已经控制住了局势”。¹⁵ 伊拉克群众政治运动的多位领袖与基层成员惨遭杀害，还有数以千计被投入牢狱。美国驻科威特（据说美国就是从这里与政变谋划者联络）的一位外交官詹姆斯·E. 埃金斯（James E. Akins）在政变成功后回到了巴格达。“我们非常高兴，”他后来回忆道，“他们除掉了许多共产党人。很多人被处决或被枪毙。真是了不起的进展。”¹⁶ 军政府下令伊石油向它移交一处废弃的泵站来关押政治犯，并要求该公司“协助为这座泵站配置设备并将其建成一座集中营”，使它能够容纳 1200 名政治犯。伊石油不愿参与这座集中营——伊拉克政府明确使用了这个名词——的建设，但同意为这座沙漠中的监狱提供自来水。¹⁷

在卡塞姆被排除出局、左翼和劳工运动被镇压或被“控制住了”之后，美国与英国失望地发现，伊石油依然不肯合作。巴格达的英国使馆向伦敦报告，“伊石油特许权的整个基础在该国都已过时”，并且应与一个伊拉克的国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来取而代之。¹⁸ 然而，伊石油却要求新政权撤销对其特许权区域的没收。伊石油一边继续从伊拉克开采它所需要的、规模甚为有限的石油供应，一边游说美国政府施压

15 ‘Assessment of Iraqi Regime’, 14 February 1963, FO 371/170502. 关于这份左翼分子的名单，参 Wolfe-Hunnicut, ‘The End of the Concessionary Regime’: 84–86。

16 Frontline, ‘The Survival of Saddam’, Interviews: James Akins, at 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saddam/interviews/akins.html. 另参 Douglas Little, ‘Mission Impossible: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Covert A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Diplomatic History* 28: 5, 2004: 663–701。

17 ‘IPC Considers Options’, 12 September 1963, FO 371/170505。

18 ‘Assessment of the Iraqi Regime’, 14 February 1963, FO 371/170502。

独立的石油公司，要求它们在第 80 号法律的争端解决之前，不接受伊拉克许诺的任何石油合同。与此同时，它却在拖延争端的解决。¹⁹

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也助长了这种先挑起危机、再拖延解决的方法。1966 年，叙利亚试图要求伊石油支付更高的管道过境费用，因为伊石油使用了那条经过叙利亚将伊拉克石油输送到地中海的输油管道。伊石油宁愿停止通过那条管道泵送石油，也不愿支付更高的费用。这次管道关闭从 1966 年 11 月一直持续到了次年 3 月，导致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²⁰ 英国石油乐于看到伊拉克石油生产的停摆，因为这提供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石油供应过多的问题，又能引发与伊拉克的进一步危机。1967 年 6 月，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六日战争（Six-Day War）。作为抗议，叙利亚政府再次切断了这条输油管道。

“制造危机—拖延解决”的策略为主要石油公司争取了十年的时间，但在 1967 年的战争后，这种策略宣告终结。1967 年 8 月，伊拉克撤销了将北鲁迈拉的大片油田返还给伊石油的提议。这一返还计划得到了伊拉克国家石油部的支持，但由于该国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反对

19 'US Government Concerned About the Non-Cooperative Position Seemingly Adopted by IPC', 15 May 1963, FO 371/170504; 另见 FO 371/175777 与 FO 371/17578。伊拉克向意大利的石油公司埃尼（ENI）发出请求，一旦伊拉克石油公司被伊拉克政府国有化，伊拉克政府希望埃尼可以为它提供技术协助。在这之后，英国驻罗马使馆试图向意大利政府施压，要求阻止埃尼与伊拉克的合作（FO371/157725）。1964 年 2 月，英美两国再次要求意大利政府劝阻埃尼，不要接受任何伊拉克政府的石油合同（FO 371/175777）。另参 Wolfe-Hunnicut, 'End of the Concessionary Regime': 144–174。

20 George Ward Stocking, *Middle East Oil: A Study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versy*,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0: 270–299; Marion Farouk-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 *Iraq Since 1958: 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 3rd edn, London: I. B. Tauris, 2001: 99–100。

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所扮演的角色而被阻挡了下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伊拉克政府与 1964 年成立的国有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Iraq National Oil Company）达成了协议，要与那些不易屈从石油巨头或美国政府施压的合作伙伴来共同开发伊拉克的石油资源。1967 年 12 月，伊拉克政府与一家法国国有石油公司达成合资协议，而次年 4 月，政府又开放招标，希望获得技术上的支持，来开发北鲁迈拉油田，以及建设一座位于巴士拉的新炼油厂和一条通向那里的输油管道，并且这个招标项目将由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直接运营，而非作为国际合资企业来运营。1968 年 7 月，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th Party）结盟的右翼军官通过一场政变上台掌权，新政府在 1969 年最终敲定了来自苏联的投标。至此，伊拉克终于能够实现卡塞姆在 1959 年就首次提出的目标，建立起独立的石油加工和出口能力了。²¹

在世界七大石油公司势力范围之外发展石油产业的各个阿拉伯国家，此时都已确立了石油归国家控制的体制。叙利亚在 1964 年国有化了该国规模较小的石油工业，阿尔及利亚在 1971 年 2 月取得了由法国建立的石油工业的多数所有权，而利比亚则在 1971 年 12 月开始将原本由外国拥有的石油生产收归国有。1972 年，伊拉克成为中东石油生产国中，第一个从占据支配地位的英美石油卡特手里夺回了本国石油控制权的国家。当鲁迈拉的油田于 4 月开始投入生产后，伊石油将其在伊拉克北部的石油产量削减了 50%。在准备好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并将两名共产党领导人纳入内阁以确保政府获得民意支持后，复兴党政府在 1972 年 6 月 1 日将伊拉克石油公司收归国有。²²

21 这些进展的细节，见 Wolfe-Hunnicut, "End of the Concessionary Regime": 209-262。

22 Bamberg, *History of British Petroleum*, vol. 3: 171, 469-470。

困入箱中

152 在石油生产国，怠工破坏的力量，这个石油工人与石油公司曾殊死争夺的能力，正在日益被各国政府接管过去。这些逐渐用宫廷卫队和情报机关将自己武装起来的政府，到 1960 年代末时，已经能够进一步抵御外国或国内组织的军事政变所带来的影响了。而在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凡勃伦所谓的“抑制的力量”经历了不同的变化。²³ 石油的崛起削弱了过去基于煤炭建立的劳工联盟，这种联盟曾经将矿工、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联合在一起，并为他们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到 1948 年时，在马歇尔计划的补贴对煤炭转向石油的推动作用下，大规模罢工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提出政治诉求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建立在新的中断工业流程的方式之上。

1958 年，法国社会学家塞尔日·马莱（Serge Mallet）研究了位于波尔多附近，地处吉伦特河口（Gironde Estuary）昂贝斯角（Bec d'Ambes）的一间加德士公司（Caltex）所属炼油厂的工人。加德士是持有阿美的那几家大型石油公司为了销售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而创建的合资企业，最初经营业务的范围在非洲和亚洲。1947 年，当建设将沙特石油输往欧洲的跨阿拉伯输油管道工程开始动工时，加德士接收了德士古在波尔多附近的这间“二战”期间曾被摧毁的炼油厂，并使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重建，以处理从沙特阿拉伯新运来的石油。因此，昂贝斯角炼油厂正是这个为了在欧洲制造一支更为驯服的劳动力而被装载起来的战后石油工业体系的一部分。

23 Thorstein Veblen, 'On the Nature of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1, 1908: 106.

十年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马莱，描述了他所称的“新工人阶级”在昂贝斯角炼油厂的形成。²⁴ 这座炼油厂代表的是一种在 1930 年代兴起并在 1950 年代迅速扩张的、以对原材料的自动化合成和加工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方式。马莱指出，与过去工人直接制造产品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不同，在炼油厂或石化厂中，工人们负责监督物质的流动，并管理复杂新材料的自动化组装。在石油炼制、合成化学、电力能源和电信通讯等行业，工人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管理者，他们所管理的是自动化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流程。同样的自动化加工方法也扩展到了汽车制造、铁路运输、钢铁制造，甚至煤炭开采等行业。工作变得逐渐技术化，抹平了体力劳动和基层管理工作之间的许多差异：“穿着白领制服、监视着持续的石油流动与它所受到的各种高压强度的一位裂化装置操作人员，和监督着他的一位工程师或高级别技术人员之间，已经不再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等级上的差异。”²⁵

这种以监督持续的、自动化的工业流程为基础的劳动形式的兴起，并没有消灭劳工行动。相反，它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罢工。工人们现在并不试图通过完全停工来无限期地关停某家企业——鉴于完全停工对罢工者收入的影响，这样的行动无法持久——他们现在能够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知识，以及他们在自动化流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通过在“生产流程中最敏感的一些环节”引发有限的工作停顿，从而实现“生产过程的系统性失序”。针对工业流程中脆弱节点或关键时

153

24 Serge Mallet, *The New Working Class*, translation of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1969), transl. Andrée Shepherd and Bob Shepherd,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for Spokesman Books, 1975: 85–118.

25 Serge Mallet, *Essays 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ed. and transl. Dick Howard and Dean Savage,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5: 41.

刻的短暂中断，可以让一个产业陷入瘫痪数月之久，同时工人们的家庭收入却不会因此受到太多影响。²⁶

从 1880 年代到 1940 年代，在以煤炭为基础的全国性能源体系的层面上，工人们建立起了对体系中的各种关键流程发动怠工破坏的能力。他们利用这种能力组织起了大众政党，并极大地改善了他们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状况。到了 1950 和 1960 年代，有效怠工破坏行动的地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发生了改变，此时开始集中在复杂的化学、冶金、通信等工业流程中关键性的节点与物质流动上。怠工破坏行动的规模变得更加局部化，这看似降低了它的革命性。但马莱认为，1960 年代后期的罢工浪潮——包括 1968 年的一系列重大动荡，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马莱的著作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表明，工人们能够利用这种力量，来获得对生产活动更大的控制权。

到了 1960 年代末，随着围绕能源供应控制权的斗争在中东地区展开，在已经工业化的世界中，劳工势力为了保障或改善收入水平和工作条件而发起的抗争活动愈演愈烈。这些冲突不仅发生在新的制造业流程中，也发生在一个历史更悠久的行业，而在这个行业里，有序组织的材料流动仍然能够被成功阻断：这个行业就是交通运输业。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对铁路、航运、码头作业以及越来越多对航空业的干扰活动，约占全球劳工抗争活动的 35% 到 40%。其中，在停工对上下游诸多环节造成影响最大的航运和码头业发生的劳工抗争活动，占了全部活动的一半以上。²⁷

26 同前注：第 43 页。

27 Beverly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8–100.

最能有效应对这些抗争活动的方式则再一次利用了石油。在一个世代以前,改用石油作为动力燃料的来源,在击败煤炭工人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石油的生产和运输形成了网格式的能量网络,将一次能源的生产者与主要工业化地区的能源使用者相互隔绝开来。这种网络灵活可变、跨越远洋,克服了运输煤炭僵化固定、局限在特定区域的能量网络所具有的脆弱性。与那次一样,石油再一次提供了某种部分地体现在空间上的、以更具有流动性的作业流程的引入为基础的修复/固定(fix)。²⁸这一次,能源的生产者与使用者维持跨洋相隔,则依赖于使用廉价的石油来运输标准化的金属集装箱。

154

第二次改变的实现,靠的是运输的集装箱化(containerisation)。在公路、铁路和水路上都能运输的标准规格金属货运集装箱的问世,让货物可以被大批量地运输,而不需要使用劳动力在货物从一种运输方式切换到另一种时,负责卸货、堆放和重新装载单个商品。石油的流动性之所以可以使能量轻松便捷地跨越遥远的距离输送,是因为石油可以被泵送到油轮上,从而省去了煤炭搬运工和发动机司炉工的工作,而与之十分类似的是,货运集装箱让固态的、工业制成品的移动,变成了一种具有流动性的、无间断的过程。过去也曾有一些尝试推广使用集装箱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不同运输商偏向于使用不同规格的集装箱,这就使人们很难堆叠不同厂商的集装箱,也很难制造尺寸最优化的卡车、火车和轮船。1965年,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升级,军用物资的供应超出了西贡港口设施的承载能力,引发了一场后勤物流的危机,从而促使美军开始推行集装箱化,并加速了标准集装箱规

28 关于“空间修复/固定”(spatial fix),参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格的采用。1969 年，航运业引入了能在货舱和甲板上装载超过 1000 个集装箱的新型特制巨轮。集装箱的使用省去了码头工人大部分的技术性劳动，消除了工会的力量，并帮助中止了工业化国家的劳工状况在 1945 年后的二十年间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²⁹

集装箱不只是在码头工人能够施展力量的那些狭窄节点上重新组织了控制关系而已。它与 1960 年代的廉价石油相结合，使得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成为可能，就像工业化国家的能源供应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被外包到海外一样。在将军事物资从美国运送到越南之后，那些集装箱货轮只能空载回程。为了寻求赚取额外收入的方式，船运商们开始让航程经过日本，捎带日本的工业制成品回美国，而这让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日本对美国出口激增。

由于生产被外包给了日本和其他工会化程度更低、劳工工资更低的国家，此时，西方国家的工业劳动力面临着生产成本降低与失业的威胁。在 1966 年之后的十年间，工业制成品国际贸易量的增长率达到了全球制造业总产量增长率的两倍。³⁰ 全球航运的扩张增加了对石油的需求，并为石油价格的上涨创造了条件。1973—1974 年石油价格的大幅飙升，中断了制造业外包的发展，因为集装箱化所节省的成本突然被跨洋运输大幅升高的燃料费用抵消了。然而，在 1976 年，趋于平稳的能源价格，加上吨位更大的新一代集装箱货轮的问世，使制造业外包的增长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读到的，石油危机及其市场规律所带来的那种“冲击”，可以被用来解释劳动条

29 Marc Levinson,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30 Levinson, *The Box*: 11, 184–188.

件改善的终结，以及在之前的几十年间工人们所赢得的政治权力和更平等的生活形式的逐渐被剥夺。

制度化的无用性

1964年，英国政府曾试图以提供某样东西作为交换，鼓励巴格达新上台的军政府解决它与持有伊石油的外国石油公司之间的争端。这样东西就是军火。英国驻伊拉克大使在与伊拉克总理举行会谈，讨论前一年倒台的卡塞姆政府在被推翻前通过的石油法时，“借此机会顺便提到了英国向伊拉克供应武器和设备的议题”。大使向伦敦报告称，他“仅仅是并列提到了这两件事情”，并告诉伦敦，利用军备销售换得伊方在石油争端中让步的计划难以成功，因为“他们向我们购买武器，实际上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向伦敦解释道，伊拉克人“以英镑来支付大笔款项”是在缓解英国日益恶化的贸易平衡，而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寻找其他武器供应方”。一个月后，英国外交部在同一份文件中注明，伊拉克此时正在向苏联购买武器，而这“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主要军火企业在合同签订后的履约表现不佳”，英国将“不得不努力说服伊拉克人继续购买英国武器”。³¹

尽管大使假装石油和军火这两样东西仅仅是并列提及，但二者其实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相互配合着：一样极其有用，另一样则重要而无用。随着石油生产国逐渐迫使大型石油公司向它们分享更多的石油利润，越来越多的英镑和美元流向了中东。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

31 'Roger Allen, Ambassador in Baghdad, to Foreign Office', 8 February 1964, FO 371/175780; cover note added 12 March 1964.

国际金融体系的持续运行，英美两国需要一种机制，来使这些货币得以回流。这对美国来说尤其是个问题，因为美元的价值是与黄金挂钩的，并且这种挂钩关系构成了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的基础。军火是一种特别适合承担这个资金回流任务的东西，因为军火的购买并不受它是否有用的限制。石油生产与军火制造之间的紧密配合，让石油与军国主义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³²

对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对中东军售的急剧增加，传统的解释都依赖于各大军火商和支持它们业务的各国政府的说法。由于军火贸易激励了中东国家的军事化，因此，它的增长也塑造了碳民主的发展。要理解石油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这一维度，我们需要先拆解那些为军售提供正当性的辩护理由，并给出一个替代的解释。

无论是食品或服装这样的消耗品，还是汽车和工业机械这样更耐用的商品，大多数商品的购买迟早都会到达一个极限，而超过这个极限之后，从实际的角度来说，人们无法再使用更多的该商品，也不可能给出合理的理由来进一步购买它。鉴于石油收入规模巨大，而许多开始积累石油收入的国家人口相对较少且普遍贫困，因此，这些国家购买美国普通商品的速度就无法达到足够高，高到可以显著平衡美元向这些国家的流入（况且许多普通商品可以从第三国购买，比如德国和日本，但这样的购买无法改善美元面临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军

32 尼灿和比希勒对军火与石油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他们将这种关系的动因归结于军火制造业在美国主要企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相比于供给国内政府的需求，军火的出口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然而，两位作者低估了美元回流和军售的有意浪费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尤其是向石油生产国军售的情况中，因为这些国家支出资金的其他选项有限。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The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198–273。

火可以买来储备而非使用，而且这种做法自带其独特的正当性。在一套适当的安全教义的指导下，规模越来越大的军火购买是可以有合理的理由被合理化的：拥有军火，就可以降低实际使用军火的必要性。到 1960 年代，某些武器，如美国的战斗机，在技术上变得日趋复杂，单件武器的造价可能就会超过 1 千万美元，这为美元的回流提供了一种非常紧凑高效的工具。因此，购买军火的数量可以不受任何实际需要或消费能力的限制。随着越来越多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流向中东，昂贵武器的销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美元回流装置——一个可以不受任何常规商业限制的约束而不断扩张的装置。

自 1945 年以来，美国一直依赖和平时期国内军事开支的“制度化的浪费”（institutionalised waste），以吸收过剩的资本，并维持国内几家大型军火制造商的盈利能力。³³通过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上的开支，美国强化了这种浪费的机制。1960 年代末，当对亚洲战事的支出预期开始下降时，美国二十余家军事承包巨头迫切需要为其军备找到新的销路。由于军火商无法再依靠美国政府军购的增加，于是它们试图将针对外国政府的军售，这个原先规模相对较小，并且主要依靠美国政府海外发展援助项目来提供资金的贸易，转变为一项商业性的出口业务。³⁴ 关心美元回流的金融商们现在拥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157

33 索尔斯坦·凡勃伦在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36–42 中注意了“炫耀性浪费”（conspicuous waste）的作用，但没有将之与军事开支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后续著作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5 中也是如此。

34 参 Nitzan and Bichler,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 206–210, 文中指出了核心的军火商。1950 年代，95% 的美国军火出口都是由政府援助资金来支付的，而到 90 年代这个数字大约只有 30%。同前注：第 216 页。

同时，在中东的独裁者和军事政权看来，军购提供了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来展示国家的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一旦西方将武器的供应从某种政府对政府的援助转变为一门商业交易，就为掮客或中间人打开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在当地国家与外国公司之间充当经纪人的角色。统治各个国家的家族的成员、他们的姻亲和政治盟友，都很适合担任掮客的角色，这样，以军火购买的形式回流的石油收入中的一部分，就能够轻松转移到巨额的私人财富积累中。

伊拉克在 1967 年以后就转向从法国和苏联购买武器，以此回报这两个帮助它发展起了国家石油工业的国家。对英美两国来说，资金回流的主要地点是伊朗，在 1967 年后的十年间，伊朗进口的武器规模几乎是伊拉克的三倍。³⁵ 伊朗沙阿在 1966 年批准了一项从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采购新型 F-111 战斗轰炸机的军购案，但这款机型不仅费用超出预算，性能也不达标，甚至在试飞时还经常坠机。³⁶ 于是，沙阿便劝说西方石油财团，将伊朗的石油产量每年增加 12%，从而为这项军购以及未来的军事开支提供资金。一年以后，由于阿拉伯国家在 1967 年 6 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期间实施了石油禁运，各大石油公司便增加了在伊朗的产量，达到了预期目标的两倍，但在 1968 和 1969 年，伊朗又要求石油收入还要取得更大幅度的增长。

35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t 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36 该机型为海军设计的更小的衍生机型 F-111B 存在太多缺陷，因此在投产后不久就被取消，并以格鲁曼（Grumman）公司设计的 F-14 战斗机取而代之。最终交付伊朗的也是 F-14，而这笔采购订单把格鲁曼从破产边缘拯救了回来。Marcelle Size Knaack, *Encyclopedia of US Air Force Aircraft and Missile Systems*, vol. 1,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78: 222–263; Anthony Sampson, *The Arms Bazaar*,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7: 249–256.

随着武器和装备供应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军火承包商、银行家、设计公司、咨询师、公关公司和军官开始从这项资金的流动中获益，并把他们自己打造成了这些资金所流经的毛细血管和动脉。美国的银行和军火制造商，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同行们的帮助下，将武器的出口变成了西方利润最丰厚的出口产业之一。³⁷

158

关岛主义

由于军火销售之所以有用恰恰在于军火本身的无用，而军火被销售出去的数量达到了空前庞大的规模，因此，它们需要某种特殊的装置来为之提供正当性。要将超大规模的武器过度消费重塑为一种必要之举，这个工作的完成，靠的是一套新的有关不安全（insecurity）的修辞话术，以及美国为了制造或维持这种必要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经验而发起的一系列行动。

“二战”后，美国制造关于中东的不安全感，靠的是宣扬共产主义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威胁，但这套老调已经难以重弹了。苏联虽然终于在波斯湾地区的油田间站稳了脚跟，但并没有像冷战的专家所曾警告的那样，威胁到西方的石油供应。苏联在 1968 年对伊拉克开采北鲁迈拉的巨型油藏提供的援助，使伊拉克终于能够开始从一块西方花了四十多年（或七十多年，如果从巴格达铁路那时算起）的时间一直试图延迟开发的油田中生产石油。苏联并不是在威胁西方的石油供应安全，苏联真正构成的威胁，是要增加石油的供应。

37 Nitzan and Bichler,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 198-273; James A.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阿拉伯国家在 1967 年 6 月战争中的失败，削弱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巩固了海湾地区西方扶植的各个保守政权。它们的失利也加速了英国的金融危机。阿拉伯国家短暂的石油禁运和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导致英国从海湾地区获得的英镑石油供应被迫中断，并引发了一次英国国际收支的危机，最终迫使工党政府贬值英镑，进而放弃了在战后维持英镑作为国际贸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努力。为了对抗这场金融危机，英国在 1968 年 1 月宣布，将在四年内从海湾地区的各个酋长国撤出所有的军事力量，结束它在中东的帝国强权角色。³⁸

来自华盛顿多家右翼智库，尤其是新成立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军国主义者们开始警告称，英国的撤离会在该地区造成“权力真空”。然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当地权力的真空，或至少是“泄气”，英国才找到了合理的理由，结束它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英国外交部报告称，由于“阿拉伯革命分子”在经历了 1967 年的失败之后已经“完全泄了气”，海湾地区的各个酋长国才可以在没有英国军事存在的情况下生存下去。³⁹

负责阿拉伯半岛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意这一判断，并且认为，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声称敌对势力已经准备好填补英国撤离留下的“真

38 Steven G. Galpern, *Money Oil and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Sterling and Postwar Imperialism, 1944–197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8–282.

39 Foreign Office Minute, May 1971, FCO 8/1311, 转引自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Gulf’, in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Scramble for Empire, Suez and Decolonization: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I. B. Tauris, 2006: 877–903, at 888. 美国所做的一项类似评估，参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34-69-IRAN’, 10 January 1969,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E-4: *Documents on Iran and Iraq, 1969–1972*, ed. Monica Belmonte and Edward C. Keefe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ocument 1, available at history.state.gov, 后文中简记为 FRUS。

空”，这种说法，“就算不是失实，也是言过其实”。他指出，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主要阿拉伯强国“被以色列人和库尔德人牵制在了别的地方”（以色列资助了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叛乱），而在一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看来，一个被军事力量武装的伊朗“更是一个威胁，而非一种安慰”。⁴⁰

伊朗沙阿抓住了英国撤离的机会，把伊朗已经在进行中的大规模军购，描绘成一项将伊朗武装成该地区警察的计划。然而，沙阿面临的唯一重大威胁，是它的政府正在搜捕和监禁的国内政治反对派，这些反对势力的声势与日俱增，但抓捕异议分子这种形式的警察任务，是用不上他所希望购买的大部分武器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求购买越来越精密、越来越昂贵的武器，并要求获得更多的石油收入和大笔美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来支付军购费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向华盛顿转达了伊朗沙阿从美国军火商那里学来的一套论述：增加武器销售“将有利于美国的工业（他提到 DOD 有义务救助陷入财务困境的洛克希德公司），对美国国际收支面临的困难也大有帮助，还能服务于我们自己在海湾和中东的关键战略利益”。⁴¹

军火制造商们帮助推广了有关区域不安全和国家军事实力的教义，并指示它们的代理人在洽谈武器销售时，不要把它说成某种商业的安排，而要从战略目标的角度去讨论。1968 年 9 月，诺斯洛普公司（Northrop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官汤姆·琼斯（Tom Jones）写信

40 William D. Brewer,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try Director for Saudi Arabia, Kuwait, Yemen and Aden to the Country Director for Iran', 27 February 1970, FRUS, Document 51; Douglas Litt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A Cold War 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4, 2010: 71.

41 DOD 指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uglas MacArthur, 'Embassy in Ir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 March 1970, FRUS, Document 55.

给金·罗斯福（Kim Roosevelt，前中情局特工，曾策划了1953年推翻摩萨台政府的政变，而他此时经营的咨询公司正在协助推进向伊朗沙阿的军售），希望他帮忙尝试把诺斯洛普生产的P530轻型战斗机卖给伊朗，因为这种机型一直找不到买家：“在与沙阿的任何讨论中，”琼斯解释道，“重点在于，要让这些讨论始终基于根本的国家目标来进行，而不能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销售计划。”⁴²

1969年，刚刚当选的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无意中为军火制造商及其客户称呼这些“根本的国家目标”提供了一个新的术语——所谓的“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该年7月，尼克松访问东南亚，在行程经停关岛时，他向媒体发表了一番不供公开发表的非正式谈话。尼克松发表这番言论，是为了向该地区受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保证，他所承诺的美国从越南撤军的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发生一个全面性的政策转变，美国还将继续依靠武装和协助其扈从国，来对抗群众势力和民主运动的威胁——或华盛顿所称的“颠覆”——而只有在当地的镇压叛乱计划失败时，美国才会站出来公开干预。这番关于直接干预只会发挥有限作用的言论，同样也为尼克松政府在这番公开承诺背后秘密开展的行动——大规模升级对越南的战争，并将战事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提供了掩护。美国媒体由于无法公开报道或直接引用尼克松将继续武装美国扈从国的保证，便开始将这一方针简称为关岛主义（Guam Doctrine），随后干脆直接称作尼克松主义——这个词日后将被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团队采用。在美国媒体的宣传中，这种延续美国与其扈从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军事关系的政策，被视为标志

42 引自 Sampson, *Arms Bazaar*: 248。

着美国政策的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一说法在随后几乎所有讨论美国外交政策与中东问题的学术研究中都得到了响应和认可。⁴³

将美国现有的反叛乱 (counterinsurgency) 政策转变为一门“主义”的好处在于，像沙阿这样的统治者，以及他在美国军火公司和智库中的盟友们，现在能诉诸这门主义，要求美国赋予他们与东南亚的独裁政权相同的角色。伊朗沙阿坚持要求华盛顿要么以国会贷款的方式补贴他的军购，要么施压美国石油企业增加伊朗的石油产量，从而让他获得更多石油收入来支付军火账单。美国大使向华盛顿报告沙阿的观点称：“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帮助他在海湾地区贯彻尼克松主义，因为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盟友的利益同样遭受着威胁。”⁴⁴

举起尼克松主义的大旗，让沙阿和他的支持者们成功克服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反对。1972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致信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信中批评了华盛顿那些主张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以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来阻止伊朗过度购买军火”的人士。为了绕过国务院而使用了秘密管道来传递这封信的大使还警告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在争取军火合同，并坚称“我们没有理由失去这个市场，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国际收支账本上的赤字”。在这封信的页边，基辛格加了一行手写的批注：“总之，我们的政策绝对不是去阻止伊朗的军购。”⁴⁵

161

43 Jeffrey Kimball, 'The Nixon Doctrine: A Saga of Misunderstanding',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6: 1, 2006: 59-74. Mahmood Mamdani, *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ew York: Pantheon, 2004: 63-118 追溯了美国反叛乱战略的延续性。

44 MacArthur, 'Telegram 1019'.

45 Harold Saunders, '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14 July 1972, FRUS, Document 212; 亦参 Wolfe-Hunnicut, 'End of the Concessionary Regime': 273.

面临美元价值暴跌的危机和军火公司与日俱增的游说，尼克松政府决定向沙阿出售沙阿本人及其美国说客所要求获得的全部武器，并使军售绕过了常规的政府审查流程，创造了如参议院的报告所形容的一笔“美国的武器制造商、三个军种的采购部门与国防安全援助局（Defense Security Assistance Agency）的滚滚横财”。⁴⁶ 由于国会不愿为额外的军售信贷提供资金，纽约各大银行也开始担心沙阿是否能偿还贷给他的军购款项，美国政府于是也开始推动石油价格的上涨，以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⁴⁷ 将美国与伊朗及日后其他产油国的石油贸易武器化的决定，被表述为将“尼克松主义”延伸至海湾地区，这为庞大的军火转移提供了一个它所需要的、用来解释它的装置。日后关于这些事件的历史论述也忠实地再现了这套解释合理性的装置。

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读到的那样，尼克松政府还阻挠了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有时甚至包括它自己的国务院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以维持美国的“安全”政策将越来越依赖的各种形式的不稳定与冲突。在另一个“牵制”着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地区库尔德斯坦，华盛顿未能阻止伊拉克与库尔德人在1970年达成和解，但两年后，面对这个会让海湾地区局势变得更稳定的威胁，尼克松政府同意与以色列和伊朗合作，重新向一个库尔德派别提供军事援助，以重燃冲突。美国国会后来发起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这样做，目的并不是使库尔德人赢得政治权利，而仅仅是“维持一定程度的敌对状态，使之足以消耗我们盟友的邻国〔即伊拉克〕的资源”。⁴⁸

46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200.

47 关于这些纽约的银行，参 MacArthur, 'Telegram 1019'.

48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205; Litt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74-85.

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以及为军售提供支持的那套教义，对于保护海湾地区或捍卫美国对该地区石油的控制来说，并没有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美国的主要石油公司都向政府游说，反对增加向伊朗供应武器，也反对为增加军售提供合理性的那套教义。这些公司认为，美国停止支持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并允许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可以更好地保障海湾地区的政治稳定。尼克松政府也大幅增加了为以色列的军售，不过，为以色列提供的武器并不是用当地的石油收入来支付的，而是由美国纳税人负担的。这些石油公司认为，武装以色列的盟友伊朗，只会加剧美国一边倒的中东政策。石油公司反对向伊朗大量出售军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德黑兰为了支付这些武器就需要增加石油的收入，而这会迫使它们将生产从阿拉伯国家转移到伊朗，从而削弱这些公司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使那些同样也在伊朗生产石油的欧洲石油公司和独立的美国石油公司从中获益。此外，对伊朗军售也可能导致伊朗要求得到更高的利润分成。⁴⁹

美国对石油生产国大规模军售的荒谬在日后变得显而易见：伊朗的国家机器武装到了牙齿，却在1979年的革命中被街头抗议和石油工人领导的总罢工推翻；沙特阿拉伯在武器上投入了数百亿美元，却在1990年面对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时无可奈何。然而，无论美国的军售有多么过度，它都导致了这些石油生产国的军事化，而这会给当地民众带来持续的后果。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1960年代，当政府用英国供应的武器来镇压他们时，就已经发觉了这种后果，而当伊朗和美国在1975年突然切断对库尔德人暴动的援助时，他们还会再次发觉

49 Wolfe-Hunnicut, 'End of the Concessionary Regime': 242-243.

这一点。当伊朗政府动用美国提供的直升机向 1978—1979 年间的政治示威活动开火，以及无数类似的事件发生时，伊朗的抗议者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后果。这些国家的军事化也让美国更倾向于看到中东危机得不到解决、乐见战事持续下去的各个利益团体联合了起来。⁵⁰

重组怠工破坏的力量

伊拉克已经通过开发油田、铺设管道和建立炼油厂，装配起了能够掌控本国石油的政治力量。但是，要完全掌握石油的控制权，还需要更多：不仅需要不依靠英美大型石油公司来独立生产石油的能力，还需要一种协调各方通过有组织地缩减石油产量，来施压大型石油公司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各石油生产国一直是单打独斗地要求增加石油生产的总量或分得的份额。如今，这些国家则希望建立起集体限制生产的能力。利比亚是首先达成这个目标的石油生产国，但这个减产能力是从更广泛的怠工破坏行动中装配出来的。

163 中东石油的主要消费地在欧洲。要把中东石油运送到欧洲的炼油厂和市场，就必须把它从伊拉克和海湾地区通过管道输送到地中海沿岸，再把它装上油轮，航经另一条狭窄的通道——苏伊士运河。包括输油管道和航道在内的各条通道，以及这些通道分岔、收窄或终止的节点，是能源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这些通道和节点的控制，是直到 1970 年代依然控制着中东石油生产的少数几家跨国石油公司的首要关切。这种控制不仅仅在于保持通道畅通无阻。大型石油公司还

50 Nitzan and Bichler,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

想要拥有限制石油流动的权力，以应对供应过剩以及因此导致的油价下跌、利润降低这个持续存在的威胁。这些公司企图限制不受它们所控制的独立输油通道的发展，以免这些通道破坏它们彼此之间在生产配额和价格垄断方面达成的各项约定。它们还需要维持一套由替代性的石油供应路线和供应来源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运作方式类似于电网，如果某个产地、某条运输路线遭到了干扰或卷入了争端，石油公司就可以关闭这个产地、绕开这条路线。

直到 1960 年代末，对石油流动的这种管理基本没有遭到什么撼动或破坏，挺过了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初的一系列危机。它甚至经受住了苏联的威胁。这里所说的苏联威胁，并不是自苏联在 1946 年尝试阻止美国的石油公司染指伊朗北部的行为被用于制造“冷战”以来，就一直被公众讨论的那个想象中的威胁——也就是，认为苏联也许会夺取中东的油田，而这被想象成俄国向南扩张势力范围的“大博弈”的延续，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读到了这个术语的发明。更真切的担忧在于，苏联也许能找到办法，将它的里海油田以及伏尔加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广阔的新油田与西欧客户连接起来，跨国石油公司会因此面临价格竞争的威胁。1950 年代，随着里海油田的生产从“二战”期间遭到的破坏中逐渐恢复过来，苏联开始尝试向欧洲出口石油。跨国石油公司依靠控制流通渠道，同时也依靠美国政府以“安全”为由施压北约成员国不许苏联石油输往西欧，成功阻止了苏联石油的销售。⁵¹

51 瑞典是这项禁令的主要例外。它当时不是北约成员国，而且该国业务范围涵盖煤炭、钢铁、炼油的企业集团——A. 约翰逊公司（A. Johnson and Co.）实力足够雄厚，可以独立于各大跨国石油公司自主经营，并与苏联开展贸易。Hans de Geer, 'Trading Companies in Twentieth-Century Sweden', in Geoffrey Jones, ed., *The Multinational Trad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41–144; and Peter R. Odell, *Oil and World Pow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48–71。

在苏联的威胁得到遏制之后，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在 1960 年代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规模较小的独立石油生产商、炼油商和分销商的崛起。这些企业以低于被石油巨头的卡特尔限定的垄断价格进行交易，由此逐渐占据了石油贸易的一小部分份额，迫使大石油公司不得不压低下游环节（炼油与分销）的价格，并导致它们日益依赖从中东的石油生产中获得的巨额利润。⁵²

从 1960 年代末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 1967 年 6 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伊拉克—叙利亚输油管道再次被切断，苏伊士运河被封锁无法通航，巴林的石油工人关闭了两座炼油厂，利比亚石油工人发动的一场总罢工导致的黎波里石油停止了对外出口。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和其他支持以色列攻击的国家，如英国和西德等，实施了石油禁运。伊拉克提议，将石油禁运从 9 月 1 日起延长三个月，理由是只有在冬天限制石油的供应才能让禁运达到效果。伊拉克还要求将当地的石油生产企业国有化。但是，沙特阿拉伯设法使禁运措施被解除，而利比亚政府则平息了罢工并逮捕了工运的领袖。⁵³

1969 年 5 月，巴勒斯坦的一个抵抗组织把输送沙特石油到地中海的跨阿拉伯输油管道炸出了一个洞。这条管道途经一块现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被炸出的洞就位于这一部分。尽管这种破坏一般在几个小时内就能修复，以色列却拒绝允许阿美公司维修管道，除非它向以色列支付一笔管道保护费。这场争执导致跨阿拉伯输油管道关闭

52 Stocking, *Middle East Oil*, 416–433.

53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5; M. S. Daoudi and M. S. Dajani, 'The 1967 Oil Embargo Revisite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3: 2, 1984: 71–72, 80. 沙特当时已经允许控制着跨阿拉伯输油管道的美国企业阿美公司恢复石油的输送，哪怕这条管道有几英里穿过了叙利亚南部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东北角。

了四个月。⁵⁴ 同时，以色列还继续封闭着将石油输送到欧洲的另一条主要通道——苏伊士运河。它在 1967 年对埃及的入侵导致了运河被埃及封锁，而因为它拒绝联合国与美国提议的以恢复 1967 年之前的边界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案，使得这条航道持续处于关闭状态。

苏伊士运河的封锁让以色列自己变成了一条输油通道，尽管这段往事鲜为人知。由西德秘密出资，以色列政府与伊朗合作，建设了一条从埃拉特（Eilat）到阿什凯隆（Ashkelon）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将伊朗的石油从红海运往地中海，绕过了苏伊士运河，使伊朗得以松动各大石油公司对其石油工业的控制。它也使以色列能够出口战争期间从西奈半岛的一处埃及油田夺得的石油。⁵⁵ 为了规避大型石油公司对市场的控制，伊朗和以色列通过一家在瑞士注册的合资企业——跨亚石油有限公司（Trans-Asiatic Oil Ltd.）来销售石油，其中大部分都由罗马尼亚运往了西班牙，因为佛朗哥领导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府已成功地排除了国际石油公司在该国经营。⁵⁶ 与此同时，埃及也试图在苏伊

165

54 跨阿管道公司最后同意支付维修和清洁的费用，并承担保卫管道安全的开销。参 James Feron, 'Israel in Accord with Aramco on Repair of Damaged Tapline', *New York Times*, 11 July 1969: 7; 'Israeli Jets Strike Military Targets in Egypt and Jordan', *Washington Post*, 17 September 1969: A26。

55 Uri Bialer, 'Fuel Bridge across the Middle East: Israel, Iran, and the Eilat-Ashkelon Oil Pipeline', *Israel Studies* 12: 3, 2007: 29–67。这条管道取代的是一条口径较小的管道，后者是用以色列在 1956 年入侵西奈半岛期间从那里占为己有的 200 公里长的管道以及油泵等其他设备建造而成的，用来将少量的伊朗石油输送到位于海法的炼油厂。这条在 1967 年之后修建的管道确保了以色列的石油供应，同时，修建它也是为了减少欧洲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

56 1970 年代，负责处理从以色列这条管道里流出的石油的交易员马克·瑞奇（Marc Rich）利用这些石油打破了石油销售的合同制，创建了石油的现货市场。这种交易方式将终结通过大型石油公司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协议给石油定价的方法，并让石油期货的投机市场得以发展。过去，石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个体系的创建，是为了限制金融投机者对全球的威胁，然而石油本身却在后来成了金融投机的媒介。Daniel Amman, *The King of Oil: The Secret Lives of Marc Ri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9: 64–86。

士运河的另一侧建设一条可以绕过运河、将苏伊士湾与地中海区域连接起来的输油管道，但它在大型石油公司的控制之外开辟一条石油通道的努力，却被英国政府阻挡了下来。⁵⁷

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也加速了石油巨头对供应路线的控制另一个层面上的削弱：西欧绕开了从“二战”以来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就一直试图对苏联石油实施的禁运，而开始从该国大量获取石油。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第一次关闭后，恩里科·马泰（Enrico Mattei）领导的意大利国有石油公司埃尼开始从苏联获取石油。1968年，苏联建成了一条通向波罗的海的输油管道，终点位于拉脱维亚沿海城市文茨皮尔斯（Ventspils）。苏联的石油此时能以低廉的费用输送到北欧了。⁵⁸

中东石油的流动所经受的这些中断与变动，还具有更深远的影响。1901年，奥斯曼帝国授予了开发伊朗南部石油的世界第一份石油特许权协议——正如第二章所述，当时授予这份特许权协议的部分动机，同样在于阻挡俄国石油的出口——自此，西方的石油公司就一直控制着中东石油的流动，并利用这种控制来管理全球油价。七十多年后，1967年战争带来的动荡持续还不到三年，这种控制终于被摧毁了。

1969年9月1日，利比亚的一群军官夺取了政权，废除了君主制。他们从狱中释放了三十六岁的工运领袖，曾领导1967年石油工人罢工的马哈茂德·苏莱曼·马格里比（Mahmud Sulaiman al-Maghribi），

57 Elie Podeh, 'Making a Short Story Lo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ez-Mediterranean Oil Pipeline in Egypt, 1967-77',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8: 1, 2004, 61-88.

58 Marshall I. Goldman, 'The Soviet Union', in Raymond Vernon, ed., *The Oil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76: 130. 当油气资源丰富的阿尔及利亚在开展反抗法国的独立斗争时，恩里科·马泰还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保持了联系（P. H. Frankel, *Mattei: Oil and Power Politic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6: 120）。

先是任命他担任总理，当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aptain Muammar Qaddafi）在次年4月以政变领导者的角色登场并接替马格里比的总理一职后，他又被任命去领导一个负责重新谈判该国与外国石油公司合同条款的小组。⁵⁹一开始，这个小组与埃克森和西方石油（Occidental Petroleum）开展的谈判毫无进展，直到一台叙利亚的推土机将谈判局势推到有利于利比亚的一边。1970年5月3日，在叙利亚南部靠近约旦边境的地区一个铺设电话线的施工现场，一台推土机撞断了跨阿拉伯输油管道。沙特人称，这次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破坏”。⁶⁰为了利用石油供应的中断争取更高的管道过境费，叙利亚政府拒绝维修，使管道关停了九个月之久。⁶¹在管道被破坏的两周后，叙利亚石油部长会见了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对等官员（阿尔及利亚此时正向法国要求修改与之签订的石油合同），各方同意，要为与石油公司“冗长而无果的谈判设定一个限制”，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单方面的行动来实现从石油收入中获得更高份额的要求，并且还要设立一个在与石油公司发生任何对抗时相互支持的互助基金。⁶²由于沙特向欧洲每日50万桶的石油供应遭到切断，利比亚便能够施压西方石油，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规模相对较小、且没有其他石油供应源的公司，迫使其接受新的税率，由此打破了石油公司之间结成的攻守同盟。利比亚成为第一个利用对石油供应的禁运而赢得石油生产率提高的产油国。

59 Joe Stork, *Middle East Oil and the Energy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153–157.

60 Francisco Parra, *Oil Politics: 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 London: I. B. Tauris, 2004: 122.

61 'Hopes Rise for Tapline Repair', *Washington Post*, 6 December 1970: 25; 'Pipeline in Syria is Reopened After Nine Months', *New York Times*, 30 January 1971: 3; Paul Stevens, 'Pipelines or Pipe Dreams?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Arab Transit Pipelines', *Middle East Journal* 54: 2, 2000: 224–241.

62 'Chronology: May 16, 1970–August 15, 1970', *Middle East Journal* 24: 4, 1970: 500.

挂牌价格

由于大型石油公司已经承受着来自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中断，利比亚的石油禁运就具有了更大的威力，能够破坏这些公司对富油国家石油生产利润税率的主宰权。

自 1930 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一直掌控在国际石油公司手中。这些试图限制中东石油供应的公司，与美国政府的生产配额和进口管制体系协作配合，共同影响着全球石油的供应与定价。在美国以外，七家主要跨国油企在 1928 年达成了卡特尔协议，以应对在伊拉克发现的大量石油，以及苏联的“石油攻势”。协议为每家公司划分了专属的市场范围，并为各公司设定了产量配额，旨在将世界石油价格维持在美国国内价格的水平上。⁶³ 而为了调控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 自 1932 年起为石油产量设定了配额。⁶⁴ 当中东石油的产量在“二战”后开始增加，使石油价格面临下跌的威胁时，国会向主要石油公司施压，要求它们限制从中东进口石油，从而保护美国的油价。1954 年，由业界与政府共同组

63 Alzada Comstock, 'Russia's Oil Offensive', *Barron's*, 30 January 1928: 17. 亦参本书第四章。

* 得州铁路委员会过去曾是监管得州铁路事务的组织，后被授予得州范围内石油生产的管辖权。虽然在 2005 年它的铁路管辖权被移交出去，但名称仍维持不变。这个名不副实的组织现在是美国唯一有权对石油生产做出计划性调控的部门，但范围仅限得克萨斯州（美国石油产量最大的州）。——编者注

64 得州铁路委员会配额制度的效力，因俗称“热油”法案的 1935 年联邦《康纳利热油法案》（Connally Hot Oil Act of 1935）而得到了强化。Harold F. Williamson, *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dustry*, 2 vol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9–1963, vol 2: 543–544. 得州铁路委员会的配额制度推出三十年后，欧佩克以它为模板，推出了其自身的国际石油生产配额制度。Anthony Sampson, *The Seven Sisters: 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5: 92。

成的石油政策委员会（Oil Policy Committee）确立了美国石油进口配额的常态化制度，并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59 年发布总统公告正式施行，将美国石油进口额度设定为国内需求量的 9%。⁶⁵ 尽管在中东地区能获得成本低得多的石油，这个限制进口的政策，让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得以继续扩张。结果，美国的石油储藏消耗得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快。到 1971 年，美国本土四十八州的石油储备量全都越过了峰值，美国的石油产量自此开始下降。产量的下滑加上需求的持续上升，意味着美国已经不再拥有调控油价所必需的过剩产能。

1960 年，为了应对艾森豪威尔推行的进口配额所导致的对非美国石油需求量的下降，委内瑞拉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海湾地区的其他三大石油生产国——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共同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于军政府刚刚被革命推翻并由民选政府上台执政的委内瑞拉来说，它之所以参与创建欧佩克，是为了借鉴美国各州之间关于生产配额的集体安排，以便使自己也可以通过限产的手段，在谈判中争取到石油收入份额的增加，并节约该国的石油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有序增长，同时避免过早地耗尽石油储藏。而中东产油国起初则试图通过增加产量，来维持石油带来的税收。等到十年后，它们才有能力采取美国限制产量的做法来增加石油收入。⁶⁶

65 Williamson, *American Petroleum Industry*: 543–544. “陆路”进口的石油享受配额豁免，这是为了保护加拿大的石油公司，因为它们的输油管道只通到美国，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市场。墨西哥的石油公司虽然没有将石油输送到美国的管道，却也利用了同样的豁免：从前走海路将墨西哥的石油运往新泽西的油轮，如今把终点改成了得州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而油罐车会在那里把这些墨西哥石油运送到美墨边界以南 12 英里处，然后经陆路再度进口到美国。Richard H. K. Vietor, *Energy Policy in America Since 1945: A Study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0.

66 Parra, *Oil Politics*: 89–109.

石油生产国在与石油公司就其所应缴纳的税金数额进行谈判时，面临的其中一个难题是，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前，原油并没有“市场价格”。美国的石油价格是根据政府设定的生产配额及进口配额来确定的，而在其他地方，大部分原油要么是被大型石油公司转移到它们自己附属的炼油子公司，要么是通过长期的合同，以非常低的价格在两家大公司之间交易。石油公司支付给生产国的税额水平，是根据被称为“挂牌价格”（posted price，又译“牌告价格”或“标示价格”）的一个人为规定的数字计算得出的。这是由石油公司设定的一个基准价格，每桶原油的税额被设定为这个价格的 50%。在艾森豪威尔实施了进口配额制之后，各大石油公司降低了原油的挂牌价格，从而减少了各公司需要支付给石油生产国的税金。当各个石油生产国联合创建了欧佩克来做出回击时，石油公司同意，将 1960 年之后的基准价格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这保证了石油生产国每出产一桶油，都能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虽然来自独立石油公司以及苏联的竞争，已经使美国以外的石油价格开始下降。然而，由于挂牌价格没有针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每桶油的实际税率还是下降了，尤其是在 1960 年代末期，当美元的价值开始急速下降的时候。

与此同时，一群主要来自德国的独立石油交易商开始定期发布欧洲精炼成品油产品的价格数据。一位名叫莫里斯·阿德尔曼（Morris Adelman）的美国石油经济学家得以利用这些数据，扣除掉石油生产的已知成本，如炼油和运输费用，首次推断出了中东石油的一个大致的“市场价格”（还要再等十年，一个有效运作的全球石油市场才能建立起来）。他的数据显示，1960 年石油公司每生产一桶石油的成本是 10 美分，其中包括 20% 的投入资本回报，而在这个回报之上，每

桶石油赚到的利润是 68 美分。阿德尔曼之后评论称，对于大石油公司来说，“市场价格是一位不请自来的闯入者”。⁶⁷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普通大众都没能察觉到这个闯入者——这种无知使石油公司继续从中得利。围绕石油生产国应该向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在本国石油上赚取的巨额利润课征多少税金的谈判，实际上变成了围绕提升挂牌价格的谈判。然而，由于新闻媒体和普通大众并不知道，“挂牌价格”其实仅仅是一个计算税率的工具，所以他们以为这些谈判是关于石油价格的谈判。于是，大石油公司便可以将自己要为石油暴利缴纳的税金的增加，描绘成石油“价格”的上涨——而这个价格的上涨，它们就不得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在利比亚于 1970 年成功争取到新的税率标准之后，欧佩克也有能力来挑战由美国和欧洲大型石油公司设定的税率了。由伊朗领头，欧佩克成员国要求原油的挂牌价格整体上涨，并将基于此价格的税率从 50% 提高到 55%。石油生产国所发起的这次行动，并不是为了提升石油的价格，而是为了将实际的税率，恢复到通货膨胀、以色列关闭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在 1960 年代后期将石油价格推高之前，这些国家所曾享有的水平上。

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下（国务院曾安排司法部放宽针对这些石油公司的反托拉斯法规），各大石油公司齐聚一堂，共同决定接受基准价格的提高。在利比亚的新石油税率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欧文（John Irwin）分发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有鉴于美国

169

67 Morris Adelman, 'My Education in Mineral (Especially Oil) Economics',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2, 1997: 21; and *The Genie Out of the Bottle: World Oil Since 197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41–68.

的进口配额制度导致美国的原油价格远高于欧洲，因此，中东石油价格的上涨会对美国有利：

许多人声称，欧洲的生产商能获取到更便宜的能源，因此在与美国产品的竞争中占据了一项优势，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如石油化工等。利比亚协议的达成会使欧洲（可能还有日本）的能源成本上涨，从而也许会削弱这些地区由于能获得更低成本的石油而享有的种种对美国的竞争优势。⁶⁸

到 1971 年 4 月，各大石油公司都与欧佩克达成了协议，将原油的挂牌价格从每桶 2 美元提高到超过 3 美元。然而，海湾地区所产石油的实际交易价格，仍然只有挂牌价格的一半略多一点，从过去每桶约 1.3 美元提高到了 1.7 美元——从名义价格上说，依然低于 1950 年代中期的水平，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则远低于该水平。与此同时，成品油产品在欧洲的售价超过每桶 13 美元，其中 60% 都用于缴纳消费国政府的税收。换句话说，在 1971 年欧佩克上涨石油税之后，欧洲国家从每桶石油中获得的收入，仍然是欧佩克国家的四倍左右。⁶⁹

将税率增加 50% 只是一时的措施。这项措施确保了欧佩克国家能在石油利润中分到更大的份额，可是，这个先让国际石油公司赚取所有石油利润、再让产油国尝试对这些利润征税的体系本身正在走向终

68 引自 Tore T. Petersen, Richard Nix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ignment in the Persian Gulf: Making Allies out of Client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9: 38。

69 Parra, *Oil Politics*: 110–134; V. H. Oppenheim, 'Why Oil Prices Go Up (1): The Past: We Pushed Them', *Foreign Policy* 25, Winter 1976–1977: 24–57; Morris Adelman, 'Is the Oil Shortage Real? Oil Companies As OPEC Tax-Collectors', *Foreign Policy* 9, Winter 1972–1973: 86。

结。在伊拉克的带领下，主要石油生产国已经逐渐开始建立控制本国石油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专家知识。1972年，伊拉克宣布，将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收为国有。伊朗已经警告了各大石油公司，当1954年签订的石油财团协议在1979年到期之后，它期待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安排。⁷⁰ 沙特阿拉伯则开展了将阿美公司的所有权逐步转移给沙特政府的谈判——它威胁阿美，如果拒绝谈判的话，就会面临与伊石油相同的命运。到1972年底，海湾地区其他两个石油生产大国，科威特和伊朗，也都在进行类似的安排。

170

金本位的结束

面对着中东油田控制权的旁落，各国际石油公司如今需要某种方法来大幅提高油价。一个远高于之前的石油价格能让它们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等偏远地区开辟新产油区，还能让石油公司从产业链下游的炼油和销售中获得更大的利润份额，以补偿在中东石油上损失的利润。

三个条件的改变将使石油定价机制的重组得以实现。第一，继成功合作提高了利比亚的油价之后，各石油生产国需要从国际石油公司手中接管这套限制生产的体系，以防止石油过剩导致油价下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团体来实现这一目标，要比油企组成的卡特尔更加容易，因为若后者被认为在故意操纵或哄抬价格，将遭到反垄断法的调查。

第二，由于国际石油公司将为这些新成立的国有石油生产公司加工和销售石油，它们就必须找到办法来销售更多的石油，并保护石油

70 “Telegram 7307 From the Embassy in Tehr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23, 1971, 1300Z”, Documents on Iran and Iraq 1969–1971, Document 155, available at history.state.gov.

免受其他能量来源的竞争。要提高石油的价格，仅由生产者来创造供应的稀缺性是不够的。更高的油价只会驱使消费者改用更便宜的替代能源。石油公司需要找到不仅能“破坏”石油的供应，还能“破坏”煤炭、天然气和核能供应的办法。因此，正如下一章将展示的，如今被铭记为“1973—1974 年石油危机”的事件，在当初的讨论中并不是一个石油的问题，而是一场“能源的危机”。由于石油是世界贸易最大宗的商品，并且左右了美元的国际流动，因此，转向新石油秩序的过程也开始于一场金融的危机。

第三，为了在油价上涨的同时维持住对石油的需求，国际石油公司需要开拓新的石油市场。最大的市场是它们被限制进入的美国。美国的进口配额制度帮助抵挡了低价的中东石油会给国内石油生产带来的竞争——1971 年上半年，美国国内所产石油价格为每桶 3.27 美元，几乎是海湾地区石油的价格在上涨之后的两倍。但是，进口管制已经是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一种机制了，它保障了美元的价值。通过限制石油进口到美国，华盛顿减少了美元流向海外，限制了海外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国后来又试图通过干预伦敦黄金市场，来为美元价值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当这两种机制被证明还不够时，美国又增加了第

171

三种机制——急速增加对石油生产国，尤其是伊朗的军售。

石油公司需要一种替代使用石油（和不断升级的军火销售）来控制美元流动的方法。美国的石油进口配额限制了这些公司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市场，而美国对伊朗的军售又迫使它们必须在伊朗增加生产。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石油公司开始主张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⁷¹

71 大石油公司希望将进口配额合理化，取消主要优待小公司的数百项还在稳步增加的豁免措施。Vietor, *Energy Policy in America*: 135–144.

1967年3月，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关联紧密的金融机构——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提议，美国应该放弃金本位制。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对此表示了谴责，于是大通银行很快将提议撤回。质疑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自动兑换机制，被认为会威胁到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美国在政治与金融上的权威。然而，八个月后，标准石油的资深经济学家尤金·伯恩鲍姆（Engene Birnbaum）发表了一份题为《改变美国对黄金的责任》（*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Gold*）的报告。报告呼吁，美国应当通过拒绝承担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义务，来单方面地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伯恩鲍姆的论述对于促使人们接受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⁷²

伯恩鲍姆的报告发表一年后，1968年11月，美国为支持美元价值而持续了十年的努力崩塌了。美国尝试将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为一种允许美元与黄金的挂钩浮动（黄金双价制）的机制。为了通过降低国内油价来对抗通货膨胀，华盛顿在1970年开始取消对石油进口的管制，但此举导致更多美元流向了国外。到下一年，美国就已经耗尽了大部分非黄金货币储备，只有22%的货币储备由黄金担保。当欧洲各银行要求美国用黄金兑换它们手里的美元时，美国违约了。1971年8月，美国抛弃金本位制，这相当于美国政府宣布自己破产。⁷³

72 Eugene Birnbaum,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Gold*, Princet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7.

73 Fred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164–202; William Engdahl,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2nd edn,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127–149. 与威廉·恩道尔（William Engdahl）不同，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没有提到这一危机的石油维度。

控制石油与金融的流动的方法，终于在 1973—1974 年间的危机中完成了转变，这就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了。我们无法确知这些改变在多大程度上是各大石油公司所筹划的，也无从知道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些公司与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冲突，以及美国政府不断变化的政策议程而实现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一场危机的产生，能让人们更容易将发生的巨变归咎于外部力量。

第七章 从未发生过的危机

173

“二战”后的石油秩序及其所带来的繁荣，似乎瓦解得太过容易。被称为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的一系列事件，使世界许多地区生活条件都在普遍改善的这样一段时代，陷入了突然而长久的停滞。这场危机确认了“二战”后国际金融管理体系的崩溃，以及石油定价的管理权向石油生产国的转移——这些国家开始从石油生产中获得大幅增加的收入。在工业化国家，曾经使更平等、更民主的社会秩序得到保障的劳工力量遭到了削弱，并将面对一种新的控制工具：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法则。在全球南方，拥有石油收入的政府建立了军事化国家，而缺少它的政府则债台高筑，因为持有大量石油美元的西方银行，将它们循环利用成了向财政状况疲弱的政府提供的高风险贷款。

将一系列事件描述为一场“危机”，就把在多个领域发生、涉及不同能动者的变化简化为一个单一事件，于是，一个单一的时刻和一个单一的能动者，似乎就要为旧秩序的崩塌承担全部责任。为了理解民主政治遭遇的挫折，我们必须追踪石油秩序在多个维度上的变化，以及为了将所发生的一切简化为一场危机而进行的工作，这些工作让人们可以把一个外部力量——阿拉伯产油国——归咎为罪魁祸首。

简单的供需关系

所谓的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让西欧和北美的许多人最深刻地体会了一次市场法则的威力。中产阶级市民遭遇了种种不曾有过的陌

生经验——以往充裕的物资出现短缺，对一件必需商品未来供应情况感到焦虑，与其他消费者争先恐后排起数英里长队，物价几乎每天都在上涨。1973年10月17日，在又一场阿以战争爆发十一天后，六个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宣布，将石油供应削减5%。这些国家承诺，每个月都会再减少5%，直到美国停止阻挠巴以冲突的解决为止。每一次减产消息见报，燃料价格都随之上涨。这次经历给西方全体民众上了不受欢迎的一课，让他们直观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

174 这一课进入了经济学家们的讲堂和课本中，作为供需关系这个基础概念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例证被反复引述。哪怕在几十年后，石油危机依然是经济学家们重申这个市场基本原理时最爱拿来使用的工具。2002年，当一位批评者质疑标准经济理论是否还有什么值得保留之处时，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就搬出了石油危机来回应。由于微观经济学的诸般假设“几乎与周围观察到的一切相矛盾”，批评者抱怨说，“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与微观经济学者——以及几乎所有新古典经济理论学者——讨论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了。他们被困在了自己的体系中，事实上已经不再关心外面的世界了”。麦克洛斯基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为经济理论辩护：当阿拉伯国家在1973年削减石油供应时，“石油的相对价格难道不是像简单供需模型所预示的那样上涨了吗？”麦克洛斯基表示，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满是这种现实世界的例子，证明经济理论的简化概念“可以在定量的层面上做到如你所希望的那样严肃。它们是真正的科学理念”。¹

1 Bernard Guerrien, 'Is there Anything Worth Keeping in Standard Microeconomics?'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2, 15 March 2002; Deirdre McCloskey, 'Yes, There is Something Worth Keeping in Microeconomics',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5, 4 September 2002.

用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来当作经济学家关心现实世界的证据，是一个让人遗憾的回应。这场危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而引起危机的一连串事件，还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抛弃了过去对“经济”所持有的那种凯恩斯主义思考进路。但是，关于经济学家被困在了自己的体系中这个更为宽泛的批评则并不准确。与批评者一样，正统经济学家是关心这个世界的。然而，他们关心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们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理念，以使其符合现实世界；他们想要做的，是改变现实世界，并使现实世界按照他们的理念来运作。² 在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中，供给和需求的法则并不是一种虚构（fiction），而是一种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事物（fabrication）。它是一场争端中的某些参与方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件工具。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这些参与方试图组织起石油危机这样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被装配起来和被实际实施的方式，使经济学的法则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对于使用石油危机来说明供需模型的做法，标准经济理论的批评者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可以简要提及。第一，我们很难知道在 1973 底至 1974 年初那个冬天发生的油价上涨，在多大程度上与石油供应的减少有关，甚至很难知道石油供应究竟减少了多少。虽然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减少了石油出口，但以伊朗为首的其他中东产油国增加了产量。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府支持对运往美国的石油实施禁运，但反对将供应欧洲和日本的石油减少的决定——这个决定减轻了美国遭受的政治孤立，使经济

175

2 参 Michel Callo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1998; 及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eds,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困境被分摊到了更广泛的范围，因此反而帮助了美国。伊拉克表示，扩大禁运范围，是“众所周知与美国及美国垄断利益集团有联系”的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两国政府的决定，伊拉克自己则增加了对欧洲的石油供应。³到1973年12月，伊拉克的石油产量比禁运前增加了7%。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阿布扎比也利用油价高涨之机，在短暂减产之后又增加了产量，最终维持住了它们的总体供应水平。由于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提供了它们实际石油产量的信息，我们无法确知，全球石油的总供应量究竟减少了多少。就连监测中东六个主要储运码头出港油轮——估算全球石油供应的标准方法——而得到的数据也存在争议，有一些报告显示，总出货量是净增长的。同时，石油的价格同样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石油公司一直在努力避免一个原油“市场价格”的形成（参第六章）。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一份公告或一种常规交易机制，可以确定原油当前的价格，因此，随着危机逐步展开，“没人知道那个‘市场’是什么”。⁴

第二，由于一处来源的供应中断可由另一处补充，因此，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从未发生过”。⁵还有其他因素也使油价暴涨。在美国国会中，民主党军国主义派系的领袖反对中东战事的和平解决，并提出紧急法案，要求政府准备燃料配给机制和减少全国石油消费的计划。⁶

3 *Middle East Economic Survey* 3, 1973: 14–16.

4 Francisco Parra, *Oil Politics: 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 London: I. B. Tauris, 2004: 183; Joe Stork, *Middle East Oil and the Energy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230; Christopher Rand, *Making Democracy Safe for Oil: Oilmen and the Islamic Eas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5: 317–318, 328–330.

5 Morris Adelman, 'The Real Oil Problem', *Regulation* 27: 1, 2004: 16–21.

6 Dan Morgan, 'Legislation Proposed by Jackson to Offset Possible Oil Losses', *Washington Post*, 18 October 1973: A6.

石油产品的商业用户与个人驾驶者则开始感到恐慌，因为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动用的“石油武器”（oil weapon）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由于不确定石油在未来的供应情况，消费者开始购买超出自身所需的石油。政府对此采取的紧急措施反而阻碍了石油的分配，导致短缺更严重，失当的危机管理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⁷ 公共辩论将石油禁运与更广泛的“能源危机”、“增长极限”的问题、“环境”的脆弱性联系了起来，加剧了民众的威胁感。过去，“环境”（environment）一词意味着社会背景或周遭事物，但最近，它也开始像“经济”（economy）一词在二十年前那样，与定冠词一起使用（the environment / the economy），用来指代一个受到广泛政治关切的对象。

要使石油遵循供需模型，还存在第三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反映了石油本身的一项特殊属性。由于大多数用户无法轻易改用替代性的能量来源，石油的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被认为是很低的，即使小规模短缺也能导致大幅度价格上涨。但在许多情况下，石油表现出了反向的需求弹性：油价上涨时，人们反而会购买更多石油。全球年度石油需求的变化，与能源基础设施、工业与社会结构、收入增长、消费税及其他因素的变化有关。石油需求通常与其价格无关。这种模式的例外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价格的大幅上涨。石油危机就是这种例外的一个例子。用石油危机来说明的简单供需模型，得到了这个例外事件的支持，却与石油市场更寻常的价格波动情况并不相符。⁸ 在这一例外事件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学家的模型发挥了自已的作用。

176

7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617.

8 Robert Mabro, 'OPEC and the Price of Oil', *Energy Journal* 13: 2, 1992.

为了使石油流动、军事行动、业界传闻、供应数据、政治计算和消费者反应等种种因素汇集起来，成为这个经济学法则的一个教科书级案例，一个新的社会-技术性的世界就必须被装配出来，从而将上述因素整合在一起。危机发生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让我们理解这样的世界是如何被装配起来，又是如何被重新组织的。一场危机被宣告发生，常常标志着人们在试图引入一些新的力量，或者在试图辨识那些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加以对抗的威胁。危机的宣告还需要定义，是哪种对象或哪种装配正在遭受威胁。而被引入的力量、被辨识的威胁、被定义的装配，都有可能会逃脱那些试图动员或掌控它们的主体的控制。

1970年代初，三项关切（matters of concern）开始出现，并且相互交织在了一起：第一项关切在于，能源是一套相互连通而又脆弱的体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第二项关切在于，中东石油的生产与流通，是单一的一组行动者就能够协调的能量流，它甚至能被转化为某种工具，用于实现其他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第三项关切是“环境”的出现，它被定义为增长所面临的物理限制，并成为政治的一个核心对象，因而开始与政治的另一个核心对象、被定义为一个国家GDP的无限扩张的“经济”相互抗衡。

我在第五章中指出，以碳为基础的工业化民主政体的典型特征，在于它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20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并与它们对石油日益加深的依赖相伴而生。借助廉价而充裕的能源，“经济”这个对象被构建起来，而以它作为参照，人们可以衡量和调整对更平等的生活的诉求，可以将关切公众之事移交给专家去管理。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读到的那样，供应低成本能源的机制，以及

治理大规模金融投机对民主所构成的持续威胁的手段,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通过“经济”来治理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这些管理民主政治的模式遭到削弱,1973—1974年的危机将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的展开铺平道路:利用了“市场”这种新机器/制的治理模式。根据这种新的统治技术,不只石油危机,几乎任何对立政治诉求之间的冲突,都将作为简单的供需问题来被理解——以及被治理。

能源如何形成一套体系

美国《科学期刊》(*Science Journal*)杂志1967年10月刊专门关注了技术预测这个新的领域。除了讨论科学、自动化、通信和太空等主题外,这一期还登载了一篇关于能源的文章。这篇由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科学技术分部主任执笔的文章宣称,“能源是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它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东西”。⁹尽管指出了诸如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和煤矿区的经济衰退等问题,但文中完全没有提到,有某个体系正在经受威胁或即将遭遇危机。

“能源危机”这个词直到三年后的1970年夏天,才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中。¹⁰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在如今人们的记忆之中,是一个

9 Ali Bulent Cambel, 'Energy', *Science Journal* 3: 10, 1967.

10 自1945至1970这二十五年间,美国主要报纸提及“能源危机”,仅仅是在讨论战后欧洲的文章中(在这个语境下,“燃料危机”这个词用得更加普遍),以及在《纽约时报》上的另外一个场合——1954年的一篇对哈里森·布朗(Harrison Brown)《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Man's Future*)的书评(Orville Prescott, 'Book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9 March 1954: 21)。1950—1960年代,对石油和其他燃料的关切通常是“自然资源”这个整体议题的一部分,而战后人们对资源枯竭的恐惧,因俗称“佩利委员会”(Paley Commission)的总统材料政策委员会(President's Materials Policy Commission)发布的报告而逐渐平息了。

由中东石油的禁运所导致的问题。¹¹ 然而，美国媒体在最初报道这场危机时，对这一问题的描述鲜少提及中东，甚至没怎么提到石油。

对“能源危机”这个新威胁的宣布，发生在 1970 年 8 月 10 日，美国联邦动力委员会（Federal Power Commission）主席约翰·纳西卡斯（John Nassikas）那一天在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了一场关于“全国能源危机”的演讲。在前一年和当年的夏天，纽约和美国其他大城市连续两年遭受了电力短缺之苦。尽管缺电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安装发电和输电设备的延迟，但这位动力委员会的主席告诉在场记者，“我们面临的这个正在发展中的能源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燃料的短缺——特别是工业用天然气的短缺。燃料可能需要实行限额供应，某些制造业工厂可能要被迫关闭。他建议，能源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在于发展核能；但与此同时，缺电问题的补救措施，是减少政府的监管，包括放松反垄断的相关法律，以允许动力行业利用“大规模运营带来的经济效益”。¹²

此前，在燃料流通、原材料获取与开采、电力生产等多个方面都曾经出现过危机。但这是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描述为一场能源的危机。动（电）力的生产与分配涉及广泛多样的行业、材料、运输体系和各

11 例如，在丹尼尔·耶金的论述中，尽管环境保护运动的动员，特别是在 1969 年 3 月圣巴巴拉海峡发生的大规模石油泄漏之后的环保动员，是影响石油生产的因素之一，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石油需求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美国；来自美国本土的石油供应的短缺，因为美国国内石油生产的速率已经越过了峰值；中东石油供应的收紧，这主要是由于欧佩克开始首次尝试推动提高石油价格，而其后在 1973 年 10 月，作为对美国在阿以战争中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回应，欧佩克又缩减了石油供应。

12 Richard Halloran, 'FPC's Head Warns Power Shortages Are Possible Next Winter', *New York Times*, 11 August 1970: 20; Richard Harwood, 'Fuel-Short US May Face Plant Closings, Rationing', *Washington Post*, 17 August 1970: A1.

178

种形式的能量：煤炭及生产煤炭的煤矿工人和矿业公司、运输煤炭的铁路、油田和天然气田、管道公司、加油站、维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公用事业、发电和输配电设备及其制造商、建造核电站的建筑公司、铀矿公司、油轮主，以及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这些设施、网络或材料中的每一个，都曾在不同时间面临过各自不同的问题：阿巴拉契亚山区煤矿工业爆发的野猫式罢工*潮，核电站运营中遭遇的技术困难，苏伊士运河关闭之后的油轮短缺，对低硫燃料的需求所导致的发电厂建设延误，以及作为一套新技术的社群组织方法的发展——这套技术使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在他广受推崇的大众运动入门指南《激进分子守则》（*Rules for Radicals*）中所称的“现实主义激进分子”（realistic radicals），也能够去挑战电力公司对社区和环境造成的损害。¹³ 在 1970 年代初，这些议题忽然间就全都被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能源危机”。

当欧佩克国家开始按照我们在第六章中检视过的方式来控制石油生产时，跨国石油公司想要将油价上涨多达 50%，甚至更多。这样，石油生产国增加的收入便可由消费者来买单，而不是靠大型石油公司减少的收入来承担。但要让价格上涨这么多，最主要的阻碍在于，石油的使用者也许会改用替代燃料，包括天然气、煤炭和核能等。仅仅是合谋限制石油的供应是不够的：各大石油公司必须在尼克松执掌的白宫的帮助下，将“怠工破坏”体系推广到其他形式的燃料上。这些

179

* 野猫式罢工（wildcat strike）指非经工会组织或批准而由劳工自行发动的罢工。——编者注

13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亦参 William Cleaver, 'Wildcats in the Appalachian Coal Fields', in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eds, *Midnight Notes, Midnight Oil: Work, Energy, War, 1972-1992*, Brooklyn: Autonomedia, 1992: 169-183。

不同形式的能源将会通过企业所有权、政府管理、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被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面临着共同困境的单一议题：能源危机。

石油巨头们一直都在向美国输入资本，其中大部分都是它们通过垄断中东石油向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销售而获得的巨额财富。这些输入美国的资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以股息的形式，被支付给了石油巨头的美国股东们，但每年还有数亿美元被保留下来，用于大量购买美国境内与石油相竞争的能源。这些石油公司不断加强对天然气生产的控制，以至于到 1960 年代末，美国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四分之三，都是由该国的二十多家石油公司生产的。它们也收购了煤炭企业，将美国的煤炭产业从一群组成卡特尔的煤炭生产商，转变成了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或生产其他燃料的更大型产业的一个下属分支部门。它们还进入了核能产业，特别是铀矿的开采业，使得这些公司到 1970 年时已经控制了美国 40% 的铀矿储量。¹⁴ 美国内政部官员指责这些石油公司大量买下了在联邦土地上从事铀矿开采的租约，却在买下之后坐拥这些租约而并不开发，以推高价格并制造“能源危机”——让人感觉好像是中东过去发生的事件又重现了一样。¹⁵

14 Stork, *Middle East Oil*: 121–125.

15 James Ridgeway, 'Who Owns America?'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4 October 1971: 7. 亦参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ssessment of Oil Shale Technologies, Vol. II: A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the Federal Prototype Oil Shale Leasing Program', July 1980, available at www.princeton.edu/~ota. 美国参议院在 1975 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要求石油公司要剥离其在煤炭、铀矿和光伏产业的持股，但随后石油公司的游说活动成功击败了这项法案（Andrew S. McFarland, 'Energy Lobbies',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9, 1984: 504）。1966 年，美国政府禁止了在美国核反应堆中使用进口铀，以此将美国国内铀的价格维持在更高的水平。随后，海湾石油和其他一些美国石油公司加入了一个由加拿大政府为应对美国铀进口禁令而设立的国际铀卡特尔，这又进一步推高了铀的价格（William Greider, 'Gulf: Uranium Cartel Raised US Prices', *Washington Post*, 17 June 1977: A1）。

为了抬升石油的价格，各大石油公司还努力推动了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在 1968 年联邦动力委员会拒绝了天然气生产商的涨价申请后，它们突然宣布减少供应。从此，新天然气储藏的发现速率开始下降。¹⁶ 在次年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联邦动力委员会主席的约翰·纳西卡斯，也就是不久之后即将宣布能源危机的那个人，批准了一项涨幅前所未有的天然气价格上调，并宣称这能鼓励天然气行业将资金投入新的生产活动。¹⁷ 他所承诺的投资从未兑现，而国会此后的调查发现，纳西卡斯的决策所依据的，是天然气行业内部提供的显示供应短缺的数据，而不是委员会自己的工作人员计算得出的远高于此的估计值。他还向国会承认，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解除管制能带来产量的增加。¹⁸

180

同时，各大石油公司还一边提高对未来需求的预测值，一边降低可采收储量的估计值，通过这种做法，制造出了人们对石油供应不足的担忧。1972 年，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National Petroleum Council）预测，美国一次能源消耗量到 1985 年时将达到 125 千万亿英热单位，即 125 夸特*。而该年的实际需求只有 74 夸特，连预测值的 60% 都不到。在 1973—1974 年的石油禁运后，联邦能源管理局（Federal Energy

16 Stork, *Middle East Oil*: 128.

17 Robert Sherill, 'Nassikas Sets Your Gas Bill', *Nation*, 17 Jan 1972: 73–79.

18 Jack Anderson, 'FPC Chief and Natural-Gas Rate Rise', *Washington Post*, 14 June 1971: B11; Jack Anderson, 'FPC Staff Disputed Industry Plan', *Washington Post*, 15 June 1971: B13;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Report to the FPC', in 'Fattening Gas Prices', *Time*, September 1974; Sherill, 'Nassikas Sets Your Gas Bill'; Stork, *Middle East Oil*: 125–131.

* 英制热量单位（British thermal unit，简称 BTU 或 Btu）是能源行业习用的热量计算单位，相当于把 1 磅水升温 1°F 所需的热量，1 BTU 约等于 1055 焦耳。由于 BTU 是一个很小的单位，统计能源时常用千万亿英热单位（quadrillion BTU, 1 quadrillion = 10^{15} ）来计，为了方便表述有时亦用“夸特”（quad）这个简称（1 quad = 1 quadrillion BTU）。——编者注

Administration) 推动了“能源独立工程”(Project Independence), 而该工程对未来的能源需求量也做出了类似的过高估计。这些计算推动了 1978 年《国家能源法案》(National Energy Act of 1978) 的制定, 禁止了新的发电厂和工业锅炉使用天然气, 并允许石油公司将天然气涨价八倍(1973 年每百万英热单位是 0.22 美元, 而从新气井中开采的天然气涨到了 1.75 美元)。这些限制措施被塑造成了保卫美国能源储备以抵御阿拉伯国家石油武器进攻的手段, 而它们在 1973—1986 年间, 令天然气消费量下降了 26%——因此, 它们帮助保卫的, 不是美国的消费者, 而是对中东石油的需求。“我现在……为我曾参与了这些看上去谋取了私利的活动而深受困扰,” 曾任美国燃气技术研究院院长的亨利·林登(Henry Linden) 在卸任后写道, 而该机构曾帮助制造了被夸大的估计值, “我也曾接受了许多其他有关这场危机的信条, 但后来发现, 这只是一场虚构的‘能源危机’。”¹⁹

动力生产和资源开采这两个领域向一个单一的“能源”领域的转变受到了白宫的激励。对不同形式的燃料和动力的监管责任曾经分散在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1973 年 6 月, 在理查德·尼克松组建一个能源与国家资源部门的请求被国会多次拒绝之后, 他在白宫设立了一个国家能源办公室(National Energy Office)。²⁰ 将对燃料和动力的不同关切整合为一个单一机构, 促成了一个关注能源和能源政策的新学术领域的出现。在 1970 年代初期之前, 历史学、经济学和政策制定领域

19 Henry R. Linden, 'The Evolution of an Energy Contrarian',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1, 1996: 32, 34, 38.

20 1974 年, 白宫的能源办公室重组为联邦能源管理局。卡特政府最终在 1977 年设立了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对这些主题所做的大部分研究，往往都专注于单独的一种燃料。但在这之后，能源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²¹

虽然人们最初讨论美国的能源危机时，把它当作多种因素的发展变化之间的复杂互动，涉及不同的自然资源和不同的动力生产方式，但突然之间，能源危机的核心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石油危机”。宣布石油危机的人是詹姆斯·E. 埃金斯，也就是十年前曾对伊拉克复兴党推翻卡塞姆政权表示欢迎，并赞成处决政治反对派的那位美国外交官（参第六章）。如今，他是美国国务院燃料与能源办公室的主任。1973年4月，埃金斯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阿拉伯国家一再警告要对美国发起的石油抵制，如今已经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威胁。²² 欧佩克已经通过谈判成功争取到了更高的石油税率，伊拉克国有化了该国的石油生产，而其他石油生产大国也威胁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因此，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会导致资本前所未有地流向石油生产国。美国现在面临的任務，是要设法让流向波斯湾的资本回流到美国境内的投资项目。

“世界‘能源危机’或‘能源短缺’是一个虚构，”石油经济学家莫里斯·阿德尔曼这样论述道，“但是，对这个一虚构的信念确是真实的。这种信念让人们可以接受更高的石油价格，就好像高油价是由自然所决定的一样，然而实际上，这些价格是通过共谋来设定的。”²³ 他给出的证据表明，全球石油供应是过剩的，对石油的需求也达不到

21 Richard H. K. Vietor, *Energy Policy in America since 1945: A Study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22 James E. Akins, 'The Oil Crisis: This Time the Wolf Is Here', *Foreign Affairs* 51: 3, 1973: 462-490.

23 Morris Adelman, 'Is the Oil Shortage Real? Oil Companies as OPEC Tax-Collectors', *Foreign Policy* 9, Winter 1972-1973: 73.

1960 年代的那种增长速度了，并且，美国国务院和石油公司确实在与石油生产国合谋，从而共同从油价的大幅上涨中得利。²⁴

巴勒斯坦等式

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石油价格上涨是如何发生的。1973 年 10 月，阿拉伯国家宣布，石油供应将与阿以冲突的解决进展挂钩，石油禁运由此引发。于是，石油的价格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个需求与供应的问题了，因为对石油的需求此时已经捆绑了另一个需求：美国应停止其反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美国已经表态拒绝支持埃及在 1971 年提出的和平倡议——在提议中，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放弃了过去所坚持的原则，即以色列必须同意全面解决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问题，并对 1948 年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逐出家园、被剥夺土地和财产的问题做出处理，转而提出愿意与以色列就 1967 年被以方占据的埃及领土展开谈判，以达成临时性的双边安排。1972 年 7 月，埃及决定驱逐协助运营其空军防御体系的苏联军事顾问，期待此举会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但最后并未得到美国的回应。²⁵ 萨达特请求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会见埃及与基辛格职务

24 几年后，V. H. 奥本海姆（V. H. Oppenheim）在阿德尔曼发表文章的同一份期刊上，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这种共谋是如何展开的：‘Why Oil Prices Go Up: The Past: We Pushed Them’, *Foreign Policy* 25, 1976–1977。

25 Richard B. Parker ed., *The October War: A Retrospectiv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这本书包含了当时事件的几位关键参与者对这段外交历史的讨论。尽管在他们的描述中，以色列对萨达特和解提议的回应“极其僵硬，缺乏回应且缺乏想象力”（第 58 页），但他们未能指出，美国的立场实际上也是如此。

对等的官员哈菲兹·伊斯玛仪 (Hafiz Ismail), 但一直遭到基辛格的推托。直到次年 2 月和 5 月, 基辛格才终于在要求保密的条件下答应了会面, 其后又拒绝了埃及单独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提议。²⁶ 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于 1973 年 6 月与尼克松会面, 提议双方发布联合声明, 共同阐述和平解决方案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而这也遭到了尼克松的拒绝。²⁷ 作为美国的扈从国, 沙特阿拉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为其恩庇国 (patron) 美国一直在阿以问题上拒不让步。1973 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 沙特都在请求华盛顿支持一项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的解决方案, 但始终未能成功。²⁸ 该年 7 月, 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草案对以色列“不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合作”来执行 242 号决议表示了严重关切。全部十五个理事国中, 十三国赞成, 一国未投票, 而只有美国动用否决权, 让这项决议没有通过。²⁹

2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uhammad Hafez Ismail and Henry A. Kissinger, 20 May 197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Henry Kissinger, Box 25, Cat C Arab-Israeli War, available at www.gwu.edu/~nsarchiv. 基辛格在与沙阿的一次谈话中解释了美国的立场: White Hous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4 July 1973, at www.gwu.edu/~nsarchiv.

27 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四项原则包括: (1) 为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提供保障……(2) ……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不发生对抗; (3) 以色列从阿拉伯领土撤出; (4) ……保证各方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蒂朗海峡和曼德海峡等航道 (Henry Kissinger,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s,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General Secretary Leonid Brezhnev on Saturday, June 23, 1973 at 10:30 p.m. at the Western White House', San Clemente, California, HAKO, Box 75, Brezhnev Visit 18-25 June 1973, Memcons, at www.gwu.edu/~nsarchiv)。

28 在 1973 年 10 月战争的前夜, 沙特阿拉伯呼吁美国要求以色列接受 1967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 242 号决议, 该决议中提出了一项以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在 1967 年的战争中占领的其他领土上撤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1)。亦参 Donald Neff, 'Nixon Administration Ignores Saudi Warnings, Bringing On Oil Boycott',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ctober-November 1997: 70-72。

29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raft resolution S/10974, 24 July 1973, 来自 unispal.un.org。

作为对这一僵局的回应，埃及和叙利亚决定在 1973 年 10 月 6 日对占领它们部分领土的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击。很多人都预料到了这场战争的发生。早在两年多前的 1971 年 8 月，美国就已经知晓埃及正在准备一场“规模有限的强力攻势”，以收复苏伊士运河对岸的失地，并迫使以色列坐上谈判桌。³⁰ 在这之后，美国不断收到警告，称如果美国拒绝支持冲突得到解决，将促使埃及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十天后，眼见战火将持续延烧，萨达特重申了他关于埃及与以色列单独达成和解的倡议。第二天，代表十八个阿拉伯国家的四位外交部长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会面，要求美国支持基于“以色列退回 1967 年以前的边界，并按联合国决议，尊重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和获得补偿的权利”的危机解决方案。³¹ 基辛格拒绝支持提议，还在当天晚些时候告诉白宫危机应对小组，担任代表团团长的沙特外交大臣“像个乖孩子一样站出来，说他们与我们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针对有关沙特可能会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的新闻报道，基辛格说这是国务院的官员或石油公司在乱放消息，还讽刺这些人“犯错的记录无与伦比”，并向危机小组保证，“我们不认为石油供应现在会被切断”。³² 第二天，阿拉伯国家就宣布了第一波削减供应的决定。

30 White House, 'Henry Kissinger is provided with a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Vietnam and other world developments', memo., 20 August 1971, CK3100551156,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2011.

31 David Hirst, 'Arabs Acclaim Sadat Peace Plan as a Major Breakthrough', *Guardian*, 18 October 1973; William B. Quandt to Kissinger,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with Arab Foreign Ministers', 17 October 1973,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The October War and US Policy', at www.gwu.edu/~nsarchiv, 之后备注简记为: NSA, 'October War'.

32 Edward Cowan, 'A Saudi Threat on Oil Reported', *New York Times*, 16 October 1973: 1; Minutes,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 Meeting', 17 October 1973, NSA, 'October War.'

为了减轻以色列被迫和谈的压力，尼克松决定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战机、坦克、火炮和弹药。白宫并不打算利用这场战争来解决中东冲突的根源，而是希望用它为自己在越南的战败提供某种慰藉。“这不仅仅是中东的问题，”尼克松对他的官员说，“我们不能允许一场由苏联支持的军事行动成功击败一场由美国支持的军事行动。”在论及迫使以色列和谈的困难时，尼克松提出了一个逻辑上十分扭曲的论点，认为重新武装以色列是“把以色列生拉硬拽到谈判桌前”的唯一办法。³³这次武器供应本该秘密进行，以便向欧洲和阿拉伯国家隐藏美国拒绝用谈判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为了保密，从美国运送武器的新型洛克希德 C-5A 运输机原本安排在夜里降落以色列。C-5A 运输机能够装载通常走海路运输的坦克和其他重型装备，同时航程足够直飞美国东海岸到中东的距离（欧洲国家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它们的机场）。然而，由于机翼设计上的失误，C-5A 实际上无法满载荷飞行原本要求的距离。要到达以色列，飞机必须中途在亚速尔群岛（Azores）降落并加油。但亚速尔群岛强烈的侧风导致这款尺寸空前的运输机难以落地，飞机从美国出发的时间就不得不被推迟，最终也使到达以色列的时间被延后到白天。秘密泄露了，空运行动被公开在世人面前，而随之同时曝光的，还有美国拒绝和平谈判的立场。³⁴

184

当时，海湾国家的石油部长们正在科威特举行会议。这是欧佩克（其成员国中也有非阿拉伯国家）与各石油公司之间长达月余的谈判的一部分，而谈判的目的，是修订 1971 年关于石油生产税率的协议。

33 Minutes,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 Meeting', NSA, 'October War.'

34 'C-5 History', at www.globalsecurity.org; James Schlesinger, 'The Airlift', in Richard B. Parker, ed., *The October War: A Retrospectiv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153-160.

这份协议订立的基础，是比当时石油实际交易价格高 40% 的一个名义的“挂牌价格”，但 1971—1973 年间，油价的上涨使这份协议已经落后于当前的实际价格水平。在此期间，石油公司的利润翻了一番，石油生产国能够分得的利润份额却下降了，而此份额的实际价值又因失控的通货膨胀而进一步缩水。在新协议的谈判失败后，欧佩克成员国于 10 月 16 日宣布，它们将单方面把挂牌价格（计算石油生产税率的基础）上调 70%，让这个基准价格恢复到比当时的石油实际交易价格高出 40% 的水平。³⁵

次日，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都留在了科威特，与加入进来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们共同讨论战争局势。他们一致同意对美国的顽固立场做出回应，宣布将石油产量适度削减 5%，而之后的每个月还会再减产 5%，直到以色列撤出其在 1967 年 6 月的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为止。而美国驻科威特使馆发回的报告指出，与美国结盟的那些石油生产国抵制了其他国家提出的采取更有效措施的要求，还通知华盛顿，此次石油供应的削减仅仅意在向美国警告，它们对于“以色列必须放弃被其占领的阿拉伯土地”的态度是严肃的。“与以色列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被延搁得越久，”科威特石油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提基（Abdul Rahman al-Atiqi）解释道，“对所有人来说，石油的供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短缺。”³⁶而尼克松对此的回应，则是在两天后，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为以色列提供 22 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请求。“我们必须持续把物资送到以色列，”基辛格对其幕僚说，“我

35 Parra, *Oil Politics*: 177–179.

36 US Embassy Kuwait to State Department, ‘Atiqi Comment on OAPC Meeting’, 18 October 1973, NSA, ‘October War’.

们必须源源不断地加码输送，直到一方认输为止。”³⁷ 随后，沙特阿拉伯宣布了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相继加入，将石油的供应与美国不愿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相挂钩。

西方的评论者将阿拉伯国家 10 月 17 日削减石油供应的决定及此后对美国实施的石油禁运，与欧佩克前一天做出的将石油生产税率上调 70% 的决定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这两个决定混为一谈，把它们塑造为一个单一事件，就像二者通过供需模型被关联在一起那样。哪怕在今天，这两个事件还是被颇具误导性地统称为“欧佩克禁运”（the OPEC embargo）。而石油公司利润税率的提高常被称作“欧佩克油价上涨”（the OPEC prise rise），也具有同样的误导性。对有关国家来说，这种巧合是偶然的，这两个决定都不是为了提高石油价格而做出的；此外，欧佩克在禁运中也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第一个决定是欧佩克与石油公司就石油利润的税率进行的长达月余的谈判所取得的结果。而一群阿拉伯国家在第二天宣布减少石油供应，则是在回敬美国在十月战争中站在以色列那边，并决定阻挠这些国家为迫使以色列接受基于放弃占领领土的和平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根据阿里·阿提加（Ali Attiga）的说法，减产“与想要提高油价无关”，而是为了引起西方公众对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³⁸

185

37 Minutes,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 Meeting', NSA, 'October War'.

38 Anthony Sampson, *The Seven Sisters: 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5: 265, 此书引用了 1975 年 2 月的一场对时任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APEC)], 而不是如作者桑普森 (Sampson) 所写的欧佩克 (OPEC)] 秘书长阿提加的采访。这次禁运的目标是支持以色列拒绝谈判的国家, 最初针对美国实施, 之后又扩大到了荷兰、南非和罗得西亚 (Rhodesia, 即津巴布韦)。在葡萄牙允许美国使用葡属领土亚速尔群岛向以色列空运武器之后, 它也被加入了禁运目标名单。(Ian Seymour, *OPEC: Instrument of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119)。

有关供应削减和禁运的论述很少提及其目的是什么。例如，丹尼尔·耶金就这样写道，“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们同意实施禁运，将产量从9月的水平上削减5%，接下来每个月都继续减产5%，直到他们的目标达成为止”。³⁹然而，他没在任何地方讨论这里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目标，是试图创建一种联系，在石油供应与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之间建立起一种等式关系。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切断了这种联系。而普通大众也处在相同的境地，忙着排队加油而无暇顾及其他，脑中只想着市场的法则。与此同时，在美国国会中，以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为首的和平谈判的反对者们，正在组织石油的配给方案，以及其他一些让市场的法则得以运作起来的手段。这位杰克逊参议员力主美国外交政策的日益军事化，人送外号“波音选出的参议员”（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军事承包商，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战争结束两个月后，欧佩克国家又一次举行会议，以再度调整税率。那时，石油交易价格有时高达每桶17美元——是10月各国开会时交易价格的四倍还多。在这第二次会议举行的前夕，基辛格发表了一场讲话，称“我们必须牢记能源危机的深层原因”。虽然这场危机因十月战争而加剧，但它是“全球石油需求的爆炸性增长超出了增加供给的激励措施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油价上涨是这些长期市场力量所造成的，并因此在华盛顿看来是必然的，那么，欧佩克成员国就没有理由不通过相应地重新设定税率来做出调整。由美国在欧佩克中最亲密的盟友伊朗牵头，该组织将挂牌价格提高到了每桶11.65美

39 Yergin, *The Prize*: 607.

元。这一措施使石油生产的税率被提高至每桶 7 美元，而按照挂牌价格比实际价格高 40% 算，这意味着石油的销售价格（加上了生产成本和公司利润）还不到每桶 9 美元，而不久之前石油的实际交易价格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⁴⁰

在帮助稳定了高油价后，基辛格开始尝试收割它所带来的好处。欧洲和日本将承受更高的能源成本，从而缓解美元的压力，而美国此时也可以开发阿拉斯加的石油储藏了。⁴¹即便战事还在推进，基辛格就制定了计划，让尼克松“在这一切结束两周后”告知国会，这些事件“让我们深切体认到我们的脆弱性”，要求国会放弃反对阿拉斯加输油管道。当苏伊士运河的战事升级时，一位热切的白宫能源顾问告诉基辛格的战略小组，“阿拉斯加石油在达到产量峰值时将等于阿拉伯国家开采的全部石油”。他的助理补充称，“我们需要两条管道”。事实证明，对阿拉斯加这个想象中的石油富矿的预测值被极度夸大了。⁴²

一场天赐的实地试验

1973 年 10 月的战争使华盛顿和石油公司得以转向一个价格更高的能源体系，同时，它也激励了另一种与石油价格的关联变得越来越

40 Parra, *Oil Politics*: 183–184.

41 有关基辛格对较高石油价格的支持，参 Tore T. Petersen, *Richard Nix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ignment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Arabian Peninsula: Making Allies Out of Client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9: 8–14，及 Parra, *Oil Politics*: 197–205。

42 Minutes,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 Meeting’, NSA, ‘October War’. 在生产达到峰值的 1988 年，阿拉斯加每日生产 200 万桶石油，而该年阿拉伯国家的产量超过了每日 1500 万桶，at www.eia.gov, and DeGolyer & MacNaughton, *Twentieth Century Petroleum Statistics*, Dallas: DeGolyer & MacNaughton, 2009。

紧密的事物：军国主义（militarism）。这场冲突中上演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役。C-5A 运输机的设计缺陷使美国没能保守住它向以色列空运武器的秘密，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东的坦克不仅让以色列军队战胜了对手，也让处境艰难的美国军方取得了大捷。

187 1973 年早些时候，在承认越南战争失败并撤出了美国驻越的最后一批军队后，面对着可以预见的军费削减和被一个小国击退的败绩，五角大楼开始重新审视其军事战略。美国在越南的战败似乎证明，依靠为应对“二战”期间以坦克为基础的重武装战斗而整备的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已经是无效的了。而 1973 年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叙利亚和埃及在一场持续十八天的战斗中损失的坦克数量，相当于美国当时在欧洲部署的坦克总数——似乎也强化了这一结论。但是，主张美国重新装备新型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的人士，把 1973 年的十月战争当作“一场天赐的实地试验”（a fortuitous field trial）。在与其以色列同行共同巡视了被以占领的叙利亚和埃及领土上的战斗地点之后，美国的将领们把战场所遭到的毁灭性破坏和以色列最终的胜利拿来作为证据，以表明：只要装备、战术和训练得当，与越战的教训相反，大规模常规装甲作战是可以打，而且能打赢的。

美军喜欢将越南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民主。他们认为，导致美国战败的，不是军事上的不足，而是国内民众的反对。以色列 1973 年的胜利为这个民主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有观点认为，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所具有的破坏力，使它们更适合民主国家参与的战争，因为它们能在民意和国际谴责迫使文官领导停战之前，就取得迅速的结果。⁴³

43 Saul Bronfeld, 'Fighting Outnumbered: The Impact of the Yom Kippur War on the US Arm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1: 2, 2007.

这些从 1973 年战争中得出的结论，在对实地试验地点的频繁回访中得到了强化，并被写进了训练手册和国会报告里，从而使五角大楼得以击败小规模机动战的倡导者，重新建立一支重武装的军事力量。

这场战争挫败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而在此过程中，它也帮助维持了中东继续作为一个不安全区域的存在。上一章中讨论的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大规模军火转移，如今又加上对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以及埃及日益增加的军售。这场危机巩固了石油生产国和美国之间基于军火销售的新型关系。⁴⁴ 美国武器出口的实际价值规模，从 1967 年到 1975 年跃升了超过一倍，而新开辟的军售市场大部分都在中东。⁴⁵ 武器的流动，以及在建筑、咨询、军事援助和银行等行业中与之相关的机会，现在都依赖更高程度的军国主义，并且还依赖于美国延长和加剧中东地方性冲突的政策，以及美国与伊斯兰教萨拉菲主义（Salafism）日益决裂的关系，该派别曾经帮助保卫 20 世纪中期的石油秩序，抵御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压力与民众诉求。我们在第八章中将会看到，军国主义、萨拉菲主义和武装冲突之间的张力，将会使人们更加不可能在 1974 年之后实现一个更民主的石油生产的政治。

增长的极限

1973—1974 年的危机还为石油价格引入了另一组计算。上涨至原先四倍的价格增长幅度也许超出了石油公司最初的预期。此时，各大

188

44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The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198-273.

45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available at armstrade.sipri.org.

石油公司为了防止石油需求暴跌，就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尤其是设法确保天然气和核能价格上涨。其中一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让石油公司来倡导节约自然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

业内领头的石油经济学家们认为，从经济计算这种实际的目的来看，石油的供应是不会耗竭的。尽管开采活动减少了地球各处的石油储藏，但勘探活动、新油田的发现和新技术的运用会使其得到补充。这些石油经济学家认为，石油资源的耗竭会发生在无比遥远的未来，因此对石油价格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看来，石油储藏就不像一种正被使用殆尽的自然资源，而更像一种被不断消耗又被不断补充的存货。“矿产资源取之不尽，永不耗竭，”莫里斯·阿德尔曼在1972年这样主张道，“一波投资投入进来之后，地下的庞大存货中已探明的储量就会增加。这些储藏在被开采的同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地下储量最初究竟有多少，最终又会剩多少，都既无从得知，也无关紧要。”⁴⁶

这种对石油储藏的基本性质所持的“资源丰饶论”（cornucopian）观点已经受到了许多石油地质学家的批评，他们对石油的性质和供应情况有着不同的看法。1956年，壳牌公司地质学家M.金·哈伯特（M. King Hubbert）在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的年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预估美国的石油产量将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即1966—1971年）到达顶峰，然后进入一个持续下降的时期。⁴⁷ 哈伯

46 Morris Adelman, *The World Petroleum Marke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Adelman, 'Is the Oil Shortage Real?'

47 哈伯特在1930—1940年代曾参与技术专家治理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这一组织与第五章曾提到的那位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一书具有关联。此运动力图推动以工程师对社会及其资源进行技术专家式的管理（technocratic management），取代经济学家们的价格体系和大企业的公司权力（corporate power）。

特的预测虽然基于石油行业当时普遍采用的可采收储量的测量方法，但利用了一些新的假设来分析石油生产速率和发现新储量速率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石油未来的展望。⁴⁸

在 1971 年以前，哈伯特的预测威胁着美国的石油业。石油公司对他的计算方法发起了攻击，并发布了相对立的数据，将可采收储量的估计值一下子提高至原来的两三倍。如果石油即将短缺的话，对石油生产起到了鼓励作用的政府配额和价格保护措施就失去了正当性。

而在 1971 年之后，随着欧佩克产油国掌管了这套维持石油稀缺的过程，并将世界油价提升到了美国国内的水平，石油公司就不再需要配额和价格保护制度了。它们将自己的估计值调整到与哈伯特的一致，并同意美国的石油产量即将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1971 年，英国石油首席地质学家指出，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将在 1980 年代耗尽，而石油需求预计还会提升，这意味着，将来可能勘探到的未探明储量，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将无法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⁴⁹ 然而，石油危机一过，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又回到了资源丰饶论的立场上。

在这些对石油储量耗竭的关切出现的同时，一种“增长的极限”和“环境”保护的政治开始出现，意在替代“经济”的政治。⁵⁰ 说来奇

189

48 Gary Bowde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idity in Estimates of US Crude Oil Reserv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5: 2, May 1985: 207-240.

49 正如我们将在结论章中读到的那样，这些预测并不太偏离实际。James Bamberg,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vol. 3: *British Petroleum and Global Oil, 1950-1975: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9.

50 参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怪的是，正是石油公司本身，帮助构建了“环境”成为一个与“经济”相抗衡的政治的对象。这一定程度上是石油公司在无意中推动的，因为它们所采用的钻探与运输石油的方式，造成了多起大规模石油泄漏事件，使得环保主义者围绕这些事件组织了起来。但是，这些公司也是通过改变自己计算世界石油储量的方式，从而帮助构建了“环境”成为一种政治关切的。1971年，石油公司突然放弃了它们把石油储藏当作无限资源的各种丰饶论式的计算（这些计算曾支撑起了“二战”后的那些“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将“经济”视为一种能够无限增长的对象），并且开始预测石油的终结。⁵¹

在1970年代初，地质学者们关于石油储藏未来将会枯竭的论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1973年，英国国家煤炭委员会（National Coal Board）的经济顾问、长期批评美国在“二战”后主导推动从使用煤炭转向使用石油的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出版了著作《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⁵² 在此书面世的几个月前，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布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报告，作为该机构“人类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研究计划的成果。这份报告利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计算机建模，论证如果当前能源消耗、资源枯竭、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等各方面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在未来的一百年内，这颗星球将会达到增长的极限。”⁵³ 这份报告还警告了因燃烧碳氢化合物而造成的

190

51 Gary Bowde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idity in Estimates of US Crude Oil Reserv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5: 2, 1985: 207-240.

52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53 Meadows, Meadows, Randers and Behrens, *The Limits to Growth*: 29, 75, 85-86.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变暖的威胁，因此，这份报告对石油工业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它也在挑战着经济学家们，因为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市场模型都依赖于能源的无限供应，似乎无法解决资源枯竭和增长极限的问题。

石油公司构造环境

在美国国务院努力为其支持提高油价的立场寻找正当理由时，不再将石油单独看待，而把它视为一个更大的“能源”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观念就变得越发重要了。1973年4月10日，就在尼克松要向美国国会呈送有关能源脆弱性的国情咨文的一周前，詹姆斯·E. 埃金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为美国石油学会这个美国石油行业的联合组织发表了一场报告。他重申了高油价不可避免的论点，但警告称，“有一个幽灵，将永远萦绕在每个石油生产商的脑海里：某种新的能量来源的发展，会使石油变得无足轻重。尽管短期来看这并不现实，但是，突然出现的某种重大科技进展，让石油变得多余，这样的可能性总是存在。”⁵⁴ 他提议：

碳氢化合物的价格应当继续上涨，直到达到替代能源——如煤炭、页岩、油砂，甚至由垃圾转化而来的能源——的生产成本为止。之后，碳氢化合物能源的价格将维持在与替代能源的成本大致相当的水平，直到本世纪末，替代能源将开始

54 James E. Aki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fforts in Energy Suppl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10, 1973: 78.

满足能源需求的增长。届时，碳氢化合物就可望被用于更高层次的用途：塑料、建筑材料、药品，甚至是食品。

他指出，只要碳氢化合物仍然代表了“能源组合（the energy mix）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它们的售价要至少与替代能源的成本相当”。他还补充说，未来的世代也许将会“因为我们烧掉了这种不可替代的商品而诅咒我们”。⁵⁵

把碳氢化合物看作“能源组合”中相对稀缺且不可替代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论点揭示了这种新的能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使石油价格与其他形式的燃料与动力的价格能够产生关联，有关能源体系的讨论便能将石油价格与新诞生的这种环境政治联系起来。

191

对尼克松政府来说，能源政治同时就是一种环境政治。1973年，尼克松总统发表该年度的国情咨文时采取了不一样的形式。他在几周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书面陈述，而不是单一的一篇口头演讲。这些书面陈述中的第一篇实质性咨文，是“呈送国会的针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⁵⁶在其中，他报告称：

自然资源是脆弱的，也是有限的，而且，已经有大量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或掠夺。本届政府从1969年上任开始，就在调动我们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来竭尽全力地应对这一问题。现在，有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美国已经摆脱了本来可

55 同前注：第79页。

56 Nixo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Energy Resources.'

能会发生的环境危机，而迈向了一个恢复与更新的新时代。

在尼克松的演讲中，这两大主题被不断地联系起来：能源，作为正在逼近中的危机；以及环境，作为原本可能会发生的危机。

1969年1月28日星期二，也就是尼克松上台的一周后，联合石油公司位于加州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海岸外六英里处的一座水下钻井平台发生井喷事故，导致海床崩裂，使得20万加仑的石油泄漏到了海面上，而海床裂口耗时十一天才封堵起来。⁵⁷ 引发这场漏油事故的部分原因在于，钻井平台使用了强度不足的管道套管。这场灾难的发生，使环保主义者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石油生产两方面的新动向所构成威胁上：石油生产从陆上向海上钻井的扩张，以及开发阿拉斯加州北坡地区（North Slope）的石油并建设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的提议。该年早些时候，曾任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执行理事，而后因其政治活动导致该组织失去慈善组织地位而被迫去职的大卫·布劳尔（David Brower）创立了“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一个全球性的、精通媒体运作的、在政治上能够施加强影响力的行动团体”，并在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其他地区创建了分支机构，成为第一个国际性的环保组织。⁵⁸ 地球之友与其他类似性质的团体开始在诸如石油钻探、核能、燃煤发电的排放和阿拉斯加输油管道等议题上施加压力，这对燃料和动力工业的多个不同部门都构成了重大挑战。

57 Keith C. Clarke and Jeffrey J. Hemphill, 'The Santa Barbara Oil Spill: A Retrospective', in Darrick Danta, ed., *Yearbook of the Association of Pacific Coast Geographers*, vol. 6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58 Daniel Coyle, 'The High Cost of Being David Brower', *Outside Magazine*, December 1995.

192 对石油行业和白宫来说,“能源危机”这个问题变成了应对这个挑战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对化石燃料这种稀缺且会被耗尽的能量来源进行节约利用的必要性,能为油价上涨提供合理正当的依据。另一方面,环保运动可以由此被引导去关注核电工业所代表的更加严重的威胁。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核能的发展,可以解决高企的能源成本和化石燃料最终被人类耗竭等问题。⁵⁹这也是尼克松政府曾经提出的应对能源危机的方案之一。1950年代,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随着核裂变的发展,“在几十年内,能源会变得像不必计费的空气一样免费,而煤炭和石油则会被主要用作有机化学合成的原材料,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才是最符合它们性质的用途。”⁶⁰到了1970年代,虽然对核能的成本估计不再那么乐观,但石油行业依然面临着它所带来的一個风险,也就是政府会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新型快中子增殖反应堆,使能源价格降低,从而威胁到石油行业当前所享受的高额利润。环保运动可以帮助削弱石油面临的这种威胁。通过坚持要求核能发电必须把事故风险和核废料的处置成本考虑在内,环保运动帮助降低了核能在经济上的可负担性,从而减少了核能成为化石燃料低价替代选项的可能性。

对石油公司来说,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携带着一种风险。它可能会使一种与石油竞争的能源——核能——变得更加可以承受。然而,如果石油公司能够迫使核能生产商在核能的价格中,附加一笔用于负

59 Robert M. Solow, 'The Economics of Resources or 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2, 1974: 1-14.

60 John von Neumann, 'John von Neumann on Technological Prospects and Global Limits' (1955),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2: 1, March 1986: 120.

担其对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的费用——包括核反应堆退役时的净化费用，以及将乏燃料封存上千年的成本——那么，核能的价格就会一直高于石油。为了促进这种计算方式，各大石油公司携手合作，努力推动将“环境”构造为一个新的政治的对象，并且要以特定的方式对它进行定义和测量。“环境”就像“经济”一样，并不仅仅是石油公司不得不应对的外部现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它是各个相互对立的团体都试图动员利用的一系列力量和计算方式。

石油公司在构造这种环境政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示了石油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我们尚未触及的维度：与煤炭的生产相比，石油的生产在专家知识的部署和分配上有着不同的方式。之前我曾提到，煤炭工人在争取民主权利上的战斗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煤矿工人在井下的采煤工作面上所行使的自主权，尤其是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时代到来之前。这些采掘矿石的工人所享有的自主权，使得他们将大量专家知识掌握在自己手里。相较之下，石油的生产让人们留在了地面上，而有关石油生产的专家知识则被分配到了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里。

这种差异还进一步扩展到了这两种矿藏被开采出来之前的阶段和之后的处理过程。煤炭行业不需要在勘探上投入大量资金，因为可开采煤层的地质条件已经决定了，它们的位置是易于确定的，而开采偏远的煤层则不符合经济效益。但在石油行业，勘探是一项规模庞大、资本密集的重要环节，石油公司可以从中获得大量利润。大型企业依赖广泛的技术、政治、经济的专家知识，来支持新油田的发现。⁶¹

193

61 Gavin Bridg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Extractive Sector: Governing Resource-Bas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 3, 2008: 414.

更进一步的，煤炭一旦被开采出来，就可以直接使用。它也许需要被清洗和分选，但不需要经过化学转化的过程。而石油被开采出来时，是以原油这种不可直接使用形式存在的。原油必须在锅炉中被加热，通过分馏使不同的碳氢化合物分离开来，再被进一步加工成可以使用的、规格统一的油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石油最初的主要用途是照明用的煤油，以及供蒸汽锅炉使用的燃油和用于润滑的矿物油，这些都是更加重质的油分。汽油和精炼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轻质副产物，则被视为废料。为了提高利润率，各石油公司成立了大型研发部门来为这些未被使用的副产品寻找用途，成立了流通和销售部门来推广它们的使用，还成立了政治与公关部门来帮助构建出对这些产品有需求的社会。⁶² 各大石油公司还彼此合作，拒绝与包括煤炭行业在内的其他方面分享这些专家知识。各大石油公司组建于1928年的卡特尔，其实是一个更广泛的、不仅限于石油的碳氢化合物卡特尔，因为这个卡特尔的协议不仅限于控制石油的生产，还包括防止煤炭公司使用那些会让它们涉足合成油生产领域的专利技术。⁶³

与煤炭公司相比，石油公司发展出了一套规模更大、分布更广的生产专家知识的网络，而这些网络越来越深地介入到重塑更广大世界的进程中，将这个世界改造为一个石油产品能够繁荣兴旺的地方。正因如此，国际石油行业在应对1967—1974年的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资源和实力。面对着石油生产国主张分到更高份额

62 参 Bruce Podobnik, *Global Energy Shifts: Fostering Sustainability in a Turbulent A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63 Gregory P. Nowell, *Mercantile States and the World Oil Cartel, 1900–193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石油收入的要求，以及环保主义者对碳民主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主要的大型石油公司能够调动公关、营销、规划、能源研究、国际金融和政府关系等各方面的一系列资源——所有这些资源都能够用于帮助定义这场危机的性质，并推广某一套特定的解决方案。

经济学的资源

人们关切的议题在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燃烧化石能源导致的大气变暖；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美元贬值；制造业的衰落和战后经济增长的终结；持续的反战运动；中东冲突；美国政治的金权腐败（包括石油公司的大笔非法献金），这种腐败最终引发了水门事件的危机。声名卓著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宣称，美国正在遭受“民主过剩”（excess of democracy）之害，而他的说法反映了美国政治精英中的一种普遍观点。⁶⁴ 194

这种过剩，已经无法再通过使政治诉求服从于以“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可行性计算来加以遏制了。一直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没有考虑到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的代价、战争的浪费、地球气候变化或环境破坏的情况下来计算的。以民族国家的尺度来衡量世界的宏观经济学，既不能解决石油危机而只能将其视为某种来自外部的“供给冲击”，也无法计算军国主义、美元价值和石油控制权的转移之间跨越国界的多重关系。

6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ed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59–118, 113.

对于为数不少且颇具影响力的一群反对政府插手调控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而言，无法对石油危机做出解释，这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个机遇。而在1973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第86届年会上，这个机遇被抓住了。在年会的理查德·T. 伊利讲座上向全体与会经济学家发表演讲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讨论了控制矿产资源的耗竭这个突然兴起的政治关切。为了对抗能源消耗交由政府来管制的计划，他设法证明，对矿产资源的节约利用可以通过市场的法则来管理。

在演讲时，索洛面对的是一个对当时各种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反应不一，充满了分歧和不确定性的经济学界。两年前理查德·T. 伊利讲座的讲者是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一位倾向左翼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在该讲座五十年的历史中仅有的三位女性讲者之一）。她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The Second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的演讲中，将“一个把精细复杂的理论建基在与现实毫无接触的虚空之上的经济学界”这个当前的混乱状态，与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前、无法解释大萧条或提供对策的1930年代经济学界的状态进行了对比。她描述了“经济理论明显的破产状态，它们再一次地，在除经济学家以外的每个人都似乎最迫切需要得到答案的问题上无话可说”——这主要是指解释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⁶⁵

索洛在演讲中首先证实，“经济理论家们确实是读报纸的”。在阅读了有关矿产资源日益加剧的稀缺问题的各种最新报道，并且“与其他人一样受潮流所惑去读了《增长的限度》一书”之后，索洛决定，

65 Joan Robinson, '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1/2, 1972: 9-10. 亦参 Michael A. Berstein, *A Perilous Progress: Economists and Public Purpos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8-184.

去看看经济学对与可耗竭资源（exhaustible resources）相关的问题有何见解。他发现，此类文献并不太多。他开始起草自己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然而，在写作期间，“似乎那段时间每次收到信件时，里面都有又一位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对可耗竭资源的经济学做出讨论的又一篇文章。这就有点像一只独行的老鼠，自顾自地一路跑到海边，然后在环视四周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一只旅鼠*罢了”。⁶⁶

索洛重新发掘了上一代的一位杰出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已被当下学界遗忘的研究。霍特林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可耗竭资源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的论文中指出，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存在着一条均衡的价格路径，在这条路径上，石油等可耗竭资源的价格上升的速率，将相当于投资具有类似风险程度的项目所能获得的现行利率。由于埋藏在地下的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着其市场价格的上涨而升高，因而在理论上，当价格上涨时，资源的所有者会减少这种资源的开采量，而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储备资源留在地下，使其价值继续增长，同时将资金投资于其他领域。更高的价格则应当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需求下降，进而使其价格下跌。而一旦资源的价格跌破现行利率，霍特林指出，资源的所有者通过储备资源留待未来开发而使其增值的做法将会使他们亏损，所以他们会增加对于生产这种资源的投资。因此，市场的法则就提供了一种调节自然资源开采速率的机制，使这一速率趋向于一个能够产生复利利率的指数价格路径的水平。

* 传闻旅鼠（lemming）这种动物存在集体投海自杀的行为。人们根据这种传闻，用“旅鼠效应”指盲目跟从的群体行为，用“旅鼠”形容盲从者。——编者注

66 Solow, 'Economics of Resources': 1-2.

霍特林的研究被遗忘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正值上一波要求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尤其是森林砍伐和油井钻探——和对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进行公共监管的呼声在增加的时期。就像四十年后索洛表达他的见解一样，霍特林试图证明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产业，是为了反对政府的干预。然而，就在霍特林此文付印之际，东得克萨斯的石油勘探者们钻探到了一处储量巨大的油田，后被证实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从那里的油井中喷涌而出的石油导致了石油价格的暴跌。四个月后，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宣布戒严，并派遣国民警卫队占领了油田，关闭了新钻的油井，以这样的手段来提高油价。⁶⁷ 霍特林关于市场调节的论述就此被忽视了。而在他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美国开始实行由得州铁路委员会管理的石油生产配额和价格监管体系。

四十年后，对油田的军事管控已经被外包给了中东，得州铁路委员会的监管权力也已经被移交给了欧佩克，在这样的背景下，索洛重新发掘了霍特林的研究，并再次提出要利用市场的法则来调节自然资源的开采。在索洛的讲座之后，涌现了一批以此为主题的文章和博士论文，形成了一门全新的研究领域：资源经济学。然而，这些工作对于解释决定石油价格或统摄石油生产的那些力量贡献甚微。⁶⁸ 索洛在演讲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在撰写讲稿时，“脑中并没有在考虑当前的问题。毕竟，我所能说的一切内容，都没有把国际石油卡特尔、中东权贵们的政治与经济野心、对石油供应的突发情况做出调整的速

67 Harold Hotelling,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2, 1931: 137-175; 'Military Rule in Texas May Boost Oil', *Wall Street Journal*, 18 August 1931: 1.

68 Robert Mabro, 'OPEC and the Price of Oil', *Energy Journal* 13: 2, 1992: 1-17.

度，或是我们国内相互支持的寡头垄断者们的所作所为考虑在内”。⁶⁹ 索洛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设计出一些计算装置，这些装置能够创造出一种不同的管控价格的方法。

索洛和他的许多经济学家同行主张，用这种市场的装置替代民主的方法来治理关切公众的事务，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将公共事务转化为拥有资源的市场能动者进行私人调控的事务。索洛承认，即使他的市场方案为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产生出了稳定而不波动的价格，这一机制也并不能保证，所得到的这种价格将会把未来世代的需求纳入考量——这是新近有关资源耗竭和环境保护的公共辩论中人们最主要的关切。他承认，市场价格事实上更有可能低估或忽视未来世代的利益。然而，他反对任何通过民主治理的手段，来试图限制当下的资源消耗，并将未来世代的需求纳入考量的做法。他说，政治人物仅仅关注下一场选举，因此，我们不能“指望”政治的过程会比能源公司更加注重未来的长期利益。将一位石油公司的高管调任到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并不会把他转变为长远利益的守护者”。⁷⁰ 人们不应该信任政客会照顾长远利益，而应该信任技术，因为技术将会发明新的能量来源，以取代化石燃料。而就较为近期的未来而言，政府则应该限制其职能，专注于改进对市场计算的应用。两项具体措施将会使市场工具更好地调控石油行业：一是建立期货市场，以此为手段来引入对较近期未来的计算；二是收集并发布关于技术、石油储藏、能源需求等方面未来趋势的信息，从而使这个期货市场运作得更加高效。⁷¹

197

69 Solow, 'Economics of Resources': 13.

70 同前注：12。

71 同前注：13。

在与石油相关的领域，上述技术发展出了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国家层面与政府之间建立石油知识协调机制。美国政府创建了能源部，下设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将石油和其他能源资源的统计与分析工作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行政单位之下。同时，工业化国家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简称“经合组织”），迅速在巴黎组建了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来组织石油的储备工作，发布能源供应的数据与报告，以应对下一次石油禁运的威胁。其二是组建另一种针对石油的技术装置——对以往通过固定合同进行石油交易的体系进行补充的一套市场安排。1970年代末，纽约商品交易所（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建立了石油期货市场，在那里，索洛的论点被发展成为一套预测油价未来走势的工具。

石油价格的成功上涨，削弱了对“经济”进行的凯恩斯主义式的管理，从而扫清了障碍，使那些被宣扬为可以替代民主“过剩”和民主政府“失败”的市场装置得以发展。在一场从1970年代起直至今日都依然在展开的持久斗争中，石油公司不断利用它们的政治关系，来扼杀旨在限制其影响力或管理自然资源的立法。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为阻挠不同于市场的其他监管举措提供了工具和论据。而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智库开始推广另一套工具：碳交易。⁷² 为了限制政府监管化石燃料日益增加的使用，并降低监管对企业利润造成的损害，各种各样的方案被设计出来，借由这些方案，西方的实际污染减排，就可以与全球南方成本低得多的假定减排进行交易了。

72 Larry Lohmann, *Carbon Trading: A Critical Convers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ivatisation and Power*,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48, September 2006.

石油价格的急速增长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助推了这一进程。在石油公司趁着石油繁荣而大发横财之际，美国的几大家族将其从石油中赚取的财富，转化成了新自由主义运动意外收获的雄厚资金支持。梅隆家族所属海湾石油公司的继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利用石油收入，在四十多年间向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组织捐赠了至少 3.4 亿美元，成为美国宣扬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各政治团体的最大金主。⁷³ 美国最大私营石油公司科氏工业（Koch Industries）的创办人查尔斯·科赫与大卫·科赫（Charles and David Koch）兄弟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查尔斯·科赫还在 1977 年参与创建了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这些智库和政策组织凭借一项自 1930 年代末以来逐步装配成形，旨在剥夺国家调控“经济”的角色，并用市场的私人调控取代这种政府对集体生活的公共调控的行动纲领，引领着新自由主义运动。⁷⁴

198

这个“在……似乎最迫切需要得到答案的问题上无话可说”的经济学界，很快就被新自由主义运动重新注入生机，而经济学界的许多成员开始在运动中扮演要角。与该运动的智库联系密切的经济学界将致力于发扬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技术，并处理“民主过剩”的问题。

73 Robert G. Kaiser and Ira Chinoy, 'How Scaife's Money Powered a Movement', *Washington Post*, 2 May 1999: A1, A25; 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200-201.

74 参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及 Timothy Mitchell, 'The Work of Economics: How a Discipline Makes its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 2, 2005: 297-320。

*

1973—1974 年石油价格的飙升，一直被描述为供需法则的一个教科书级案例。我们没有因为这种论述对所发生事件的解释过于片面而拒斥它，而是深入追踪了使这种解释得以成立所必须完成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对原材料的控制、动力的生产、能源工人与社会团体的诉求、对企业利润的监管等各种不同领域的一系列冲突和转变整合在一起，形成美国政治关切与政府干预的一个单一领域，并被称为“能源危机”。这项工作还包括本章和上一章所考察的中东地区一系列罢工、怠工破坏行动，以及政治竞争和对抗，它们使得将石油从主要产区输送到西欧石油消费地的网络，被转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这个工具被打造出来，是为了服务双重目标——第一重目标关乎石油利润流的改向，第二重目标关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为了阻挠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相关参与方采取了种种行动，这些行动特别利用了市场的机制，以供需法则的论述和限制石油消费的手段为依托，试图构造出这场危机的可能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199

然而，从多个方面来说，1973—1974 年发生的事件都超出了试图将其限制在市场力量范围内的努力。供应的问题，引发了新的有关石油储藏可能存在的限度的疑虑；预测未来需求和价格的日益困难，开辟了新的描绘未来的方法；无法防止的漏油灾难，则催生了一些新的关切议题——尤其是环境的保护。然而，1973—1974 年的事件也助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瓦解，让它备受自 1970 年中期以来在重获生机的新自由主义智库中发展起来的市场技术的攻击——这些智库中有许多是受美国石油家族的私人财富资助的，这些财富因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带来的意外暴利而大幅膨胀。

第八章 “麦当劳-圣战”

200

1997年2月3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一个代表团到访华盛顿。十天前，塔利班武装夺下了喀布尔周边的乡村地区，在已经控制了该国南部和东部的情况下，他们此时正在准备征服北部。塔利班的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院官员，并讨论了总部设在加州的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日后隶属雪佛龙公司）设想的一条始于中亚、途经阿富汗的管道*的建设计划。一位美国的资深外交官解释了他们对塔利班政权的想法：“塔利班也许能发展成沙特那样。那里将会有阿美公司，有管道，有一位埃米尔君主，没有议会，但有广泛实施的伊斯兰教法。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状况。”¹

塔利班从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获得武器和财政援助以及招募军事人员，是经过了华盛顿同意的，而美国对塔利班的这种支持，用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的评价来形容，是一项“充满内在矛盾”（ridden with inner tensions）的政策，“因为我们在一边谴责他们的暴行，一边与他们接触”。²但是，这位外交官提到阿美——这家曾经属于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六十年前资助了沙特阿拉伯的建立——则提醒了我们，

* 这是一条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出发，途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最终到达印度（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通常以四国首字母 TAPI 来简称）。——编者注

1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9.

2 这位官员大概想写“被内部矛盾撕裂”（riven with inner tensions）。US Embassy (Islamabad), ‘Official Informal for SA Assistant Secretary Robin Raphel and SA/PAB’, 10 March 1997, i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Pakistan: “The Taliban’s Godfather”?’ at www.gwu.edu/~nsarchiv.

对于那些权力源自对伊斯兰教法进行严格解释的埃米尔们，美国是很习惯于同他们合作的。1998 年美国驻东非大使馆发生了爆炸事件，国名已改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塔利班政权却拒绝逮捕及引渡沙特异见者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美国对该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然而，直到 2000 年 9 月，哪怕在公开场合斥责塔利班行为“卑鄙”，美国还是私下向塔利班的一位高级官员保证，其政策“一向是设法与塔利班进行接触”。³ 与保守的伊斯兰政权建立联盟时面临的“内在矛盾”，是美国政策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

201 近几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讨论把石油与民主的问题，与伊斯兰问题联系在一起。有政治学者指出，并不是每一个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都未能发展出更民主的政府形式。例如，在全球南方的三个大型产油国——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可以发现军政府与更民主、更平民主义的政权交替更迭的现象。为了解释这些模式，专家们提出了多种解释方法和限定条件。⁴

3 US Embassy (Islamabad), 'Searching for the Taliban's Hidden Message', 19 September 200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The Taliban File Part IV, at www.gwu.edu/~nsarchiv.

4 Fernando Coronil, *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Michael Watts, 'Resource Curse? Governmentality, Oil, and Power in the Niger Delta', *Geopolitics* 9: 1, 2004: 50-80; Thad Dunning, *Crude Democracy: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erry Lynn Karl,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食利国家”问题的首次表述，出自以下文献：Hussein Mahdavy, 'The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ntier States: The Case of Iran',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对中东“食利国家”的进一步研究包括：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New York: Croom Helm, 1987; Ghassan Salamé, ed.,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The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London: I. B. Tauris, 1994; and Isam al-Khafaji, *Tormented Births: Passages to Modernity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2004, 309-325。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中东对于那些想要控制世界石油生产的跨国公司与帝国国家来说，既是最关键的地区，也是最难控制的地区。一方面，中东是石油储藏最丰富、生产成本也最低廉的地区。另一方面，有太多的大型石油生产国集中在这一区域，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当地的诉求时要做出妥协的话，就有可能扰乱周边几个国家达成的布局安排。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从伊斯兰教中寻找理由，来解释中东地区那些为推进民主和平等的诉求而斗争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政治伊斯兰已经在中东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它们也在石油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oil）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通常情况下，中东地区最世俗的政权，往往是那些最独立于美国的政权。一个政府与华盛顿的联盟越紧密，其政治就越伊斯兰化。纳赛尔治下的埃及、共和制时期的伊拉克、巴勒斯坦的民族运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复兴党执政的叙利亚——全都制定了独立于美国的发展道路。以上各国没有一个宣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家，许多国家甚至还压制了本地的伊斯兰运动。相较之下，那些依赖美国的政府通常都声称自己拥有伊斯兰权威，而这些政府要么由一位声称自己是先知后裔的君主统治，如约旦、北也门*和摩洛哥，要么自称担任

* 1934年，英国占领独立的也门王国的南部，造成也门南北分裂。1962年，北也门军事政变，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67年南也门摆脱英殖民统治，成立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990年，北、南也门统一成也门共和国。也门南方一直存在分离势力，企图再次独立。——编者注

着信仰捍卫者的特殊角色，如沙特阿拉伯。而就其他一些政府而言，当它们向美国靠拢时——如 1970 年代安瓦尔·萨达特治下的埃及、1980 年代齐亚·哈克（Zia ul-Haq）治下的巴基斯坦——它们的政治话语与维持合法性的方式都明确表现出向伊斯兰化靠拢的倾向。

伊朗看起来似乎是这一模式的一个例外。在亲美的沙阿政府统治下，它是一个世俗国家；在 1979 年革命后，它变成了一个与美国的野心相对立的伊斯兰共和国。然而事实上，沙阿曾经动员了保守的宗教力量来支持他。1953 年，他依靠美国中情局资助的宗教领袖推翻了当时的民族主义政府，而他最终失去政权，也是因为该国的主要宗教领袖转而反对他。而且，许多研究伊朗的学者会认为，在这个中东地区最独立于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号中有“伊斯兰”的共和国，诉诸宗教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无法支撑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了。特别是在青年一代当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造了整个中东最世俗的社会之一。

一旦我们注意到这种模式，就会得出一个直接但并不令人满意的解释。常常有人指出，美国依赖于保守政权的支持，而这些保守政权则依靠宗教来为自己的权力提供合法性。相较之下，许多平民主义或民族主义政权在独立后推行了诸如土地改革、提升妇女权利、工业化以及提供免费教育或医疗等举措，并通过这些平等主义的社会改革而非宗教权威获得了它们所获得的各种程度的合法性。

但这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由某些伊斯兰教派所提供的保守主义政治道德，并不是这个宗教的某种持久性的特征，可以由统治者们的便取用。这种保守主义政治道德之所以有用，是因为道德保守主义表达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立场和观点。政治政权依赖于它们所无法直接控制的这种影响力，而与这些运动结成充

满紧张的联盟关系。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派，代表的是一种在 18 世纪中期兴起、在 20 世纪初又作为一场政治运动重生的思想传统。这一教派拥有自己的教法学者、教师、政治代言人和战士。外界依据这一教派 18 世纪创始人的名字，称其为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其信众（the *muwahhidun*，“穆瓦希德”，或译“认主独一者”）则更愿意将它称为认主独一派（*tawhid*）。它在英国殖民扩张时期发展起来，目标是改造穆斯林社群并重建其道德观念。印度（包括日后成为巴基斯坦的部分）和阿富汗的迪奥班德派（Deobandi school）则是英国殖民时代另一支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和思想力量，塔利班运动主要就是源自该宗派。在埃及，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思想改革运动催生了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而这个成立于 1929 年的组织，日后将会发展成为该国对抗英国军事占领与统治阶级腐败最强大的一支群众势力。

政府借助这些运动的支持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当优尼科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官员（连同巴基斯坦政府）决定他们可以“容忍”塔利班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提议与这一运动缔结合作关系，因为塔利班的道德权威、社会纪律与政治暴力，在他们眼中，是能够加以利用和驱使的力量——用于实现那条长达 1000 英里的输气管道的建设。“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美国指出，“塔利班在他们控制的区域恢复了安全，大致建立起了某种法律与秩序。”⁵ 在埃及，自 1970 年代以来，国家政权（以及与之相牵涉的美国政府）依靠与穆斯林兄弟会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tacit alliance*）来协助同时镇

203

5 US Embassy (Islamabad), 'Official Informal for SA Assistant Secretary Robin Raphael'.

压世俗进步派和打击激进的伊斯兰反对派。而在阿拉伯半岛，穆瓦希德（瓦哈比派）不仅是沙特统治的意识形态家（ideologues），更是一支让沙特的国家建构得以实现，进而使美国的石油工业得以运转的社会力量。在每一个这样的案例中，统治权力与伊斯兰运动之间缔结的联盟，都是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的源头。

因此，这类宗教运动在全球的石油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发挥着虽然小却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沙特阿拉伯的穆瓦希德或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类保守主义宗教改革运动，对于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力与权威来说不可或缺，而且如果说，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那样，埃及与沙特政府的稳定，对于保护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对石油的控制——至关重要，也许比全球南方其他任何国家政府都更为重要，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伊斯兰在我们所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中，扮演着某种未被承认的角色。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称为“圣战对峙麦当劳世界”（Jihad vs. McWorld）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力量（“麦当劳世界”），正经受着被巴伯归类为“圣战”的各种力量——与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相对立的各种部族特殊主义（tribal particularism）和“被狭隘理解的信仰”（narrowly conceived faiths）——所带来的冲突与抵抗。⁶即使是那些对美国帝国的崛起和全球市场（这是一个错误的术语）的扩张持批判立场的人，通

6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How Globalism and 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5: 4. 巴伯讨论了圣战与麦当劳世界的“辩证法”（dialectic），但他仅仅是在说，被他归类为“圣战”的那些力量，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对现代性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过去留传下来的遗存物（第157页）。

常也都会赞同这样的解释。事实上，正是这些批评者们常常会主张，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所谓“普世的”(universal)市场力量所遭遇的那些地方形式的抵抗(local forms of resistance)。

这种讨论所使用的术语具有极大的误导性。把巴伯创造的名词改动之后，可以说，我们事实上生活在一个“麦当劳-圣战”(McJihad)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被我们称作“资本主义”的各种机制，似乎在某些关键的状况之下，只有借助保守主义伊斯兰运动的社会力量和道德权威，才得以运作。也许我们确实需要更好地理解那些反抗资本全球化的地方性力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那个所谓的资本的全球性力量(global forces of capital)。

204

在遭受到了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它将这场战争描述成一场消灭“邪恶势力”的斗争，而这些邪恶势力之所以犯下这些暴行，都是源自他们所怀有的某种对西方非理性的、反现代的仇恨。然而，对此持更多怀疑态度的论述，则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及其盟友在扶植这些“邪恶势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它们一直持续支持阿富汗境内交战的各股伊斯兰势力——包括由本·拉登领导的、被认为要为“9·11”事件负责的基地组织，并自1994年起，助推了塔利班的崛起。这些论述将这场危机全部或至少部分地归咎于美国对中东地区政策的不连贯、矛盾与短视。我们一方面同意这些批评，但与此同时，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认识到：阿富汗的危机反映了某种形式的帝国以及资本的力量所具有的弱点，而它们之所以具有这些弱点，是因为它们必须依赖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才能存在，这些社会力量体现了不同于帝国和资本的能量、方法与目标。

穆瓦希德与市场

1930年，在未来将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这块土地上，统治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Abd al-Aziz Ibn Saud，即伊本·沙特）正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因为世界当前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前往五年前才刚刚被他征服的麦加城朝觐的人数锐减。他开始与美国的石油公司谈判出售阿拉伯半岛的石油权益。谈判的中间人是一位英国商人，哈里·圣约翰·菲尔比。菲尔比出生于英属锡兰，是一位茶叶种植园主之子，曾在旁遮普与克什米尔担任英国印度高等文官体系（Indian Civil Service）的行政官。“一战”期间，他随印度军队来到了伊拉克，并继而以英属印度政府向伊本·沙特提供资金与军火的代理人身份来到了阿拉伯半岛。他后来辞去了印度的文官职位，选择作为伊本·沙特的心腹留在了沙特，并于1925年，也就是麦加落入伊本·沙特控制的那一年，在麦加附近的贸易港口吉达（Jiddah）开创了自己的生意。他担任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富兰克林汽车公司（Franklin Motor Company）和胜家制造公司（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在当地的代理人，并帮助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谈判争取沙特的石油权益。此外，他还皈依了伊斯兰教，开始信奉伊本·瓦哈卜（Ibn Wahhab）的教义（即瓦哈比主义）。尽管有人对他的虔诚表示了怀疑，他还是特意在伦敦和开罗的英语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他的宗教信念。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他先讨论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清教主义是英格兰国力强盛的一个原因，接着便解释起了自己的信仰：

当前阿拉伯半岛的清教徒运动昭示着未来一个建立在坚实的道德与精神根基之上的政治盛世的到来。此外，我将伊斯兰伦理体系视为某种真正的民主博爱精神，以及生活的一般行为准则……它将会创造出一个国家公共道德的极高标准，明显高于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欧洲伦理准则……我认为，支持这项阿拉伯伟大事业发展的最好方式，就是公开表示我对阿拉伯宗教与政治理想的认同。⁷

205

菲尔比的皈依很可能确实是虔诚的，尽管他仍然受到“不可知论、无神论、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反叛我从小接受到的哲学与政治信条的普遍进步思想”等信念的影响，并在日后对伊本·沙特的统治感到幻灭。⁸然而，美国的石油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算皈依了瓦哈比主义，因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开始依赖并支持它们所称的“一位论的”（unitarian）伊斯兰教，以此作为方法和手段，来经营阿拉伯半岛的业务——进而维持与发展全球的石油经济。

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对世界石油产业投入了大量关注，却鲜少注意穆瓦希德在石油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前几章的论述已经让我们熟悉了石油的政治经济学的四项特征，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穆瓦希德的这种角色。第一，作为工业化生活的主要能量来源，石油提供了获得巨大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它的销售价格甚至可以高达生

7 H. St. John B. Philby, 'Why I Turned Wahhabi', *Egyptian Gazette*, 26 September 1930, cited in Elizabeth Monroe, *Philby of Arabia*, Reading: Ithaca Press, 1998 [1973]: 157-158.

8 Monroe, *Philby of Arabia*: 152, 200.

* “超额利润”原文为“rents”，在经济学上译作“租”或“租金”，或称“经济租”（economic rent），指在供应受限的条件下，某些商品所能带来的高于正常回报的额外收益。——编者注

产成本的一百倍。第二，与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相反，整个 20 世纪的石油供应几乎总是过剩的。每家石油生产商都面临着对手压价竞争的风险。如果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为有石油需求的人提供供给的石油市场，这并不会构成什么问题。但石油产业关注的，是利润，不是市场，而在竞争的条件下，维持高额利润是不可能的。潜在的超额利润——或用这种利润通常被称呼的方式，“由稀缺性而产生的溢价”（premiums on scarcity）——只有通过建立起相应的机制来创造出那种稀缺性，才能够实现。

人们常常从美国追求保障全球石油供应的角度来解释石油的国际政治。但保障石油的供应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也就是穆瓦希德发挥作用的所在，是保障这个稀缺性的体系。在 1860 年代石油工业刚刚发展起来时，约翰·D. 洛克菲勒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依靠的方法是建立垄断——他所垄断的并非油井，而是炼油厂，之后他又垄断了运输系统，继而进一步将标准石油建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垄断集团，控制着炼油、运输、分销，以及最后终于控制的油井本身。在 20 世纪，当主要的综合性石油公司开始在美国以外大规模生产石油时，它们发展出了一套不一样的稀缺性的体系：它们合作瓜分了全世界的能源资源，并通过限制生产来维持价格。1928 年，这些石油公司终于针对共享伊拉克的石油开发达成了一项延搁已久的协定，其中还包含了一项限制中东其他地区石油开发的承诺，在这一时刻——正当此时，它们阻止苏联石油出口的努力遭遇了失败——这些公司又签订了一项在彼此之间划分世界石油市场和限制生产以维持价格的平行协议。它们后来同意，以石油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生产和销售的情况为基准，尽量将世界石油价格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这些布局安排防止了市场竞争的出现，从而确保了那些控制着中东低成本石油的生产商，能够以此攫取巨额的利润。“二战”后，石油公司生产石油的成本，包括勘探、抽油、储存和损耗等环节的费用在内，是每桶不到 30 美分；这个数字后来下降到了每桶 10 美分，而这些公司向炼油厂出售石油的价格则是每桶 2 美元。⁹到了 1960 年代，全球南方的石油生产国开始发挥更独立的作用，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它们组建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管了维持石油供应的稀缺性的角色，并且通常与跨国石油公司和主要非欧佩克产油国合作，来完成维持稀缺性的目标。

世界石油产业的第三项显著特征在于，通过前述这些布局安排，有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开始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在 1970 年代，沙特发展成为与美国和苏联并列的三个超大石油生产国之一。而到 1990 年代时，这三国中每个国家的石油产量，都达到了全球前十二大石油生产国中其他任何一国（加拿大、挪威、英国、中国、委内瑞拉、墨西哥、科威特、阿联酋和伊朗）的两到三倍。¹⁰不过，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石油供应的丰富，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个稀缺性的体系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沙特人口仅为俄罗斯的十分之一或美国的十六分之一，而当时其国内对石油的需求还相对较低，这使得沙特有能力关闭它的部分石油产能。到 1990 年代，这部分未被使用的产能（据当时估算超过每日 300 万桶）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除美

9 Christopher T. Rand, *Making Democracy Safe for Oil: Oilmen and the Islamic Eas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5, 16-18.

10 有关产量数据，参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at www.eia.doe.gov. 随着 2000 年后北海油田产量的下降，挪威和英国跌出前十二名外，被巴西和伊拉克取代。

207 俄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的石油总产量。¹¹ 这种过剩，使沙特阿拉伯得以扮演“摇摆”（swing）的产量调节者角色（欧佩克成立前，这个角色由英国石油控制之下的伊拉克和科威特先后承担），能够以威胁要开启或关闭其剩余产能（surplus capacity，或译“富余产能”）来约束试图超过生产配额的其他石油生产国，从而维持这个稀缺性的体系。而沙特在扮演这个角色时是与美国合作的，它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由于这三大因素——缺乏弹性的需求、供应过剩和沙特的剩余产能——在20世纪后半叶，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大规模超额石油利润的可能性，都取决于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控制。

全球石油经济的第四项相关特征，就是建立上述这种政治控制的方法。1930年，世界上并不存在“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强权强大到可以单独创建这样一个国家。这是全球石油经济诞生的那个历史时刻的特征，而关于石油政治经济学的文献未曾深入探讨过这个部分。大公司通过建立寡头垄断或独占经营区域来规避市场风险的做法并不罕见。事实上，现代的大规模商业公司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7至19世纪的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英国南非公司等许多公司——这些企业被赋予了独占性的权益和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或译“至高统治权力”）以垄断特定商品在特定区域的贸易。然而，主要的石油公司，作为20世纪新出现的跨国公司中最早成立且规模最大的一批，正是在那个最初通过殖民公司建立起来的旧帝国体系最终解体的时刻，确立了它们的全球存在的。

11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at www.eia.doe.gov. 剩余产能的定义是可以在三十天内投入生产并维持至少九十天的石油产量。

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也就是石油公司巩固了它们对全球石油的控制之时，正是塑造世界贸易长达三个多世纪的那种帝国形式遭遇失败与崩溃之际。这种旧的帝国权力具有四项特征，能帮助我们解释在其崩溃之后，伊斯兰运动所开始体现的重要性。第一，主权权力不仅属于若干欧洲国家，同时也属于殖民公司。在某些地区，这种形式的权力很早以前就崩溃了（例如在美国，它崩溃于 1776 年的反英独立战争，而在印度，它崩溃于 1857 年的民族起义），远远早于其他地方——例如在非洲，欧洲殖民公司的权力（corporate power）及其创造的垄断体系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第二，早期帝国强权在军事暴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这些军事力量总能为殖民公司所用，而且常常就是由殖民公司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能运用这种军事力量来击败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消灭当地人对殖民权威的反抗。第三，帝国主义利用被剥夺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欧洲农业人口，把白人定居者的社群散播到了全球各地，而这群人极少受到非西方的法律或政治权威的约束。第四，帝国主义为了创建其社会秩序，部署了一种被广为采纳的政治、道德与思想组织原则：种族主义。

到 1945 年时，帝国主义强权的上述四项要素都已经遭到了削弱。首先，新兴的跨国石油公司要建立它们的寡头垄断地位和独占的经营区域，必须通过相互密谋勾结的方式，而不是帝国的法令；它们要获得特定地区的石油权利，则必须依靠与本土势力的谈判，而不是武力。军事支持此时仅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用。

其次，尽管到 1945 年时美国已经拥有了压倒性的全球军事力量，但其使用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在阿拉伯世界，1919—1920 年的民众起义（参第四章）和其后 1936—1939 年规模更大的巴勒斯坦大起义，

已经向英国人展示了通过武力维持军事占领的困难，而美国人稍后也将在东南亚学到同样的教训。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接受有外国军事基地存在于自己的领土上。1945年，美国在被盟军占领的德国与日本设有军事基地，但在德国到日本之间的广阔区域上基本没有。就在那一年，美国与沙特展开谈判，要在阿美在沙特境内的石油业务总部所在地宰赫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并于同年着手开始建设。到了1950年代，宰赫兰成为美国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军事基地。华盛顿努力维持对这个基地的控制，但1962年，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情绪迫使沙特政府要求美国人撤出。直到三十年后，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人才有机会重新占据该基地。

再次，到1930年代时，大多数欧洲北部国家的人口增长已经大幅放缓甚至完全停滞，如此一来，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白人定居者群体，能够跟随海外公司业务的建立而迁徙了。不仅如此，那些随公司海外扩张而迁居当地的较小规模白人定居者群体，例如位于宰赫兰的美国侨民社区，也已不再享有当地法律的完全豁免权。

最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纳粹大屠杀，突然使得欧洲的种族主义成为一种令人难堪的政治与社会组织体系。阿美这样的公司曾将美国的劳动力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方法带到了阿拉伯半岛，为四个不同族群（美国人、意大利人、印度人与非沙特籍阿拉伯人、沙特人）设立相隔的居住区和不同的生活标准，而英国也曾把类似的安排从印度带到了伊朗和伊拉克。但是，在公司经营上实施的种族主义制度导致了频繁的劳工抗议，使得石油公司的处境愈发脆弱。¹²

12 Robert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因此，这样的历史背景代表了石油的政治经济学的第四项重要特征：主要的石油公司需要一个基于对石油生产进行独占性控制、对石油产量进行限制的体系——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反市场的安排，才能够保证它们的利润。这些公司从 1930 年代开始就在努力寻求巩固这样的安排，并在“二战”结束后再次做出尝试，但是，这恰好发生在对海外资源的生产建立独占性控制的旧有方法——殖民主义——正在逐渐崩溃的历史时刻。正是这些因素，为政治伊斯兰赋予了它在石油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209

一个道德的联盟

伊本·沙特，未来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是在英国的保护国科威特的流亡中长大成人的。1902 年，他收复了家族过去的根据地，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利雅得，并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成为争夺阿拉伯半岛控制权的诸位军阀之一。他的征伐生涯起初依靠英属印度提供的资金，后来又依靠与穆瓦希德结成的联盟。尽管他本人并不特别虔诚，但他最骁勇的军事力量来自伊赫万（Ikhwan，又译“伊赫瓦尼”，阿拉伯语意为“兄弟”），或称兄弟会*——一个追求平等主义的运动，试图用定居和农业的生活方式来取代阿拉伯人日益受到威胁的部落游牧生活，用严格的认主独一信仰来取代圣人崇拜和对先知过度尊崇的堕落行为。伊赫万复兴了伊斯兰教经典中有关圣战（*jihad*，或译“吉哈德”，即与不信者展开斗争的责任）的教义，并泛化了这一教义的

* 此兄弟会与后文中提到的由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在埃及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并不是同一个组织。——编者注

内涵，以之证明他们向异教徒——甚至是在他们看来已经背弃了真正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教众——开战的正当性。加入了伊本·沙特行乐的伊赫万不再从事对部落的劫掠，也不再靠抢夺日渐衰落的跨阿拉伯商队（caravan）贸易来获得收入，而是发起了一场战争，来对抗他们认为在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中存在的多神崇拜现象。

在 1913—1914 年间，伊本·沙特控制了阿拉伯半岛东部（这一地区的人口以信仰伊斯兰什叶派为主，被穆瓦希德视为异端）。“阿赫万主义（Akhwanism）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全然糟糕的运动，”英国驻巴林的政治代表在 1920 年赴哈萨（al-Hasa）调查后，向伦敦这样汇报道，“它似乎是一场真正的宗教复兴，是尝试让阿拉伯半岛中部的民众在宗教和精神上自我提升的努力。”这位代表还报告称，伊本·沙特“曾经打算利用这场运动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最终却发现，他不得不传播这一运动的教义，并成为运动的领袖，以免自己地位不保”。然而，伊本·沙特和他的副手们“把这一运动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上”。¹³ 在夺取了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之后，1925 年，伊本·沙特又攻占了西部的汉志王国，王国里有麦加与麦地那这两座圣城，城中还居住着有权有势的商人家族，这里的统治者每年可以从麦加的朝觐活动中获得丰厚的收入。在汉志被占领后，伊赫万运动开始强制向当地民众推行他们所认定的纯正伊斯兰信仰，并捣毁了先知穆罕默德出生地的纪念碑以及其他被他们认为不合教义的礼拜场所，还禁止了饮酒和吸烟。为了制约伊赫万的狂热，伊本·沙特设立了由自己控制的公共道德委员会。这些扬善惩恶委员会负责打击恶行，而随

13 H. R. P. Dickson, 'Notes on the "Akhwan" Movement', June 1920,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Office Records, PRO CAB 24/107.

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还越来越多地负责监管“有害思想”的传播和参与反政府集会的行为。¹⁴

伊本·沙特正在建立的专制统治，需要依靠英国提供的资金和军火来击败阿拉伯半岛上与之相争的势力；伊赫万则致力于清除阿拉伯半岛上的个人腐化和道德败坏，而这些弊病在他们看来，是与殖民主义的存在和影响力相联系的。这位统治者对外国支持的需求，与帮助他征服和统治阿拉伯半岛的这支追求纯洁信仰和严格道德的势力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立。在汉志被征服后，伊赫万开始积极将他们的圣战向北推进到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挑战这三个英国保护国的后果，是伊本·沙特承受不起的。1927年，由于伊本·沙特开始限制他们的扩张，伊赫万发动了叛乱。伊本·沙特在英国的帮助下镇压了叛乱，并于1930年解散了伊赫万运动。

虽然穆瓦希德在阿拉伯半岛的政治中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势力，但也无力阻止伊本·沙特向资助他的帝国强权妥协。在伊赫万被击败的同一年，伊本·沙特开始在圣约翰·菲尔比的居间协调下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今天的雪佛龙）开展谈判，并开始从寻求英国的保护转向美国的保护。为使宗教权威机构接受这种来自外国的支持，他做出了让步：穆瓦希德的领导层将要容忍外国石油公司的角色，而作为回报，该教派改造阿拉伯半岛皈依认主独一教义与戒律的宣教事业，将使用石油的收入来资助。

因此，这位成功的军阀建构阿拉伯半岛新的政治秩序，依靠的是两种不同的力量。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为其提供了资金，

14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0-271.

以及技术和物质的援助。¹⁵ 阿美为该国建设了新的市镇、公路系统、电信网络、港口和机场，还充当着统治家族的银行家，以及沙特企业的投资人——尤其是会把它在阿拉伯半岛东部的业务需求都承包给当地企业。阿美缴纳的石油特许权使用费并不是付给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是付给了单一的一户家庭，也就是伊本·沙特的家庭。此时，已经自封国王的伊本·沙特，将从前汉志、内志两省合并而成的国家重新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创造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某个家族命名的国家。由于阿美公司与伊本·沙特之间达成的这样一种安排，每年为石油支付的数百万，乃至日后的数十亿美元，就都变成了私有的收入，全部归于一个单一的家族——尽管是一个后代繁衍得无比兴盛的家族，据说在三四代之内，伊本·沙特的后裔就已多达约 7000 人。¹⁶ 这种对石油收入的“私有化”在当地并不得民心，因而需要获得外部的帮助来维持。1945 年，美国政府在宰赫兰建立了军事基地，随后又开始训练和武装沙特的安全部队，这些部队监禁、胁迫、拷打、处

15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SOCAL）在 1933 年创立了阿美石油公司的前身——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石油公司（CASOC），并在 1936 年增加德士古作为共同股东。1943 年，SOCAL 说服美国政府来接手了原本由该公司和英国向沙特政府提供的财政援助。美国政府随即决定，将该公司变更为国有控股。SOCAL 经过艰难的谈判，设法将国有股份限制在了三分之一，但埃克森和美孚随后又阻止了这个国有计划的实施。作为对这一系列威胁的回应，SOCAL 在 1944 年将 CASOC 更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并在 1946 年同意让埃克森和美孚也获得阿美的部分所有权。Irvine H. Anderson, *Aram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Study of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Oil Policy, 1933-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Saïd K. Aburish, *The Rise, Corruption, and Coming Fall of the House of Saud*, 2nd edn,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6: 7. 阿布里什（Aburish）估算，沙特全国石油收入的约 15% 被归为王室的私有收入。这笔钱中的大部分在被计入国家账目之前，就已经从国家的石油收入这一项中扣除了，因此确切数字无从查考。这笔钱不包括王室家族从军火购买和其他非石油交易中收取的费用（第 294—295 页）。

决或流放了统治家族的反对者。另一方面，宗教权威机构（religious establishment）强制施行了严苛的社会体制，使臣民纪律得到了维持，政治异见都被压制，从而创造了这个新国家的道德与法律秩序。

当阿美在“二战”后开始拓展业务时，员工群体中出现了反该公司实施的种族隔离与不平等制度的声音。1945年，一系列抗议种族间同工不同酬和生活待遇差别的罢工接连爆发，作为回应，阿美设立了一个阿拉伯事务部，以便更好地搜集员工情报，并试图铲除“劳工煽动者”。¹⁷此后又发生了一连串抗议活动，最终引发了1956年7月的一场总罢工。工人们的诉求包括：制定一部政治宪法；保障成立工会、政党和全国性组织的权利；禁止阿美再干涉沙特的国家事务；关闭美国军事基地；释放被关押的工人。阿美公司的安保部门把工运领导者的身份都指认给了包括伊赫万在内的沙特安全部队。1950年代，沙特政府又重建了伊赫万，将其更名为国民卫队——尽管其成员依然被称为“穆贾希丁”（即“圣战士”）——以制衡本身就聚集了大量异见者的正规军队。总罢工中有数百名抗议者被逮捕、拷打、投入牢狱或驱逐出国。像往常一样，美国石油公司的高管和圣战势力在罢工事件中携手合作，以继续维持石油的政治经济学。¹⁸

对于这样的一种石油的政治经济学，在国内的反对被噤声之后，主要的威胁便来自国外——来自埃及和伊拉克的民族主义政府，这两国政府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谴责沙特王室的腐败，以及它对两国如今所称的“阿拉伯石油”的侵占。为应对这一威胁，沙特阿拉伯政府动用了石油收入，支持该国的宗教权威机构将其奉行穆瓦希德的道德

17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92–98.

18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176–183; Vassiliev,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337.

212 权威与社会保守主义的计划推广到国外。在埃及，它们资助了一个伊斯兰政治运动的重新兴起，而该运动在 1950 年代末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当政期间曾是他试图镇压的对象。它们还支持了巴基斯坦和整个中东地区的类似运动。

阿美公司的政治官员协助策划了这一方案。以阿美员工身份作为掩护的那位中情局特工威廉·埃迪曾呼吁，要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建立一个道德的联盟，以对抗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的威胁”。当这个想法被传达给了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这些更加世俗化的政府驻沙特的大使时，他们“反应冷淡”，得知这一点的埃迪承认，“这不对他们的胃口，也不是为他们准备的”。¹⁹到了 1956 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逐渐被说服，要扶植在 1953 年继承了父亲伊本·沙特王位的苏欧德国王*，使之成为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相抗衡的中东地区领导者。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拥有穆斯林世界两圣地的国度，沙特阿拉伯人也被认为是阿拉伯各族群中信教最虔诚的。因此，该国国王或许可以被塑造成一位信仰上的领袖。一旦这个目标达成，我们也许会开始力推他也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²⁰可是，苏欧

* 即伊本·沙特之子、沙特阿拉伯第二任国王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因为他的名字也是“沙特”（Saud），英文中通常称为“King Saud”，直译为“沙特国王”，也有文献将之翻译为“国王沙特”。为避免混淆，本书译作“苏欧德国王”。——编者注

19 William A. Eddy Papers, letter from Myron B. Smith, 19 December 1950, and reply from Eddy, 29 December 1950, Box 8,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7, 1948–1954,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0 ‘Diary Entry by the President’, 28 March 1956, FRUS, 1955–1957, XV, cited Matthew F. Jacobs, ‘The Perils and Promise of Isl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Middle East in the Early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30: 4, 2006: 734. See also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nd the Middle Ea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44.

德国王更倾向于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改革者站在一起，因此美国人便转而支持他的对手，也就是他的弟弟和他任国王时的首相——王储费萨尔亲王（Prince Faisal），最终在 1964 年，费萨尔把他的王兄赶下了台。费萨尔清除了政府中的改革派与现代化的支持者，包括石油部长阿卜杜拉·塔拉基（Abdullah Taraki）。这位曾参与推动建立欧佩克的石油部长，正在制定沙特政府逐步接管阿美公司的计划，同时，他还参与了一个由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群人正在为沙特规划制定成文宪法、设立民选议会和推动工业化的方案。被美国人奉为开明君主的保守派费萨尔重启了对抗纳赛尔主义（Nasserism）和支持国外伊斯兰主义运动发展的方案。在这方面，美国人似乎已经准备好为他提供帮助了。²¹ 根据英国驻开罗使馆的说法，曾任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外交事务编辑的哈里·克恩（Harry Kern），此时正“与中情局合作，为该地区的石油公司运作着一个情报网络”，而当地的消息源表示，他是“利用‘伊斯兰’作为政治跳板，使费萨尔国王能在其国家之外发挥影响力的幕后人物”。²²

与此同时，一批曾为阿美工作、现为中情局效力的特工协助策划了暗杀埃及总统和伊拉克总统的密谋。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推行了土地改革、妇女权利、普及教育和其他一些平民主义的举措。埃及总统纳赛尔逃过了一劫，但在 1963 年，一场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伊拉克政府，其总统也死于政变中，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213

21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188–264; Nathan J. Citino, *From Arab Nationalism to OPEC: Eisenhower, King Sa'ud, and the Making of US-Saudi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95–96, 125–133.

22 Canadian Embassy (British Interests Section), Cairo, to Foreign Office, 8 July 1966,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PRO, FO 371/185483-0001.

也就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党，也被这场政变推上了台（参第六章）。²³在同一时期，大约自 1958 年开始，美国确立了它中东政策的另一大支柱：武装并资助以色列国，将其作为与伊斯兰保守主义并重的另一个行动工具，来帮助削弱阿拉伯的民族主义。²⁴

石油资金在 1930 年后帮助发展了穆瓦希德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势力，并使某些伊斯兰政治运动在 1970 年代得以复苏，这些事实都已得到广泛的认知。但是，理解这一点同样重要：也正是由于某个伊斯兰运动，石油产业才得以实现这样丰厚的利润。石油的政治经济学依赖于从一个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势力中汲取权力的沙特阿拉伯政府，这并不是偶然的。由于石油的政治经济学存在前述四项特征——能从中获取巨量超额利润、供应过剩造成这些利润难以保障、沙特阿拉伯在维持稀缺性上发挥关键作用、外国公司以违反自由市场的原则强行控制沙特油田的旧有殖民方法正在崩溃——石油利润就取决于与那些能够确保对阿拉伯半岛施加政治控制的势力合作，而这些势力，就是与穆瓦希德结成联盟的沙特家族。因此，穆瓦希德并不是扮演一个偶然的角色，而是已经成为石油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内在要素。“圣战”并不只是一种与“麦当劳世界”的发展相对立的地方性的力量；事实证明，“麦当劳世界”（McWorld）其实是“麦当劳-圣战”（McJihad），是多种社会逻辑和社会力量的必然结合。

23 关于中情局在刺杀纳赛尔的阴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参 Aburish, *House of Saud*: 128。关于中情局在 1960 年 2 月企图刺杀伊拉克总统卡塞姆的未遂行动，参 Thomas Powers, 'Inside the Department of Dirty Tricks: Part One, An Isolated Man',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79。关于中情局对 1963 年这场政变的支持，参 PBS/Frontline, 'The Survival of Saddam: An Interview with James Akins', at www.pbs.org。

24 我们在讨论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时，已经考察了与以色列结盟的后果。

要理解“麦当劳-圣战”这一概念，我们需要抱持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这种认识的关注重点，不在于某个特定伊斯兰运动的历史角色，而在于我们所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对它的讨论往往也是依循它的逻辑与权力来进行的。在这样一种视角下，“圣战”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同效（homoficient）历史逻辑的某种地方化的、处在外部的抵抗。²⁵而相比之下，“麦当劳-圣战”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某种不连贯性和脆弱性的历史，是关于某种“充满内部矛盾”的政治的历史。这一概念指引人们注意到，除非经由某些特定的安排，石油的巨额利润是不可能确保的——这些安排依赖于某些相当活跃，但是看起来不资本主义的（uncapitalist）社会力量。可是，在何种意义上，这些社会力量是“不资本主义的”？它们并不是某种从外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因素。无论这些社会力量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根源，它们都是活跃于20世纪的力量，它们的角色随着石油的发展而发展。然而，这些社会力量在石油经济中的角色，是与之相断裂的（disjunctive）。尽管政治伊斯兰对于石油利润的创造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本身并不面向这一目标。穆瓦希德和其他的伊斯兰运动都有它们自己的议程，这些议程有时源于人民所遭受的不公义与不平等，有时源于当地的道德生活形式或当地的等级与尊卑安排——包括家庭与性别关系中的男性特权——所面临的威胁。如果我们把以石油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视为“麦当劳-圣战”中的一个过程，它就不再显得能够自足地独立运作了。它的成功

214

25 资本的“同效性”（the “homoficiency” of capital）指这样一种观点：即便资本主义可能有地方性的差异，但在某种层面上它的行为或产生的影响始终如一。参 Timothy Mitchell,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45。

需要依靠其他的一些力量，而这些力量对于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说，既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又是与它相断裂的。

维持工作

正如我们在上两章中读到的，1967—1974年间，石油生产国、主要石油公司和美国这三者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转变之后，军国主义、危机与战争，在管理“麦当劳-圣战”的矛盾和张力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3年后急剧增加的石油收入回流至了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部分通过沙特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在西方进行其他投资，但也通过石油生产国大批量购买美国和欧洲的军事装备，而在石油繁荣之后，军购呈现加速的趋势。军火制造商开始与石油公司一样，在利润的取得上越来越依赖中东的政治安排。与此同时，有滚滚石油美元涌入的西方银行开始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发放一系列后患无穷的贷款。当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时，这些西方银行又协助设计了被称为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方案，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民而非政府或银行家要为无法偿还的贷款买单。例如，在西方银行发放不良贷款的情况尤其严重的埃及，结构调整方案削减了政府对学校、医药、工厂和农耕的支出，利润丰厚的国家建设项目和庞大的军事预算却丝毫无损。²⁶ 美国开始发现，对于这种石油的政治经济学，要使它所依赖的那些专制政府继续掌权正变得愈发困难，而政治伊斯兰在其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变得愈发与它相断裂。

26 同前注：209-303。

下面所述的一系列危机已经众所周知了。自 1975 年起, 伊朗反对沙阿独裁的力量不断增强, 宗教权威机构的重要派别也开始从支持转而反对沙阿的政权。为应对这些反抗, 当权者选择诉诸暴力和镇压, 而这样的做法在 1978—1979 年激发了一场革命运动, 导致沙阿政权被推翻。在埃及, 政府在 1970 年代鼓励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 以此作为手段来削弱世俗的政治反对派, 但是, 它所面临的民众抗议与反对声浪还是日益高涨, 最终在 1977 年 1 月, 抗议政府将大饼* 价格翻倍的民众占领了开罗的解放广场 (Tahrir Square / Midan al-Tahrir), 酿成了所谓“大饼暴动”。在安全部队杀害了几十甚至上百名抗议者之后, 示威活动蔓延到了全国。直到撤回涨价政策之后, 政府才得以重新控制住了局面。²⁷ 1981 年 10 月, 一个试图利用这种民愤的激进派伊斯兰主义小团体暗杀了萨达特总统, 还尝试发动武装起义, 但迅速就被军政府镇压了下去。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华盛顿加大了它在中东地区一系列战争和政治冲突中的介入力度, 但不是为了解决这些冲突, 而是通过为冲突方提供武器并阻挠外交谈判等和平解决方案, 来维持甚至延长这些冲突。还有其他一些外部势力——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苏联——也向冲突方提供了武器, 而本地区一些国家在面临问题时也会诉诸军事暴力, 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持续地使用暴力, 以此作为镇压手段。但美国和它们

* 原文为“bread”。这种饼是埃及人最主要的主食, 状似饅, 但质地比饅软, 中间空心, 可以夹菜同食。埃及人称之为“aish baladi”, 其中的“aish”兼具“饼”和“生命”的意思, 因此也有“生命之饼”的称号。由于大饼紧密关系着埃及人的日常温饱, 埃及政府长期对大饼提供低价的福利补贴, 而几十年来的历次涨价计划都造成了强烈的民意反弹。——编者注

27 Yahya M. Sadowski, *Political Vegetables? Businessman and Bureaucr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yptian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156.

的区别在于，它在整个中东地区参与武力使用的范围之广，它对于将消耗战用作一种常规政治工具的依赖之日增，以及它在阻止冲突解决上的用力之深。美国这种政策有三个主要实例——伊朗／伊拉克，阿富汗，还有以色列／巴勒斯坦。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在海湾地区两个主要大国——伊朗和伊拉克——就都失去了盟友。1980年9月，伊拉克入侵伊朗，华盛顿并未就此提出异议，甚至可能还给予了鼓励。²⁸ 随后，美国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采取行动阻止战争的解决，来同时削弱这两个国家的势力。华盛顿向伊拉克提供了充足的财政与军事援助以避免其战败，但也使其无法从争端中脱身。与此同时，美国制造的武器也在流向伊朗，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以色列提供或居间安排的，而苏联在此时组织和平对话的尝试，也遭到了华盛顿的拒绝。²⁹ 在1983—1984年间，伊拉克将战事升级到了新的高度——先是对伊朗使用了化学武器，其后又袭击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设施和运输作业——企图以此迫使伊朗投降，从而结束战争。1983年12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与美国特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讨论激化的战争

216

28 伊拉克计划发动一场效仿1967年以色列“六日战争”的短期战争，目标是夺取阿拉伯河水道，以及毗连水道的一块领土。在开战后的第五天，即1980年9月28日，伊拉克宣布实现了这一目标并暂停进军，表示愿意停战并与伊朗协商解决方案。而在这一时刻之前，美国一直在阻碍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但在伊拉克做出宣布后，美国随即推动安理会通过了一份呼吁停火的决议，而这份决议完全没有提及伊拉克的侵略行为，也没有要求伊拉克军队退回国际承认的两国边界。Efraim Karsh, 'Military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Goals: The Iran-Iraq War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 1, Winter 1987/8: 92; Saïd K. Aburish, *Saddam Hussein: The Politics of Revenge*, New York: Bloomsbury, 1999: 186–189 给出了美国和伊拉克在战争前夕拥有更密切关系的证据。

29 M. S. El Azhary, 'The Attitudes of the Superpowers Towards the Gulf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59: 4, Autumn 1983: 614, 616.

局势时，向拉姆斯菲尔德解释称，我们“需要的是停止战争，或使海湾地区处于交战双方势力平衡的状态”。美国选择走后一条路，加强了对伊拉克的支援。³⁰ 华盛顿还努力阻止联合国做出任何决议，而使发动战争的伊拉克受到惩罚或承担赔偿责任——这些正是伊朗要求的停战条件。在美国的帮助下，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代价则是两国共超过一百万人的伤亡。

两伊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希望将伊拉克在战争期间对美国支持的依赖，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然而，萨达姆为了解决这场战争在伊拉克国内引发的财政危机，于1990年8月又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使得这种可能性荡然无存。但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反而为华盛顿提供了通过旷日持久的冲突来削弱伊拉克的进一步机会。在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后，美国和英国建立了联合国制裁制度，这个制度在官方的名义上是为了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实则是为了维持伊拉克财政的瘫痪状态，并阻止其经济复苏。华盛顿以伊拉克未能解除武装为由，来证明制裁政策的正当性，尽管它没有为这一说法给出任何证据。现有的证据显示，伊拉克在1995年及以前就已经销毁了其被禁止的武器和武器方案，而相关方面是了解这个情况的。

30 在拉姆斯菲尔德与萨达姆密谈前，美国外交官曾警告他，“鉴于伊拉克迫切希望结束战争，它可能会再次使用致死或致残的CW [chemical weapons, 即化学武器]”。拉姆斯菲尔德告诉萨达姆，“冲突导致局势不稳，或造成伊拉克的地位削弱、伊朗的利益和野心增强等后果，都不符合本地区或西方的利益。”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Near Eastern and South Asian Affairs, Action Memorandum from Jonathan T. Howe to Lawrence S. Eagleburger, 'Iraqi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21 November 1983; and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United Kingdom Cable from Charles H. Price I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umsfeld Mission: December 20 Meeting with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21 December 1983, 两份文件可在此查阅: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Shaking Hands with Saddam Hussein', www.gwu.edu/~nsarchiv.

217 但美英两国选择保密这一信息，以便推迟解除制裁。³¹ 1997年3月，华盛顿宣布，对伊拉克的制裁还将无限期继续实施，哪怕相关核查认定伊拉克已经履行了有关被禁止武器的义务。十八个月后，美国通过一项法案，为试图推翻伊拉克政府的“民主”团体拨款9900万美元，其中的9700万美元被分配给了军事的援助。³² 为了在伊拉克实施并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禁飞区，美国定期升级空袭轰炸行动，以对伊拉克

31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可以获得并在其后得到了确认的证据显示，伊拉克的核武器方案，以及化学武器的库存和生产设施，在1991年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被销毁了。伊拉克也在1991年的战争后销毁了其生物武器库存，但并未知会联合国。1995年，萨达姆政权的两位高级官员叛逃，这个1991年以前的生物武器方案才被揭露于世；生物武器的设施在1996年被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SCOM）销毁。叛逃的官员还透露，这个项目之前就已解散，但这部分信息被华盛顿保密了，因为公布出来就会让维持制裁的理由不复存在。美国 and 英国还声称，伊拉克在1980年代所生产的化学武器的数量，超过它在1991年申报并销毁的数量，这在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美英两国并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设，尽管联合国已经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视察。用这样的假设作为对伊拉克制裁（和之后发动战争）的论据，其有效性并不在于任何提供支持的证据，而在于伊拉克根本没有办法来证伪这个假设。伊拉克在证伪指控上的无能为力，在美国政府和媒体的说法中，就是伊拉克在欺骗的表现。“我们把萨达姆·侯赛因说成是否认和欺骗的大师，”联合国视察队的一位资深美国成员日后这样说道，“这样，当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的时候，就不会质疑自己的假设，而是说这正是萨达姆善于否认和欺骗的证明。”引自 Bob Drogin, 'US Suspects It Received False Iraq Arms Tips', *Los Angeles Times*, 28 August 2003. 参 Sarah Graham-Brown, *Sanctioning Saddam: 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in Iraq*, London: I. B. Tauris in association with MERIP, 1999; and Glen Rangwala, 'Claims and Evaluations of Iraq's Proscribed Weapons', 18 March 2003, available at www.grassrootspeace.org/iraqweapons.html. 关于美国中情局的一个搜寻小组在2003年的战争后没能找到被禁武器或武器方案的任何证据，参 'Statement on the Interim Progress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raq Survey Group', 2 October 2003, available at www.cia.gov/news-information/speeches-testimony/2003/david_kay_10022003.html.

32 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解释道：“有些国家认为，如果伊拉克履行了该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义务，制裁就应当解除，我们并不同意这个观点。”Speech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6 March 1997, available at 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iraq/1997/bmd970327b.htm. 美国通过的《伊拉克解放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原文，可在此处参阅：thomas.loc.gov/home/bills_res.html。

政权施加进一步的侵扰。而在联合国武器视察过程中搜集到的信息，也被美国用在了一系列针对伊拉克领导层的未遂暗杀行动中。

到1998年时，华盛顿在波斯湾地区实施的暴力长期化政策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但是，现实证明，这个政策是难以持续的。反对制裁的草根运动公布了这样的事实：这些制裁措施是导致伊拉克多达50万婴儿死亡的原因之一，而美国仍在继续利用这些措施来阻挡药品、净水设备和食品加工机器的供应。持有伊拉克数十亿美元债务的法国和俄罗斯希望在伊拉克国内寻求经济机会。而美国对此做出的回应，则是在1998年12月撤走了联合国的视察员，还升级了对伊拉克的轰炸行动。通过中止联合国的视察，美国就由此推迟了这些视察可能完成的日期，从而延后了制裁被解除的风险，为其推翻伊拉克政权的行动争取了更多时间。

在伊朗另一侧的阿富汗，华盛顿又帮助激化了另一场冲突，将它延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人们通常会认为，美国之所以介入阿富汗的局势，是在回应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但事实上，美国的介入开始于更早之前的时间，而其目标，则可能反而是挑动苏联军队出兵阿富汗，并设法让苏军留在那里。1973年，阿富汗的陆军军官与左翼势力结盟，推翻了该国的君主制，同时承诺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在美国的怂恿下，伊朗的沙阿政权启动了一项援助和干预阿富汗局势的计划，以削弱喀布尔的左翼势力，并将该国从对苏联支持的长期依赖中，拉拢到美国-伊朗势力的轨道上来。就像其他美国支持的干预行动一样，伊朗的行动也以失败告终。1978年4月，阿富汗的左翼势力夺取了政权，他们怀着以武力推翻旧有社会秩序的目标，推行了一项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并向苏联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随着政治动荡在阿富汗全国蔓延开来，美国开始资助巴基斯坦进行破坏阿富汗政府稳定的行动，还在1979年3月开始讨论起了针对苏联的计划，企图像某位五角大楼策略分析师所说的那样，在阿富汗“把苏联人拖入一个越南那样的泥潭”。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事务情报专家向该会报告称，“一项大规模的美国秘密援助计划可能会使其中的利害关系变得更加重大，从而诱使苏联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根据这项研判，国安会在1979年4月批准了一项秘密计划来支持企图推翻阿富汗政府的反革命势力。³³同年7月，华盛顿开始提供武器给巴基斯坦在背后支持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穆贾希丁（“圣战士”）。这场“圣战”将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同资助，并将配备来自埃及和以色列等国的苏式武器，以及从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国的伊斯兰运动中募集到的额外战斗人员。³⁴其实，早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近六个月前，美国就开始对大本营设在巴基斯坦的穆贾希丁提供支持了，而它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阿富汗抵抗苏联的入侵，反而更可能是为了挑起入侵。正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日后证实的那样，美国希望引发一场使苏联在“它自己的越战泥潭”里深陷难拔的战争。³⁵

33 Robert Michael Gates, *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145-146. 关于这场因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打破旧的社会秩序而导致并扩散的政治动荡，参 Barnett R. Rubin, *The Fragmentation of Afghanistan: State Formation and Collap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2nd ed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1-121。

34 John K. Cooley,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2nd edn,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Rubin, *Fragmentation of Afghanistan*: 197.

35 'How Jimmy Carter and I Started the Mujahideen: Interview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 *Le Nouvel Observateur*, 15-21 January 1998: 76. 此杂志在美国出售的缩编本没有收录这篇访谈。

从 1983 年开始, 苏联就试图谈判撤军, 但遭到了更希望看到战火延烧的华盛顿的拒绝。在美国政府内部以理查德·珀尔 (Richard Perle) 为首的主战派的安排下, 美国将供应给穆贾希丁的武器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成功延迟了苏联的撤离。³⁶

美国帮助维持的第三场主要冲突, 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与上面所述的其他两场冲突一样, 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被人们广泛地误解了。在 1967 年 6 月的阿以战争之后, 以色列政府采纳了阿隆计划 (Allon Plan), 也就是让以色列去逐步殖民它所新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将它们并入以色列的领土范围, 而只把分隔开的两小块领土保留给被占领地区上的巴勒斯坦人民, 并交由约旦或一个受以色列操控的巴勒斯坦傀儡当局来管辖。反对阿隆计划的联合国、欧盟与阿拉伯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以结束占领并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为基础的方案, 希望通过这些提议来解决巴以冲突。³⁷ 而面对这些提议, 美国要么忽略, 要么拒绝。不仅如此, 美国还否决了所

219

36 Diego Cordovez and Selig S. Harrison, *Out of Afghanista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Withdraw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2-105 详细介绍了里根政府为阻止苏联撤军所做的努力。本书作者之一、时任联合国负责特殊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科多韦斯 (Cordovez) 参与并完成了 1988 年的《日内瓦协定》(Geneva Accords) 的谈判过程。这份协定为苏军撤离阿富汗提供了一个框架, 使苏联最终在 1989 年如约完成了撤军。美国对穆贾希丁的援助金额从 1984 财政年度的 1.2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85 年的 2.5 亿美元, 而到了 1980 年代后期这个数字几乎又翻了一番, 使得美国与沙特两国对穆贾希丁援助的金额加起来达到了每年 10 亿美元 (Rubin, *Fragmentation of Afghanistan*: 180-181)。

37 美国拒绝支持 1971 年萨达特的和平提议、1976 年 1 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草案、1977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的和平计划、1980 年欧共体发表的《威尼斯宣言》(Venice Declaration)、1981 年沙特王储法赫德 (Fahd) 的和平计划、1982 年阿拉伯首脑会议在摩洛哥菲斯 (Fez) 发表的倡议、1984 年举行联合国和平会议的提案, 以及后来数不胜数的基于两国方案来结束占领的努力, 包括在 2002 年提出并在许多场合被重申的“阿拉伯和平倡议” (Arab Peace Initiative)。

有主张举行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³⁸ 华盛顿不仅反对这些提议，反而协助以色列实施阿隆计划。为了替代国际社会提出的各种要求以色列立即结束占领的解决方案，华盛顿推动了一系列协议——1979 年的《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1993 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和 2003 年的中东和平“路线图”（Road Map）——而所有这些由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没有要求以色列改变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现状。³⁹ 2011 年 5 月，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在讲话中发出呼吁，希望巴勒斯坦人通过与以色列展开谈判，来建立一个“以 1967 年的边界线，以及双方认可的领土交换为基础”的国家，而他的这种说法，也是在继续执行这个把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变为既成事

38 参本书第七章。只有在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中，美国没有否决此类通过对话和谈判来和平解决争端的提案，包括计划于 1977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会议，以及 1991—1993 年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议和会谈，虽然在这两个例子中，美国都应以色列的要求，阻止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出席。而当这两次会议仍然可能会给以色列造成压力，迫使它结束对他国领土的占领时，以色列就会采取在会议外与单一的一方开启秘密谈判并做出某种让步的做法，来击溃它所面临的压力——在 1977 年的会议上，以色列向埃及提出，要把被以色列占领的埃及西奈半岛归还回去；而在 1993 年的会谈上，以色列则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出，可以让巴解组织在被以色列占领领土中的巴勒斯坦飞地的管理工作上承担一定的角色，并在未来就巴勒斯坦飞地的地位举行谈判。

39 2002 年 6 月 24 日，当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说出那句“我的愿景是两个国家和平与安全地毗邻共存”的时候，看起来，美国似乎是要结束其拒绝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政策了。然而，以色列当时已经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周边和内部建造隔离墙（加沙地带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围了起来），以便将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社区及其周边，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其他地方分隔开来，并进一步用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和仅限犹太人使用的道路，将西岸地区切割成一块块飞地，以此明确地向世人宣示，所谓的巴勒斯坦“国”，将会像阿隆计划所设想的那样，不过只是一系列处在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封闭区块而已，而不是一个主权政治领土——以色列这样做，华盛顿完全没有反对。美国和以色列自《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所提议的边界方案的地图，向我们展示了两国是多么紧密地贯彻着阿隆方案（available at www.passia.org）。

实的策略。⁴⁰ 强迫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与占领者谈判自己臣服的条件，这种政策在当代的任何冲突中都找不到先例，它使以色列在一个接一个“和平计划”不断被提出的情况下，还得以继续推进其殖民活动，并加速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攻占和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建设，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维持占领和压制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所必需的财政支持和军事援助。

这里讨论的三场冲突中，没有一场是由美国挑起来的。在每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场既有的冲突或国际争端，而当地的各个冲突方愿意为此诉诸武力。还有其他的外部势力也介入其中，而它们要么通过向当事方提供武器来间接地参与，要么像苏联干预阿富汗一样直接地介入。该地区的大多数政府都把军队或警察暴力当作一种常规的政治工具来使用，要么用于对付特定的群体（土耳其用来对付其库尔德人口；苏丹政府对付其农村人口；以色列则对付巴勒斯坦人），要么用作一种一般性的镇压手段。然而，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它们都并不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暴力使用中介入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为这些暴力手段的执行所提供的财政投入是如此之巨，以及它对于把长期冲突当作一种常规政治工具来使用的依赖是如此之日益加深。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20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也许变成了中东地区有史以来最暴力的时期。

40 奥巴马维持了美国的立场，即任何巴勒斯坦国的建立，都必须通过与以色列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之后才能实现，而且在完成建国前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持续时间没有明确，而且也取决于以色列的同意），巴勒斯坦人必须展示自己能“有效地实施安全措施”——正是这些条件，让以色列得以利用《奥斯陆协议》作为一种拖延机制，来巩固其对“大耶路撒冷”地区及被占领土其他部分的殖民。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Middle East’, at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考虑到美国的帝国野心，冲突的持续存在反而是美国相对虚弱的表现。由于无法在中东地区的许多领土上建立霸权，甚至无法以武力手段施加控制，美国只能退而求其次，依赖旷日持久的战争作为次优手段，来削弱那些拒绝接受其权威的地方势力。

人员输出

同一时间，在沙特阿拉伯，统治王朝的腐败及其对政治活动的打压引发了日益高涨的反对情绪，而这些反对情绪在穆瓦希德的宗教学校和清真寺的布道者中找到了释放的出口——这一伊斯兰运动是沙特政权唯一无法压制的一种政治表达。1979年11月，这种不满短暂地爆发了出来。11月中旬，武装反叛者控制住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城之间一块面积相当大的土地。11月20日，成百上千名武装分子攻占了麦加的大清真寺（Grand Mosque，又称“禁寺”），高呼要把国家从沙特王朝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们谴责沙特政府只是虚伪地在表面上尊重宗教，实际上却在干着“压迫、腐败和贿赂”的勾当。他们批评沙特家族霸占了人民的土地，挥霍国家的财富，过着“奢华宫殿中的淫逸生活”。政府军队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重新控制住了大清真寺，数百名反叛者死于交战之中。这群武装分子的首领和其他63名幸存者在叛乱平息后被斩首示众。⁴¹

221

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在1980年代继续上升，在1984—1985年石油价格崩溃后尤其激烈，因为油价的暴跌引发了一场财政危机，国民收

41 Vassiliev,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入剧减，失业率居高不下。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局势，沙特政府在阿富汗看到了解决困难的方法：它将多达 12,000 名对统治家族的腐败日益不忿的年轻宗教活动分子输出到了阿富汗，参与抗击苏联的“圣战”。⁴² 凭借其家庭与沙特政权的密切联系，以及作为一名也门移民之子而独立于沙特各大权势宗族之外的身份，奥萨马·本·拉登能够吸引到跨越族属界限的追随者，使他得以成为“圣战”的协调人而异军突起。1990 年代，随着穆贾希丁从阿富汗返国，沙特的经济困局进一步恶化。1990—1991 年对伊拉克的作战激起了比过去更大的反对声音。尽管前些年沙特政权在采购军火上挥霍了数十亿美元，当伊拉克的威胁出现时，它却突然显得势单力薄，仓促同意美军到来，拯救其免遭伊拉克入侵。支撑沙特政权的两大因素——西方的军事资源，穆瓦希德的地方权威——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在一起。从阿富汗归来并招募了新成员后，穆贾希丁开始像他们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发起了将外国军队逐出阿拉伯半岛的运动，另一部分成员则针对美国扶持的埃及政府开展了破坏政权稳定的活动。他们还把目标转向了对美国的直接攻击，并最终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了袭击。

重返伊拉克

“9·11”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间，两个事件改写了中东的政治格局。一是 2003 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伊拉克；二是 2011 年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抗争浪潮。

42 Gwenn Okruhlik, 'Networks of Dissent: Islamism and Reform in Saudi Arabia', *Current History* 101: 651, January 2002: 22–28.

伊拉克战争是一次试图克服“麦当劳-圣战”弱点的努力，结果却创造了更为严重的困难，也创造了对断裂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地方性力量更深的依赖。美国做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是在回应1990年代末期的僵局——经过了二十年的战争、制裁和秘密行动，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依然没能被美国扳倒。实际上，对伊拉克的制裁反而加强了国家和执政党的力量，因为这些制裁措施使普通民众更加依赖政权来获取食品配给和其他必需品。不仅如此，正如一份英国的情报报告所解释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萨达姆赢得了民意*，这对本地区的亲西方国家及西方扈从构成了威胁”。⁴³ 这份报告的作者后来还解释道，伊拉克这个除埃及外唯一“拥有战略纵深、人力资源、充足水源和良好官僚传统”的阿拉伯国家，已经重新崛起为一个主要的区域性强国，并且正在对英美与沙特等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真实的威胁”。作者在当时曾评论称，“我们对伊拉克重新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强国缺乏回应，这就好像我们在一边和一些非常体面的人在起居室里喝茶，一边注意着一条蟒蛇正从角落里的盒子中钻出来一样”。⁴⁴

两个因素使美国的处境变得更加弱势。首先，俄罗斯、中国 and 法国都在寻求与伊拉克发展商务关系，欧盟也已经开始推动一系列的政

* 原文为“the Street”，即“the Arab Street”（阿拉伯街头），以街头这个比喻义代指阿拉伯国家中与政府或政府意志相对的民众或民意。——编者注

43 ‘Letter from Richard Dearlove’s Private Secretary to Sir David Manning’, 3 December 2001, at www.iraqinquiry.org.uk/transcripts/declassified-documents.aspx; Toby Dodge, ‘What Accounts for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Towards Iraq 1990–2003?’ at www.iraqinquiry.org.uk/articles.aspx.

44 代号“SIS4”的军情六处中东负责人作为匿名证人的证词：Transcript Part 1, at www.iraqinquiry.org.uk/transcripts/private-witnesses.aspx。

治倡议，甚至就连英国都在提议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⁴⁵可是，美国共和党的战略专家却把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连同叙利亚一起并称为“新轴心”（the new axis），这个术语在日后又被发展成了“邪恶轴心”（the axis of evil）。无法与两国发展关系的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孤立。⁴⁶其次，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全球性的石油短缺正在逼近，因为国际石油公司已经无法通过新发现的石油供应来补足它们的全部产量。伊朗和伊拉克拥有仅次于沙特的世界最大已知石油储藏，美国试图阻止两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就只会进一步加剧自身的弱势。

华盛顿面临的困境被美国的一群军国主义者趁机利用。这群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1968—1974年间的政策转型时期，当时，理查德·珀尔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麾下工作，协助他推动美国与中东的关系的军事化，并阻挠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他们在1980年代帮助升级并延长了阿富汗的冲突，后来又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鼓吹美国应当做出进一步的干预行动，从而颠覆伊拉克政府。当他们不在公职上时，都被安置在了

223

45 Alan Goulty to Tom McKane, 'Letter and attachment, "Iraq Future Strategy"', 20 October 2000, and 'Letter... to Sir David Manning', at www.iraqinquiry.org.uk/transcripts/declassified-documents.aspx.

46 “新轴心”这个术语是以色列裔美国人、共和党恐怖主义与非常规战争工作组负责人约瑟夫·博丹斯基（Yossef Bodansky）在1992年提出的。参 Yossef Bodansky and Vaughn S. Forrest, 'Tehran, Baghdad and Damascus: The New Axis Pact', Task Force on Terrorism and Unconventional Warfare, House Republican Research Committe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vailable at www.fas.org/irp/congress/1992_rpt/index.html.

* 亨利·杰克逊即上一章提到的“波音选出的参议员”。他是鹰派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当时有一群新保守主义者围绕在他周围，组成了一个“民主多数联盟”（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Majority），成员除了理查德·珀尔（小布什时代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之外，还有小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里根时代的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等人。——编者注

新自由主义 / 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中，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这些智库是美国的石油亿万富豪动用他们在 1973—1974 年石油价格飙升期间赚取的意外暴利来帮助创建的。⁴⁷ 在乔治·W. 布什 2000 年 11 月当选总统之后，他们重回公职，一上任就立即开始策划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抓住“9·11”袭击这个与伊拉克并没有关系的事件，来说服人们支持 2003 年 3 月的入侵行动。

发动这场战争并不缺理由。2001 年 12 月，当伦敦军情六处的一位资深官员被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为首相办公室提供一套理由，以证明推翻伊拉克政权的正当性时，他列举出了以下几点：“让萨达姆下台仍然是一项有价值的目标，因为这可以为石油的供应带来新的安全保障；可以动员伊拉克这个强大的、世俗化的国家来参与打击逊尼派极端恐怖主义的斗争，可以在海合会* 国家中打开新的政治局面，可以消除一个对约旦和以色列的威胁，可以削弱中东地区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持有的逻辑观念。”⁴⁸ 为了争取公众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美国 and 英国把议题聚焦在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人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上。英国秘密情报局（即俗称的军情六处）的负责人在 2002 年 7 月访问美国并进行相关会晤之后，回国报告称，“布什想要通过军事

47 参 Philip Mirowski and Dieter Plehwe, eds, *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以及本书第七章。

“新自由主义的”（neoliberal）和“新保守主义的”（neoconservative）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前者反映了该运动在右翼欧洲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起源（更多地用在与该运动的经济方案相关的场合），后者则反映了其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更多地用在与外交政策有关的情形中）。

* 原文为 GCC（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即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总部设在沙特利雅得，包括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伊朗虽是波斯湾沿岸国家，但因不是阿拉伯国家而被排除在外。伊拉克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入侵科威特）之后一直被拒绝加入。——编者注

48 ‘Letter... to Sir David Manning’.

行动来除掉萨达姆，并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作为理由来证明行动的正当性”。由于入侵的决定已经做出，“情报与事实都在围绕开战的政策来被修正”。⁴⁹

曾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2006年卸任后指出，“我们在政治上不方便承认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石油的”。⁵⁰ 但在那个时候，提出这种论点已经没有什么不方便了。认为美国在2003年3月以颠沛无能而又管理不善的军事行动入侵和占领了伊拉克，是出于某种宏大地缘战略计划的驱动，或甚至仅仅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龙头”（oil spigot）*，这种想法显得不太符合实际。⁵¹ 如果这场战争牵涉了某种商业上的必要性，那么，这种必要性也是体现在那些军事承包商、保安公司和武器供应商的利益中——对他们来说，石油的“战略”重要性能继续提供拓展商机的理由和地点——而不是清楚地知道帝国霸权和跨国公司已经无法再“控制”石油供应的那些石油公司的利益中。无论如何，美国在“麦当劳-圣战”遭遇失败后陷入的僵局与孤立，加上“9·11”之后公众普遍支持战争的情绪，已经为开战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224

伊拉克战争的主导者还将这场入侵粉饰成了一次为中东带来民主的机会。然而，美国庞大军事力量的残暴无情并不太可能成为实现民

49 Mathew Rycroft to David Manning, 'Iraq, Prime Minister's meeting, 23 July', 23 July 2002, published in the *Sunday Times*, 1 May 2005, at www.timesonline.co.uk. 战争鼓吹者很注意避免将入侵伊拉克描述为一场为了石油的战争，而是使用海湾地区的“稳定”这种表述，来间接地指向与石油相关的利益。

50 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London: Penguin, 2007: 463.

* 这里的“龙头”指放液活门（如水龙头），而非带头的事物（如龙头企业）。——编者注

51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他的著作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5 中对“石油龙头”这个论点给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概述。

主化的工具，这尤其是因为，华盛顿将它与另一种形式的残暴无情结合在了一起：一个将某种去管制化的、由市场驱动的政治经济秩序强加给伊拉克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这种秩序的很大一部分将由美国的私营承包商来建立，因为作为占领国的美国把战后的重建工作，乃至本应由军队负责的军事占领工作本身的许多流程，都外包给了它们。⁵² 战争带来的破坏、死亡和政治混乱很快就激发了人们对占领的反对，而且不仅是旧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或害怕发生更广泛社会革命的人在反对，随着伤亡和混乱的继续，甚至许多原本乐见旧秩序崩溃的人也开始反对。华盛顿的强硬派出手阻止了将权力尽快移交伊拉克政府的计划，他们更支持延长美国的占领，并在伊拉克安插一个由美国掌控的文官权力机构。这个美国管理当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包括肢解伊拉克大部分的国家政权及其全部武装力量，关闭其国有工业，取消对外国控制商业活动和利润输出的一切限制，将其石油工业私有化等，使伊拉克陷入了经济困境，加剧了民众对占领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始终都在于通过将控制权从公众的代表转移到市场的私人力量手上，来削弱民主和平等的政治。

美国更倾向于通过一个非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来统治伊拉克，而这个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是为了“代表伊拉克的多元性”——意指伊拉克的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亚述基督徒等不同群体。这样一来，伊拉克真正的多元性，包括其多种多样、交错重叠，并且常常是世俗化的政治归属和倾向，以及各种可能关切的是福祉、平等、个人或国家抱负等议题，而不是某种宗派

52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Lane, 2007: 323–382.

身份认同（无论是种族的还是信仰的）的政治互动和参与的模式，就将被一种美国人设计出来的、简单化的、基于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所取代。⁵³ 民众支持的缺失迫使占领当局把一个由伊拉克人组成的临时政府推上了台，但美国人依然控制着工程建设合同、武装部队和许多个政府部门。

原本打算立即实施的将伊拉克石油工业转为私有化的计划，因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的阻挠而被迫搁置。这些公司更希望与单独的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来进行协商安排，而不是去面对与新崛起的本地石油寡头之间的无序竞争，就像它们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所曾经历的情况那样。趁着石油私有化计划的延迟，这些公司可以培养自己与新成立的伊拉克石油部之间的关系。⁵⁴

225

伊拉克主要油田、炼油厂以及其他产业的工人，尝试着建立独立的工会。但美国占领当局保留了前政府禁止公共部门组织独立工会的第 150 号法律，而 2006 年上台的新政府也拒绝取消这一禁令。石油工人就反对工资拖欠、合同工与全职工同工同酬、外国工人的雇佣等议题开展了一系列罢工与抗议活动。抗议的规模在 2010—2011 年间有所扩大，但石油部能够识别工会领袖的身份，并将他们遣送到其他地区。2010 年 6 月，码头工人发起了针对工会禁令的示威活动，活动的领导人又再次被发配到了国内其他地区的岗位上。2010 年 7 月，由哈希米亚·穆赫辛（Hashmeya Muhsin）领导的电力工人工会——第一个由女性领导的全国性独立工会——在巴士拉组织了示威活动，抗议

53 Greg Muttit, *Fuel on the Fire: Oil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Iraq*, London: Bodley Head, 2011: 95.

54 Greg Palast, 'OPEC on the March', *Harper's Magazine*, April 2005: 74–76; Greg Muttit, *Fuel on the Fire*: 70–76, 107–110.

用于重建电力供应设施的 130 亿美元拨款遭到了滥用，这些设施仍然频繁断电。作为对示威的回应，石油部下令取缔了工会的活动，并将他们逐出了自己的办公室。⁵⁵

不幸的是，对于憧憬更民主的未来能在伊拉克实现的石油工人和其他人来说，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对美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伊拉克石油生产的全部收入都由联合国控制。根据联合国在伊拉克 1990 年入侵科威特后对其实施、在 1995 年“石油换食品”（Oil-for-Food）计划之后又调整过的制裁方案，购买伊拉克石油的款项要付给一个由联合国掌管的账户，且只能用于购买食品和药品。一些国际团体担忧制裁对普通伊拉克人造成的影响，在它们的施压下，联合国推出了这一方案，它使人联想起“一战”期间英国劳工运动倡导的国际联盟方案：由国联来管理原材料的开发，以确保其收益能造福普通民众，而非让投资商和本土统治者获利（参第三章）。

226

可在出兵伊拉克的两个个月后，联合国安理会就将伊拉克石油收入的控制权移交给了美国，放弃了从一开始就要求美国在对石油的控制中遵循民主程序的机会。我们知道，民主的治理依赖于中断关键流动的能力，无论是能量的流动还是收入的流动。石油国家的人民面临的困难是，当国家收入几乎完全取自单一来源——石油出口的收入，而非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时，如何才能建立起上述这种能力。华盛顿只以非常有限的条件就从联合国手中获得了石油收入的控制权，并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交给了它所雇佣的美国承包商，以牺牲伊拉克工程师和石油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开始重建石油工业的基础设施。⁵⁶

55 David Bacon, 'Unionbusting, Iraqi-Style', *Nation*, 25 October 2010: 25–26.

56 Muttit, *Fuel on the Fire*.

美国将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乃至越来越交由私有承包商处理的军事占领工作，都承包给了美国公司，并试图以相同的方式处置石油。石油产业的劳工权利没有得到加强。使石油产业变得更加民主化的其他机会——例如，要求竞标石油的公司具备民主的所有权结构——也遭到了忽视。（这种招标程序在美国很普遍，例如，公共项目的承包合同通常经过了特别的设计，使招标过程有利于少数族裔和女性所拥有的企业，或明确要求招标过程要包括这类企业。）在围绕伊拉克的石油法律进行了漫长的政治斗争之后，跨国石油公司被请回了该国，在初看起来非常苛刻的财务条款的约束下开发新油田。但这些条款实则充满漏洞和例外——例如，如果伊拉克为了满足欧佩克的配额限制而需要减产的话，它就必须补偿石油公司因此损失的产量。⁵⁷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就像九十年前英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那样，转向了寻求“部落”首领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等保守势力的帮助以维持对局势的控制，并开始寻找以最小成本撤出大部分占领军的方法。最终的结果是另一种形式的“麦当劳-圣战”——一种混杂了美国军事力量、国际石油公司，以及当地的保守派与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复合体。正如十年前那位外交官在评论与塔利班的接触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状况”。

解放广场

许多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人士曾指出，这样做将会在阿拉伯世界的街头引燃民众的强烈怒火，进而会使埃及等国受美国扶持的政府

57 同前注。

面临倒台的危险。有些人认为，这也许是向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较为正面的后果之一，但开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并没有在开战后就立即给出让这些人鼓舞的反应。在被推迟了差不多八年之后，民众的反应终于出现了。2011年1月，突尼斯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推翻了本·阿里（Ben Ali）总统的政府，紧随其后的，是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Mubarak）的下台，以及在也门、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爆发的一系列革命抗争。这一波抗争浪潮背后有多重原因。与其将它们归因于伊拉克发生的事件，一个看起来更合理的观点是：伊拉克战争反而推迟了这些专制政府的倒台。

2003年2月15日，在美国即将入侵伊拉克之际，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们在世界各大城市组织了反战游行，包括在开罗的一场。上百万人在伦敦和罗马、数十万人在纽约和柏林，以及几千人在东京、首尔和雅加达参加了游行。在开罗，示威人数为600人。⁵⁸ 抗议者聚集在开罗市中心，计划组成人墙，包围占据一块几英亩大小的三角形街区、紧邻城市中心广场——解放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政府安全部队以强大的力量压制了示威活动，驱散了人群，并逮捕了活动的领导者，把他们与数千名大都未经审判就依据紧急状态法被投入监狱的政治犯关在了一起。两周后，又一场反战示威被组织了起来。这次示威在位于市中心几英里外的开罗国际体育场举行，与美国大使馆相距甚远。馆内挤满了至少12万名抗议者，还有数千人在入口处被拒之门外。⁵⁹

58 'People Power Takes to the World's Streets', *Observer*, 16 February 2003; Amira Howeidy, 'Where Did All the Anger Go?' *Al-Ahram Weekly*, 20–26 February 2003, at weekly.ahram.org.eg.

59 Gihan Shahine, 'A Harmonious Protest', *Al-Ahram Weekly*, 6–12 March 2003, at weekly.ahram.org.eg.

举办这场由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并且得到了现政权同意的集会，是为了在顺应民众反战情绪的同时又能够对其加以遏制，而集会组织的方式，也不会引起人们对现政权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注意。

这两场示威向我们展示了埃及反对派政治的动态。基本上属于世俗化的左翼反对力量几乎没有任何组织的空间，它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迎合二者议程的国家政权的腐败所持的批判立场，也得不到任何表达的机会。穆斯林兄弟会也反对政府，但它的批评则要温和许多，并且主要是为了捍卫道德上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它的道德保守主义常常以大众反美情绪的形式出现，而这种情绪会被用作一种牵制和削弱左派的手段。穆斯林兄弟会对埃及现政权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⁶⁰

八年后，另一场在解放广场举行的抗议活动导致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即便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穆巴拉克政权面对的反对声就已经在与日俱增了，促使它向政治改革的方向短暂地迈出了几步，它实行文官统治的主要装置——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内的守旧派尝试着做出了一些调整，以应对权力控制的逐渐减弱，以及统治精英内部更年轻的技术官僚所带来的挑战。新的反对党派相继成立，但穆巴拉克政权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则是产业工人的组织动员。自 2000 年代初开始，这些工人发动了一波反对政府将公有企业私有化的罢工，而在 2004 年之后，罢工活动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

228

60 2003 年 3 月 20 和 21 日，随着美国对伊拉克入侵的开始，左翼人士在开罗市中心组织了进一步的示威活动。这场示威集结了约 10,000—20,000 名示威者，其中一些人尝试冲破警戒线，向英美两国大使馆进发。在这一系列示威活动之后，政府加剧了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Paul Schemm, 'Egypt Struggles to Control Anti-War Protests',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31 March 2003, at www.merip.org.

来越大。力图逆转甚至废除埃及在独立后推行的农业土地改革、租金与价格管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已经进行了超过二十年，但穆巴拉克在 2004 年任命的新政府加速了私有化的步伐，并把目标对准了在前几轮私有化中被跳过的纺织业和其他雇佣了大量劳工的企业。2004—2008 年间，超过 170 余万名工人参与了超过 1900 次罢工和其他表达不满的示威活动，抗议实际工资的降低——以及私有化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失业、工资的进一步降低和劳工权利的丧失等威胁。这是自 1952 年导致君主制垮台的那一波“二战”后的社会动荡以来，埃及发生的持续时间最久的社会抗议运动。抗议活动包括 2006 年 12 月和 2007 年 9 月在该国最大工业企业之一，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城市大迈哈莱（Mahalla al-Kubra）的埃及纺纱织布公司（Misr Spinning & Weaving Company）进行的罢工，以及两年后在刚刚被私有化的坦塔织物公司（Tanta Linen Company）进行的罢工。⁶¹

过去，在面临经济抗议时，埃及政府能够通过提供价格补贴、发放小额奖金，或采取其他适度的让步措施，同时辅以对任何威胁或挑战现有政治结构的政治组织活动进行持续的镇压，来缓解社会的不安和动荡。但是，到了 2000 年代末时，这样的政策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了。一方面，随着经济重组计划的目标如今开始针对大型工业，政权更加难以抵御劳工行动的冲击。而另一方面，为削弱经济抗议而采取的让步措施已经失去了为之提供资金支持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2010 年，埃及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这是自 1975 年它从以色列手中收回红海油田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在 1990 年代中期，埃及曾

61 Joel Beinin, *Justice for All: The Struggle for Worker Rights in Egypt*, Washington, DC: Solidarity Center, 2010; and 'Egyptian Workers Rise Up', *Nation*, 7–14 March 2011, at www.nation.com.

经能将其超过每日 90 万桶的石油产量的近一半用于出口，这是该国出口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自 1996 年起，埃及油田的产量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内较富裕人群的私家车保有量急速增加，埃及国内的石油消费量开始迅速增长。⁶²

对于这场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抗议，相关论述着重强调了新出现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为组织者与支持者筹备抗议活动提供了帮助。然而，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关键事件，是 1 月 25 日对解放广场的首次占领——在事态的这一步发展中，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转移注意力的诱饵作用。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知道，安全部队会使用暴力手段来阻止任何占领广场的企图，因此，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在开罗城里工人阶级聚居的社区安排了二十个抗议地点，希望能通过将安全部队分散到多个地点的方式使其疲于奔命，同时希望能以此吸引来大量群众，提高冲破警戒封锁线并在解放广场集结的机会。组织者还在布拉克达克鲁尔（Bulaq al-Daqrur）这个靠近市中心的工人阶级社区策划了一场额外的集会，那里的居民大多是受雇于附近卷烟厂和铁路场站的工业劳工。组织者尽量避免在互联网上宣布这场集会，结果使数百人得以在没有安全部队前来的情况下聚集在了这里。正是这群人一路向解放广场进发，沿途壮大到数千人之众，最终占领了广场，而此时，抗议人群的数量已经大到武装警察的力量也无法镇压的程度了。⁶³

229

62 数据来源：www.eia.gov，以及“能源出口数据总览”（Energy Export Data Browser），mazamascience.com。

63 Charles Levinson and Margaret Coker, 'The Secret Rally that Sparked an Uprising', *Wall Street Journal*, 11 February 2011, at online.wsj.com.

穆斯林兄弟会拒绝支持最初的抗议活动，并在第一周的时间里保持观望。⁶⁴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与政权进行谈判，而此时，权力已从穆巴拉克及其家族手中被移交给了他的国防部长。一个仓促组建的宪法改革委员会提出了对宪法的一些细微修改，这些修改都将有利于执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斗争没有结束。

*

人们常说，中东的政治一直被国际石油行业的力量所塑造。更确切的说法是，中东的政治一直被国际石油行业的弱点所塑造。控制石油的生产和流通可以带来非比寻常的超额利润。跨国石油公司力求确保并扩大这些超额利润，为此，它们与那些控制着油田的政府结成了对抗性的合作关系。控制军火的生产和流通同样也能带来丰厚的超额利润，而那些控制着油田的政府也已经成为最大的海外军火客户。在塑造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各种势力当中，石油工业和军火工业看似是最有力量的。然而，它们的力量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克服一种弱点，一个永远在威胁着这笔潜在巨额利润的缺陷。

230 一方面，整个 20 世纪，石油的供应总是过剩，这让石油行业所赚取的丰厚超额利润永远面临着可能崩盘的风险。石油行业必须持续地制造石油的稀缺性，从而规避这一永恒的威胁。另一方面，为了制造这种稀缺性，相应的政治结构被打造了出来。由于石油行业本身从未足够强大到能单独创建一套政治秩序，它就不得不与其他的政治势力、社会能量、各种形式的暴力和依附力量合作。在整个中东地区，

64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从埃及国家安全部门办公室中获取的文件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了安全部队与右翼萨拉菲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例如：‘Wathiqat Musribat min Amn al-Dawla’，*Al-Masry al-Yawm*, 7 March 2011, available at www.almasryalyoum.com/node/342155.

存在着各种可以利用的势力。但是，这些盟友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并不总是能够与确保石油稀缺的需求相一致。正如我们已经在前文中读到的那样，确保稀缺性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控制。地球石油储备的地球物理学特性决定了，只有通过调动一个强大的宗教运动的能量，才能从这个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商品中赚取超额利润。

“麦当劳-圣战”这一表达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缺陷。这个词并不是指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它所遭遇的其他力量和理念之间的矛盾，而是指这种逻辑本身的缺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它不是唯一的行动者，但它在其中的作用比任何其他行动者都更甚——在中东地区的许多地方推动、资助及延长的政治暴力，正是这一缺失的一个持续存在的症候。

结论：不要再指望石油

231

我们正在进入化石燃料时代最后几十年的衰落期。这个时代只是人类历史的短暂一章，在此期间，煤炭和石油工人将埋藏于地下煤层和油气圈闭（hydrocarbon traps）中的大量能源运到地表，让它们在地面上的发动机、锅炉、鼓风炉和涡轮机中以越来越快的速率燃烧，向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机械动力，使现代的工业生活、巨型都市和近郊、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被化学重塑的合成材料的世界、电力和通讯、全球贸易、军事主导的帝国，以及更加民主的政治形态得以实现的机会，都成为可能。然而，即便我们已经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章正在逝去，我们似乎仍然难以抛弃它所引发的那种异于历史常态的实践：将自然当作一种无尽资源的生活与思考方式。

化石燃料并非马上就要耗尽，但是，由它们所打造的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困境，使之脆弱得出乎我们的意料。第一，在能源供应量持续增长长达 150 年之后，石油充裕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全球石油储藏的消耗速度，超过了开发石油的人能够发现新供应源的速度。全球共有约 7 万个油田，但其中仅 110 个大型油田就产出了世界一半的石油。这些大型油田大多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 193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之间被发现的。而许多大型油田，包括产量最大的 20 个油田中的至少 16 个，都处在逐年减产的衰退之中。¹

1 Fredrik Robelius, 'Giant Oil Fields - The Highway to Oil: Giant Oil Fields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Future Oil Production', PhD thesis, Teknisk-naturvetenskapliga vetenskapsområdet, Department of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Uppsala University, March 2007, available at publications.uu.se.

截至 2008 年，已投产油田的石油产量以每年超过 4% 的速率下降。生产商每年都必须找到能够每天供应超过 300 万桶石油的新油田，才能刚刚抵消现有石油开采源供应量的下滑。² 乐观的人会着眼于新发现的大型油田，比如说，2006 年和 2007 年在巴西沿海发现的油田，似乎就预示着一个新的沙特阿拉伯的出现——尽管是一个处在海岸 250 千米以外、位于深达 3 千米的海水之下、石油埋藏在海床地底 5 到 7 千米位置的沙特阿拉伯。巴西发现的油田是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发现之一，但也只相当于沙特油田的一小部分。然而，如果要弥补现有油田产量的下滑，全世界必须每四年就有相当于一个新的沙特阿拉伯的油田投产。由于石油产量的下滑速率是几何级数的，下滑幅度每年都在复合增长，而新油田会以更快的速度被开采，于是往往要比老油田更早、更快地进入产量下滑的衰退阶段，因此，生产商如果要维持现有供应水平的话，就需要越来越频繁地发现新的沙特阿拉伯。

232

近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发现新石油供应源的速度能赶上已知油田产量下滑的速度。在 1995—2005 这十年间，全世界消耗的石油总量只有约 40% 能被新发现的石油来源弥补。再往后的五年，全世界只能面对石油供应量毫无增长的现实。³ 常规来源的石油产量就

2 Steve Sorrell et al., *Global Oil Depletion: An 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for a Near-Term Peak in Oil Production*, UK Energy Research Centre, 2009: 44–46, 66, at www.ukerc.ac.uk;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8*: 221–248; Euan Mearns, Samuel Foucher and Rembrandt Koppelaar, 'The 2008 IEA WEO: Production Decline Rates', 17 November 2008, at europe.theoildrum.com.

3 Rembrandt Koppelaar, 'USGS WPA 2000', 30 November 2006, at europe.theoildrum.com. 世界原油产量（包括租赁凝析油）从 1985 年的每日 5397 万桶增加到 1985 年的每日 6238 万桶，再到 2005 年的每日 7371 万桶。之后五年，世界原油产量不再上升，2010 年产量达到每日 7368 万桶。数据来源：www.eia.doe.gov。

算没有到达顶峰，也至少进入了一个漫长而不稳定的平台期，而从这个阶段开始，石油产量的水平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有些人认为，这一平台期是暂时的，是由于过去十年中的政治因素，例如对伊拉克发动的制裁与战争，使新油田的开发变得困难所造成的。他们会引用世界全部可采收石油总量约为 3 万亿桶甚至 4 万亿桶的估计值，来否定那些主张全球石油开采已经到达峰值* 的人所估计的 2.5 万亿桶。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更高的估计值并不会导致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它们只是把石油产量到达峰值的时间延后仅仅六年至 2016 年（以 3 万亿桶计），或延后不到二十年至 2028 年（以 4 万亿桶计）而已，并且它们还意味着，在石油产量到达峰值之后，产量下滑的速率会更快，因而对能源短缺的调适也会更加艰难。⁴

此外，对许多国家来说，石油供应可能已经越过了平台期而走上了下坡路。这是由于石油的消费者发生了变化。几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包括沙特和伊朗，其出产的石油用于本国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可供出口的石油就相应减少了。⁵与此同时，这部分可供出口的石油被中国和印度消耗的份额越来越大，从 2005 年的 11% 上升到了 2010 年的 19%。在这段时间内，除去被中印两国消耗的部分之后，余下的全球石油净出口量从每日 4100 万桶下降到了每日 3500 万桶。⁶许多国家都已经在经历着石油供应无法再持续增加的时期，这种情况在长达 150 年的石油发展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 “石油峰值”（peak oil）即全球石油产量达到顶点，其后开始下降的时间点。——编者注

4 Sorrell et al., *Global Oil Depletion*: 134–138.

5 Energy export data browser, 来自 mazamascience.com/OilExport。

6 Jeffrey J. Brown and Samuel Foucher, ‘Peak Oil Versus Peak Net Exports’, ASPO-USA Oil & Energy Conference, 2010, at www.aspousa.org.

第二个困境在于，这些石油供应的燃烧，让原本储存于地下的碳被散布到了大气层中，而且碳排放的速度越来越快。从现代石油工业开始建立的 1860 年代到 2010 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人类消耗的石油总量有一半以上，都是在 1980 年以来的三十年间被燃烧掉的。在这些石油的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加剧了地球大气和海洋的暖化，而全球变暖现在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大自然无法为自己发声。地球的生态系统似乎正在同时逼近两个极限：其一，化石燃料易获得性的终结，而它们曾经的丰富供应使人类发展出了机械化的现代生活；其二，生态系统将全球温度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调节能力的丧失，而这一温度范围曾是人类社会性本身得以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困境并不能自行进入政治辩论之中。与自然有关的事实，只有借助测量设备和计算工具，才能发出声音。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石油工程师、投资顾问和经济学家们装配出了用于测量过去、记录现在和预测未来的设备与方法。就像煤炭和铁道工人曾经利用那些为运输煤炭而建造的设备来制造有力的政治声势一样，面对当前的困境，人们组织政治回应的能力，依赖于对设备的控制——也依赖于人们在控制了设备之后能够为之代言的自然力量。

*

石油峰值和气候崩溃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二者都源于使用化石燃料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生活模式，包括各种由碳能源支撑起来的民主政治形式，同时也都对它们构成了威胁。然而，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意外的差异。关于地球气候和生物圈生态平衡的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从 1960 年代起就在气候科学家的圈子里被广

234

泛讨论，并在 1992 年的里约地球峰会（Rio Earth Summit）上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在随后的二十年间，这个问题变成了大量科学调查、政治辩论、媒体讨论和草根民主运动的对象。然而，对于石油产量可能到达峰值并走向下滑的不确定性，却没有引发同等的关注。对石油未来控制权的担忧，也许是驱使美国政府在其孤立伊拉克的政策失败后入侵该国并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动机。2005—2008 年间，在伊拉克石油产能持续无法恢复的推波助澜下，全球石油供应出现短缺，导致石油价格猛增至原先水平的六倍——这一金融冲击的规模，大约相当于 1974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的三倍。石油价格的飙升引发了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这场危机所造成的破坏，与任何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气候崩溃所导致的灾难相比，其影响范围都要更为广泛。由于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军事暴力和经济困难可以被归咎于石油短缺这个日益严重的威胁，但围绕气候变化的政治动员是如此活跃，而围绕石油的辩论却相对冷清，这种差异就更加令人感到意外了。

正如对石油峰值的意见分歧所揭示的那样，全球的石油资源并不容易计算（to count），但直到最近，它们依然是可以被指望的（to be counted on），因为在以往的日子里，可用的石油储备总是存在。政治动荡会带来偶尔的短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和墨西哥的革命，以及 1970 年代中东地区的冲突，都引发了暂时的石油危机。石油公司常常会利用这些供应的中断来营造公众的恐慌情绪，使他们担忧石油供应面临着更长期的威胁，从而借此获得更高额度的政府补助和税费减免，或合理化这些公司提涨石油价格的行为。然而，石油的供应在整个 20 世纪基本上是充足的，这使得工业化世界依然指望未来还会有充足的石油供应。

出于这些原因，石油可以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被指望。它随时可用的供应、不断增加的产量，以及基本相对低廉且稳定的价格，都意味着石油可以被指望（to be counted on）不去计算（not to count）。我们在消耗石油时，似乎可以不必把石油资源不可再生这个事实纳入考量。反过来，不必计算人类（基本上在两三百年的时间内）用尽了大部分地球有限的化石燃料储藏所需要支付的代价，便成就了另一种类型的计算——各种新形式的经济计算。作为一种计算的对象和治理人口的手段，“经济”并不是在 18 世纪末的政治经济学或 19 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中出现的，而是在 20 世纪中期才形成的（参第五章）。它的形成是拜石油所赐，因为丰富可用而成本低廉的能源供应，使得经济学家放弃了先前对自然资源枯竭的担忧，转而将物质生活表征为一个货币流通的系统——这种流通可以无限扩张，而不存在任何物理限制的问题。经济学由此变成了一门货币的科学；它的对象不是自然的物质力量和资源以及人类的劳动，而是自然在一边，人类的社会与文化在另一边，两边之间所开辟出的一个新的空间——一个不完全自然也不完全社会、被人们称作“经济”的空间。

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认为政治生活可以基于无限增长的原则来进行组织的假设，是一个不太可能被人们接受的想法。在 20 世纪最初的阶段，自然的限制无处不在。在英国，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关于英国煤炭供应量到达峰值的警告已经被证明是准确的，该国煤矿的产量已经开始了不可逆转的下滑。在美国，随着欧洲移民的定居点向西扩张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已经到达极限，自然保护主义者正在努力斗争，试图从木材公司和煤矿利益集团手中，拯救西部最后的大森林和山脉。可是，到 1920 年代末，美国的石油钻井工在东得克萨斯，英

235

国的石油钻井工在伊拉克北部，都发掘到了从地底向天空井喷而出的海量石油，规模前所未见。突如其来的丰富石油，推动了这门研究资源分配的科学——经济学——的出现，而这些资源被经济学当作是无限的。人类发现的石油储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根本没有现实的方法或必要，去把石油耗尽的情形纳入考量。我们可以尽情消耗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不可再生资源，而不必去计算其替代成本。石油工业的出现相继催生了塑料和其他合成材料的制造，也促进了合成化学制品作为肥料和农药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如今，无论是有机材料还是无机材料，人们都能用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化石燃料，来生产出前所未有的数量。对资源的管理不再是一个有关自然及其物质限制的问题。“经济”的诞生——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上——使一种去物质化、去自然化的政治形式成为可能。

石油峰值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二者计算方式的历史与政治有所不同。它们的差异似乎还对应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辩论与行动。气候崩溃的威胁如今已是国际条约与议定书、持续的政府行动（无论实际采取的措施是多么不足），以及大型国内与国际组织协调发起的出版物、抗议活动和政治施压所共同聚焦的对象。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 2000 年左右开始的十年间，油价急剧上涨，但并没有什么主要的国际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或行动组织就化石燃料供应的限度问题开展过动员。在美国，石油供应的问题进入了右翼政治势力的议程范围，他们寻求政府放松对环境保护的监管，从而增加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他们用这样一个迎合民粹的、反阿拉伯的主张来支持这一议程的推进：增加国内的石油产量将减少美国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但这样的主张没有得到任何证据

支持。(2009年,美国石油消耗总量中只有不到9%来自阿拉伯国家,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沙特阿拉伯根据一项特殊的安排向美国供应的,而这项安排是帮助美国维护美元价值的措施之一。')在英国,石油供应也是右翼关注的议题。唯一把石油峰值问题作为其党纲支柱的政党,是新法西斯主义的英国国家党。⁸ 2000年9月,因燃料价格攀升,西欧各地抗议四起,卡车司机和农民封堵了主要道路,包围了炼油厂。2005年,又发生了一轮持续时间较短的抗议。在这两波抗议之后,与人为气候变化证据的否认者气味相投的英国国家党盘算发现,该党白人至上主义和反穆斯林的仇外主义政纲,会因即将到来的石油峰值危机而增强力量。燃料价格上涨引发的抗议表明,能源问题为右翼的政治力量打开了一个契机,因为针对政府征税、境外石油生产国和跨国公司的不满,已经找到了一种使国家陷入瘫痪的方法。2009年1月,英国林赛炼油厂(Lindsey Oil Refinery)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作岗位被分配给了住在附近码头驳船上的葡萄牙籍与意大利籍劳工。这场罢工使英国第三大炼油厂被迫停业,并蔓延到了全国各地的炼油厂。这些反移民的抗议活动表明,存在进一步的机会,可以将能源供应的政治,转化为一个能让右翼运动在其中招兵买马的领域。⁹ 然而,不只是极端主义政党,就连主流政党也在利用能源政治的仇外潜力,谴责

236

7 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 *Petroleum Supply Annual*, 2009, July 2010, at www.eia.gov. 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是自食其果,这是因为该国未能引进更高效的汽车发动机和其他已经广泛应用的交通运输技术。Vaclav Smil, 'America's Oil Imports: A Self-Inflicted Burde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4: 4, 2011: 712-716.

8 'The Archive for Peak Oil', British National Party, 2008, at bnp.org.uk/category/peak-oil.

9 Robert Booth, 'Mediators Called in as Wildcat Strikes Spread Across UK', *Guardian*, 31 January 2009. 雇佣南欧工人始于2008年欧洲法院的一项裁决,允许雇主只用支付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工人在其母国所能获得的、低于东道国最低工资水平的薪酬。英国国家党派员声援了罢工。

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而他们所指的，就是依赖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生产的石油所带来的危险。

不断上涨的燃料价格和未来石油的短缺是否会产生一种新型的政治——某种以炼油厂罢工、卡车司机抗议、围堵燃料仓库、关闭油气管道为特征的政治，进而助燃新的仇外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有其历史渊源（参第一章）。一个世纪前，煤炭的广泛使用为工人们赋予了一种新的力量。数量空前的燃料沿着固定而狭窄的通道，从煤矿出发，经过铁轨和运河，一路流动，最终到达工厂和电站，创造出了脆弱的“通道节点”，而在这些节点上，只要一场罢工，就能让整个能源体系瘫痪。在这种全新的力量面前，遭到削弱的西方政府只能向给予全体公民选票，对富人开征新税，提供医疗保健、工伤和失业保险、退休金等为人类福祉带来基本改善的要求让步。各种争取更平等的集体生活的民主诉求，经由煤炭供应的流动与中断而得以推进。

20 世纪后半叶，各国政府试图透过一项同样简单的工程项目，来削弱工人们所取得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力量：从使用煤炭转向使用石油和天然气。早在 1940 年代，华盛顿的马歇尔计划设计者们就主张为西欧进口中东石油的成本提供补贴，以此削弱煤矿工人的力量，并打击左翼势力。几十年后，这个曾使左翼壮大的能源体系受到的攻击达到了顶峰，英国保守党政府正试图摧毁英国所剩煤炭产业中的绝大部分，以消灭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所称的“内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英国影响力最大的工会，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¹⁰ 1967 年，石油供应中断导致英镑暴跌，在这场金

237

10 Seumas Milne, *The Enemy Within: 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Miners*, 3rd edn, London: Verso, 2004.

融危机之后，劳工组织与国家机器之间逐渐发展起来的冲突中，全国矿工工会发挥了领导作用，而在 1974 年，它又击败了利用另一场能源供应危机来削弱工会力量的企图，导致保守党政府被赶下了台。十年之后，核电站的发展和北海油气田的开发终于为政府中的规划者提供了一个办法，来结束英国对煤炭发电的依赖。于是，保守党得以在 1984 年通过新一轮关闭矿井的行动，重新发起了打压矿工的战争。随之而来的罢工行动是英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是自 1926 年的总罢工以来斗争最激烈的一场劳资冲突。政府这次没能摧毁全国矿工工会，但六年后，英国国内安全部门军情五处（MI5）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向媒体散播了一个不实的指控：全国矿工工会的领导层挪用了来自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资金。¹¹（军情五处是 1916 年成立的，原本是为了应对德国间谍造成的恐慌，但成立没多久就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了在第三章中曾提到的那群组织战时罢工的劳工领袖，以及试图对帝国建立“民主控制”的左翼知识分子。¹²）这个牵连利比亚的指控是一件有力的武器，政府借此成功破坏了民众对工会的支持，从而削弱了全国矿工工会的势力，让政府得以推进其消灭英国煤矿业的计划——1982—1983 年间，煤矿业雇佣了超过 200 万名工人。到 2009 年，英国只剩下五座采用长壁采煤法的煤矿还在运营。

事实证明，随着欧洲的主要能源从煤炭转变为石油，宰赫兰、阿巴丹、基尔库克的石油工人，或者巴勒斯坦与黎巴嫩沿海地带管道终端储运码头与炼油厂的工人，要想复制欧洲煤矿和铁路工人先前的成

11 同前注。

12 Christopher Andrew, *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The Authorized History of MI5*, London: Penguin, 2010: 94–109.

功，就变得远远更加困难了。正如前文中讨论过的，石油通过管道而非铁轨来运输，而且足够轻便，使人们能装载它跨越远洋，因此，它的运输依循的是更加灵活的网络，而且还在生产地和使用地之间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分隔。石油工人对劳工权利和政治自由的诉求可以被转译为将石油产业国有化的方案，而石油生产的卡特尔则能够限制石油的供应，使得 20 世纪大多数时期都处于过剩状态的石油，被转化成了一种脆弱的、需要帝国的军队和扈从国加以保护的“战略资源”。由于石油产业的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社会-技术性的特质，从石油生产中建立更民主的政治机制变得愈发困难。

*

238 当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流动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样的政治呢？许多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都陷入了某种形式的能源决定论，就好像每种能源都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形式一样。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提议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能源体系：摒弃电网，将每幢建筑都变成热能与电能的发生器。该组织认为，通过降低大型电力和能源公司的影响力，“使能源去中心化也将使能源民主化”。受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欧洲投资者支持、计划在撒哈拉沙漠建造巨型太阳能电站的“沙漠科技”（Desertec）项目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它所规划的地中海能源网络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工具，可以使价格充分竞争，并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进而为“能源的民主化”开辟道路。¹³

13 Greenpeace, *Decentralising Power: An Energy Reserve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5, at www.greenpeace.org.uk/MultimediaFiles/Live/FullReport/7154.pdf; Desertec-UK,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Grids', 2010, at www.trec-uk.org.uk/elec_eng/grid.htm; Anni Podimata, 'Energy from the Desert', Desertec Industry Initiative Annual Conference 2010, at www.dii-eumena.com.

这些方案以及支持它们的论点，并不意味着什么样的能源形式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政治模式，而是表明：能源是一个技术上存在不确定性的领域，而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的领域；构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的解决方案，也是在构建新的集体生活的形式。

而另一方面，围绕未来石油政治的论辩，常常会陷入两个对立阵营之争：马尔萨斯主义者（Malthusians）和技术主义者。对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政治将由自然界的限度来决定，而人类对能源消耗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超过这些限度。对技术主义者来说，科学的进步将会持续地找到克服这些限度的出路，而克服限度所用的方法，则由于技术创新的特性，是我们永远无法提前预知的。这两种论点都试图消除当前的不确定性——马尔萨斯主义者通过揭示大自然固定不变的界限，技术主义者则通过信任科学的无限潜能。

与其去信奉政治由自然的力量所决定，或相反的，政治可以通过科技的持续进步而摆脱自然的约束，不如选择替代这两种立场的另一个选项，也就是去承认，我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越来越多的社会-技术性的争议之中。技术的变革并不会像人们对科学的传统认识所主张的那样消除不确定性——它会让不确定性激增。¹⁴这种情况发生在任何技术创新的领域，从控制人畜共患的流感病毒新毒株、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种植转基因作物、分离人类基因并为之申请专利，到建造第三代压水反应堆、围绕标准化测试重组学校教育、为医学研究收集胚胎干细胞，以及无数其他领域。这些技术性的争议始终都是社会-技

239

14 以下论述参考了 Michel Callon, Pierre Lascoumes, and Yannick Barthe,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An Essay on Technical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亦参 Andrew Barry,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thlone Press, 2001。

术性的争议。这些争议关乎我们希望与什么类型的技术共存，也关乎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技术性的生活。

现代世俗民主社会常常被描述为一个由现代科学的发展所塑造的历史阶段。人们常说，科学的思考方式让我们第一次得以把自然与社会明确区分开来，并得以组织集体生活，从而使自然世界归在一边，充满激情、信仰、社会力量和政治权力的人类世界归在另一边。

如果这就是现代性的含义的话，那么，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我们应当坦承“我们从未现代过”。¹⁵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混杂的，由技术、自然、人类的错综纠葛（imbroglio）所构成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的各种争议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世界是技术、自然和人类的因素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的世界。任何技术装置或社会过程都结合了种种不同的物质与力量，涉及人类认知、机械动力、概率、被储存起来的记忆、自作用的机制、有机质等各种不同事物的不同组合。当我们在推出技术创新，或以全新的方式来使用能源，或开发替代性的动力来源时，我们并不是在让“社会”去经受某些新的、外部的影响，也不是反过来，在使用社会的力量来改变一种被称作“自然”的外部现实——我们是在重组社会-技术性的世界，而我们所谓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和技术过程，在其中的每一个点上全都存在。

然而，这些交织纠缠在我们有关集体生活的各种理论中并没有得到承认，这些理论仍旧在根据不同专家知识领域之间的传统分际来划分我们的世界。存在一个自然的世界，由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进行研究；还存在一个社会的世界，由社会科学来分析。关于人类活动引发

15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的气候变化、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或其他任何问题的辩论，之所以会产生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并不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触及了技术与科学知识的极限，而是因为它们打破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传统区分。这些问题只靠专家是得不到解决的，因为它们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关乎这个世界的本质——一个传统上被科学与技术的专家知识所垄断的领域——还关乎“集体”（collective）的本质。¹⁶ 我们希望与什么样的人或非人类力量结成联盟？我们希望让自己受何种权力支配？

社会-技术性的争议同样也在挑战着建基于自然与社会区分的另一项区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技术性的专家知识的构建，需要普通民众的参与。¹⁷ 新研发出来的药物需要在临床试验的参与者身上进行测试，这些受试者会报告服药后的症状和感受到的副作用，而在某些情况下患者们还会结成团体，来为进一步的药物研发提供资金并设定研究的优先级。新的市场技术需要消费者的参与，而消费者的选择将会塑造这个经济实验的结果。军事装备在战场上被测试，就像载人战车的残骸在 1973 年的阿以战争（参第六章）之后成为证明常规战争的持续可行性的对象一样。用于决定要向信用卡客户授予多少信用额度的算法，会根据客户的消费习惯进行调整。¹⁸

240

16 Bruno 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ichel Callon,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ohn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86: 196–223. 编者注：这里的“集体”是借用自拉图尔的概念，指人类与非人类（或粗略地理解成社会与自然）形成的联合（association），人类与技术、环境等行动元（actant）如何构成（how to compose）这个集体是重要的政治问题。

17 Callon et al.,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18 Martha Poon, 'Scorecards as Devices for Consumer Credit', *Sociological Review* 55, supplement S2, 2007: 284–306.

标准化测试的创新必须通过学校里的教师们来落实，并由这些教师的教学对象来执行。蓝光影碟机的用户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变成了非官方的公测版本测试员，因此，这些用户同时也在帮助媒体巨头测试和强化它们希望用来解决 DVD 盗版问题的复杂的数据保护方法。经济学家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设计的碳补偿（carbon offset，又译“碳抵消”）方案，将热带雨林住民的生活，转变成了一场旨在维持我们自身能源消费方式的实验。

在这些情境中，政治主体不仅变成了社会-技术性实验的对象，而且也变成了这些实验的参与者。许多这样的实验程序最初看起来似乎都对公民、消费者或作为实验对象的一般人类主体的权利构成了威胁，有时还会受限于试图保护这些权利的协议。然而，在应对像石油峰值或气候崩溃这样影响广泛的威胁时，相互竞争的技术解决方案就变成了探索集体世界构成方式的实验。哪怕只是应对那些更加平常的问题，专家知识也会利用人类主体 / 受试者（subject）来设计新形式的社会-技术性的生活。这些情境不仅提供了捍卫既有的民主权利，或将这些权利扩展到他人身上的机会，而且还提供了将各种形式的民主进行再民主化的机会。

正如我们已经在前文中读到的那样，民主政治，是在普通民众共同构成了工业化生活的新机器 / 制中关键的组成部件之后才形成的。作为对这些民众压力的回应而出现的大众民主的模式，是通过将职业政治人物与普通公民区分开来而进行组织的——前者经由政党获得授权并被政党规管，后者则被要求将自己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交给给执政党。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通过科学技术的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区分，民主政治得到了进一步的规管。科学、技术、战争、产业管理、

公共卫生、会计、法律，以及最为重要的经济规划等各领域的专家，获得了为公众关切的议题做出决策的责任。

技术性的争议动摇了社会 / 自然、专家 / 普通民众这两大区分，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争议就可以为重建更为“技术性”的民主形式提供机会。¹⁹ 重新装配社会-技术性的世界的必要性，可以开启新的脆弱节点，而在这些节点上，专家和职业政治人物也许会再一次地对大众的诉求担负起责任，因为新的制度安排必须经由大众的生活才能建立起来。这并不是必然发生的。但为了抓住可能出现的机会，我们必须将这些事关自然、技术与专家知识的问题，作为民主化的机会将可能出现的场所，纳入我们的关切范围。

我们能否借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来思考石油的政治？关于化石燃料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创造一系列问题，而如果我们坚持要对自然与社会、要对自然资源与可以维持下去的社会秩序做出明确的区分，或者要对谈论自然事实的专家，与被要求接受专家所言的事实并把基于这些事实做出决策的工作交给职业政治人物来行使的普罗大众做出明确的区分，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解答？如果各种争议超出了这一区分，它们是否会开辟一种新的政治空间，一个在讨论世界可能状态的问题上，“集体”的构成（composition of the collective）会产生关键影响的论坛？

★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一条由于自然科学的崛起（它将自然确立为自己的对象，并将其与政治

19 Callon et al.,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分离开来)而形成的脆弱的线,而是一片广阔的空间——一片被我们称作“经济”的领域。自然与政治的分离,主要不是靠那些垄断了对自然解释权的大型科学与工程权威来维持的,而是靠在自然与政治之间划分出了大片无人地带(no-man's land)的那些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能源——尤其是石油——的生产,为确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或石油公司所称的“地下”与“地上”之间的区分,提供了一块有利的土壤。因此,正是在世界能源体系不确定的未来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的一些最新、最积极有力的,旨在保卫这种将自然与社会分离开来的“经济化”(economisation)的努力。

★

242 气候变化的政治与石油峰值的政治之间的差异之一,在于某些形式的测量,这些测量使我们得以构建一套关于地球气候的知识体系。存在一门气候变化的科学,却并不存在一门石油峰值的科学。这种差异可以从测量石油供应和测量大气成分的不同方式中体现出来。测量二者的区别不在于对二者做出的测量工作的多少,而在于故意制造的不精密性(imprecision)的程度。石油测量工作的组织方式会产生显著的不确定性。而在大气的测量工作中,尽管也有某些方面企图要制造类似的不确定性,但准确性的产生更难以被破坏。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水平最初并不比石油储量更容易计算。在1960年代以前,对空气进行的化学测量表明,其二氧化碳含量的波动范围很大。1950年代末,气象学家开展了第一波测量全球二氧化碳含量的工作,但并不是为了监测气候变化,而是为了提供一种追踪气团(air mass)在全球范围内移动的方法,因为气象学家相信,每块气团中的气体组成成分都不同。然而,大气化学家查尔斯·D.基林(Charles D.

Keeling) 制造了一台以机械方式, 而非通过化学分析来测定二氧化碳浓度的设备。这位气象学家们口中“那个带着机器的人”用他发明的设备证明, 二氧化碳的浓度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恒定的, 约为 312 ppm (ppm 即百万分比, parts per million)。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用他的机械装置来校准其他的测量机器, 因此, 他的合作者们便能在世界各地的不同位置连续地操作测量设备, 并比较不同时间的测量结果。到 1961 年, 基林的团队已经能够证实, 自由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增加, 而且增加的速率是如此之快, 唯一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似乎只能是化石燃料的燃烧。²⁰

基林对大气的测量工作, 经受住了好几次企图拆除测量设备或降低其测量准确度的努力。大部分攻击都来自美国的国会或政府机构。1963 年, 美国国会削减了为基林的项目提供资助的气象局 (Weather Bureau) 的预算, 并将该局的工作范围限制在天气预报上。在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支持下, 基林继续进行着他的测量工作, 并在 1970 年协助发起了一个由世界气象组织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主持的在全球范围开展的监测项目。在基林的工作获得了公众瞩目之后, 他受邀在美国哲学协会 (American Philosophy Association) 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 在地球历史的 5 亿年间由植物从空气中缓慢吸取并被埋藏为沉积物的碳, 正被重新释放回大气中, 由此引发的后果让他很是担忧。演讲结束后, 国家科

243

20 Charles D. Keeling, 'Rewards and Penalties of Monitoring the Earth',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3, 1988: 32-42. 基林的团队后来意识到, 二氧化碳浓度增长的速率会加快和减慢, 这种波动可归因于被称为南方涛动 (southern oscillation) 的赤道太平洋地区气压周期性变化的现象。

学基金会通知他，由于他的测量设备被用于“常规监测”工作，而非“基础科学”研究——一个新定义的区分——因而从1971年起要停止对他的资助。在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监测计划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支持下得以重新开展，而这所实验室是美国核能领域的官方机构之一，它希望向反对核能的人证明，化石燃料更加危险。

企图终止基林测量大气二氧化碳工作的“协调计划”在1990年代卷土重来。美国能源部开始控制资助的方向，只资助测量化石燃料燃烧增加的积极后果的研究，例如测量它是否刺激了植被生长速率提高。斗争的焦点最后集中到了基林保存在南加州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for Oceanography）的玻璃烧瓶上，瓶内盛装有助于校准二氧化碳测量设备的气体样本。在试图控制这批装有气体的烧瓶未果后，美国能源部宣布其校准标准“不合要求”，命令国家标准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发布新的、精确度更低的标准，并试图迫使世界气象组织接受这套标准。这些装有气体样本烧瓶经受住了攻击，使得对不断上升的二氧化碳水平进行精确测量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并证明化石燃料对大气的影响日益加剧。²¹

而对石油的测量来说，制造不精密度和不确定性更为容易。与测量气候变化的设备相比，用于勘测石油的测量设备和计算设施更加古老，分布也更加广泛。负责石油勘探和生产的公司会采集地球物理学数据（找矿远景图和地震剖面图）和地球化学数据（烃源岩类型、埋藏史、有机质熟化生油史）；它们会收集储油层的信息，测量烃源岩的孔隙度、温度、压强与水饱和度，进而估算岩层中可能被采收的石

21 Keeling, 'Rewards and Penalties': 45–63.

油所占比例；它们还积累已钻油井的信息，记录其位置和深度，岩心分析、钻杆测试和机械测井的结果，以及干井的历史与位置。²²

对气候变化的测量与对石油储量的测量之间，存在着三项重要差异。第一，试图预测未来石油供应量的测量工作，是通过对岩石圈进行取样来完成的。这个取样对象是一个碎裂化的、难以接近的空间，一个固体、液体和气体，黏性与非黏性，多孔与半多孔，可渗透与不可渗透物质的不规则混合体。所有这些成分，在渗漏、流动、断裂、褶皱、泛滥等多种运动叠加的一个动态、高压的系统中相互作用。而对此进行测量所得到的知识是局部的，仅适用于特定地点，具有概率性而非确定性，并且难以汇总加总。²³

244

第二，与气象学的测量不同，石油公司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测量几乎从不对外公开。这项差异与前一项差异是相关的。一处油藏就是一台碳能源机器——一部由热量、压力、流体迁移和地震运动所组成的装置，能生成珍稀而强效的、埋藏于地下的太阳能。使测量变得如此不确定的地质过程，正是石油生产商们所能赚取的巨额利润的源泉。随着石油变得越来越难以找到，找到石油所花费的成本越来越高昂，采油地点越来越高的地质复杂性就要求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潜在的利润，不断增加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脆弱性，使石油公司不愿将测量得到的结果公开。过去，这些公司为了保密，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力气，就连对测量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如此。²⁴

22 P. J. Lee,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Estimating Petroleum Resour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0.

23 G. C. Bowker, *Science on the Ru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Geophysics at Schlumberger, 1920–194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24 同前注。

在这两项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补充与它们相关的第三项差异。某处产油区的石油储藏，指的并不是这里的全部地质沉积物，而仅仅是能被采收到地面上的那一部分。它无法被直接测定，不仅因为它深藏于地下，还因为储量规模是对未来产量的估计，而这种估计需要对未来的成本和需求水平做出假设，并对资源开采项目的技术可行性进行评估。石油储量是一个综合评估地质、石油化学、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因素得到的结果。蕴藏有石油的那些碎裂化的、越来越难以接近的地质构造，使得人们对储量规模的估计，越来越取决于人们对于勘探和开采那些石油的设备能够被设计出来的可能性的估计，而这是不可测量的。此外，储量规模还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地下储藏释放的碳最终会进入大气。因此，为阻止气候灾难而采取的碳减排措施将会越来越大地影响石油的开采成本，进而影响开采速率。

由于这些差异，没有任何一个与世界气象组织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相当的机构被创设出来，从而根据全球的石油估计值，来建立一门关于石油峰值的科学。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美国政府成立了参考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的研究成果开展工作的能源信息署，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也建立了国际能源署。但这些机构既没有权限直接获取石油公司的信息，也不安装、操作或协调测量石油的设备。它们不得不想出其他办法，来估计地球上剩余的石油储量。

245

冷战时期的一个研究项目产生了日后被用于对世界已知与未知石油储量进行第一次系统性估算的方法：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这套以古希腊神谕之地命名的程序由兰德公司开发，最初是用来估计苏联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概率与强度的。这种方法可以在己方对于敌方

的军力规模，及其武器性能和火力都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帮助规划如何作战。为了弥补可靠测量手段的缺失，这个方法需要征询一个专家小组的意见，让他们针对不同结果的可能性做出自己的估计并解释理由，然后再向每一位专家展示小组其他专家的估计和推理，并要求他们据此调整或修正自己的估计。这一过程会重复进行多轮，逐步形成围绕一个区间较窄的估计范围的共识。

1990 年代，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始采用德尔菲法的一种变体，来发布对世界石油储量的估计。由于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缺乏可靠的途径获取敌方的数据——石油公司的知识体系——他们所做的估计都是基于“石油地质学的原理、已发表的文献，以及石油行业未发表的信息（在他们能够获取到的情况下，大部分这类未发表的信息都来自某家特定的石油行业咨询公司）”。²⁵ 尽管还是无法获取油井数据或地震覆盖的数据，2000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用一种新的估计方法取代了过去的方法，新方法基于一个新的对象——“碳氢化合物流体体系”。当下所有对世界石油储量的官方估计，包括国际能源署的年度《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和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国际能源展望》（*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都仍然是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这份 2000 年的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做出来的。

石油工程师、地质专家和石油行业的其他从业者们已经装配出了一整套测量与计算的设备，甚至可能比用来测量和监控全球气候的设备还要更为庞大和复杂。可是，关于油田的知识，却没能像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成功做到的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的领域，甚至都没能成为

25 L. B. Magoon and J. W. Schmoker, 'The Total Petroleum System: The Natural Fluid Network that Constrains the Assessment Unit', *US Geological Survey Digital Data Series 60*, 2000, at energy.cr.usgs.gov.

一门整合统一的科学。对油田的测量是由相互竞争的石油公司，或由这些私有或国营的石油生产公司外包给石油服务公司，针对逐个油田在私下里单独开展的，每个油田的数据也被分别保存。人们通常会将石油行业可靠数据的缺乏归咎于欧佩克，因为该组织对石油储量给出了极高的估计值，这反映出其生产配额是以各成员国报告的储量规模为基础的，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单个油田生产率的近期历史数据。但事实上，除了英国和挪威位于北海的产区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石油产区，其单个油田的生产数据是可以公开获得的。

246

油田数据碎片化、私有化的性质，使得人们只能传播唯一可用的官方数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在 2000 年的评估报告中给出的数字极高的估计值，而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信息署又是以此为基础来发布年度展望的。

★

拉图尔认为，“自然”是一个应当被我们抛弃的术语，因为它是一种“未经正当程序”地聚合（assemble）共同世界的方式。²⁶对自然的诉诸绕过了政治的辩论与角力。自然被理解为一个事实领域，与价值相分离，也与混乱主观的政治世界相分离。只有专家才具备完全的能力去探索自然世界，并且能以无可论争的形式，将他们的发现报告回政治世界。尽管在很多领域中我们都已经抛弃了这种对自然世界的天真认识，但在石油的问题上，自然 / 社会的分隔仍然在被维持着。石油的未来存在着技术上的不确定性，而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治理，是通过维持经济学的计算空间（calculative space）来执行的。

26 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54.

经济学家是如何保持对他们这片领地的控制的呢？他们创造并利用了“已探明”石油储量与尚待发现的石油储量的估计值之间的巨大鸿沟——前者主要由石油公司的数据汇整得到，而后者则是基于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总石油体系”（total petroleum systems）的估计值以及类似形式的不确定性。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正在生产的石油仅仅是尚待发现的全部石油储量中的一小部分，那么，未来石油供应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地质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计算和政治计算的问题。我们要应对的问题，不是自然的实际事实，因为自然本身仍然是一个潜在的无限资源，而是由已探明储量的形式所表征的自然。经济学家是表征问题的专家。他们告诉我们，已探明储量，就像所有的表征一样，是部分的、不完整的，并且会根据测量的方式、报告的标准和新技术的发展而发生变动。经济学家从他们对表征方式的操控中获得了力量。他们不处理物质的世界，因为物质世界虽然客观存在，但规模太过庞大而难以表征；他们也不处理看似主观、非实在的文化与社会。他们掌控着他们为治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表征体系。

作为一个表征问题，用石油经济学家们的话来形容，石油供应的问题属于“地上，而非地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人类选择和技术创新的问题，而不是自然的客观事实的问题。提高石油产量的障碍在于：钻井的成本、需求的水平以及受二者所影响的油价——油价必须上涨，才能使在更偏远的地点勘探和生产石油变得可行；以及环保运动对钻探活动所造成的限制，这些限制阻碍了美国沿海地区的石油开发；还有中东地区地方性的政治安排或美国对中东施加的制裁，它们限制了跨国石油公司接触到新的石油储量来源的机会。

这些因素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石油公司在其历史上曾发展出了庞大的政治、情报和经济预测部门。在石油储量相对充裕的时代，投资规划通常远远更加依赖这些“地上”的计算，而不是在地质或石油化工方面所做的计算。

但“地上”和“地下”之间——经济或政治的计算，与地质因素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判然两分的。与其他情况一样，政治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直接的区分，石油行业却在努力地维持这样一个区分——维持这样一个插在自然与政治之间，具有不确定性和经济可能性的空间。例如，石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石油储藏的生产是可行的，而这些油藏的地质评估同样也会影响石油价格。当国际能源署或像壳牌、沙特阿美这样的石油公司宣布石油储量丰富时，它们也是在鼓励巨额资本投入未来的石油生产，并阻止石油的使用者转向替代能源——尤其是那些需要大量初始投资、与石油具有根本性差异的替代能源，例如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石油企业及其咨询公司对单个油田测量工作与数据的控制，以及因为无法接触测量设备与实地数据，而被迫在笼统宽泛的层面上开展工作的国际机构对未发现的石油发布的极高估计，为管理这种地上与地下、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分离提供了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实际的计算工作，经济学才得以治理并维持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差异。

★

我们如何才能挑战经济学家们对这些表征方法的掌控呢？目前的主要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它们的目标，是对自然建立起与经济表征相抗衡的表征形式。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读到的那样，更有效的挑战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我们在第五章中了解到，“经济”——一种去

物质化的理解经济流动的方式——的诞生，是由石油的出现催生的，这种从 1930 年代起就一直十分廉价和充裕的能量来源，使人们得以构想出一个不把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问题或能源的成本问题纳入考量的总体经济计算的体系。这让无限增长的理念成为可能。

在美国，一个站在新古典经济学与“价格体系”对立面的思想流派——在诸如理查德·T. 伊利和索尔斯坦·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制度经济学派——在与它的竞争中已经被击败了。然而，他们的思想在纽约的一个推动“技术专家治理”运动的团体手中得以延续。这个团体由一群被主流视为异端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他们主张，财富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现在所能论证的那样依赖货币的流通，而是依赖能量的流动，及其在物质与服务中的转化。1920 年代，当欧文·费雪用“轮转式索引卡片架”的前身来编制他的“价格指数”时，这个团体开展了一项“北美能源调查”，收集了有关自然资源开采、制造和能源使用的数据。之后，他们又与哥伦比亚大学工业工程系合作，开展了一项与费雪基于货币流动的国民经济测量方案相竞争的项目：一项以能量 / 源为单位来衡量北美生产与就业情况的分析。

248

这场运动在 1930 年代的领袖之一 M. 金·哈伯特，在今天因其对石油储藏耗竭的研究，以及 1956 年做出的美国石油产量将于 1970 年到达顶峰并在之后下降的预测而闻名。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师时，哈伯特曾研究过地下流体的流动。而在进入壳牌石油公司工作之后，他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用到了石油的流动上。他借鉴了在当时已经备受关切的煤炭储量耗竭问题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分析方法，并转变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对石油未来供应的估计，不再是一个关于一处油

藏的总体规模究竟有多大，或仍然埋藏于地下的石油储量究竟还有多少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能够以多快的速率使石油从地下流向地表。他认为，这个流动的速率有历史可循，并且这一历史遵循着某种典型的模式，勘探的方法、发现新油田的速率、开采的技术，以及不同类型的烃源岩和石油的性质，都会对此产生影响。而从这些因素中，我们就可以预测石油在未来可能的流动情况。如果对经济学家来说，地下沉积的石油储藏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且它具有不可探知的巨大储量，那么对石油地质学家来说，石油的流动是一种可以测量的社会-技术性的过程。²⁷

1990年代，一个由石油公司退休的地质专家、投资银行家、独立运营的石油勘探商、学者，以及关注该议题的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非正统石油专家群体重启并继续推进了哈伯特的工作。他们采用哈伯特的方法和这些方法的几种变体，对石油生产到达顶峰并开始永久下降的时间点做出了预测。他们得到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都预测，这个峰值将出现在2005—2010年间。²⁸

*

面对这些越来越巧妙地证明未来的石油流动可被预测、可被表征的努力，经济学家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任务：维持石油流动的不可计

27 Gary Bowde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idity in Estimates of US Crude Oil Reserv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5: 2, May 1985: 207–240; Michael Aaron Dennis, 'Drilling for Dollars: The Making of US Petroleum Reserve Estimates, 1921–25',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5: 2, May 1985: 241–265.

28 M. King Hubbert, *Nuclear Energy and the Fossil Fuels*, Houston: Shell Development Company, Publication 95, June 1956; Kenneth S. Deffeyes, *Hubbert's Peak: The Impending World Oil Short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olin J. Campbell and Jean H. Laherrère, 'The End of Cheap Oil', *Scientific American* 278: 3, March 1998; Kjell Aleklett and Colin J. Campbell, 'The Peak and Decline of World Oil and Gas Production', *Minerals and Energy* 18: 1, 2003: 5–20.

算性——通过维持表征石油（经济学家向我们保证，它们是片面的、不可靠的，而且还是政治性的）与表征现实（经济学家们声称它们是无限的、不可知的，因此是非政治性的）之间的区别，来维护自然是一种无限资源的认识。只要这场斗争是围绕对自然的不同表征而展开的，那么，经济学家就会占据上风。然而，正如我们从“经济”的构建过程中所知道的那样，构建对世界的表征总是需要去构建一个可以被表征的世界。这就是经济学家们的脆弱性所在。

对于那些可以被我们称为“资源丰饶论者”（cornucopians）的人士来说，面对石油峰值（并不意味着石油会完全耗竭，而是石油流动的速率已经无法再持续增长）日益增多的证据，他们会有两种回应：第一，重新定义自然，或至少重新定义石油；第二，重新定义石油供应的问题，认为它仅仅是政治安排的问题。

迄今为止被生产出来的所有石油，现在几乎都被重新命名为“常规石油”（conventional oil）。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近年来少数几个新发现的大型石油储藏，全都处在近海深水区域，位于水面以下数千米的深处。所有人都会同意，常规石油的供应就算还没有开始下降的话，也会很快就要开始下降了。但我们可以避免由此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和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只要我们将其他类型的物质也定义为石油——即所谓的“非常规石油”（unconventional oil），而我们如今还可以把非常规的天然气储藏也纳入这一范畴。

非常规石油指的是两种矿藏。第一种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是一种被称为油页岩（oil shale）的矿物构造。这是一种富含有机质的泥灰岩，其中不含有石油，而是蕴含着干酪根（kerogen，又译“成油母质”），一种可以生成石油的有机物质，但尚未经历在高压和热量的

作用下被转化为石油的这个长达千百万年的完整地质过程。然而，在人类技术的帮助下，这一地质过程可以人工地来进行。油页岩通过一种被称为裂化（cracking）或热裂解（pyrolysis，这是一个通用术语，用来指称通过加热使有机质碳化的过程，类似于将木材制成木炭，或将煤炭制成焦炭）的过程，被转化为合成油。对于常规石油来说，从地下开采出的重质原油要在炼油厂通过裂化被分解成如汽油等质量更轻的碳氢化合物，也就是通过加热，使长链碳氢化合物分子裂解为短链。而对于油页岩来说，则是这种岩石本身必须通过热裂解的方式，被转化为合成油。然而，开采页岩以及在地面上对其进行加工的过程被证明是极为昂贵的，而且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一些试点项目已经尝试在页岩中“原位”（in situ）合成石油，也就是将整个地下沉积矿体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干馏炉，在数月的时间内将页岩加热至约 350℃，再抽取出液化的干酪根。但这一工艺还需要将生产区域周围冻结，建造起一堵“冰墙”，从而阻止地下水的流动。²⁹

250

换句话说，为了达到经济上的可行性，页岩的热裂解过程要转移到地下，使矿体留在原位，并通过将地球转变成一台裂化机器来实现这个化学转化的过程。页岩油气产业首先必须用人工和机械的过程，来取代长达千百万年的成油地质过程；然后必须通过将这个合成过程的地点转移到地下，来把岩石圈本身从自然造物转变为一台发生工业化学反应的机器。尽管美国政府为这些技术提供了数十年的资助，但其可行性至今都没有得到证明。

29 Anthony Andrews, 'Oil Shale: History, Incentives, and Poli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6; Andrew Gulliford, *Boomtown Blues: Colorado Oil Shale, 1885-1985*,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89.

另一种形式的非常规石油是一种叫“油砂”[oil sands, 或称“tar sands”(焦油砂或沥青砂)]的资源, 尤其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阿萨巴斯卡(Athabasca)和委内瑞拉奥里诺科盆地(Orinoco Basin)出产的油砂。油砂也不是常规认知中的石油。它是沥青, 是石油中最重、最黏稠的部分, 传统上用于铺设道路。阿萨巴斯卡沥青砂的商业化开采始自1967年, 但一直到2002年, 它才被重新归类为加拿大“石油储量”的一部分, 使得该国石油储量从50亿桶一下跃升到了1800亿桶(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石油储量第二大国家)。³⁰ 因此, 加拿大的石油, 是通过露天开采地表的砂矿生产出来的。

与页岩油一样, 沥青也必须通过人工过程转化为合成原油。这个处理过程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来分离掉沥青以外的砂粒——大约每生产一桶油就要用掉120加仑(约454升)水。但砂粒中还含有其他物质, 包括镍、钒、铅、铬、汞、砷等有毒元素。它们没有简便的处理方式, 只能被收集在储存池中。环保人士警告, 如果储存池池壁不够坚固, 就存在废水溢出的风险。由于溢出物会威胁到河流和野生动物, 自然因此又被重新带回了政治之中。而自然之所以会重回政治, 不仅是因为环保运动声势浩大, 或露天采矿的方式存在争议(正如煤炭行业过去所发现的那样), 而是因为能源本身已经不再是以一种近乎取之即用的“自然”的形式, 被方便开采地密封在平坦的土地之下了。

今天, 从页岩中生产天然气和石油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常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在烃源岩的孔隙和裂缝中的运移而向井口流动。页岩层

30 Bengt Söderbergh, 'Canada's Oil Sands Resources and Its Future Impact on Global Oil Supply', Uppsala Hydrocarbon Depletion Study Group, MSc degree project, Systems Engineering, Uppsala University, 2005, available at www.fysast.uu.se/ges/sv. 瑟德贝里(Söderbergh)指出, 加拿大沥青工业对天然气的依赖使其不可持续, 也不符合该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减碳义务。

中同样也存在天然气和石油 [即人们所称的“致密油”(tight oil), 不要与油页岩混淆], 但由于页岩构造的孔隙度不够高, 不足以形成能支撑商业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流量。然而, 生产商可以通过在井筒中引发可控的爆破, 再以高压向井下泵送流体和砂的混合物, 从而以机械的方式压裂岩石, 使之具有充分的裂缝和孔隙。类似常规石油生产中被称为“裂化”的高压裂解碳氢化合物过程, 以高压将页岩层击碎的技术被称为“水力压裂”(fracking, 全称“hydraulic fracturing”)。与页岩油的生产相同, 水力压裂的过程必须被转移到地下, 并向地球内部打入化学药剂 [“压裂支撑剂”(propants)], 而这些药剂就像数百万名微型矿工一样, 在岩层中开辟空间以提取其能量。

就像煤炭工人一样, 这些支撑剂也很难被控制。水力压裂液使用的数百万加仑水中含有酸和有毒化学物质, 而这些化学物质在美国的使用并不受标准环境法规的约束。页岩储层位于地下 250—8000 英尺的深度, 可能靠近人类使用的水源, 导致这些化学物质有机会污染饮用水供应。在欧洲, 地下压裂引发的小型地震引发了担忧, 导致页岩气钻探被叫停, 有些地方还立法禁止了此项技术。³¹ 由于今天新发现的石油主要集中在近海深水区域, 虽然开采难度与成本增加, 却帮助强化了自然与政治的分离; 而页岩气通常位于大型人口中心附近, 降低了向用户输送能源的成本。但这也意味着它接近大型饮用水源。当支撑剂从裂缝渗入饮用水时, 它也将自然与政治重新混合在了一起。

31 Joseph H. Frantz Jr. and Valerie Jochen, 'Shale Gas White Paper', Schlumberger, 2005, at www.slb.com; Lisa Sumi, *Our Drinking Water at Risk: What EPA and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Don't Want us to Know About Hydraulic Fracturing*, Washington, DC: Oil and Gas Accountability Project, 2005, available at www.earthworksaction.org; Sylvia Pfeifer and Elizabeth Rigby, 'Earthquake Fears Halt Shale Gas Fracking', *Financial Times*, 1 June 2011.

20 世纪的政治是围绕着一个新的对象——“经济”——而被构建起来的。“经济”的政治是一种去自然化的政治。通过各种计算的实践，自然被排除在了政治之外。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在 20 世纪中期，通过将“经济”构建为一个插在自然与政治之间、由去物质化的货币流通形成的空间——这个空间之所以能被构建起来，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不必计算使用或耗尽能源的成本；第二，自 1990 年代以来，通过使用资源丰饶论的技术，来表征世界能源储量的规模。这些技术建基于某种特殊的安排：由两种完全不同且相互独立的计算机构，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来对石油做出计算。石油公司依靠精密的测量设备，计算单个油井和油藏的储量；国际机构则依靠地质理论的抽象和建模，计算全球储量。这两种方法对于已知和未知的石油，对于被表征的和实际存在的石油，都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果。日益下降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和不断扩大的未发现石油储量之间的差距，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将由经济（学）的计算来治理的空间。因为经济学家们号称自己已经掌控了表征的方法。

然而，面对石油峰值——石油从全球的油井和油藏中流出的速率已经到达一个平台期——的证据所构成的挑战，经济学家的论述只有通过重新开启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才能存续下去。将蕴含于酪根的岩石构造和混有沥青的砂粒转化为油田，就是在承认我们所称的自然，其实是一个机器化、人工化的领域（machinated, artificial territory），各种新的诉求和政治能动性都能形成于其中。

252

*

资源丰饶论者面对石油峰值证据的另一种回应，是辩称常规石油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未来大部分新增的石油供应将

会来自欧佩克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三个石油产量最大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而这三国中的每一个，据报道称，都拥有庞大的石油储量，但战争、制裁和欧佩克的政策阻碍了这些石油的开发。新增的石油供应也将会来自非洲，来自那些常常被认为因内战和政治腐败而使石油投资受到了抑制的国家。对于这种将石油短缺诉诸“政治”解释的做法，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我们有理由怀疑，大多数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储量都被夸大了，因为欧佩克的生产配额是根据各国的储量规模来决定的。因此，对石油储量的估计值就不是对现实的部分表征，而是整个开采速率控制机制的一部分。第二，“政治”的障碍也是一个地质技术的问题——无论在地下还是在地上都是如此——因为制裁政策和战争压制了伊朗与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迫使两国不得不采取低技术手段来维持油藏压力。而这些手段可能已经永久性地降低了可采收的石油量。第三，如果石油的供应是一个涉及战争、人权和集体未来的政治问题，那么，这正是我们需要去争取一种新的自然的政治，来取代政治与自然的关系只受经济计算支配的旧自然政治的理由。

承认常规石油的主要来源——波斯湾地区——的储量规模是一个不确定的技术-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的问题，就是在对以经济的方式来管理政治的不确定性的做法提出质疑。未来的能源政治和碳民主进程，将正是在这种拷问所带来的可能性，而不是任何形式的能源决定论的基础上展开。

*

本书并不提供一套关于民主的一般性理论。各种针对民主的一般性理论虽然数量众多，但其中都没有石油的位置，除非是把石油当作

例外情况来讨论。相反，本书的目标，是密切地追踪在一个世纪或更久的历程中，碳燃料与某些类型的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之间被打造出来的一系列联系。

20 世纪中叶之前在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出现的那些形式的民主，是由人类从世界存量有限的碳氢化合物储藏中获得的空前集中的能量，以及为了提取与配送这些能量而必需的那些社会-技术性的安排所催生并塑造的。然而，随着能量的生产转向了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这一转变就为削弱而非推广那些以碳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形式提供了机会，无论在西方还是中东都是如此，而过去的工业民主正是依赖这种形式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出现的。探究石油的属性、石油流动所依循的网络，以及在能量、金融和其他事物的流动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就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些不同的因素与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这些关系连接着能源与政治、物质与理念、人类与非人类、计算与计算的对象、表征与各种形式的暴力，以及现在与未来。

253

因为石油，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未来有着一种特殊的定位：我们的未来是一片无限增长的前景。这个前景并不是由于它自然而然地反映着一个丰裕的时代而形成的。它是根据一个被称作“经济”的全新世界来组织专家知识及其对象的特定方式所造成的结果。计算的方法、货币的使用、交易的度量，以及国家统计数据的编制等方面的创新，使得人们有可能将这个政治的核心对象，想象为某种不受任何形式的终极物质限制的约束，而能够无限扩张的对象。在 1967—1974 年的危机中，这些截然不同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曾发生了转变，而在当下，这些关系正经历着又一次转变。

要理解当代的石油政治，还需要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也就是把为了保障石油生产安排而一直被反复部署的暴力，以及似乎同样是不民主的石油政治不可或缺的各种形式的景观与表征——尤其是这样一种表征：将美国最近的几轮军国主义行动呈现为一个给中东带来民主的项目——结合在一起。³²

通过密切追踪石油本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景观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石油政治中其他看似不相关或不协调的特征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因为石油的物质属性或战略必要性可以决定其他的一切（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读到的那样，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对于控制中东石油的“战略依赖”，是通过投入大量的艰苦努力才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因为通过追踪在输油管道与泵站、炼油厂与航运路线、公路系统与汽车文化、美元流动与经济知识、武器专家与军国主义之间被建立起来的联系，我们会发现，石油、暴力、金融、专家知识与民主之间，如何被打造出了一套特殊的关系。

254 这些关系已经与煤炭时代大有不同。如果说 20 世纪初大众政治的出现——福利民主的某些场所与事件就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应当透过它与煤炭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话，那么，当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则应当通过它与石油之间的关系来追溯。相对的，实现更加民主的未来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工具，来应对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

32 Retort (Iain Boal, T. J. Clark, Joseph Matthews and Michael Watts), *Afflicted Powers: Capital and Spectacle in a New Age of War*, London: Verso, 2005.

英文 2013 版后记

255

自本书第一版出版（2011 年 11 月）以来的十八个月里，美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能源充裕时代。从页岩层中开采天然气和石油使美国新的能源供应量出现了有史以来最迅猛的增长。¹ 对于这个在美国化石燃料产量连续下降三十五年之后突然发生的逆转，政治领袖和新闻媒体视之为美国的国家能源独立开始恢复的标志。² 在 2008 年美国金融机构的崩溃中，股市、养老基金、房产价格的崩盘让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并导致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经济衰退中失去了七百万个工作岗位。因此，这场金融危机之后的能源繁荣（energy boom），似乎也预示着实体财富的回归。这种脆弱的、基于金融投机和消费信贷的纸面经济（paper economy，又译“虚拟经济”），将让位于在不断扩张的物质资源这个坚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有可能发生的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³

1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onthly Energy Review',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www.eia.gov. 美国的一次能源生产从 2009 年的 72.6 千万亿英热单位增长到了 2012 年的 79.2 千万亿英热单位，化石燃料占到了这一增长的 85%。

2 Clifford Krauss and Eric Lipton, 'US Inches Toward Goal of Energy Independence', *New York Times*, 23 March 2012: A1.

3 Ed Morse, 'Move Over, OPEC - Here We Come',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 19 March 2012, available at online.wsj.com. 该作者曾任花旗集团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

但对政治领袖和新闻媒体以外的其他人来说，这个意外的能源富矿并不预示着新获得的独立，而是依赖的加深。新发现的页岩气和页岩油将会强化人类对化石燃料的长期依赖，而化石燃料的生产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高。突破历史记录의干旱、北极圈海面冰层的融化、热浪与洪水，还有其他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都提醒着许多人要进一步计算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⁴ 以下三项数字影响了这一计算：

(1) 2 摄氏度——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 中所接受的目标，即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低于这个目标值时，就有可能避免人为气候变化最危险的一些后果；

(2) 8860 亿吨——从 2000 年到 21 世纪中叶，人类可以向大气排放这么多的二氧化碳，同时仍然有机会将升温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但这个碳预算的三分之一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间就已经被消耗掉了，只留下 5650 亿吨可在 2050 年之前使用；

(3) 27,950 亿吨——全世界各公私企业和政府拥有的已探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潜在碳排放量。⁵ 最后这个数据是人类剩余碳预算的五倍。主导世界大企业排行榜的能源公司正陷入对化石燃料日益加深的依赖。这些公司依赖于将化石燃料储量当作金融资产来计算，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地球依然适宜人类生存，这些储量的五分之四就必须被埋在地下，不被计算。

4 关于人为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之间的关系，参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dited by C.B. Field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PCC, 2012.

5 Bill McKibben, 'Global Warming's Terrifying New Math', *Rolling Stone*, 19 July 2012; 'Unburnable Carbon - Are the World's Financial Markets Carrying a Carbon Bubble?' available at www.carbontracker.org. 全球营收最高的十家公司中有七家都是石油公司，前二十高的公司中则有十一家是石油公司。其余大部分则是输配电公司或汽车制造公司，因此也跟化石燃料产业紧密相关 [Fortune 'Global 500' (《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 at money.cnn.com]。

碳民主需要去理解和处理这种依赖关系，以及这种依赖关系所产生的脆弱性。在此，我们将探讨信贷体系对能源未来 / 期货（energy futures）的依赖。对此，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可能会将之纳入考量？

★

在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战后繁荣的消逝，终结了战后的碳民主赖以建立的安排。正如前几章所述，以石油为燃料驱动的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以及每十年价格就会下降、供应量却会剧增，而且不需要考虑能源耗竭和气候变化代价的能源供应所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使工业劳动力得以享受日益增长的繁荣和不断改善的社会福利，而不会对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润造成威胁。从 1970 年代开始，能源的成本上升，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及其投资者发现，很难从本国国内的生产性劳动中获得持续增长的利润。资本之前可以通过雇佣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来获利，哪怕付给工人的工资一直在增长；但现在，资本需要其他的方法来增值。在 21 世纪之交，解决这个问题的全新办法，是让人们作为借款人来工作。⁶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消费者债务逐渐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打造了各种高碳生活方式的举措来实现的：在美国和其他地区，政府为了刺激郊区的发展，向抵押（按揭）贷款提供补贴，而汽车制造商为了销售郊区生活所倚赖的汽车，也制定了信贷计划。消费者债务在 1980 年代的扩张始于塑料信用卡的广泛使用，和随后二次抵押贷款（second mortgage）的激增。随着用于信用评分和用于打包分割

6 关于这一转变，参 Maurizio Lazzarato,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2; and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Brooklyn,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次级贷款（sub-prime loans）并从中获利的金融工具被开发出来，信用卡债与二次抵押贷款这两种形式的债务在 1990 年代及 2000 年代扩展到了收入更低、风险水平更高的人群中。在美国，家庭负债总额在 1950 年几乎为零，1970 年代增长到 1 万亿美元，到 2001 年是 7.5 万亿美元，而到 2008 年则达到了 14 万亿美元，几乎是 2001 年的两倍。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家庭负债率也差不多，甚至更高。⁷ 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不再靠修建工厂来利用劳动力创造利润，而是去安排消费者的消费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家庭通过不断扩大的借贷能力，来弥补实际工资的停滞、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安全和福利水平的下降。

对于华尔街的银行，以及其他参与打造这种债务的世界，并依赖其产生的各种费用、利息和衍生品来维系的公司来说，这种世界能为它们带来极其丰厚的收益。但是，这种世界太过脆弱，承受不了石油价格在 2005—2008 年翻了两番的上涨——这一冲击致使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放缓，导致普通消费者的二次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违约，由此引发了金融崩溃。但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油价助长了泡沫的膨胀。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国债的低回报和美元价值不断贬低感到失望，似乎已经将其不断增长的石油美元收入的一部分，转向投资回报更高的项目，比如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⁸ 金融崩盘前衍生品交易的繁荣，与石油峰值时油价飙升所导致的石油美元的波动性流动是相关联的。

7 US Federal Reserve, Consumer Credit-G19, available at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statisticsdata.htm>, and Flow of Funds, at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apps/fof>; IMF, 'Dealing with Household Deb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2: 89.

8 Kent Moors, *The Vega Factor: Oil Volatility and the Next Global Crisis*, Hoboken, NJ: Wiley, 2011: 73–74.

在其他地区，石油价格翻了两番的涨幅还产生了另外的影响。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油价上涨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在与碳民主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下，对食品价格的影响。2007—2008 年间，全球许多基本食品的价格都翻了一番。这一上涨是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干旱和其他极端天气状况，工业化农业和合成肥料中重度使用石油制品导致的生产成本提升，以及玉米从粮食作物被广泛地转变为工业能源作物等。玉米是美国第一大农作物，美国玉米产量约占全球玉米供应的三分之一，而现在，约 40% 玉米产量被用于生产乙醇。一项新的政府规定要求，每加仑燃料都必须掺入乙醇，这大大推动了玉米从粮食向内燃机燃料的转变。食品价格的上涨，再加上能源价格飙升所造成的困难，为 2011 年阿拉伯抗争运动的发生铺平了道路。

触发金融崩溃的油价上涨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美国在 2009 年之后的油气繁荣。当油价达到每桶 100 美元，天然气涨价超过一倍，达到每千立方英尺 8 美元时，美国的一些地区，从前因资源太分散、太难开采而导致当地的油气生产不具经济效益，现在就可以进行钻井作业了。尤其是，油气现在可以从页岩层中开采。页岩层是致密的粘土颗粒沉积而成的趋势带，非常难以穿透，连天然气都无法轻易流过，但页岩层中有一些狭窄的裂隙，其中可能聚集有少量天然气和石油。页岩层中的天然气和“致密油”无法像常规油气一样透过岩石内的孔隙流动，因此，钻井时必须尽可能多地截获裂隙。钻井工人使用两种均发展于几十年前的技术来钻井：水平钻井，这种技术让钻井机可以沿裂隙走向前进，与垂直钻井相比大大提高了截获裂隙的概率；水力压裂，这种技术可以让油气层周围的岩石裂开，使液体得以从没有被油井直接截获的天然裂隙中，沿人工制造的缝隙到达井筒。

页岩油气的生产成本之所以高昂，是因为这些技术费用不菲，而供应用于水力压裂的水、处理污染残留物的成本也很高。在美国，钻井成本呈指数级增长。1980年代和1990年代，钻井成本平均为每英尺50—100美元，到2002年翻倍至200美元，到2006年再次翻倍至400美元，而到2012年时则已经接近每英尺800美元。⁹此外，由于页岩油气不能自动向井筒运移，单口井的产量会很快下降。美国最大的致密油成藏区带（oil play）——巴肯储层（Bakken Formation），开采第一年时，产量的下降率为69%，头五年的下降率达到了94%，而相较之下，传统油田年产量的下降率只有4%到4.5%。因此，仅仅是为了维持现有的产量，生产商就必须每年钻出约6000口新井，而每口井的成本将近600万美元。¹⁰再加上土地租赁的成本，以及由于最有前景的区块都已被完全开采，新井的产量越来越低，为了维持产量所需要的油气井数量就越来越多，于是，这个行业就变成了一个对新资本的需求在不断加速的行业。

页岩油气生产商依赖于另一项技术来发展这门产业：不是开采能源的技术，而是它们开发出来的从投资者那里“开采”资金的手段。¹¹随着2008年投机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页岩气和致密油为华

9 参 www.eia.gov/dnav/pet/pet_crd_wellcost_s1_a.htm。这里的成本数据以名义美元计价，但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得到的数据还是类似。

10 J. David Hughes, 'Drill, Baby, Drill: Can Unconventional Fuels Usher in a New Era of Energy Abundance?', Post Carbon Institute, 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www.postcarbon.org.

11 参约翰·迪扎德（John Dizard）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发表的讨论页岩区带的文章中这句评论：“除了技术，你还可以感谢美国人在开采投资者资金方面的先进能力”，出自 'Shale Gas Numbers May Not Add Up', 1 November 2009。就这一点而言，页岩油气的繁荣让人联想到150年前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繁荣。参 Richard White, *Railroaded: 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尔街提供了一个新的投机并赚取费用的领域。从水力压裂中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创造了钻井租赁权交易的繁荣，以及预计能从新的石油储量中获利的那些公司的股票的繁荣。

截至 2012 年，美国本土 48 个州已经有 10% 的土地被租赁给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使得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成为美国面积最大的单一土地用途，甚至超过了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种植的用地面积。¹² 钻井公司、土地投机商和推动油气行业发展的银行，在向投资者推销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这两种技术过程时，把它们定位成一种类似于产品制造的工程过程，与更加依赖石油物理特性与烃源岩地质特性的传统油气井的钻探相比，有着更高的产出可能性。

后碳研究所（Post Carbon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华尔街大肆炒作了这个行业，使投资大量涌入。在致密油的开发之前，页岩气行业率先迈入繁荣，最后导致天然气供应过剩，气价暴跌。随后，银行通过安排由此陷入困境的公司的收购与兼并，收取了大量费用，再一次从中获利。这个行业越来越多地由银行家和投资分析师驱动，以至于钻探的决策不一定是为了使长期产量最大化，而是为了达到华尔街分析师的目标数字，从而继续吸引投资资金的流入。¹³

2013 年 4 月，我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这里是马塞勒斯页岩油气藏（Marcellus Shale）区域的中心地带。在当地一家宾馆里，水力压裂工程师们之间交流的主要话题，就是“大都在二十五岁左右”的银行家们，在决定去哪些县钻井、怎样营销产品方面所扮演的新角

12 Deborah Rogers, 'Shale and Wall Street: Was the Decline in Natural Gas Prices Orchestrated?', Post Carbon Institute, 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www.postcarbon.org.

13 同前注。

色。一位工程师当时刚参加完一场在休斯敦举行的讨论水力压裂行业现状的会议，他发现自己在那里被一群银行家和私募股权持有人包围了。“在那场会议中，”他说，“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戴袖扣的人。”¹⁴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场繁荣会持续多久。亚瑟·伯曼（Arthur Berman），一位石油地质学家，同时也是从 1916 年就开始发行的石油行业期刊《世界石油》（*World Oil*）的专栏作者，持续不断地对页岩油气产量的夸大宣传提出质疑。两家在这份期刊上登载广告的石油公司向编辑部施加压力，要求伯曼不要用他的专栏讨论这些。由于一位编辑没能迅速采取行动停掉专栏，编辑本人被解雇了。这位拥有勘探实地经验和物理学专业背景的编辑表示，自己可能是“《世界石油》最后一位具有技术背景的编辑了，而这份期刊几十年来一直都有一个技术背景合格的编辑团队”。¹⁵

★

美国突然出现的石油充裕实际上反映了全球石油的稀缺。有些人已经用页岩油气的繁荣来当作反驳石油峰值的证据，但事实上，这一繁荣就是石油峰值的最新症状。曾塑造了 20 世纪政治的易于获取、生产成本低廉、供应一直在增加的常规石油的时代正在逐渐逝去。全球最大的公司埃克森美孚每年都出版一份年度报告——《能源展望》（*The Outlook for Energy*），其中呈现了每一年人口扩张、消费增长、对能源的需求持续上升的图景，而该公司的股价就依赖于这些因素。可是，就算是埃克森美孚，现下也在其 2013 年报告接近尾声的地方

14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on, Pennsylvania, 1 April 2013.

15 参见 2009 年 11 月 6 日的博客条目，at <http://petroleumtruthreport.blogspot.ca>.

承认, 常规石油的供应已经到达了峰值, 之后会逐渐降低。¹⁶ 这个峰值表明, 石油公司已经从地下开采了全球常规石油可采储量的大约一半, 剩余储量的生产速度会越来越慢, 开采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自 1860 年代现代石油工业兴起至今, 人类已经消耗了大约两万亿桶石油。以下事实值得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烧掉第一个一万亿桶石油花了约 130 年, 但是消耗第二个一万亿桶仅仅花了 22 年。关于非常规石油或其他化石燃料的供应到达峰值的时间, 估计值各不相同。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 它们的消耗速度都是惊人的。地球的化石燃料是埋在地下的“阳光”经过五亿年才形成的。无论我们是在三百年还是四百年里用光了这份“由其他生物馈赠给人类的资本”, 从地质史的角度来看, 或单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 人类世 (Anthropocene) 的时代都是短暂却非凡的。

这个在埃克森美孚年度报告所展示的图景中发现不了的术语“人类世”, 被地质学家和环境科学家用来描述这样一个近期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 人类已经与物质性、技术性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 不仅作为一种动物性、社会性的能动者而行动, 也作为一支全球尺度上的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力量而行动。这个地质学术语所刻画的, 主要不是这个化石燃料中所蕴含的能量以全新的规模为人类赋予能动性的短暂时段, 而更多的是从今往后, 在未来将会感受到这一短暂的能动性所产生影响的超长时段。当下人类普遍实践的生活方式, 主要是

16 ExxonMobil, 'Liquids Supply by Type', *The Outlook for Energy: A View to 2040*, 38, available at <http://www.exxonmobil.com/energyoutlook>. 埃克森美孚是按净收入算世界最大的公司, 比苹果公司高 50%, 但苹果的股价在 2012 年超过了埃克森美孚, 成为当年按市值算世界最大的公司, 参 <http://www.ft.com/intl/companies/ft500>.

在最近这一百年之内形成的，其强度自 1945 年起才开始加速，而它们正在塑造未来一千年，甚至可能是五万年的地球。¹⁷

261

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克森美孚和其他石油公司对于页岩繁荣与更多尚待发现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也许会让化石燃料的使用持续扩张的时代再延长另外二十到三十年的乐观预期——这种预期也在美国新闻媒体中获得了纷纷响应，似乎就错付得十分奇怪了。这些预计会发现资源将使我们在短时间内，把燃烧化石燃料的速率提高到现在的两倍到三倍，同时，它们也将可能给集体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做出这些预计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使埃克森美孚和全球其他巨型能源公司的股价持续上涨，让流通和扩张都依赖于对未来资源的充裕做出计算的信贷流的规模持续增长。由于围绕美国页岩繁荣的夸张宣传往往会遮蔽更广泛的图景，所以，我们值得考虑一下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

★

2005 年，美国以外国家石油产量的增长率达到了一个很难再提高的平台期，此后未能再有突破。¹⁸ 正如我们所知，即使要保持在现有的

17 Paul J. Crutzen and Christian Schwägerl, '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 a New Global Ethos', *Environment* 360, 24 January 2011, available at <http://e360.yale.edu>. 推广了“人类世”这个术语的保罗·J. 克鲁岑 (Paul J. Crutzen) 现在认为，人类世的起点不应该从 1800 年前后工业化开始的时期算起，而要从 1945 年和“大加速” (great acceleration) 时代开始的时期算起。石油使用量的快速增长是这个被称为“大加速”的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参 Will Steffen, Paul J. Crutzen and John R. 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Ambio* 36: 8, 2007: 614–621; and Paul Voosen 'Geologists Drive Golden Spike Toward Anthropocene's Base', *Greenwire*, 17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enews.net/gw>. 亦参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35, 2009: 197–222。

18 世界原油和凝析油产量在 2005 年是每天 7250 万桶，此后直到 2009 年都没有增长，到 2012 年才有少量增长，达到每天 7550 万桶，其中 70% 都是美国贡献的 (www.eia.gov)。

生产水平，每年都必须有新的油田投入生产，才能弥补现有油田产量的下降。全球石油产量的下降率，也就是全球主要油田产量增长率和减少率的加权平均值，估算起来相当困难。2012 年 6 月，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由英国石油公司和其他能源公司资助的“能源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 of Energy）项目发布了一项极为乐观的预测，认为全球石油产量的下降率比较低，因此，石油的供应将会增加，全球新闻媒体对此做了热情的报道。英国的多位学者很快指出，这一预测结果是因为误读了现有的数据才得出来的，而且还犯了一个令人尴尬但未被广泛报道的基本算术错误。¹⁹对证据进行的更仔细的分析继续证实了本书第 345—346 页（页边码 232 页）描述的图景。面对每年 4% 到 4.5% 的产量下降率，全世界必须每四年，或者可能每三年，都要发现并投产相当于一个新沙特阿拉伯——或一个拥有页岩繁荣的新美国——的新增石油供应源，才能保持目前的石油生产速率。²⁰

262

石油产量的下降率反映了北海和阿拉斯加北坡等主要石油产区的枯竭，以及曾经位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之列的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国石油产量的下降。但它也反映了在那些本应为常规石油未来供应

19 Leonardo Maugeri, 'Oil: The Next Revolution: The Unprecedented Upsurge of Oil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Geopolitics of Energy Project,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012, available at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 Steve Sorrell and Christophe McGlade, 'Commentary: Maugeri's Decline Rate Assumptions', ODAC Newsletter, 6 Jul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odac-info.org>; David Strahan, 'Monbiot Peak Oil U-turn Based on Duff Maths', 30 Jul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davidstrahan.com/blog>.

20 Steve Sorrell, Jamie Speirs, Roger Bentley, Richard Miller, Erica Thompson, 'Shaping the Global Oil Peak: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Field Sizes, Reserve Growth, Decline Rates and Depletion Rates', *Energy* 37:1, 2012: 709–724.

的增长做出大部分贡献的国家，特别是波斯湾三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产量的增加有多困难。

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是一个“产量调节者”，拥有能够随时投入生产和市场的额外石油储量了。在 2005—2009 年间，该国石油出口量有所下降，并且可能很快就会再次下降。预计在 2014 年，沙特阿美将完成其已探明的最后一个巨型油田玛尼法（Manifa，此油田发现于 1957 年，但由于出产的石油质量较差且难以开采，因而被封存搁置了数十年）的开发工作，但该公司并不期望此处油田新增的石油供应能够提高整个国家的产量。新油田预计每天将产出的 90 万桶石油，刚刚可以填补其他老油田下降的产量而已。²¹ 沙特现在要用掉每日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来为生产该国国内用水所需的 27 座海水淡化厂供电，还有另外差不多五分之一，要用于该国其他的国内消耗。考虑到国内石油使用量的增加会减少用于出口的石油份额，所以除非沙特政府找到办法，使国内石油使用量的增长放缓，否则该国的石油出口将会迅速下降。²²（巴西在 2007 年发现了过去三十多年间西半球发现的最大的新油田，并且该国可能被证实拥有世界第七大的石油储量；但由于巴西国内石油消耗量的上升，它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石油出口国。²³）伊朗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甚至可能更严重：占伊朗境内石油储

21 Reuters, 'Aramco: Manifa Field to Pump 500,000 bpd in H1 2013', 16 October 2012, at uk.reuters.com.

22 Mamdouh G. Salameh, 'If Current Trends Continue, Saudi Arabia Could Become an Oil Importer by 2025', USAEE/IAEE Working Paper Series,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2187643>. 此外可参杰弗里·J. 布朗 (Jeffrey J. Brown) 的出口地模型 (Export Land model)。布朗是一位石油地质学家，用笔名“Westexas”为网站 theoil drum.com 供稿。

23 Mamdouh G. Salameh, 'Brazil's Pre-Salt Oil Potential: The Hype and the Reality', USAEE Working Paper No. 2109947, 16 July 2012,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2109947>.

量绝大部分的六个特大油田的产量下降率达到了 13%，其国内的石油消费又在上升，而美国和欧盟发起的制裁使伊朗无法采用先进的开采技术，因此，伊朗的石油产量正面临长期的下降。²⁴

最大的“新沙特阿拉伯”本应是伊拉克。国际能源署 2012 年发布的一份展望到 2035 年能源发展的报告预测，伊拉克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为全球石油供应的增长做出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²⁵ 当伊拉克石油部从 2008 年起向国际石油公司提供开发该国南部现有油田的合同时，该部暗示，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从每日 200 万桶增加到 2017 年的每日 1200 万桶。然而，如今在伊拉克南部作业的公司发现，这些油田的产量难以增加，因为在复兴党政权遭受国际制裁期间，为了充分开采石油而采取的措施使油田遭到了破坏。同时，它们也认识到，在一个绝大部分边界都被他国陆地领土包围的国家，石油管道只有几条，储油罐不足，装载油轮的泊位有限，石油的运输量也是难以增加的。于是，伊拉克政府将 2017 年达到每日 1200 万桶的产量目标降低到了每日 950 万桶。国际能源署认为，哪怕是降低之后的目标也过于乐观。该署建议，每日 610 万桶才是更现实的目标，但要到 2020 年才能实现，直到 2035 年才能增加到每日 830 万桶。2012 年，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战争和重建之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终于超过了战前受制裁限制时的水平——每日 250 万桶，接着又达到了每日 300 万桶，但随后出现的新的生产困难，又中断了这一增长。²⁶

263

24 Oxford Analytica, 'Iranian Oil Production Faces Long-term Decline', cited in UPI, 'Iran's Oil Output Faces Long-term Decline', 28 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www.upi.com.

25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 Executive Summary. 4.

26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Quarterly Report to Congress*, 2012, Q3, 81, available at <http://www.sigir.mil>; IEA, 'Iraq Energy Outlook', 11 October 2012.

西方主要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石油生产权第一轮投标中的结果好坏参半，之后没有继续参与。以下问题打击了它们的积极性：生产合同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只能获得每桶固定的生产费用作为收益，石油本身仍然是伊拉克政府的财产，而约定的生产费用是每桶 7 美元，甚至更低；在提高产量方面遇到了出乎预期的困难；要与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竞争。2011 年，埃克森美孚冒着让自己在伊拉克未来所有石油合同的招标中都被取消资格的风险，转而与该国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签署了开发伊拉克北部油田的协议。巴格达当时仍希望与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就未来石油收入的分成问题达成协议，因此曾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下，敦促各石油公司不要为伊拉克北部油田单独做出安排。事后，埃克森美孚在向华盛顿报告与库尔德斯坦的协议时解释说，遵守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目标的任何义务，都不及对股东的企业责任重要，因为它必须维护股东所持股票的价值。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伊拉克北部的油田能否为股东们提供任何对长期增长的更好保障。2012 年，一份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由于产区萎缩、地质结构破坏和油井压力下降，这些油田的产量一直在下降。²⁷就连国际能源署审慎乐观的预测也开始显得不切实际起来。国际石油行业每三年就需要找到一个新沙特，但伊拉克这个最有潜力的候选国现在只能增加三分之一沙特的供应量，而且要用九年才能实现。

*

对于国际主要石油公司来说，鉴于在伊拉克获取石油和维护股价面临的困难，它们最主要的替代选项，是去发展非常规的石油来源，

27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1 Reconstruction, Quarterly Report to Congress, 2012, Q3, 81.

包括位于近海深水区域的油田和北极地区的油田。但是，在海上平台从非常深的水域或在偏远恶劣的地点勘探和开采石油，不仅存在许多技术困难，成本也会不断上升，风险还很高。从 2001 年到 2011 年这十年间，石油行业的年度资本支出增加了两倍多，但增加的花费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石油产量。2012 年，欧洲主要石油公司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少于它们开采出来的储量，仅仅实现了 92% 的储量替代率（reserve replacement ratio）。²⁸

由于石油公司的价值依赖于用新增储量来补充已开采储量的能力，储量替代率不足 100% 会带来两大后果。第一，随着复杂开采项目的完成超出了原定的期限和预算，石油公司会设法尽快开采首批石油来安抚股东和股权合作伙伴，而为了这个短期利益，石油公司牺牲了油田的长期生产力。“追求以不可达到的速度开采第一桶石油，正在严重损害石油行业，”咨询公司独立项目分析（Independent Project Analysis）的研究指出，“这会在〔资本支出〕上增加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并在开采出第一桶石油后降低未来产量目标的达成率。”²⁹因此，随着能源生产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对短期股权的日益依赖加剧了能源供应的长期问题。

第二，为投资者创造短期利润的压力与生产上面临的困难似乎在驱使石油公司去承担过度的风险，从而造成设备故障、人员伤亡和对环境日益加剧的破坏。在近海深水区域钻井所带来的挑战，曾导致 2010 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外海由英国石油公司运营的“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钻井平台发生井喷事故，造成 11 名工人死亡。

28 Sylvia Pfeifer and Guy Chazan, 'More Buck, Less Bang', *Financial Times*, 12 April 2013: 9.

29 同前注。

这场井喷威力巨大，难以封堵，以至于在花了三个月才最终堵上漏油处之前，有相当于 500 万桶的石油泄漏进了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同意支付约 78 亿美元来解决民事诉讼，还花了约 45 亿美元来解决美国政府的指控，创下了有史以来对企业开出的最高罚款金额的记录。

事实证明，在北极地区钻井要更加困难，也更加危险。2012 年，壳牌在遭遇了一系列意外事故、设备故障和环境法规的挑战之后，被迫在阿拉斯加北海岸暂停钻井，反映了在该地区强烈的风暴、冰山遍布的海域、更长时间的黑夜和极端寒冷的环境中作业所面临的不同寻常的巨大风险。壳牌已经花了 50 亿美元来勘探石油，却没有打成一口油井。³⁰ 在壳牌做出暂停的决定后，其他计划在北冰洋钻井的大型公司，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现改名为“Equinor”）和康菲公司（ConocoPhillips）等，也暂停了在北极海域的钻探作业。

大部分跨国石油巨头也投资了加拿大的油砂。油砂可以被转化为合成油，对阿尔伯塔省富含沥青的土壤进行露天开采是一种昂贵但技术上更直接的获取新的碳能源的方式。暂且不考虑露天采矿和加工沥青增加的碳排放，以及推土机破坏数千英亩北方森林与泥炭沼泽地、处理用于分离油砂中的沥青而受到污染的河水等环境成本，在这些问题都解决后，石油公司还面临着输送沥青的问题。沥青被必须被稀释到可以通过管道流动的程度，从而流向得克萨斯州配备了重质油加工设备的炼油厂。稀释沥青的腐蚀性比原油更强，而输送稀释沥青的管道故障率高达美国输油管道平均故障率的四倍，可能就与此有关。³¹

30 同前注。

31 美国国家学院（National Academies）正在调查稀释沥青的腐蚀性与管道高故障率之间关系的证据。参 <http://www8.nationalacademies.org/cp/projectview.aspx?key=49461>。

2013 年 3 月，埃克森美孚从阿尔伯塔省向得克萨斯州输送的油砂稀释沥青在流经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时，导致一条 20 英寸口径的旧管道破裂。但这次事故的泄露规模与 2010 年的稀释沥青泄露事件相比还算小的。2010 年，全球最大的能源管道网络运营商加拿大安桥公司（Enbridge）所拥有的一条管道爆裂，油砂油流入了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河（Kalamazoo River）。操作人员以为问题仅仅是管道中的空气泡，在警报响起后还让输油泵继续工作了几个小时。事故三年后，持续清理的费用已经接近 10 亿美元。³²

★

由于常规石油的供应不断下降，开发非常规的石油来源又存在高风险和高成本的问题，主要石油公司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未来。然而，在短期内，石油生产平台期的一个积极方面，掩盖了这些公司所面临的困难。新的常规石油供应的短缺，加上生产非常规石油的高边际成本，以及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石油来源和种类而重新调整管道路线、重新配置炼油厂所带来的物流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在每桶 20 美元至 25 美元之间维持了三十年后，随着产量的增长率到达平台期，石油价格在 2005 年翻倍至每桶 50 美元，到 2008 年再次翻倍至超过每桶 100 美元。³³突然增加的收入为不断增长的勘探费用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也被许多大型石油公司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股票的回购支撑住了股价，减轻了开发新的大型石油供应来源的困难对股票价值造成的压力。

266

32 Jennifer Bowman, 'Enbridge: Oil Spill Cleanup Costs Nearing 1 Billion', battlecreekenquirer.com, 21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battlecreekenquirer.com>.

33 信息摘自 www.eia.gov。

石油价格翻了两番的上涨引爆了 2008 年全球银行业的倒闭潮，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崩溃。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股票市场价格的暴跌，以及与房贷挂钩的金融衍生品所导致的金融泡沫的破裂，这些都不只与石油价格这个直接的问题有关，也与我们在本书中已经考察过的碳民主这个更加长远的故事密切相关。

*

2009 年后的能源繁荣似乎拯救美国脱离了投机资本的无度所引发的金融崩溃和全球衰退，但是，对于这个无度和投机的世界来说，它并非真正的解药。认为页岩革命代表通往“美国有可能发生的再工业化”之路的说法，由花旗集团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这些银行和媒体，曾帮助组织了由指数级增长的消费者债务，与基于这些债务而构建的估值过高的衍生品所组成的信贷体系并从中获利，而同样的一批银行和媒体，如今又在为人们营造对碳燃料驱动的未来所抱有的这种不可持续的期待。似乎少有人注意，曾标志着美国进入能源独立新时代的美国石油进口量的下降，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而在于人们对汽油需求的减少，因为失业人数倍增和其他经济困难迫使人们设法减少开车出行。

随着我们以缓慢的速度——缓慢得到了危险的程度——朝使用更多不必燃烧碳，也不必使碳在大气中进一步积累的可再生能源的方向迈进，我们有时会认为，一个后碳的世界（post-carbon world）必然将会变得更加民主。还有人更具说服力地主张，欧洲分布式、网络化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模式（其基础是将每个家庭和企业都转变成自己所需能源的生产者和少量盈余电量的发电者），与美国通过传统长距离电网输配电的大型公用设施级（utility-scale）可再生能源发电方案相

比，具有更大的民主潜力。有人举出互联网的民主化潜力作为范例，来展示本地化、分布式、智能网络化的设计模式所具有的政治效益。³⁴《碳民主》的一个教训是，我们不能直接从社会-技术性体系的设计模式中预测民主的可能性——正如互联网本身所示，其开放通信的能力始终受到超大型软件、计算机和互联网企业的垄断性商业力量的威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决定未来能源体系应该是何种形态的斗争中，民主的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议题，其结果攸关斗争的成败。

267

*

不过，要实现一个后碳的世界，我们得先付出相当重大的努力，尤其是在美国。《碳民主》的一个更大的教训是，这样的民主斗争并不取决于对未来的设计，而是取决于在当前这些社会-技术性的体系中识别出它们的脆弱性所在。这篇后记追溯了石油公司所特有的脆弱性——这些公司依赖于股权投资的资金流，而投资增加的速度，必须赶上石油生产的成本上涨的速度。然而，不断上涨的成本反映了一个廉价的常规石油越来越稀缺、生产非常规石油的技术开支和环境成本不断攀升的世界。这些风险和成本所揭示的世界，与股权加速流动所依赖的乐观图景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很久以前就开始对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性劳动力失去了兴趣——也因此在这些劳动力面前变得脆弱——的资本，尝试了一条更简单的路径：围绕债务的制造和偿还来组织人们的生活。石油峰值所引发的加速了债务机器的崩溃。美国最近的能源繁荣只是一个暂时的，而且同样脆弱的转移罢了。

(聂瑶 译)

34 Jeremy Rifkin,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参考文献

除下列文章和书目外，我的研究还利用了一系列档案和数据库。石油生产的历史数据取自《20 世纪石油数据》(*Twentieth Century Petroleum Statistics*, Dallas: DeGolyer & MacNaughton, 2009)。当前的石油和煤炭数据取自美国能源信息署(可在 www.eia.gov 查阅)、国际能源署(可在 www.iea.org 查阅)、能源出口数据浏览系统(可在 mazamascience.com 查阅)。跨国军售的数据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转让数据库(可在 www.sipri.org 查阅)。英国政府档案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共记录办公室，有时可从其在线馆藏取得(可在 www.nationalarchives.gov.uk 查阅)，但绝大多数是从其位于基尤(Kew) 区的档案馆收集而得。英国议会的辩论和报告来自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Hansard, 可在 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 查阅)。美国政府档案来自《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0 年以前的卷宗可在 digital.library.wisc.edu 获得，更近的卷宗可在 history.state.gov 查阅) 及来自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的珍贵馆藏(可在 www.gwu.edu/~nsarchiv 查阅)。我查阅的私人文档包括：詹姆斯·V. 福莱斯特文档(James V. Forrestal Papers)、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文档(Harry Dexter White Papers) 和威廉·埃迪文档(William A. Eddy Papers)，这些都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

- Abisaab, Malek, '“Unruly” Factory Women in Lebanon: Contesting French Colonial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 1940–1946',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6: 3, 2004: 58–82.
- Abrahamian, Ervand,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he 1953 Coup in Iran', *Science and Society* 65: 2, 2001: 185–215.
- Aburish, Saïd K., *The Rise, Corruption, and Coming Fall of the House of Sau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6.
- Adelman, M. A., 'Is the Oil Shortage Real? Oil Companies as OPEC Tax Collectors', *Foreign Policy* 9, 1972–1973: 69–107.
- *The World Petroleum Marke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 *The Genie Out of the Bottle: World Oil Since 197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My Education in Mineral (Especially Oil) Economics',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2, 1997: 13–46.
- 'The Real Oil Problem', *Regulation* 27: 1, 2004: 16–21.
- Afary, Janet,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1906–11', in John Foran, ed.,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 Akins, James E., 'The Oil Crisis: This Time the Wolf Is Here', *Foreign Affairs* 51: 3, 1973: 462–490.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fforts in Energy Suppl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10, 1973: 75–85.
- Aldrich, Mark, 'Capital Theory and Racism: From Laissez-Faire to the Eugenics Movement in the Career of Irving Fish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 3, October 1975: 33–42.
- Alinsky, Saul,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 Altwater, Elmar, 'The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Fossil Capit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43, 2007: 37–59.
- Amman, Daniel, *The King of Oil: The Secret Lives of Marc Ri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9.
- Anderson, Irvine H., *Aram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Study of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Oil Policy, 1933–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Andrew, Christopher, *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The Authorized History of MI5*, London: Penguin, 2010.
- Anghie, Antony, 'Colonialism and the Birth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overeignty, Economy, and the Mandate System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34: 3, 2002: 513–633.
- 'Finding the Peripheries: Sovereignty and Colon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0: 1, 1999: 1–71.
- Antonius, George,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13: 4, July–August 1934: 523–539.

- Ardagh, Colonel John, 'The Red Sea Petroleum Deposi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8: 8, August 1886: 502–507.
- Arrighi, Giovann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 Arrow, Kenneth J., and Gerard Debreu,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3, 1954: 265–290.
- Ayres, Robert U., and Benjamin Warr, 'Accounting for Growth: The Role of Physical Work',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6: 2, 2005: 181–209.
- Bamberg, James,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vol. 3: *British Petroleum and Global Oil, 1950–1975: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rber, Benjamin R., *Jihad vs McWorld: How Globalism and 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5.
- Barber, William J., 'Irving Fisher of Yal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4: 1, 2005: 43–55.
- Barry, Andrew,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thlone Press, 2001.
- 'Technological Zon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9: 2, 2006: 239–253.
- Batatu, Hanna,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 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London: Saqi Books, 2004.
- Beblawi, Hazem,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New York: Croom Helm, 1987.
- Beeby-Thompson, Arthur, *The Oil Fields of Russia*, London: Crosby Lockwood & Son, 1904.
- Beer, George Louis, 'The Future of Mesopotamia', in *African Quest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ith Papers on Egypt, Mesopotamia, and the Colonial Settlement*, ed. Louis Herbert Gray,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 Beinin, Joel, *Justice for All: The Struggle for Worker Rights in Egypt*, Washington, DC: Solidarity Center, 2010.
- Beinin, Joel,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ell, Danie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Bernstein, Michael A., *A Perilous Progress: Economics and Public Purpos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ialer, Uri, 'Fuel Bridge Across the Middle East: Israel, Iran, and the Eilat–Ashkelon Oil Pipeline', *Israel Studies* 12: 3, 2007: 29–67.
- Bill, James A., *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irnbaum, Eugene A.,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Gold*,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Dep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7.
- Blair, John Malcolm, *The Control of O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 Blewett, Neal, 'The Franchi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85–1918', *Past and Present* 32, December 1965: 27–56.
- Block, Fre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Bowden, Gar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idity in Estimates of US Crude Oil Reserv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5: 2, 1985: 207–240.
- Brailsford, Henry Noel, *After the Peace*, London: L. Parsons, 1920.
- *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 A Study of the Armed Peace*, 10th edn, London: G. Bell & Sons, 1918.
- Brand, Carl F., *British Labour's Rise to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The Attitude of British Labor toward President Wilson During the Peace Confer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2: 2, 1937: 244–255.
- Brandt, Adam, 'Technical Report 6: Methods of Forecasting Future Oil Supply', *UKERC Review of Evidence for Global Oil Depletion*, London: UK Energy Research Centre, 2009, available at www.ukerc.ac.uk.
- Bridge, Gav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Extractive Sector: Governing Resource-Bas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 3, 2008: 389–419.
- 'British Labor's War Aims: Text of a Statement Adopted at the Special 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 at Central Hall, Westminster, on December 28, 1917',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4: 123, 1918: 45–56.
- Bromley, Simon, *American Hegemony and World Oil*,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trol of World Oil',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0: 2, 2005: 225–255.
- Brown, Geoff, *Sabotage: A Study in Industrial Conflict*,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for Spokesman Books, 1977.
- Brown, Nathan, *Peasant Politics in Modern Egyp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Burke, Edmund, *Prelude to Protectorate in Morocco: Precolonial Protest and Resistance, 1860–19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Busch, Briton Cooper, *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 1894–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Verso, 2004.

- Cain, P. J., *Hobson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Callon, Michel,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Sociological Review, 1998.
-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ohn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86.
- Callon, Michel, Pierre Lascoumes and Yannick Barthe,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An Essay on Technical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 Cambel, Ali Bulent, ‘Energy’, *Science Journal* 3: 10, 1967: 57–62.
- Campbell, Colin J., and Jean H. Laherrère, ‘The End of Cheap Oil’, *Scientific American* 278: 3, March 1998: 78–83.
- Canning, Kathleen, *Languages of Labor and Gender: Female Factory Work in Germany, 1850–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arew, Anthony, *Labour Under the Marshall Plan: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Marketing of Management Scienc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de Cecco, Marcello,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oney and Empire*, 2nd ed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 Church, Roy A., Quentin Outram and David N. Smith, ‘The Militancy of British Miners, 1893–1986: Interdisciplinary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2: 1, Summer 1991: 49–66.
- Churchill, Randolph S., *Winston S. Churchill: Young Statesman 1901–1914*, London: Heinemann, 1967.
- Churchill, Winston,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8*, abridged and revised edn, London: Penguin, 2007.
- Citino, Nathan J., ‘Defending the “Postwar Petroleum Order”: The US, Britain and the 1954 Saudi–Onassis Tanker Deal’, *Diplomacy & Statecraft* 11: 2, 2000: 137–160.
- *From Arab Nationalism to OPEC: Eisenhower, King Sa’ud, and the Making of US–Saudi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Clarke, Keith C., and Jeffrey J. Hemphill, ‘The Santa Barbara Oil Spill: A Retrospective’, in Darrick Danta, ed., *Yearbook of the Association of Pacific Coast Geograph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Cleaver, William, ‘Wildcats in the Appalachian Coal Fields’, in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eds, *Midnight Notes, Midnight Oil: Work, Energy, War, 1972–1992*, Brooklyn: Autonomedia, 1992.
- Coatsworth, John H., ‘Welfa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1, February 1996: 1–12.
- Cocks, Frederick Seymour, *E. D. Morel: The Man and His Work*,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20.
- Cohen, Lizabeth, *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Cohen, Stuart A., *British Policy in Mesopotamia, 1903–1914*, Reading: Ithaca Press, 2008.
- Committee on the Royal Mint, Great Britain,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Royal Mint*, London: HMSO, 1849.
- Cooley, John K.,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2nd edn,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 Corbin, David, *Life, Work, and Rebellion in the Coal Fields: The Southern West Virginia Miners, 1880–1922*,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1.
- Cordovez, Diego, and Selig S. Harrison, *Out of Afghanista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Withdraw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oronil, Fernando, *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Crummey, D., *Banditry, Rebell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Africa*, Oxford: J. Currey, 1986.
- Curtis, Lionel,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Macmillan, 1915.
- Daly, Herman E., *Steady-State Economics: The Economics of Biophysical Equilibrium and Moral Growth*,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7.
- Daoudi, M. S., and M. S. Dajani, 'The 1967 Oil Embargo Revisite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3: 2, 1984: 65–90.
- Dasgupta, Partha, and Geoffrey Heal, *Economic Theor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Davis, Mike,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2001.
- Davis, Simon, *Contested Spac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Persian Gulf, 1939–1947*,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9.
- Deffeyes, Kenneth S., *Hubbert's Peak: The Impending World Oil Short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De Geer, Hans, 'Trading Companies in Twentieth-Century Sweden', in Geoffrey Jones, ed., *The Multinational Trad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De Grazia, Victor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Dennis, Michael Aaron, 'Drilling for Dollars: The Making of US Petroleum Reserve Estimates, 1921–25',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5: 2, May 1985: 241–265.
- DeNovo, John A., 'A Railroad for Turkey: The Chester Project, 1908–1913',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3: 3, 1959: 300–329.
-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1900–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3.
- Desrosières, Alain, 'Managing the Economy: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Statistics', in T.

- Porter and D.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53–564.
- Dirks, Nicholas, *The Hollow Crown: 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 2nd ed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 Disch, Lisa, ‘Representation as “Spokespersonship”’: Bruno Latour’s Political Theory’, *Parallax* 14: 3, August 2008: 88–100.
- Dix, Keith, *What’s a Coal Miner to Do? The Mechanization of Coal Mining*,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8.
- Dodge, Toby, *Inventing Iraq: The Failure of Nation-Building and a History Deni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hat Accounts for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Towards Iraq 1990–2003?’ Iraq Inquiry, 5 November 2009, available at www.iraqinquiry.org.uk.
- Dunning, Thad, *Crude Democracy: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Earle, Edward Mead, ‘The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 A Study in Oleaginous Diplom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9: 2, 1924: 269–275.
-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A Study in Imperi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 Edwards, P. K.,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97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 Eichengreen, Barry, ‘The British Economy Between the Wars’, in Rodrick Floud and Paul John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14–343.
-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Lessons of Bretton Woo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 Eichholtz, Dietrich, *Die Bagdadbahn, Mesopotamien Und Die Deutsche Ölpolitik Bis 1918: Aufhaltsamer Übergang Ins Erdölzeitalter: Mit Dokumenten*,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07.
- El Azhary, M. S., ‘The Attitudes of the Superpowers Towards the Gulf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59: 4, Autumn 1983: 609–620.
- Eley, Geoff,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Engdahl, William,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2nd edn,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 Engels, Friedrich, ‘The Bakunists at Work’,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ds, *Revolution in Spai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39 (First published in *Der Volksstaat*, 31 October, 2 and 5 November, 1873).
- Fagge, Roger, *Power,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Coalfields: West Virginia and South Wales, 1900–192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 Farouk-Sluglett, Marion, and Peter Sluglett, *Iraq Since 1958: 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 3rd edn, London: I. B. Tauris, 2001.
- Feis, Herbert, 'The Anglo-American Oil Agreement', *Yale Law Journal* 55: 5, 1946: 1,174–190.
- Ferrier, Ronald W.,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vol. 1: *The Developing Years: 1901–193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Forrestal, James,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Walter Millis and E. S. Duffield,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1.
- Foucault, Michel,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Frank, Alison Fleig,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Frankel, P. H., *Mattei: Oil and Power Politic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6.
- Frantz, Joseph H., and Valerie Jochen, 'Shale Gas White Paper', Schlumberger, 2005, available at www.slb.com.
- Fremdling, Rainer, 'Anglo-German Rivalry in Coal Markets in France,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1850–1913',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5: 3, 1996: 599–646.
- Fursenko, A. A., *The Battle for Oil: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Conflict over Petroleum, 1860–1930*, Greenwich: Jai Press, 1990.
- Galpern, Steven G., *Money, Oil, and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Sterling and Postwar Imperialism, 1944–197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Gates, Robert Michael, *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 Gavin, Francis J., *Gold, Dollars,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 Gelvin, James L.,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Gendzier, Irene, *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1945–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2006.
- Gerretson, Frederik Carel,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Dutch*, Leiden: E. J. Brill, 1953–1957.
- Gilmour, David, *Curzon: Imperial Statesman*, 1st US ed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3.
- Goldberg, Ellis, 'Peasants in Revolt – Egypt 19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4: 2, 1992: 261–280.
- Goldberg, Ellis, Erik Wibbels and Eric Mvukiyehe, 'Lessons from Strange Cases: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esource Curse in the US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4–5, 2008: 477–514.

- Goldman, Marshall I., 'The Soviet Union', in Raymond Vernon, ed., *The Oil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76.
- Goodrich, Carter, *The Miner's Freedom: A Study of the Working Life in a Changing Industry*, Boston: Marshall Jones Co., 1925.
- Graham, Benjamin, *Storage and Stability: 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37.
- Graham-Brown, Sarah, *Sanctioning Saddam: 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in Iraq*, London: I. B. Tauris/MERIP, 1999.
- Greenpeace, *Decentralising Power: An Energy Reserve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5, available at www.greenpeace.org.uk.
- Greenspan, Al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London: Penguin, 2007.
- Grieb, Kenneth J., 'Standard Oil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alifornia Historical Quarterly* 50: 1, 1971: 59–71.
- Grovogui, Siba N., *Sovereigns, Quasi Sovereigns, and Africans: Ra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Guerrien, Bernard, 'Is there Anything Worth Keeping in Standard Microeconomics?'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2, 2002: Article 1.
- Gulliford, Andrew, *Boomtown Blues: Colorado Oil Shale, 1885–1985*,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89.
- Haberl, Helmut, 'The Global Socioeconomic Energetic Metabolism as a Sustainability Problem', *Energy* 31: 1, 2006: 87–99.
- Hakimian, Hassan, 'Wage Labor and Migration: Persian Workers in Southern Russia, 1880–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7: 4, 1985: 443–462.
- Halliday, Fred, 'Trade Unions and the Working Class Opposition', *MERIP Reports* 71, October 1978: 7–13.
- Hanak, H.,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Historical Research* 36: 94, 1963: 168–180.
- Hansen, James, Makiko Sato, Pushker Kharecha, Gary Russell, David W. Lea and Mark Siddall, 'Climate Change and Trace Gas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5, 2007: 1925–1954.
- Harrison, Royden, ed., *Independent Collier: The Coal Miner as Archetypal Proletarian Reconsider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78.
- 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yek, F. A., 'A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 *Economic Journal* 53: 210/211, June–September 1943: 176–184.
- Hazlitt, Henry, *Will Dollars Save the Worl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47.
- Hecht, Gabrielle, *The Radiance of France: Nuclear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 Henry, James Dodds, *Baku: An Eventful History*,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1905].
- Hewins, Ralph, *Mr Five Per Cent: The Story of Calouste Gulbenkian*,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1958.
- Hicks, John, *Value and Capi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Vintage, 1989.
- Hobson, J. A.,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James Nisbet & Co., 1902.
-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s and Effects*, London: James Nisbet & Co., 1900.
- *Toward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15.
- Hoch, Myron L., 'The Oil Strike of 1945',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5: 2, 1948: 117–133.
- Holter, Darryl, *The Battle for Coal: Miner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zation in France, 1940–1950*,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ottelling, Harold,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2, 1931: 137–175.
- Houtsma, M. Th., A. J. Wensinck and T. W. Arnold,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A Dictionary of the Geography, Ethnography and Biography of the Muhammadan Peoples*, Leiden: E. J. Brill, 1913–1936.
- Hubbert, M. King, *Nuclear Energy and the Fossil Fuels*, Houston: Shell Development Company (Publication 95), 1956.
- Hull, Edward, *The Coal-Fields of Great Britain: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and Duration, With Notices of the Coal-Fields of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61.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ed. 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ntanuki,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 Hyslop, Jonathan, 'Martial Law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Jan Smuts and the "Solid Guarantee of Force", 1899–1924',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2: 2, 2009: 234–268.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2007, available at www.ipcc.ch.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8*, New Milford: Turpin Distribution, 2008.
- 'International No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1, 1920: 120–154.

- Jack (Kent), Marian, 'The Purchas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Shares in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1912-1914', *Past and Present* 39: 1, April 1968: 139-168.
- Jacobs, Mathew, 'The Perils and Promise of Isl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Middle East in the Early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30: 4, 2006: 705-739.
- Jaggers, Keith, and Ted Robert Gurr, 'Tracking Democracy's Third Wave with the Polity III Dat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2: 4, 1995: 469-482.
- Jevons, H. Stanley, *The British Coal Trade*, London: E. P. Dutton, 1915.
- Jevons, William Stanley,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London: Macmillan, 1865.
- Jones, Charles O., and Randall Strahan, 'The Effect of Energy Politics on Congressional and Executive Organization in the 1970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0: 2, 1985: 151-179.
- Jones, Geoffrey, *The St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Oil Industry*, London: Macmillan, 1981.
- Jorgenson, Dale W., ed., *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vit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9.
- Kanafani, Ghassan, *The 1936-39 Revolt in Palestine*, New York: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Palestine, 1972.
- Kandiyoti, Rafael, *Pipelines: Flowing Oil and Crude Politics*, London: I. B. Tauris, 2008.
- Kane, N. Stephen, 'Corporate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Efforts of American Oil Companies to Influenc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Mexico, 1921-1928', *Diplomatic History* 1: 2, 1977: 170-198.
- Kanefsky, John W., 'Motive Power in British Industry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1870 Factory Retur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2: 3, 1979: 360-375.
- Karl, Terry Lynn,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Karsh, Efraim, 'Military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Goals: The Iran-Iraq War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 1, Winter 1987/8: 83-95.
- Keeling, Charles D., 'Rewards and Penalties of Monitoring the Earth',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3, 1988: 25-82.
- Kent, Marian, 'Agent of Empire? The National Bank of Turkey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18: 2, 1975: 367-389.
- *Moguls and Mandarins: Oil,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London: Frank Cass, 1993.
- *Oil and Empire: British Policy and Mesopotamian Oil, 1900-1920*, London: Macmillan, 1976.
- Kerr, Clark, and Abraham Siegel,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Arthur Kornhauser, Robert Dubin and Arthur M. Ross, eds,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34: 189-212.

- Keynes, John Maynard,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London: Macmillan, 1913.
-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ed. Donald Moggridge, London: Macmillan, 1971–1989.
-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A Centenary Allocation on His Life and Work as Economist and Statisticia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99: 3, 1936: 516–555.
- al-Khafaji, Isam, *Tormented Births: Passages to Modernity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2004.
- Khalidi, Rashid, *Resurrecting Empire: Western Footprints and America’s Perilous Path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2004.
-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 Khalidi, Walid, ed., *From Haven to Conquest: Readings i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Until 1948*,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71.
- Kimball, Jeffrey, ‘The Nixon Doctrine: A Saga of Misunderstanding’,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6: 1, 2006: 59–74.
- Klare, Michael,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 *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
- Klein, Naomi,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Lane, 2007.
- Knaack, Marcelle Size, *Encyclopedia of US Air Force Aircraft and Missile Systems*, vol. 1,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78.
- Knights, Mark,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Knock, Thomas J.,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Kuznets, Simon, Lillian Epstein and Elizabeth Jenks,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1938*,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1.
- Ladjevardi, Habib, *Labor Unions and Autocracy in Ira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Laslett, John H. M., *Colliers Across the S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ass Formation in Scotland and the American Midwest, 1830–1924*,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 ‘State Policy Towards Labour and Labour Organizations, 1830–1939: Anglo-American Union Movements’, in Peter Mathias and Sidney Pollard,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8: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95–548.
- Latour, Bruno,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ee, P. J.,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Estimating Petroleum Resour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Leith-Ross, Frederick,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Egy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28: 1, 1952: 29–37.
- Lenin, V. I.,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ing, 1960.
- Levinson, Marc,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inden, H. R., 'The Evolution of an Energy Contrarian',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1, 1996: 31–67.
- Lippmann, Walter,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1947.
- List, Friedrich,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 G. A. Matile, Philadelphia: J. P. Lippincott, 1856 [1841].
- Little, Douglas, 'Cold War and Covert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yria, 1945–1958', *Middle East Journal* 44: 1, 1990: 51–75.
- 'Mission Impossible: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Covert A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Diplomatic History* 28: 5, 2004: 663–701.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A Cold War 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4, 2010: 63–98.
- Lockman, Zachary,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Lohmann, Larry, *Carbon Trading: A Critical Convers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ivatisation and Power*,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48, September 2006.
- Long, David, *Towards a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J. A. Hobs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Longrigg, Stephen Hemsley, *Oil in the Middle East: Its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Louis, William Roger,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Scramble for Empire, Suez and Decolonization: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I. B. Tauris, 2006.
- Lowi, Theodore J., 'The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We Become What We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 1992: 1–7.
- Lugard, Frederick,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5th edn,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65.
- Luxemburg, Rosa,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a translation of *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 1906), Detroit: Marxist Educational Society, 1925.
- Mabro, Robert, 'OPEC and the Price of Oil', *Energy Journal* 13: 2, 1992: 1–17.

- MacKenzie, Donald,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 *Statistics in Britain, 1865–193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 MacKenzie, Donald, Fabian Muniesa and Lucy Siu, eds,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ckenzie King, William Lyon, *Industry and Humanity: A Study in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8.
- Madureira, N. L., 'Oil in the Age of Steam',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 1, 2010: 75–94.
- Magoon, L. B., and J. W. Schmoker, 'The Total Petroleum System – the Natural Fluid Network that Constrains the Assessment Unit', in *US Geological Survey Digital Data Series 60*, 2000.
- Mahaim, Ernest, and Harald Westergaard, 'The General Strike in Belgium, April 1902', *Economic Journal* 12: 47, 1902: 421–430.
- Mahdavy, Hussein, 'The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ntier States: the Case of Iran',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allet, Serge, *Essays 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5.
- *The New Working Class*,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for Spokesman Books, 1975.
- Mamdani, Mahmood,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anela, Erez,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ntena, Karuna,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Marks, Shula, and Stanley Trapido, 'Lord Milner and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History Workshop* 8, 1979: 50–80.
- Marshall, Alfred,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n, London: Macmillan, 1920.
- Maunsell, F. R., 'The Mesopotamian Petroleum Field', *Geographical Journal* 9: 5, 1897: 528–532.
- Mayer, Arno J., *Wilson vs Lenin: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New Diplomacy, 1917–1918*,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 McCarthy, Tom, *Auto Mania: Cars, Consumers,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cCloskey, Deirdre, 'Yes, There Is Something Worth Keeping in Microeconomics',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5: 4, 2002.
- McFarland, Andrew S., 'Energy Lobbies',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9, 1984: 501–527.

- Meadows, Donella H.,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 Mehrling, Perry, 'Retrospectives: Economists and the Fed: Beginn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4, 2002: 207–218.
- Meredith, Martin, *Diamonds, Gold, and War: The British, the Boers, and 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 Miller, Geoffrey, *Straits: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Press, 1997.
- Milne, Seumas, *The Enemy Within: 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Miners*, 3rd edn, London: Verso, 2004.
- Milner, Alfred, *England in Egypt*, 11th ed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4.
- Mirowski, Philip,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irowski, Philip, and Dieter Plehwe, eds, *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itchell, Timothy,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eorge Steinmetz, ed.,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The Work of Economics: How a Discipline Makes Its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 2, 2005: 297–320.
- Monroe, Elizabeth, *Philby of Arabia*, Reading: Ithaca Press, 1998.
- Morel, E. D.,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1904.
- *Morocco in Diplomacy*,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912.
- *Red Rubber: 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Flourishing on the Congo in the Year of Grace 1906*,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6.
- Morgan, Mary S., *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ortimer, Joanne Stafford,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German Diplomacy in the Agadir Crisis', *Historical Journal* 10: 4, 1967: 440–456.
- Mosley, Leonard, *Gideon Goes to War*, London: Arthur Baker, 1955.
-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 Muttig, Greg, *Fuel on the Fire: Oil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Iraq*, London: Bodley Head, 2011.
- Nalbantian, Tsolin, 'Fashioning Armenians in Lebanon, 1946–1958',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0.

- Neatby, H. Blair,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in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Online*, at www.biographi.ca.
- von Neumann, John, 'John von Neumann on Technological Prospects and Global Limi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2: 1, March 1986 [1955]: 117–126.
- Neville, Robert G., 'The Courrières Colliery Disaster, 19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 1978: 33–52.
- Nitzan, Jonathan, and Shimshon Bichler,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 Nowell, Gregory, *Mercantile States and the World Oil Cartel, 1900–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Nuvolari, Alessandro, 'Collective Invention During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the Cornish Pumping Engin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3, 2004: 347–363.
- Nuvolari, Alessandro, and Bart Verspagen,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British Steam Engineering, 1800–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2, 2009: 685–710.
- Nuvolari, Alessandro, Bart Verspagen and Nick von Tunzelmann, 'The Early Diffusion of the Steam Engine in Britain, 1700–1800: A Reappraisal', *Cliometrica*, 2011: 1–31.
- Nye, David E., *Consuming Power: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Energ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 Odell, Peter R., *Oil and World Power*, 5th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 Okruhlik, Gwenn, 'Networks of Dissent: Islamism and Reform in Saudi Arabia', *Current History* 101: 651, 2002: 22–28.
- Olusoga, David, and Casper W. Erichsen, *The Kaiser's Holocaust: Germany's Forgotten Genocide and the Colonial Roots of Nazism*,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 Oppenheim, Lassa,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ed. Ronald F. Roxburgh,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20.
- Orwell, George, 'You and the Atomic Bomb' (1945), in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eds,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 4: *In Front of Your Nose, 1945–195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6–10.
- Painter, David S., 'Oil and the Marshall Pla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8: 3, 1984: 359–383.
- *Oil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Foreign Oil Policy, 1941–195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The Marshall Plan and Oil', *Cold War History* 9: 2, 2009: 159–175.
- Parker, Richard B., ed., *The October War: A Retrospectiv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 Parra, Francisco, *Oil Politics: 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 London: I. B. Tauris, 2004.
- Peart, Sandra J., '“Facts Carefully Marshallled”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William Stanley Jevon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3, 2001 (annual supplement): 252–276.

- Pedersen, Susan, 'The Failure of Feminism in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Radical History Review* 43, 1989: 86–110.
- Penrose, Edith, and E. F. Penrose, *Iraq: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Ernest Benn, 1978.
- Petersen, Tore T., *Richard Nix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ignment in the Persian Gulf: Making Allies out of Client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9.
- Podeh, Elie, 'Making a Short Story Lo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ez–Mediterranean Oil Pipeline in Egypt, 1967–77',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8: 1, 2004: 61–88.
- Podobnik, Bruce, *Global Energy Shifts: Fostering Sustainability in a Turbulent A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 Polanyi, Karl,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Glencoe: Free Press, 1957.
- Polasky, Janet L., 'A Revolution for Socialist Reforms: The Belgian General Strik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 3, 1992: 449–466.
- Pollard, Sidney,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orter, Theodore, 'Locating the Domain of Calculation',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1: 1, 2008: 39–50.
-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otter, Pitman B., 'Origin of the System of Mandates Und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 4, November 1922: 563–583.
- Pouget, Émile, *Le Sabotage*, Paris: M. Rivière, 1911 [1909], English translation: *Sabotage*, Chicago: C. H. Kerr & Co., 1913.
- Qaimmaqami, Linda Wills, 'The Catalyst of Nationalization: Max Thornburg and the Failure of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alism in Iran, 1947–51', *Diplomatic History* 19: 1, 1995: 1–31.
- Quam-Wickham, Nancy Lynn, 'Petroleocrats and Proletarians: Work,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California Oil Industry, 1917–1925',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 Quataert, Donald, *Miners and the State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Zonguldak Coalfield, 1822–192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
- *Workers, Peasant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1730–1914*, Istanbul: Isis Press, 1993.

- Radice, Hugo, 'The National Economy: A Keynesian Myth?' *Capital and Class* 8: 1, 1984: 111–140.
- al-Rafi'i, Abd al-Rahman, *Thawrat sanat 1919: Tarikh misr al-qawmi min sanat 1914 ila sanat 1921*, 2 vols: Cairo: Maktabat al-Nahda al-Misriya, 1955.
- Rancière, Jacques,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5.
- Rand, Christopher T., *Making Democracy Safe for Oil: Oilmen and the Islamic Eas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5.
- Randall, Stephen J., *United States Foreign Oil Policy, 1919–1948: For Profits and Security*,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edish, Angela, 'The Evolution of the Gold Standard in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4, December 1990, 789–805.
- Rees, Jonathan, *Representation and Rebellion: The Rockefeller Plan at the Colorado Fuel and Iron Company, 1914–1942*, Boulder, CO: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0.
- Reifer, Thomas E., 'Labor, Race and Empire: Transport Workers and Transnational Empires of Trade, Production, and Finance', in Gilbert G. Gonzalez, Raul Fernandez, Vivian Price, David Smith and Linda Tinh Vo, eds, *Labor Versus Empire: Race, Gender, and Mi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17–36.
- Retort (Iain Boal, T. J. Clark, Joseph Matthews and Michael Watts), *Afflicted Powers: Capital and Spectacle in a New Age of War*, New York: Verso, 2005.
- Revelle, R., W. Broecker, H. Craig, C. D. Keeling and J. Smagorinsky,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in *Restoring the Quality of our Environment: Repor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anel*, Washington: White Hous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November 1965: 111–133.
- Rimlinger, G. V., 'Labour and the State on the Continent, 1800–1939', in Peter Mathias and Sidney Pollard,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8: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Rippy, Merrill, *Oil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1972.
- Robelius, Fredrik, 'Giant Oil Fields – The Highway to Oil: Giant Oil Fields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Future Oil Production',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Uppsala University, March 2007, available at publications.uu.se.
- Ross, Michael L.,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3: 3, April 2001: 325–361.
- Rosser, Andrew, 'Escap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e Case of Indone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7: 1, 2007: 38–58.

- Rubin, Barnett R., *The Fragmentation of Afghanistan: State Formation and Collap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2nd ed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Ruotsila, Markku, 'The Great Charter for the Liberty of the Workingman: Labour, Liberal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LO', *Labour History Review* 67: 1, 2002: 29–47.
- Rutledge, David, 'Estimating Long Term World Coal Production with Logit and Probit Trans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Geology* 85: 1, 2011: 23–33.
- Sabin, Paul, *Crude Politics: The California Oil Market, 19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Sachs, Jeffrey D., and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517a, Cambridge, MA: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5.
- Sadowski, Yahya M., *Political Vegetables? Businessman and Bureaucr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yptian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 Salamé, Ghassan, ed.,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The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London: I. B. Tauris, 1994.
- Sampson, Anthony, *The Arms Bazaar*,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7.
- *The Seven Sisters: 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5.
- Samuelson, Paul A.,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Sartre, Jean-Paul,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 1: *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London: Verso 1977.
- Satia, Priya, 'Developing Iraq: Britain, India and the Redemption of Empi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ast and Present* 197: 1, 2007: 211–255.
- Saul, Samir, 'Masterly Inactivity as Brinkmanship: The Iraq Petroleum Company's Route to Nationalization, 1958–1972',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9: 4, 2007: 746–792.
- Schabas, Margaret, 'The "Worldly Philosophy" Of William Stanley Jevons', *Victorian Studies* 28: 1, 1984: 129–147.
- Schlesinger, James, 'The Airlift', in Richard B. Parker, ed., *The October War: A Retrospectiv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 Schorske, Carl 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chulze, Reinhard, *Die Rebellion Der Ägyptischen Fallahin 1919*, Bonn: Ballbek Verlag, 1981.
- Schumacher, E. F.,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 Schumpeter, Joseph, 'The Common Sense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al* 1, January 1933: 5–12.

- Schwarz, Solomon 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Bolshevism and Menshevism*, transl. Gertrude Vak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Searle, G. R., *A New England? Peace and War, 1886–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 Serres, Michel, *The Parasi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 Service, Robert,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eymour, Ian, *OPEC: Instrument of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 Shafiee, Katayoun, 'Cracking Petroleum with Politics: Anglo-Persian Oil and the Socio-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of Iran, 1901–54',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2010.
- Sheail, John, 'Torrey Canyo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 3, 2007: 485–504.
- Shields, Sarah, *Mosul Before Iraq: Like Bees Making a Five-Sided Ce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 Shubert, Adrian, *The Road to Revolution in Spain: The Coal Miners of Asturias, 1860–193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 Sieferle, Rolf Peter, *The Subterranean Forest: Energy System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K: White Horse Press, 2001.
- 'Why Did Industrialization Start in Europe (and Not in China)?' Rolf Peter Sieferle and Helga Breuninger, eds, *Agricultur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urope*, Stuttgart: Breuninger Stiftung, 2003: 7–89.
- Silver, Beverly J.,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kidelsky, Robert,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 *The Economist as Saviour, 1920–1937*, London: Macmillan, 1992.
- Sluglett, Peter, *Britain in Iraq: Contriving King and Country, 1914–193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mil, Vaclav, *Energy in Nature and Society: General Energetics of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 'America's Oil Imports: A Self-Inflicted Burde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4: 4, 2011: 712–716.
-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Methuen, 1950 [1776].
- Smith, James Allen,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 Smuts, Jan Christiaa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 Practical Suggestion', in John Dugard, ed., *The South West Africa/Namibia Dispute: Documents and Scholarly Writings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Selections from the Smuts Papers*, 7 vols, W. K. Hancock and Jean Van Der Poel,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öderbergh, Bengt, 'Canada's Oil Sands Resources and Its Future Impact on Global Oil Supply', MSc degree project, Systems Engineering, Uppsala University, 2005.
- Solow, Robert M., 'The Economics of Resources or 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2, 1974: 1–14.
- Soltau, Irene C.,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Leban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3, 1949: 307–317.
- Sorel, Georges,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transl. Thomas Ernest Hulme,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4.
- Sorrell, Steve, *Global Oil Depletion: An 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for a Near-Term Peak in Oil Production*, UK Energy Research Centre, 2009, available at www.ukerc.ac.uk.
- Spring, D. W., 'The Trans-Persian Railway Project and Anglo-Russian Relations, 1909–14',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54: 1, 1976: 60–82.
- Stabile, Donald R., 'Veble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ngineer: The Radical Thinker and Engineering Leaders Came to Technocratic Ideas at the Same Tim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5: 1, 1986: 41–52.
- Stead, W. T., *Methods of Barbarism: The Case for Intervention*, London: Mowbray House, 1901.
- Steinhouse, Adam,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Post-Liberation Franc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1.
- Stevens, Paul, 'Pipelines or Pipe Dreams?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Arab Transit Pipelines', *Middle East Journal* 54: 2, 2000: 224–241.
- Stewart, Rory, *Occupational Hazards: My Time Governing in Iraq*, London: Picador, 2006.
- Stivers, William, *Supremacy and Oil: Iraq, Turkey, and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Order, 1918–193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Stocking, George W., *Middle East Oil: A Study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versy*,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0.
- Stoff, Michael B., 'The Anglo-American Oil Agreement and the Wartime Search for Foreign Oil Polic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5: 1, 1981: 59–74.
- Stokes, Raymond G., *Opting for Oi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West German Industry, 1945–19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tork, Joe, *Middle East Oil and the Energy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 'Oil and the Penetration of Capitalism in Iraq', in Petter Nore and Terisa Turner, eds,

- Oil and Class Struggle*, London: Zed Press, 1980.
- Strunk, William, 'The Reign of Shaykh Khaz'al Ibn Jabir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rincipality of Arabistan',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1977.
- Sumi, Lisa, *Our Drinking Water at Risk: What EPA and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Don't Want Us to Know About Hydraulic Fracturing*, Washington, DC: Oil and Gas Accountability Project, April, 2005, available at www.earthworksaction.org.
- Suny, Ronald Grigor, 'A Journeyman for the Revolution: Stalin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in Baku, June 1907–May 1908', *Soviet Studies* 23: 3, 1972: 373–394.
-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2nd ed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essler, Mark, and Amaney Jamal, 'Political Attitude Research in the Arab Worl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9: 3, 2006: 433–437.
- Thomas, Paul,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4.
- Thompson, Elizabeth, *Colonial Citizens: Republican Rights, Paternal Privilege, and Gender in French Syria and Leban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Throntveit, Trygve, 'The Fable of the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35: 3, June 2011: 445–481.
- Tilly, Chris, and Charles Tilly, *Work Under Capi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 Tobin, James, 'Irving Fisher (1867–1947)', in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87.
- Tolf, Robert W., *The Russian Rockefellers: The Saga of the Nobel Family and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6.
- Tooze, J. Adam, 'Imagining National Econom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1900–1950', in Geoffrey Cubitt, ed., *Imagining N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ribe, Keith,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Strategies of Economic Order: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95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vedt, T., 'Why England and Not China and India? Water System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 1, 2010: 29–50.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07*,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7.
- Vassiliev, Alexei,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 ‘On the Nature of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1, 1908: 104–136.
-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5.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Peace and the Terms of Its Perpetu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 *O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Sabotage*, New York: Oriole Chapbooks, 1919.
-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New York: Oriole Chapbooks, 1919.
-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B. W. Huebsch, 1921.
- Vietor, Richard H. K., *Energy Policy in America since 1945: A Study of Business Government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Visser, Reidar, *Basra, the Failed Gulf State: Separatism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rn Iraq*,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 Vitalis, Robert, *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2nd edn, London: Verso, 2009.
- al-Wardi, Ali, *Lamahat ijtimai’i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6 vols, vol. 5: *Hawla thawrat al-‘ishrin*, 2nd edn, London: Kufan, 1991.
- Watts, Michael, ‘Resource Curse? Governmentality, Oil and Power in the Niger Delta, Nigeria’, *Geopolitics* 9: 1, 2004: 50–80.
- Werth, Alexander, *France, 1940–1955*, New York: Henry Holt, 1956.
- Williams, Beryl, ‘1905: The View from the Provinces’, in Jonathan Smele and Anthony Haywood, ed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London: Routledge, 2005.
- Williamson, Harold F., *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dustry*, 2 vol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9.
- Wilson, Arnold Talbot, *Persia: A Political Officer’s Diary, 1907–191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Winkler, Henry J., ‘British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of Colonial Trusteeship, 1914–1919’, *Historian* 13: 2, 1951: 154–172.
- Woodward, David R., ‘The Origins and Intent of David Lloyd George’s War Aims Speech’, *Historian* 34: 1, November 1971, 22–39.
- Wright, John, *Libya: A Modern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Wright, Quincy, ‘The Mosul Disput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 3, July 1926: 453–464.
- Wrigley, E. A., *Poverty, Progress, and Popul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Wriston, Henry M., ‘Institute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 4, 1926: 852–860.
- Yaqub, Salim,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nd the Middle East*,

-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 Yates, Douglas A., *The Rentier State in Africa: Oil Rent Dependency and Neocolonialism in the Republic of Gabon*,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6.
-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 Zelizer, Viviana A.,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Pin Money, Paychecks, Poor Relief and Other Curren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Zittel, Werner, and Jörg Schindler, 'Coal: Resources and Future Production', EWG Paper no. 1/01, 10 July 2007, at www.energywatchgroup.org.
- Zupnick, Elliot, 'The Sterling Area's Central Pooling System Re-Examin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1, 1955: 71–84.

索引

(数字对应英文版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 “n” 后数字代表脚注编号)

- Abadan 阿巴丹 54, 91, 107, 144, 237
- Abu Dhabi 阿布扎比 175
- Aburish, Saïd K. 萨义德·K. 阿布里什 211n16, 213n23
- Adelman, Morris 莫里斯·阿德尔曼 168, 181, 188
- Admiralty 海军部。参 Royal Navy 皇家海军
- Afary, Janet 珍妮特·阿弗雷 64n48
- Afghanistan 阿富汗 200, 201, 204, 215, 217-221
-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非洲人国民大会 73
- Agriculture 农业
and industrialisation ~与工业化 16, 140-141
亦参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 Akins, James E. 詹姆斯·E.埃金斯 150, 181, 190
- Alaska 阿拉斯加 170, 186, 191
- Albright, Madeleine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217n32
- Algeciras Conference (1906)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1906年) 74-75, 83-84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44, 151, 165n58, 166, 175, 201
- Alinsky, Saul 索尔·阿林斯基 178
- Allon plan 阿隆计划 219
- Altwater, Elmar 埃尔马尔·阿尔特法特 7n15
-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美国银行家协会 171
-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美国经济学会 132
-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美国石油学会 188, 190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美国哲学协会 242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24
- Anatolian Railway 阿纳托利亚铁路。参 Baghdad Railway 巴格达铁路
- Andrews, Thomas 托马斯·安德鲁斯 25n38
- Anglo-American Petroleum Agreement (1944) 英美石油协定 (1944年) 118, 123, 142
-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英伊石油公司 142, 144-146。亦参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英波石油公司; BP 英国石油公司
-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英波石油公司 50-68, 89, 94, 107。亦参 BP 英国石油公司
- Arab Barometer project 阿拉伯晴雨表项目 3-4
- Arab Revolt (1936-1939) 阿拉伯人起义 (1936-1939年) 104
- Arab uprisings of 2011 2011 年阿拉伯民众起义 1, 11, 221, 226-229
- Aramco (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 阿美石油公司 (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104, 114-115, 164n53, 169, 208, 210-213, 247
and racial division of labour ~与其对劳工的种族划分 106, 211
- Armenia 亚美尼亚 80
- arms trade 军火贸易 155-162, 183, 187, 214
and dollar recycling ~与美元的回流 155-162
- Arrow-Debreu model 阿罗-德布鲁模型 140
-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亚细亚火油公司 53
- Aswan Dam 阿斯旺水坝 49
- al-Atiqi, Abdul Rahman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提基 184
- Attiga, Ali 阿里·阿提加 185, 185n38
-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18

- Ayres, Robert U. 罗伯特·U. 艾尔斯 140n67
Azores 亚速尔群岛 183, 185n38
- Baghdad Railway 巴格达铁路 54-58, 74, 103
Bahrain 巴林 164, 227
Baku oil industry 巴库石油工业 33-36, 46-54, 64, 69, 88
Bakunin, Mikhail 米哈伊尔·巴枯宁 24n33
Bambatha rebellion (1906) 巴姆巴塔起义 (1906年) 72
Barber, Benjamin 本杰明·巴伯 203
Basra 巴士拉 58, 87, 91, 103, 147-148, 151, 225
Batumi 巴统 33, 36, 50
Beer, George 乔治·比尔 83
Belgium 比利时 19
 general strike in ~发生的总罢工 24
Ben Ali, Zine el Abidine 宰因·阿比丁·本·阿里 227
Berlin Act of 1885 1885年《柏林会议总议定书》73, 77
Bichler, Shimshon 希姆申·比希勒 156n32
Bin Laden, Osama 奥萨马·本·拉登 200, 204, 221
Birnbaum, Eugene 尤金·伯恩鲍姆 171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21
Black Hundreds 黑色百人团 35
Block, Fred 弗雷德·布洛克 171n73
BMW 宝马 42
Boer republics 布尔共和国。参 South Africa and Afrikaner republics 南非和阿非利卡人共和国
Boer Wars 英布战争。参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南非战争 (1899-1902年)
Bolivia 玻利维亚 113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33-34, 68-69
BP (British Petroleum) 英国石油公司 5, 43-44, 146-151, 189, 206
Brailsford, Henry Noel 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 73-76, 83-84
Brazil 巴西 231-232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 109-112, 123, 155, 171
Brezhnev, Leonid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182, 182n28
Bridge, Gavin 加文·布里奇 7n16
British National Party 英国国家党 235-236
British Petroleum 英国石油公司。参 BP 英国石油公司
Bromley, Simon 西蒙·布罗姆利 41n79
Brower, David 大卫·布劳尔 191
Brown, Harrison 哈里森·布朗 177n10
Brzezinski, Zbigniew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218
Burma 缅甸 46
Burmah Oil 缅甸石油 46-59
Bush, George W. 乔治·W. 布什 219-220, 223
-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27, 31, 70
California-Arabian Standard Oil Company 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参 Aramco 阿美石油
Callon, Michel 米歇尔·卡龙 7n16, 238n14
Caltex oil refinery 加德士炼油厂 152
Cambodia 柬埔寨 160
Canada 加拿大 206
capitalists 资本家 41n79, 49, 70-71, 101
carbon democracy 碳民主 1, 4-6, 9-11, 17-18, 123, 143, 156, 193, 253-254
 and Islam ~与伊斯兰 200
carbon energy 碳能源。参 energy 能源
carbon trading 碳交易 197
cartels 卡特尔。参 oil firms and monopoly power 石油公司和垄断权力
Cassel, Ernest 欧内斯特·卡塞尔 49, 57-58, 75
Cecil, Edward 爱德华·塞西尔 49
Chartist movement 宪章运动 23
Chase Manhattan Bank 大通曼哈顿银行 171
Chester, Colby M. 科尔比·M. 切斯特 56-57
Chester Concession 切斯特特许权项目 56-57, 96n34
Chiah Surkh 恰赫苏尔赫 50
China 中国 12, 16, 83-84, 146, 206, 218, 222, 232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23, 44, 60-65, 76, 93, 96, 115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情局(中央情报局) 149, 212-213, 217n31
Iranian coup ~与伊朗政变 107-108
Syrian coup ~与叙利亚政变 105
Citraen 雪铁龙 41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6-7, 140, 190, 194, 233
calculation of 计算~ 241-246
Club of Rome 罗马俱乐部 189
coal 煤炭 7-43
and autonomy of miners ~与矿工自治 20-21
and calculation ~与计算 6, 127-130
comparisons to oil ~与石油的比较 37, 39-42
consumption of 对~的消费 37n74
and depletion of reserves ~与储备枯竭 124, 128-130
and imperialism ~与帝国主义 84
as mechanical power 作为机械动力的~ 13
mining of 开采~ 19, 19n14, 36-39
and population growth ~与人口增长 14-15
transition to oil from 从~转向石油 12-15, 31-36
transportation of ~的运输 37, 37n72, 37n73
coal industry 煤炭工业 193
Cold War 冷战 10, 115, 122-123, 158-168, 245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参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248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Pétroles (Total) 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石油) 95n30, 97n36, 147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被统治者的同意 9, 79-80, 92-94, 98-100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1905-1911 (Iran) 1905-1911 年宪政革命(伊朗) 64
containerisation 集装箱化 154-155
Cordovez, Diego 迭戈·科多韦斯 218n36
Cornwall 康沃尔 13, 38, 72
Coronil, Fernando 费尔南多·克罗尼尔 2n2
corporation, history of 公司的历史 207。亦参 oil firm 石油公司

Courrières colliery disaster 库里耶尔矿难 23
Cox, Sir Percy 珀西·考克斯爵士 88-89, 92, 96
cracking (pyrolysis) 裂化(热裂解) 249-251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204
Curaçao 库拉索 5
Curzon, Lord 寇松勋爵 52-53, 89, 95
D'Arcy, William Knox 威廉·诺克斯·达西 50-59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130
Dawes Committee 道斯委员会 136
democracy 民主
as assembled machinery 作为被装配起来的机制的~ 9, 109
and collective life ~与集体生活 241
and crisis ~与危机 173, 177
and expertise ~与专家知识 192, 240-241
and the general strike ~与总罢工 8, 12-14, 23-27, 42, 254
as idea 作为理念的~ 1-2, 21, 85
and imperialism ~与帝国主义 15-18, 101
and militarism ~与军国主义 187, 220-226, 253
and oil ~与石油 4-5, 43, 66, 109, 142-143
as struggle for material resources 作为争取物质资源的斗争的~ 73-76
translation into 'self-determination' 被译为“自决”的~ 67-72, 84-85
亦参 democratisation 民主化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175
democratisation 民主化 3-4, 224, 241
and labour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与“一战”后的劳工 76-85
and neoliberalism ~与新自由主义 224-228
resistance to 对~的抗拒 4
and vulnerability ~与脆弱性 146
Deobandi school 迪奥班德派 202
Department of Energy 美国能源部 197, 243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美国内政部 179
Desertec 沙漠科技 238
Deutsche Bank 德意志银行 32, 46-59, 94

- development 发展 86, 100-101, 114-115, 122, 125
 as separate development 用于“分别发展”之意 82-85, 120-121
- Dhahran 宰赫兰 121, 208, 211, 237
- Díaz, Porfirio 波菲里奥·迪亚斯 64
- Dinshaway 丁舍瓦伊事件 73, 73n17
- Dumbarton Oaks 敦巴顿橡树园 112
- Eastern and African Concessions Syndicate 东方
 与非洲特许权辛迪加 49
- economics 经济学 134, 138, 247-248
 calculation ~计算 234-235, 246-254
 and eugenics ~与优生学 130-133
 and market ~与市场 11, 173-177, 184-186
 and natural resources ~与自然资源 131-133,
 194-199, 234-235, 248-254
 and oil ~与石油 246-254
- economy, the 经济 109, 123-127, 132-136, 144,
 175-177, 189, 192, 194, 234, 249-251, 253
 and circulation of money ~与资金流通
 134-139, 247-248
 emergence of ~的出现 9, 123-127, 132-139
 and energy ~与能源 139-143
 as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作为治理机制
 的~ 109
 and nature-society divide ~与自然-社会的划
 分 241
 as object of development 作为发展目标的~ 101
- Eddy, William 威廉·埃迪 120, 212
- Egypt 埃及 17, 119, 151, 158, 164-165, 181-183,
 187, 201-203, 211-215, 218, 221, 226-229
 as British protectorate 作为英国保护国的~
 91, 94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宣布独立 88, 99
 oil fields of ~的油田 48-49, 60
 strikes in ~的罢工 87-88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167-168, 212
- electrical power 电力 32, 177-178
- Eley, Geoff 乔夫·埃利 18n12
- Ely, Richard T. 理查德·T. 伊利 132, 247
- energy 能源 1-15, 176-181, 190, 194
 alternatives to hydrocarbons 油气的替代选
 项 190, 247
 compression of space and time 时间与空间的
 浓缩 15
 decentralisation of ~的去中心化 238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4-5, 14, 43, 66, 109,
 142-143, 254
 and determinism ~与决定论 237-239
 and 'the economy' ~与“经济” 109-143
 exhaustion of ~枯竭 6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与“大分流”
 15-16
 and imperialism ~与帝国主义 15-18
 networks of ~网络 7-8, 18-42, 65, 66, 103,
 144, 236-237
 transition from coal to oil 从煤炭转到石油
 12-15, 31-36
- energy crisis ~危机 170-172, 175-181, 194
-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国能源信
 息署 197, 244, 246
- Engdahl, William 威廉·恩道尔 171n73
-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3-24
- ENI 埃尼公司 165
- environment 环境 38, 38n75, 175, 188-189
 as object of politics 作为政治对象的~ 176,
 189-193
 and oil spills ~与石油泄漏 189, 191
- eugenics 优生学 82, 131-133
-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欧洲煤钢
 共同体 29
- European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欧洲合作
 局 30n50
- European Petroleum Union 欧洲石油联盟 47, 56
-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ERP) 欧洲复兴计
 划。参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 expertise 专家知识 192-193, 238-241, 246

- Exxon 埃克森公司 95n30, 166, 171
- Faisal, Emir 费萨尔埃米尔 93, 96, 212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09, 208
- Featherstone massacre of 1893 1893 年费瑟斯通惨案 62
- Feder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联邦能源管理局 180
-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联邦动力委员会 177-178
- Federal Reserve 联邦储备局 223
- Feis, Herbert 赫伯特·菲斯 115
-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8, 23, 54-55, 58, 61, 66-69, 74, 86, 91, 141, 204, 225, 234
labour protest during ~期间的劳工抗议, 24-25, 78-79
- Fisher, Irving 欧文·费雪 131-135, 248
- Ford Motor Company 福特汽车公司 204
- Forrestal, James 詹姆斯·福莱斯特 41
- 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参 energy 能源; oil 石油; coal 煤炭; natural gas 天然气
-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经济教育基金会 142
- fracking 水力压裂法 249-251
- France 法国 18, 22-23, 25, 28-29, 39, 56, 58, 64, 69, 74, 80, 83, 86, 87, 90, 94, 100, 157, 161, 166, 215, 217, 222
- Franc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165
- Franklin Motor Company 富兰克林汽车公司 204
- Frisch, Ragnar 拉格纳·弗里希 135
- Galicia (Eastern Europe) 加利西亚 (东欧) 32, 46
- Galton, Francis 弗朗西斯·高尔顿 130-131
- Gandhi, Mohandas 莫罕达斯·甘地 73
- General Dynamics 通用动力公司 157
- George, Lloyd 劳合·乔治 79-80
- Germany 德国 18, 21-22, 25-28, 32, 39, 45, 56, 58, 63, 66, 70, 74, 79, 81, 128, 136, 156, 164, 208
- Glasgow 格拉斯哥 22
- Global Barometer 全球晴雨表项目 4。亦参 Arab Barometer project 阿拉伯晴雨表项目
-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资本主义 3, 203, 213, 229-230
and political Islam ~与政治伊斯兰。参 McJihad 麦当劳-圣战体制
-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2008-2009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 233
-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109-111, 155, 170-171
and coal ~与石油 127
and currency speculation ~与货币投机 110
- gold-mining 淘金 70
- Gómez, Juan Vicente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 5
- Goodrich, Carter 卡特·古德里奇 20
- Graham, Benjamin 本杰明·格雷厄姆 112
- Great Britain 英国 13-15, 110, 149, 161, 206, 215
depletion of coal reserves in ~煤炭储量的枯竭 124
and occupation of Middle East ~与占领中东 87
revolts against rule of 反抗~统治的起义 93-94
and sterling area ~与英镑区 118-119, 142
and strikes ~与罢工 22-23
- Great Coalfield War of 1913-1914 1913-1914 年煤田大战 25
- Great Depression 经济大萧条 194, 204
- Great Game 大博弈 52, 163
- Great Syrian Revolt (1925-1927) 叙利亚大起义 (1925-1927 年) 87
- Great Unrest (1910-1914) 大动荡 (1910-1914 年) 62-63
- Greece 希腊 18
- Greenpeace 绿色和平 238
- Greenspan, Alan 艾伦·格林斯潘 223
-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 136-140
- growth, limits to 增长的限度 175-176, 188-190, 234-235, 247-248, 253
- Guam Doctrine 关岛主义。参 Nixon Doctrine 尼克松主义
- Gulbenkian, Calouste 卡洛斯特·古本江 48, 97, 147

- Gulf Oil 海湾石油 179n15, 197
 Gulf War 海湾战争 221-222
- Hansen, James 詹姆斯·汉森 7n14
 Hardinge, Arthur 亚瑟·哈丁 59
 Harvey, David 大卫·哈维 223n51
 Hayek,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112, 141
 Hazlitt, Henry 亨利·哈兹里特 142
 Hecht, Gabreille 加里布埃尔·赫奇特 28n47
 Hirtzel, Arthur 亚瑟·赫策尔 92
 Hobson, J.A. J. A. 霍布森 69-72, 76, 82-84
 Hochschild, Adam 亚当·霍克希尔德 74n20
 Hoffman, Paul 保罗·霍夫曼 30n50
 Honolulu Oil Corporation 檀香山石油公司 142
 Hotelling, Harold 哈罗德·霍特林 195-196
 House, Colonel (Edward M.) 爱德华·M. 豪斯上校 83-84
 Hubbert, M. King M. 金·哈伯特 188, 248
 Hull, Edward 爱德华·赫尔 128-129
 Huntington, Samuel 塞缪尔·亨廷顿 194
 Hussein, Saddam 萨达姆·侯赛因 174, 213, 216, 221-223, 233
- Ibn Saud, Abd al-Aziz 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 30, 41, 92, 120, 204-205, 209-212
 Ibn Wahhab,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瓦哈布 204
 亦参 Wahhabism 瓦哈比主义
-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国际能源署 197, 244-247
- Ikhwan (Saudi Arabia) 伊赫万(沙特阿拉伯) 209-211。亦参 Muslim Brotherhood 穆斯林兄弟会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68-81, 89
 financial burden of ~的财政负担 93-94
 and air power ~与空军力量 93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101
 and political Islam ~与政治伊斯兰 202
 strategic interests ~战略利益 158-162, 227
 and racism ~与种族主义 207-208
- Inchcape, Lord 英奇凯普勋爵 58
- Index Visible 可视索引。参 Rolodex 轮转式索引卡片架
- India 印度 12, 17, 49-65, 89, 94, 202, 232
 Indian Railways 印度铁路 59-60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201
 industrial democracy 工业化民主 26-28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国防分析研究所 177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经济事务研究所 142
 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 燃气技术研究院 180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44
-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参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国际劳工局 78, 13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77, 110, 138
-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mission 国际石油委员会 118
-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uncil 国际石油理事会 112-113
- Iran 伊朗 144-147, 149, 157-161, 167-171, 174-175, 186, 202, 206, 215, 221, 232, 252
 labour unrest in ~的劳工动乱 107
 1953 coup ~1953 年政变 107-108, 144-145, 202
 oil dispute in ~的石油争端 121
- Iran-Iraq War 两伊战争 215-216
- Iraq 伊拉克 5, 10, 67, 81-83, 86, 88, 144-151, 158-159, 167, 174-175, 201, 205, 208, 211-217, 221-227, 234-235, 252。亦参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and arms trade ~与军售 10, 155-162, 170-171
 Ba'th Party 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151, 181, 213, 221
 Communist Party of ~共产党 145, 149-151
 control of oil industry ~对石油工业的控制 47-48, 96-98, 102-105, 225-226
 'native rule' in ~的“本土统治” 92-93

Oil Ministry ~石油部 151, 225
sabotage in ~国内的怠工破坏 94, 103
US invasion of 美国入侵~ 1-2, 84, 227
Iraq National Oil Company 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 151
Iraq Petroleum Company (IPC) 伊拉克石油公司(伊石油) 96-97, 102, 105, 147-151, 155, 169-170
Iraq War (2003) 伊拉克战争(2003年) 216-217, 217n21, 221-227, 232
Ireland 爱尔兰 94
iron industry 钢铁工业 13-14
Irwin, John 约翰·欧文 169
Ismail, Hafiz 哈菲兹·伊斯玛仪 182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巴以冲突 161-162, 176, 187, 215, 218-220, 222
1967 War 1967年战争 151, 157-158, 164, 182n28, 215n28, 219
October 1973 War 1973年十月战争 173, 181-187, 240
Israel 以色列 151, 158-162, 168, 181-186, 213, 215, 228
as oil conduit 作为输油通道的~ 164-166
Italy 意大利 18, 150n19, 161

Jackson, Henry 亨利·杰克逊 185, 222
Japan 日本 156, 169, 174, 186
Jennings, Brewster 布鲁斯特·詹宁斯 41
Jevons, H. Stanley H. 斯坦利·杰文斯 124n28
Jevons, William Stanley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124, 126-130, 132, 141, 234
jihad 圣战 203, 209, 213, 218
Jones, Tom 汤姆·琼斯 159
Jordan 约旦 201, 212, 219
Jumblatt, Kamal 卡迈勒·琼卜拉特 106

Kasr-i Shirin 席林堡 50
Keeling, Charles 查尔斯·基林 242-243
Kennan, George 乔治·凯南 121-122

Kern, Harry 哈里·克恩 212
kerosene 煤油 31-32, 34, 46-47, 58
Kerr, Philip 菲利普·克尔 79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11-113, 123, 134-136, 140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 174, 194, 197
Khanaqin 哈奈根 50
Kindleberger, Charles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37n73
Kipling, Rudyard 鲁德亚德·吉卜林 52
Kirkuk 基尔库克 102, 237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160-161, 182-186
Kitchener, Lord 基钦纳勋爵 52
Klare, Michael 迈克尔·克莱尔 41n79
Koch, Charles and David 查尔斯·科赫与大卫·科赫兄弟 198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157
Kurds 库尔德人 161-162, 220
Kuwait 科威特 145-146, 149-150, 162, 167, 174-175, 184, 206, 208-209, 216
Kuznets, Simon 西蒙·库兹涅茨 136-137

Labour Party 工党 76-79, 84, 92, 94, 98-101
labour 劳工 5, 19-39, 60-65, 70, 130, 225
and automation ~与自动化 152-153
and coal ~与煤炭 19-31, 66, 106-108, 232
and democratisatio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与“一战”后的民主化 76-85
and energy networks ~与能源网络 27
and oil ~与石油 31-39, 44-46, 151-155, 225-226, 228
racial segregation of 针对~的种族隔离 70, 82-83
unions 工会 8, 18, 26-27
and welfare ~与福利 77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64, 145-146, 202, 213, 217-218, 228
Lansing, Robert 罗伯特·兰辛 81n36
Laos 老挝 160
Latour, Bruno 布鲁诺·拉图尔 239, 246

- Laughlin, J. Laurence J. 劳伦斯·拉夫林 135
- Lawrence, T. E. T. E. 劳伦斯 101n47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8, 75-86, 92, 97-98, 138, 225
- Lebanon 黎巴嫩 106, 119, 212
- Lend Lease aid《租借法案》的贷款援助 114, 120
- Lenin, Vladimir Ilyich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69
-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自由国际主义" 94
- Libya 利比亚 144, 151, 162, 164-165, 168, 175, 227
- Liebig, Justus von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 127
- Linden, Henry 亨利·林登 180
- Lindsey Oil Refinery 林赛炼油厂 236
- Lippmann, 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 122, 141
- List,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26, 128
- Lockheed C-5A 洛克希德 C-5A 军机 183, 186
- Ludlow Massacre 勒德洛屠杀 25
- Lugard, Frederick 卢吉(弗雷德里克·卢加德) 86n1, 99-101
-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24, 33
- Lynch Brothers 林奇兄弟 50n14, 58
- Mackay, James (Lord Inchcape) 詹姆斯·麦凯(英奇凯普勋爵) 58
- Mackenzie King, William Lyon 威廉·莱昂·麦肯齐·金 26
- Macready, Nevil 内维尔·麦克雷迪 62
- al-Maghribi, Mahmud Sulaiman 马哈茂德·苏莱曼·马格里比 165
- Mallet, Serge 塞尔日·马莱 152-153
- Mamdani, Mahmood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80n34, 160n43
- Mandates Commission 委任统治委员会 86, 98, 101
- mandates 委任统治(地) 75, 77-86, 94, 122
- and civilisation ~与文明 86
- and development ~与发展 100-101
- 'dual mandate' 双重~ 86
- as mechanism of consent ~作为获得认同的机制 98-99
- Manin, Bernard 伯纳德·曼宁 18n11
- market 市场
- as mode of governing democracy ~作为治理民主的模式 196-198
- in oil 石油~ 167-170
- and political Islam ~与政治伊斯兰 203-204
- Marshall, Alfred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135-136
- Marshall, George 乔治·马歇尔 29
-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29-31, 37n73, 122, 142, 152, 236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24n33
- Masjid-i-Suleiman 马斯吉德苏莱曼 43, 44, 50n14, 54, 89
- Malthusians 马尔萨斯主义者 238
- Mattei, Albert 阿尔伯特·马泰 142
- Mattei, Enrico 恩里科·马泰 165
- Mazower, Mark 马克·马佐尔 72n15
- McCloskey, Deirdre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174
- McJihad 麦当劳-圣战体制 11, 200-230
- Mellon Family 梅隆家族 46, 197
- Memorandum on War Aims《战争目标备忘录》 76-78
- Mendès-France, Pierre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29
- Merriman, J.X. J. X. 梅里曼 82
-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47-68, 72-75, 80-84, 86
- map of ~地图 51
- 亦参 Iraq 伊拉克
- Mexican Eagle 墨西哥鹰石油公司 64
- Mexico 墨西哥 64, 67, 113-114, 167n65, 206
- MI5 军情五处 237
- Michigan 密歇根 27
- Middle East 中东
-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1-4
- and early oil exploration ~与早期石油勘探 43-65
- oil production in ~的石油生产 86, 97, 102-103, 113-114, 110
- and security ~与安全 187

Mikunis, Shmuel 什穆埃尔·米库尼斯 105
Milner, Lord Alfred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
71, 79n32, 86, 98-99
Mobil 美孚公司 95n30
Mombauer, Monnika[sic] 莫妮卡·孟鲍尔 74n22
Morel, E.D. E. D. 莫雷尔 73-76, 96
Morgenthau, Henry 亨利·摩根索 110
Moroccan Crisis of 1911 1911年摩洛哥危机 60
Morocco 摩洛哥 63, 72-75, 83-84, 201
Morris Motor Company 莫里斯汽车公司 41
Mossadegh, Muhammad 穆罕默德·摩萨台
107-108, 144-145, 159
Mosul 摩苏尔 47-48, 58, 84, 87n3, 91, 94-98
Mubarak, Hosni 胡斯尼·穆巴拉克 227-229
Mufti, Malik 马利克·穆夫提 149n14
mujahideen 圣战者(穆贾希丁军) 211, 218, 221
Mumford, Lewis 路易斯·芒福德 37
Mun, Thomas 托马斯·孟 126
Muslim Brotherhood 穆斯林兄弟会 202-203,
227-229
muwahhidun 穆瓦希德(认主独一者)。参
Wahhabism 瓦哈比派; Saudi Arabia 沙特
阿拉伯
Nasser, Gamal Abdel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201, 212-213
Nassikas, John 约翰·纳西卡斯 177, 179
National Bank of Egypt 埃及国民银行 49, 80
National Bank of Turkey 土耳其国民银行 5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国家经
济研究局 136
National Coal Board 国家煤炭委员会 189
national economy 国民经济 132, 134-139, 248
National Energy Act《国家能源法案》180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国家科学基金会 242
National Security Act《国家安全法案》41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国家安全委员会 218
National Union of Dock Labourers 全国码头工人
工会 22
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 全国矿工工会
236-237
nationalisation 国有化 28, 49, 67, 107, 114,
137-139, 144-151, 169, 237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44
native rule 本土统治 86
in Iraq 伊拉克的~ 92-93, 226
protectorates as 保护国作为实现~的方式 90-91
亦参 self-determination 自决
NATO 北约 163
natural gas 天然气 178-180, 188, 237, 249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177, 191
and market ~与市场 194-199
nature 自然
and collective life ~与集体生活 239
and expertise ~与专家知识 238-241, 246
limits of ~的限度 231, 238
politics of ~的政治 233, 252-254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112, 141-142, 173,
197-199, 223-228
Neumann, John von 约翰·冯·诺依曼 192
New Deal 罗斯福新政 124, 134, 141
Nigeria 尼日利亚 201
Nitzan, Jonathan 乔纳森·尼灿 156n32
Nixon Doctrine 尼克松原则 158-162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克松 160, 178-186,
190-192, 194
Nobel Brothers 诺贝尔兄弟 46-50
Northrop Corporation 诺斯洛普公司 159
Norway 挪威 206
nuclear power 核能 28n47, 178, 188, 191-192,
237, 243, 247
Nye, David E. 大卫·E. 奈 41n81
Obama, Barack 巴拉克·奥巴马 219
Occidental Petroleum 西方石油公司 166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244

Office of Fuels and Energy 燃料与能源办公室 181
oil 石油

comparisons to coal ~与煤炭的比较 37, 39-42
and conception of economy ~与经济的概念
139-143

currency linked to flow of 货币与~流动的联系 109-113, 119-123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43, 146n4, 156-162,
192, 252-254

depletion of reserves ~储备的枯竭 167, 188-90,
222, 231-246, 252. 亦参 peak oil 石油峰值

as kerosene 作为煤油使用的~ 31-32

'market price' ~的“市场价格” 167-170, 175

as mechanical power 作为机械动力的~ 32-33
and militarism ~与军国主义 155-162,

186-187, 214, 223-224

and nature-society divide ~与自然-社会的划分 245

networks ~网络 5-6, 36-39, 163, 176

and politics ~与政治 47, 235-241, 253

price of ~价格 30, 139-141, 154-155, 173-176,
190, 206, 233

problem of abundance ~充裕导致的问题
39-42, 43, 140, 163, 206

production of ~生产 1, 32-33, 144n1, 191, 232

Royal Navy and 皇家海军与~ 44, 57-65, 94

sands 油砂 250-251

shale 页岩油 249-251

as strategic resource 作为战略资源的~ 237

taxation of 对~的征税 162, 166-170, 184-186

volume of trade in ~贸易量 111

oil crisis of 1973-1974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
10-11, 171-199, 223, 243-244

and 'oil weapon' ~与“石油武器” 175, 180

'oil curse' “石油诅咒” 1-2, 5-6, 7n16

oil firms 石油公司 46-65, 104n60, 115

alternative energy ~与替代能源 178-179

as apparatus of control 作为控制装置的-
44-45

and calculation ~与计算 243-247

control of Middle East oil by ~对中东石油的
控制 86

and crisis ~与危机 149-151, 170-172,
178-181, 193

and environment ~与环境 188-193

and 'imperial' interests ~与“帝国”利益 45,
57-61

and imperialism ~与帝国主义 207, 229-230

and monopoly power ~与垄断权力 39, 60-61,
66-67, 97, 147, 163-167, 193, 205-207, 237

and oil price ~与油价 166-172

and production of scarcity ~与制造稀缺
40-45, 54-59, 86, 96-97, 146-147, 180-181,
205-207, 234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与“战略”利益
121-122

and tax rate ~与税率 184-186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 193

and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与汽车生产
商 41-42, 42n82

competition in ~内部的竞争 39

development of 石油工业的发展 45-49

and weakening the workforce 石油工业与劳
动力的削弱 35

oil pipelines 输油管道 147-149, 150-151,
163-164, 186, 200, 203

from Baku to Persian Gulf (trans-Persian) 从
巴库到波斯湾(跨波斯)的~ 49-50

invention of ~的发明 36

from Kirkuk to Haifa 从基尔库克到海法的~
102-105

from Kirkuk to Tripoli (Lebanon) 从基尔库克
到的黎波里(黎巴嫩)的~ 102-106

and Zionism ~与犹太复国主义 104-105

Oil Policy Committee 石油政策委员会 167

oil states 石油国家 6-11, 173, 201, 226

oil tankers 油轮 33n56, 37-39, 46, 154, 163, 175, 178

oligopoly 寡头垄断. 参 oil firms and monopoly

power 石油公司与垄断权力

OPEC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 10, 167-169, 178, 181, 184-186, 189, 196, 206, 212, 226, 245, 252

'open door' "门户开放" 80

Oppenheim, Lassa 拉萨·奥本海 90

Orinoco Basin 奥里诺科盆地 250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122

Ottoman-American Development Company 奥斯曼-美国开发公司 56-57, 96n34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15, 18, 21, 49, 55-58, 66-69, 75-76, 83-95

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 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 57, 75n23

Owen, Edgar Wesley 埃德加·威克利·欧文 57n31

Pakistan 巴基斯坦 106, 200-203, 218

Palestine 巴勒斯坦 80, 87, 91, 94, 99-100, 104-105, 237

partition of ~的分割 119

Palestine question 巴勒斯坦问题。参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巴以冲突

Paley Commission 佩利委员会 177n10

Panama 巴拿马 38

parasitism 寄生机制 45

peak oil 石油峰值 231-246, 252

calculation 对~的计算 6, 6n12, 241-246

亦参 oil, depletion of reserves 石油储量的枯竭

Pearson, Karl 卡尔·皮尔逊 131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36, 46

Pentagon 五角大楼 186, 218

Perle, Richard 理查德·珀尔 218, 222

Persia 波斯 43-65

Persian Bank Mining Rights Corporation 波斯银行矿业权益公司 52

Persian Gulf 波斯湾 30, 47-58, 90, 119, 158, 170, 181, 252

petrodollars 石油美元 156, 173, 214

petroknowledge 石油知识 139

petroleum 石油。参 oil 石油; energy 能源

Petroleum Industry War Council 石油工业战时理事会 142

Petroleum Reserves Corporation 石油储备公司 114

Petty, William 威廉·配第 126

Philby, Harry St. John 哈里·圣约翰·菲尔比 92, 204-205, 210

Pigou, Arthur Cecil 阿瑟·塞西尔·庇古 135

Polanyi, Karl 卡尔·波兰尼 21n20, 110, 125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125

and calculation ~与计算 127-128

objects of ~的对象 126

of oil 石油的~ 201, 205-209, 211-214

political Islam 政治伊斯兰 11, 200-226

and global capitalism ~与全球资本主义。参 McJihad 麦当劳-圣战体制

Port Said 塞得港 21

Pouget, Émile 埃米尔·普热 22, 39

protectorates 保护国 84, 88, 90, 99, 209-210

pyrolysis 热裂解 249-251

Qaddafi, Muammar 穆阿迈尔·卡扎菲 165-166

al-Qaeda 基地组织 204

Qaimmaqami, Linda Wills 琳达·威尔斯·卡姆阿卡米 120

Qasim, Abd al-Karim 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 145, 147-151, 181

race development 种族发展。参 eugenics 优生学

railways 铁路 14, 19-38, 46-77, 82-83, 96, 103-105, 128, 152-158, 233, 236-237

Rancière, Jacques 雅克·朗西埃 9n17, 18n11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18n36

recalcitrance 拒绝服从。参 sabotage 怠工破坏

Red Line Agreement of 1928 1928 年红线协定 97

rentier state 食利国家 1-2, 2n2, 201n4

Revolution of 1905 (Russia) 1905 年俄国革命 36, 64, 67, 234

- and Baku labour unrest ~与巴库劳工骚乱 33-34
- Revolution of 1910-1920 (Mexico) 1910-1920 年革命(墨西哥) 64, 75, 234
- Revolution of 1919 (Egypt) 1919 年革命(埃及) 87, 98-99
- Revolution of 1920 (Iraq) 1920 年革命(伊拉克) 88
- Revolution of 1979 (Iran) 1979 年革命(伊朗) 11, 162, 202, 215
- Reza Khan 礼萨·汗 64
- Ricardo, David 大卫·李嘉图 125, 141
- Rí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 37n72
- Rio Earth Summit 里约地球峰会 233
- Robinson, Joan 琼·罗宾逊 194, 195n65
- Rockefeller (family) 洛克菲勒(家族) 25-26, 95, 171
- Rockefeller, John D. 约翰·D. 洛克菲勒 205
- Rockefeller Plan 洛克菲勒计划 26
- Rolodex 轮转式索引卡片架 132-133, 248
- Romania 罗马尼亚 46, 165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115, 120, 136
- Roosevelt, Kim 金·罗斯福 159
-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133
- Röpke, Wilhelm 威廉·洛普克 142n73
- Ross, Michael L. 迈克尔·L. 罗斯 146n4
- Rothschild 罗斯柴尔德 46-57
- Royal Dutch/Shell 荷兰皇家/壳牌 5, 33n56, 46-49, 94, 113
- Royal Navy 皇家海军 44
- transition from coal to oil ~煤改油 57-65
- Rumaila oil field 鲁迈拉油田 148-151, 158
- Rumsfeld, Donald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216, 216n30
- Russia 俄罗斯 18, 31, 206, 217, 222
- use of oil in ~的石油使用 34
- Sabin, Paul 保罗·萨宾 41n81
- sabotage 怠工破坏 43, 47, 87 103-108, 144-172, 235-236
- and coal ~与煤炭 21-27
- new form of 新形式的~ 152-153
- by oil firms 石油公司主导的~ 39-42
- origins of word ~一词的来源 22, 22n26
- organized by the state 由国家组织的~ 145, 151, 162-166, 178-179
- and transportation ~与交通运输 153
- 亦参 strikes 罢工
- Sadat, Anwar 安瓦尔·萨达特 181-183, 202, 215
- al-Sa'id, Nuri 努里·赛义德 102
- Salafism 萨拉菲主义 187, 202
- Samuelson, Paul A. 保罗·A. 萨缪尔森 140
- San Remo agreements 圣雷莫协议 94-96, 95n29
- Santa Barbara 圣塔芭芭拉 191
-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6
-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14, 30, 92, 104-107, 114-115, 144, 146, 152, 162, 164-166, 169-170, 174-175, 182, 184, 200-214, 218-220, 231-232, 250, 252
- revolts in ~的叛乱 220-221
- strikes in ~的罢工 106-107
- US military bases in ~的美军基地 121
- Scaife, Richard Mellon 理查德·梅隆·斯凯夫 197-198
- Schumacher, E.F. E. F. 舒马赫 189
-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熊彼特 138-139
-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科学顾问委员会 6
- Scripps Institution for Oceanography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 243
-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10, 40, 77, 102, 107, 110, 121, 125, 137, 141, 165, 167, 173, 186, 206, 208, 211
- security 安全 41, 41n79, 158-163, 223n49
- and insecurity ~与缺乏安全 158, 187
- self-government 自治 26, 71-72
- self-determination 自决 35, 68, 80n35, 90, 98
- as ideal 作为理想的~ 68-69, 72, 84-85
- as mechanism of consent 作为获得同意的机

制的~ 79-80
as method of control 作为管控方式的~ 68
and 'minorities' ~与“少数民族群” 99-100
as solution for imperialism 作为帝国主义解
决方案的~ 90
September 11 attacks “9·11” 袭击事件 204,
221, 223-224
Serbia 塞尔维亚 18
shah of Iran 伊朗沙阿 107-108, 159-160, 202,
215, 217-218
Shatt al-Arab 阿拉伯河 91, 215n28
Shell Oil (Shell Transportation Company) 壳
牌石油(壳牌运输公司) 46-60, 148, 188,
247-248。亦参 Royal Dutch/Shell 荷兰皇
家 / 壳牌
Sierra Club 塞拉俱乐部 191
Six-Day War 六日战争。参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巴以冲突; 1967 War 1967 年战争
Smil, Vaclav 瓦克拉夫·斯密尔 6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26
Smuts, Jan 扬·史末资 72-73, 79-83
Söderbergh, Bengt 本特·索德堡 250n30
solar energy 太阳能 12
Solow, Robert 罗伯特·索洛 194-197
South Africa 南非 69-73, 81-83
and Afrikaner republics ~与阿非利卡人共和
国 70-72
general strike in ~国内的总罢工 72
South African Native Affairs Commission 南非
土著事务委员会 82
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 南非土
著人国民大会 73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南非战争(1899—
1902 年) 35, 69-70
Soviet Union 苏联 97, 121-122, 151, 155, 157,
163-168, 206, 215-218
Spain 西班牙 18, 165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33, 115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 (Chevron)

加州标准石油公司(雪佛龙) 204-205, 210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
司。参 Exxon 埃克森公司
Standard Oil 标准石油公司 27, 32, 40, 46-64, 68,
75, 80-81, 96-97, 205
dissolution of ~的解体 95n30
support of unrest by ~对骚乱的支持 32, 95-96
State Department (US) 国务院(美国) 57, 102, 106,
113-118, 142, 159-161, 169, 181-184, 190, 200
steam power 蒸汽动力 13-14
statistics 统计学
and coal ~与煤炭 128-130
emergence of ~的兴起 130
strikes 罢工 18-42, 61-64, 87, 103-107, 211, 225,
228, 235-237
general strike 总~ 23-27, 72, 79, 107, 152-153, 211
and oil ~与石油 162-165, 198, 211
and work stoppages ~与停工 153
亦参 sabotage 怠工破坏
structure 结构 61-65, 74-75
Sudan 苏丹 88, 220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37n72, 88, 158, 163-165,
168, 182, 186
Sumatra 苏门答腊 46
Sumner, William Graham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
纳 133
Sweden 瑞典 163n51
Sykes-Picot Agreement 赛克斯-皮科协定 87n3
Syria 叙利亚 80-81, 92, 119, 144, 150-151, 158,
164-166, 187, 201, 222, 227
CIA-organized coup in 中情局在~筹划的政
变 105
independence of ~独立 87
Syrian General Congress 叙利亚全民大会 87

Taft, William 威廉·塔夫脱 75
Tahrir Square 解放广场 215, 227-229
Talib, Sayyid 赛义德·塔利卜 92
Taliban 塔利班 200, 202-204

- Tapline 跨阿拉伯输油管道 152, 164-166
- Taqizadeh, Sayyid Hasan 赛义德·哈桑·塔吉扎德 64
- Tbilisi 第比利斯 33
- Technocracy movement 技术专家治理运动 247-248
- technological zones 技术区 40
- technologists 技术主义者 238
- technology and controversy 技术与争议 238-239
- Texas 得克萨斯州 27, 195-196, 234
- 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 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 166-167
-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236
- Thawrat al-Ishrin 1920 革命。参 Revolution of 1920 (Iraq) 1920 年革命(伊拉克)
- think tanks 智库 158 197-198, 223
-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美国企业研究所 198
-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198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158, 198
- Heritage Foundation 传统基金会 198
- Hoover Institution 胡佛研究所 198
- Manhattan Institute 曼哈顿研究所 198
-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245
- Thompson, E.P. E.P. 汤普森 21n20
- Tinbergen, Jan 扬·廷贝亨 134
- Torrey Canyon “托利卡尼翁”号 38, 38n75
- Trans-Arabian Oil Company 跨阿拉伯石油公司 105
- Trans-Arabian Pipeline Company 跨阿拉伯输油管道公司 104, 119
- Trans-Asiatic Oil Ltd 泛亚石油公司 164-165
-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 78n30
- Triple Alliance 三头同盟 23
- Tripoli (Lebanon) 的黎波里(黎巴嫩) 102
- Truman, Harry 哈里·杜鲁门 120
- trusteeship 托管制度 113-115, 118, 121-122
- Tudeh Party 伊朗人民党 107
- Tunisia 突尼斯 227
- Turkey 土耳其 95, 220
-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 土耳其石油公司 57-59, 67-68, 94-97
-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64, 182, 225-226
- sanctions regime (Iraq) ~制裁体系(伊拉克) 216-217, 221-222, 225, 232
-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233, 238
- production of ~的创造 241-247
-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民主控制委员会 76
- Union Oil 联合石油公司 191
-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6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77, 138
- United States 美国 110, 138, 149-151
- and gold reserves ~与黄金储备 111
- oil embargo of 对~的石油禁运 164-166, 170-199
- Unocal (Chevron) 优尼科公司(雪佛龙) 200, 203
- uranium 铀 179, 179n15
- US Congress 美国国会 175, 179n15, 242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美国商务部 136
- US Federal Reserve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135
- US National Petroleum Council 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 180
- US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for War 美国战时石油管理署 114
- uselessness 无用性 154-158
- USGS (US Geological Survey) 美国地质调查局 244-246
- Veblen, Thorstein 索尔斯坦·凡勃伦 22n26, 39-40, 132, 156n33, 188n47, 247
- Venezuela 委内瑞拉 5, 114, 167, 201, 206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154, 157, 160, 183, 186, 218
- Viner, Jacob 雅各布·维纳 131
- Vitalis, Robert 罗伯特·维塔利斯 2n2, 41n79, 106n69
- Volkswagen Beetle 大众甲壳虫轿车 41
- Wahhabism 瓦哈比派 202-214, 218-221

- Wales, coal-mining strikes in 威尔士的煤矿罢
工 22, 37n72, 61-62
- Warr, Benjamin 本杰明·瓦尔 140n67
- Watts, Michael 迈克尔·瓦茨 2n2
- Weather Bureau 美国气象局 242
- White, Harry Dexter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111,
112n7
- Wilhelm II, Kaiser 德皇威廉二世 21
- Wilson, Arnold 阿诺德·威尔逊 89
-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8, 68, 75, 80-85
and Fourteen Points ~与十四点和平原则 80-81
- Witwatersrand goldfields 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
69-70, 110
- Wolfe-Hunnicut, Brandon 布兰登·沃尔夫-亨
尼科特 149-151, 162
- women's movement 妇女运动 27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77, 110, 138
-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世界气象组
织 242-244
- World War I “一战”。参 First World War 第一
次世界大战
- World War II “二战”。参 Second World War 第
二次世界大战
- Worthington, John 约翰·沃辛顿 56
- Yalta 雅尔塔 120-121
- Yapp, M.E. M. E. 亚普 52n17
- Yemen 也门 201, 218, 221, 227
- Yergin, Daniel 丹尼尔·耶金 44, 68, 185
- Young Turk Revolution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
55n27, 56, 75
- Zapata, Emiliano 艾米里亚诺·萨帕塔 64
- Zia ul-Haq, Muhammad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 202
-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119, 120, 219n39
and oil pipelines ~与石油管道 104-105
and settlement in Palestine ~与巴勒斯坦的
安排方案 87, 99-100
- Zonguldak coalfield 宗古尔达克煤矿 21



三辉图书

上架建议：

政治、能源、中东研究

ISBN 978-7-305-26007-0



9 787305 260070 >

定价：84.00 元